



国 外 马 克 思 学 译 丛

马克思学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其考据研究和文本解读研究以及取得的理论成果对当代马克思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书通过对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梳理和译介，试图从国外马克思学主要代表人物、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揭示国外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新阶段和新特点，以期为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 and 理论参照，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哲学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空间。

鲁克俭 / 主 编

# 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 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

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美] 莱文 / 著 臧峰宇 /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译丛

鲁克俭 / 主编

# 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 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

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美] 莱文 / 著 臧峰宇 /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美)莱文(Levine,N.)著;臧峰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国外马克思学译丛)

ISBN 978-7-303-10637-0

I. ①不… II. ①莱…②臧… III. ①黑格尔—哲学思想—对比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IV. ①B516.35 ②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743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5417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2  
字 数:266千字  
版 次: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

策划编辑:饶涛 祁传华 责任编辑:祁传华  
美术编辑:高霞 装帧设计:高霞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 版权声明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 Lexington Books 授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Divergent paths :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Norman Levine

©2006 Norman Levine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9,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 “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编委会

主 编：鲁克俭

副主编：杨学功 张秀琴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歌 王雨辰 王峰明 文 兵

仰海峰 刘森林 吴向东 沈湘平

张文喜 张立波 周 凡 聂锦芳

袁吉富 韩立新

# 总序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划和准备，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正式推出这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现就译丛的编译旨趣、编译原则和工作分担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对于“马克思学”<sup>①</sup>这个术语，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我们认为，如果不过分纠缠于吕贝尔创制 *Marxologie* 这个法文词的特定含义，而是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学就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学术性研究。

---

<sup>①</sup> “马克思学”的法文和德文都是 *Marxologie*，英文是 *Marxology*，俄文是 *марксоловедение*。

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的研究成果通常是马克思传记。比较有代表性且已译成中文出版的有弗·梅林的《马克思传》(1918年)<sup>①</sup>、东德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1968年)<sup>②</sup>、苏联学者彼·费多谢耶夫等著的《马克思传》(1973年)<sup>③</sup>、苏联学者斯捷潘诺娃的《马克思传略》(1978年)<sup>④</sup>、英国马克思主义家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sup>⑤</sup>等。

关于著作版本的研究成果有几种形式：一是马克思著作年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院长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1934年)<sup>⑥</sup>、吕贝尔的《没有神话的马克思》(1975年)<sup>⑦</sup>等；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题注”以及MEGA2资料卷对马克思著作(含手稿)和书信的写作时间、版本情况、文本写作过程和手稿修改等情况的介绍；三是马克思文献学专家发表的有关马克思著作版本考证的研究论文。

关于马克思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专著，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马克思思想传记，如吕贝尔的《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年)<sup>⑧</sup>、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1954、1958、1970年)<sup>⑨</sup>、麦克

① Franz Mehring,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er Bchdruckerei A. G., 1918. 该书有两个中译本：一是罗稷南译本，由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出版，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一是樊集译本，由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② 中译本由易廷镇、侯焕良译，三联书店1978年出版。

③ 中译本由孙家恒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

④ 中译本由关益、李荫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⑤ 原书名是《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思想》，1973年出第1版，2006年出第4版。中译本由王珍根据第3版和第4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2008年再版。

⑥ 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在索引部分列出“马克思著作索引”，包括三个部分：甲，书籍、小册子和重要手稿；乙，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给报纸编辑部的信，以及声明、公告、呼吁书和文件；丙，文章、报告和演说。

⑦ Maximilien Rubel and Margaret Manale, *Marx Without My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75.

⑧ Maximilien Rubel, *Karl Marx :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Librairie Marcel Riviere et Cie, 1957.

⑨ Auguste 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 Leur vie et leur oeuv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5, 1958, 1970.

莱伦的《马克思思想导论》(1971、1980、1995、2006年)<sup>①</sup>等。(2)对马克思思想的分期研究,如日本学者广松涉的《唯物史观的原像》(1971年)<sup>②</sup>、苏联学者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1976年)等。(3)对马克思理论的整体研究,如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sup>③</sup>、艾尔斯特的《卡尔·马克思导论》(1990年)<sup>④</sup>等。(4)对马克思某一方面思想或具体著作的专题研究,如阿维内里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1970年)<sup>⑤</sup>、德雷珀的四卷本《马克思的革命理论》(1977、1978、1981、1989年)<sup>⑥</sup>、奥尔曼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1971、1976年)<sup>⑦</sup>、科恩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1978、2000年)<sup>⑧</sup>、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年)<sup>⑨</sup>、卡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1983年)<sup>⑩</sup>、拉雷恩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1983年)<sup>⑪</sup>、拉比卡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87年)<sup>⑫</sup>、克拉克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1994年)<sup>⑬</sup>、莱文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

① David McLella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n Introduction*, Harper and Row, 1971, 1980, 1995, 2006.

② 该书中文版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③ Allen W. Wood, *Karl Marx*,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2004.

④ Jon Elster, *A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⑥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⑦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76.

⑧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2000. 重庆出版社1989年根据该书第1版出了岳长龄的中译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根据第2版出版了段忠桥的中译本。

⑨ Antonio Negri, *Marx oltre Marx: Quaderno di lavoro sui Grundrisse*, Milan, Feltrinelli, 1979.

⑩ Terrell Carver, *Marx &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⑪ Jorge Larrain, *Marxism and Ideolog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⑫ Georges Labica, *Karl Marx. les Thèses sur Feuerbach*,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7.

⑬ Simon Clarke, *Marx's Theory of Crisis*,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2006年)<sup>①</sup>等。

马克思学主要分考据性研究和文本解读研究两种类型。“考据”包括对马克思生平事业中历史细节的考据,对马克思思想观点的来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考据,对马克思著作版本的文献学考据等。“文本解读”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思想的要旨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和阐释。人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思想的要旨和理论体系的言说,实际上都不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在进行“文本解读”。

作为专门术语的“马克思学”,或与之相近的名词虽然20世纪初才出现<sup>②</sup>,但马克思研究却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甚至在马克思生前即已存在的学术现象。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所写的多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和书评<sup>③</sup>,以及他在马克思逝世后为马克思著作所写的大量再版序言或导言等,就是这种研究存在的证明。此外,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评论或批判,在广义上也属于“马克思研究”的范畴。正因如此,列宁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说:“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他列举了威·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书目》(开列了300本书)、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新时代》杂志上的索引、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等,供读者参阅。列宁还提到了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年)、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

---

<sup>①</sup> 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Lexington Books, 2006.

<sup>②</sup> 一般认为,西文中“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术语是法国学者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创制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1904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阿德勒就与希法亭一起创办了《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杂志,而且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就已出现俄文词“马克思学”(марксведение)。

<sup>③</sup> 例如,恩格斯1859年8月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书评,1877年6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传记等。

年)以及《马克思研究》杂志<sup>①</sup>等。

马克思学可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两大派别。恩格斯和列宁为后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奠定了基本解读框架。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认为马克思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学家。列宁认为，经济学说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资本论》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被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的思想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但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等等。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在梁赞诺夫(Riazanov, 1870—1938年)<sup>②</sup>那里得到发扬光大。梁赞诺夫早年投身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两次流亡国外(德国和奥地利)。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进行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积极寻找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早在1905年前就被列宁评价为“视野广泛、有丰富学识、极好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文献遗产”。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筹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sup>③</sup>，并任第一任院长(1921~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特别是在列宁支持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对马克思恩格斯大量原始手稿和书信进行照相复制，培养了一批马克思字迹辨认专

① *Marx-Studien. Blätter zur Theorie und Politik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herausgegeben von Dr. M. Adler und Dr. R. Hilferding, 1904—1923.

② 原名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戈尔登达赫。

③ 1924年起，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为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机构。1931年11月，它与1924年成立的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56年改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

家，启动了历史考证版<sup>①</sup>。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编辑和出版，梁赞诺夫还出版了许多关于马克思革命活动及思想理论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27年)<sup>②</sup>和大部头著作《马克思主义史概论》(1928年)，主编《卡尔·马克思：伟人、思想家和革命家》(1927年)<sup>③</sup>等。1930年梁赞诺夫60寿辰时，他的学生索拜尔<sup>④</sup>评价说：“梁赞诺夫不仅是当代俄国，而且是当代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研究者，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他为马克思研究打开了真正无限广阔的历史和视野……梁赞诺夫在进行马克思学研究的初期就已作为特殊标志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征，是在理解和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力求有条理和尽可能地完整。”

梁赞诺夫使马克思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促成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传统，并为阿多拉茨基后来编辑出版MEGAI奠定了基础。俄文“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一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苏联的出版和研究史》<sup>⑤</sup>一书第109页写道：“在这些年间，这家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马克思学’这一术语，并试图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些年间”是指1922~1923年，“这家杂志”是指《哲学问题》的前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苏联马克思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和出版有密切的关系。1982年苏联学者博尔迪烈夫就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50卷)出齐，说

① 即MEGAI(1927~1935)。

② 该书1927年在伦敦出版了英文版。1929年以《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出了中文版(李一氓译，上海江南书店出版)，1933年又出了刘侃元译本(上海春秋书店出版)。

③ D. B. Riazanov ed., *Karl Marx—Man, Thinker, and Revolutionist*, Martin Lawrence, 1927.

④ 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驻维也纳大使。

⑤ 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69年出版。

成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而从1975年开始出版的MEGA2各卷次的资料卷，更是代表了当今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的代表，他们身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和马克思学家(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旨在通过挖掘马克思丰厚的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批判或改良资本主义提供理论支点。

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的主流，而吕贝尔是学院派马克思学研究的代表。19世纪40年代，吕贝尔从收集有关马克思生平传记和著作目录的资料入手投身于马克思学事业，并因创制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和主编刊物《马克思学研究》<sup>①</sup>，而在20世纪下半叶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名词。按照吕贝尔自己的说法，他自觉地继承格律恩贝尔格<sup>②</sup>和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传统，注重考据和思想研究相结合。具体来说，吕贝尔规定了马克思学研究的三项任务：一是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二是批判的分析的评论；三是文献和图书。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和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强调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当然，研究者事实上很难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因为任何解读研究都会存在“合法的先见”。

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当然，我们不应将学院派的马克思

---

① *Etudes de Marxologie*, 1959—1994.

② 格律恩贝尔格(Karl Grünberg)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的老师 and 亲密朋友。他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年)发表了大量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后以《格律恩贝尔格文库》而闻名。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最早就发表在《格律恩贝尔格文库》(1923年)。1924年苏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达成协议，在出版MEGA方面进行合作，《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也就成为MEGA1的配套研究刊物。



学研究随意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免犯下将洗澡水和孩子一同泼掉的错误。

## 二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被当时的志士仁人和知识精英选择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常常是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时代任务紧密结合的。但是，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以随意解释的灵丹妙药或实用工具，而是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首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思想学说的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因此对它的学理研究又往往是与对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译介相互伴随的。

早在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理论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宣传 and 普及，也开始对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比如，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1892—1967 年）所著的三卷本《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1930～1932 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中有蔡元培先生写的序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1953 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 50 卷（1956～1985 年）陆续出版，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也逐步开展起来。首先是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大量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研究成果（专著以及论文）被翻译出版；其次是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学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译介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说以前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偏向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而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国

外马克思学成果的译介。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甚至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从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适应人们了解国外思潮的需要，学界开始译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因为随着苏东剧变，苏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地位，人们比以前更加迫切地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近二十年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外，进一步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逐渐从以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许多学者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事实上，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通过学者们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如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此外，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

也都收入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出版了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总数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通论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又有专题、思潮研究以及人物和文本个案研究。即使不专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现在也比较注意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建构。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锻造和培育了一批学养深厚、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烈程度相比，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学的译介和研究则相当冷清。这主要与人们对“马克思学”所持有的约定俗成的偏见有关。

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通过苏联学者的一些著作有所了解。但是由于受当时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持完全排斥否定的态度。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虽然学界开始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进行系统的评介，但是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定性并未改变。其实，从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马克思学，以版本考证、文献梳理、人物思想关系研究为特征和内容；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即带有明显现实关怀的研究。“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回到马克思”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趋势并在中国产生回响，较之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学者更能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中发现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

2007 年初，在众多前辈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论坛”。在此期间，鲁克俭向杨学功和张秀琴谈了编译“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设想，迅即得到他们的响应。三人开始协商编译原则，搜集和遴选书目，并

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丛书方案，同时联系国外作者、版权以及国内译者和出版社。后经征求论坛成员的意见，大家都积极献计献策。在此过程中，中山大学的刘森林、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向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歌给予了十分热情的襄助，他们或者帮助推荐书目，或者联系作者和版权，或者承担相关译事。令人感动的是，不少外国作者向我们免费赠送了版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经理兼总编辑杨耕教授独具慧眼，慷慨接受了我们的计划，高教分社副社长饶涛博士和责任编辑祁传华同志为本译丛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所以，本译丛得以顺利出版，是全体编委协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出版者敬业工作的产物，还包含众多前辈学者以及国外作者的关切和帮助。这里虽然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尊名，但我们一定会记住他们为此所做的一切。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学的评价还很不平衡。有的学者明确提出“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口号和纲领，有的学者则仍然对马克思学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们认为，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说实话，即使是在主编之间和编委内部，对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但这并没有影响译丛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具体观点或结论，但不能回避他们提出的问题。譬如西方马克思学所谓“马恩差异(对立)论”，作为一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借用卡弗的话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是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谁也不能否认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解。

应该承认，与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相比，中国的马克思研究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一方面，我们缺乏原创性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所探讨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超出西方马克思学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问题。苏联马克思学以考证研究见长，西方马克思学以文本解读研究见长。中国不像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那样拥有马克思著作全部手稿的复制件，也没有实质性参与 MEGA2 的编辑工作，因此中国学者要在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方面超过苏联马克思



学，是相当困难的，但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马克思学。伴随着改革开放 30 年来思想解放的深入，中国马克思研究者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宽松的学术环境，因此完全有可能像西方马克思学者那样生产出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为达此目的，首先有必要全面了解和译介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新成果，避免做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这是深化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开创者吕贝尔的著作）大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们策划出版的这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就是希望把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全面译介过来。继首批 6 本之后，我们将根据版权落实情况 and 翻译进展，陆续分批出版，形成规模和系统，进一步夯实中国马克思研究的学术基础，以期逐步达到与当代中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马克思研究应有的世界领先水平。

望海内外有识之士不吝批评匡正，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鲁克俭 杨学功

2009 年 11 月 16 日于北京

# 作者简介

**诺曼·莱文**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左派政治理论中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重要的分歧，并坚持认为马克思汲取和沿用了黑格尔哲学的关键要素。莱文教授出版了四部著作来阐述他的分析：《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这部著作打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连字符；《辩证法内部的对话》，证明辩证法的变革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所接受；《民主化进程》，分析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乔治·卢卡奇的政治哲学；以及目前这部著作——《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描述了黑格尔在马克思早期著作（1839~1841年）中施加的影响。莱文教授目前正在写第二卷，将在近期完成，论及马克思—黑格尔的共生，追踪黑格尔在马克思1841~1848年著作中的在场。

# 中文版序言

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对马克思的重新黑格尔化，而《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致力于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

《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出版于2006年，是预计出版三卷本丛书的第一卷，该书旨在研究从1836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这段时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关系。《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主要关注马克思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我目前正在撰写该研究的第二卷《看不见的黑格尔》，计划今年完成，主要研究从1841年至1850年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是我重塑马克思主义这项事业的最初阐述。该书第三章明确指出马克思从《逻辑学》中借用的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而这些方法论的形式为马克思提供了他变革社会—经济研究范式所需要的逻辑工具。马克思转变了社会科学的解释原则。在这篇序言中，我将简要描述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分类，并指出马克思主要提供了关于社会科学的新哲学。

为了阐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界定，首先有必要揭示的是，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标签是对马克

思思想真实内容的歪曲。

#### A) 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约瑟夫·斯大林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跨越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段岁月，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时期。“辩证唯物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

尽管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发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界定其特征的人。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的运转依靠矛盾、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这三个辩证的规律。这三个辩证的规律来自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恩格斯使它们成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运行原则。

苏联马克思主义使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他们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教条。斯大林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自然辩证法”是苏联共产主义最终胜利的保证。斯大林主义假定“自然辩证法”是如下论断无可辩驳的根据：社会转型是历史内在固有的；历史变迁终将使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于现行的历史发展观，它假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对历史的线性解释。

苏联解体也是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覆灭。新时代的后苏联（post-Soviet）哲学开始于1991年，而后苏联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去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

#### B)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在其中描述了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中第一次得到了阐明。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还描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性的有机体，而上层建筑是文化领域的各种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文化的王国是对经济—生产性前提的投影。“历史唯物主义”优先看重一个社会的生产者阶层，认为理念的王国是经济基础的缩影。



通过揭示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核心的观点无效了。特别是关注语言分析的发展和实践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认为文化领域独立于经济基础的重要思想学派。让·鲍德里亚和雅克·德里达的著作，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学研究为基础，驳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文化仅仅是社会经济组成部分——比如阶级、所有权和劳动——的映像。

我相信，马克思既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试图证实这个结论，因此，这本书标志着我作为马克思主义支持者的成熟时期的重要阶段。

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的出版，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自身成长是不可能的。出版于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由曼弗雷德·纽豪斯博士主持编辑，MEGA<sup>2</sup>发表了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前不为人知的手稿，尽管在这篇序言中，我主要关注马克思的材料。马克思的这些手稿其中之一是为撰写《资本论》而准备的1861~1863年笔记。当我2000年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从事研究的时候，我有幸看到了这些大纲，而这些材料证实了我的想法：黑格尔的方法论对马克思具有重要影响。我随后发表了一篇论述该问题的文章，对黑格尔—马克思的相互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参阅我的论文《黑格尔和〈资本论〉的1861—1863年手稿》<sup>①</sup>。该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MEGA<sup>2</sup>第二部分第3卷第1册、第5册和第6册。MEGA<sup>2</sup>第二部分完全是与《资本论》的形成相关的准备材料。

此外，对《资本论》三卷本的当代理解因为MEGA<sup>2</sup>出版的此前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文本而被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早期编辑，达·梁赞诺夫和弗·阿多拉茨基，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版发行了马克思的某些手稿，或允许不正确的或在政治上倾向于赞成

<sup>①</sup> 该文发表于RETHINKING MARXISM, Vol. 14, No. 4, 2002。

斯大林主义的文本或评论收入他们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之中。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由莫斯科和东柏林合编，随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为基础，也收录了支持斯大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评论。MEGA<sup>2</sup>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最客观和最详尽的版本，它开始了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对马克思原貌的忠实而符合事实的理解只能回到MEGA<sup>2</sup>的页面上来，而现在有必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前MEGA<sup>2</sup>时代和后MEGA<sup>2</sup>时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只能在依赖MEGA<sup>2</sup>的条件下展开。

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的编辑所收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在也属于历史的灰尘。《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编排是无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释和栏外的评论并不连贯，而莫斯科—东柏林作了过度且不准确的解释。2004年，《马克思恩格斯年鉴》与MEGA<sup>2</sup>联合发表了由汉斯·派尔格编辑的“费尔巴哈”章的新版本，该版本提供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意图的更为忠实的描写。

作为从这些新发表的文本中受益的人，我越来越相信，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社会分析方法的基础。我发现自己赞同最近被称作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或体系辩证法的马克思解释学派。我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第一章中提到过，这个学派的两个杰出的成员是托尼·史密斯和克里斯托弗·阿瑟。我还想在这个名单中添加弗雷德·莫斯利教授的名字。作为经济学家，莫斯利在两本文选——《马克思方法新探》（Humanities Press, 1997）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Humanities Press, 1993）中，整合了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黑格尔主义基础的论文。莫斯利是以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的显要观点重写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力量。

我自己对黑格尔的解读使我确信对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的需要。然而，我对马克思的重新黑格尔化与恩格斯的方案是完全相反的：恩格斯将辩证法置于自然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自然哲学，而

我要探究的是，马克思如何借用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去揭示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我拒绝所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线性解释，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它们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主义的形式，成为随着时代逐步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我自己著作依据的理论是，马克思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解释公式。马克思打破了以往所有社会科学的诊断，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分析原则，而这个原则主要来自于《逻辑学》的“本质论”。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变革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或者说马克思的解释方法是由四个原理组成的。

(1) 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在他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期间并不主要关注历史的预见，他并不想描述社会运动的内在趋势。他主要关注的不是历史的预言。

在第二个层面上，可以得出关于社会发展的未来可能的结论。马克思实现的主要意图可能是关注潜在的结果。比如说，在政治活动的实践层面上，他可能思考政治活动必须超越社会压迫的形式。

(2) 首先，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科学解释的理论家。他发展了社会研究的新范式。

这个新范式的核心是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性思想。黑格尔认为，如果一个事物不能被视为总体的一部分，这个事物就不可能被理解。总体性提供了意义的语境，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运用这个原理对他们的方法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特殊性总是包含在总体性中，因此，特殊性通过参与在总体性中而获得了它们的意义。《逻辑学》中“本质论”的核心主题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部分只能在整体的语境中找到自身的意义。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关于整体一部分的辩证法，这种对立面的统一成为马克思解释科学的轴心。

(3) 追随黑格尔，马克思将社会理解为有机的系统。以总体性

概念为基础，基于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马克思将社会规定为有机的系统。每个社会都是一种社会形态，都有由普遍本质支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由利润的持续稳定的本质规定的。社会形态必然被理解为由本质推动的有机的系统。

(4) 马克思只有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将他的有机体系叙述清楚。只有黑格尔主义的逻辑学体系提供了把握有机的普遍性的内在功能的逻辑。

对马克思社会研究范式的这个简要的概述是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或体系辩证法的一个例子。它是由黑格尔主义逻辑范畴的内在联结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的内在机制是通过辩证的方法论范畴得到理解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运动只有通过运用辩证的逻辑，才能得到最好的把握。辩证法不是力量之源，它不是生产方式的力量，而是解释总体性的力量。体系辩证法理解的社会形态使我们认识到社会总体性的真实本性。

基于上述四个原理，我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分类。马克思是社会科学的逻辑学家，这是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的主要路径。马克思引发了社会科学诊断方案的哥白尼式革命。

我要感谢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杨金海研究员和鲁克俭研究员，他们使《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被译成中文成为可能。鲁克俭研究员最初提出了翻译计划，并坚持不懈地推动这个计划的完成。

莱文

2009年2月21日

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 目 录

## 导 言 · 1

## 第一章 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历史编纂学 · 13

- 一、乔治·卢卡奇/泰欧多尔·阿多诺 · 23
- 二、路易·阿尔都塞/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 42
- 三、让-伊波利特/赫伯特·马尔库塞 · 74
- 四、乔恩·埃尔斯特/约翰·罗默 · 86
- 五、葛兰德·科亨/托尼·史密斯 · 97
- 六、菲利浦·范·帕里斯/克里斯托弗·阿瑟 · 109
- 七、结语 · 113

## 第二章 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 116

- 一、1837——恩格斯夭折的教育 · 120
- 二、1838~1841——恩格斯在不来梅 · 122
- 三、1841~1842——恩格斯在柏林 · 157

### 第三章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 193

- 一、不密切相关的领域 · 194
- 二、密切相关的领域 · 195
- 三、创作的过程 · 196
- 四、马克思的总体构思 · 246
- 五、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 · 252
- 六、马克思和宗教 · 254
- 七、马克思和唯物主义 · 255
- 八、马克思和国家 · 259
- 九、从思辨哲学到批判 · 264
- 十、马克思的科学哲学 · 268
- 十一、发展理论 · 277
- 十二、马克思的方法 · 286

### 参考文献 · 292

### 索引 · 304

### 译后记 · 318

## 导言

我本来打算用冗长而独立的一卷容纳乔治·威·弗·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的全部学术关系，但当我的研究有所进展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个主题太大，以至于不能在了一本专著中处理。黑格尔从1837年开始驻留在马克思的心中，即他撰写论黑格尔的诗《黑格尔。讽刺短诗》这个日子，直到他1883年去世。勾勒这两个天才跨越46年的思想共生图景，不仅需要掌握马克思的思想，而且需要掌握黑格尔哲学，而这个主题不是单一的一卷所能容纳的。

因此，我退回到这样的立场上来：出版单独一卷，考察近50年的马克思—黑格尔关系重要连接点的关键性时刻。用一本专著来存储关于马克思—黑格尔的五花八门的资料是不可能的，原来的设计因而拓展为一套系列丛书。统一于一个基本的主题，多卷本系列丛书中的每一本都将考察黑格尔—马克思关联的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

整套系列丛书名叫《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读者目前手持的这本书是第一卷，它的题目是《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其余各卷将在随后几年内出版。

《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包括三章：“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历史编纂学”，“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这本书的主要焦点是马克思，我将在下面说明为什么这个研究包括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章。

这个导言以五个专题的形式编排：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借用分为两个时期；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借用分为两个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别；各种派别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作者的结论。我将在下面的段落中分别解释每个专题。

##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借用分为两个时期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更详细地解释的，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分为两个时期，从1837年到1850年，以及从1850年直至他去世。另一个同样阐述这个观点的学者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我谈到从1837年到1850年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而1850年之后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

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这个时期自身又分为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横跨1837年到1841年，第二个片段则涵盖余下的数年——从1841年到1850年。

这一卷，《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只处理1837年至1841年的问题。它只关注马克思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片段。

以后的研究会处理第二个片段的问题，并将问题推进到1850年，或得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借用的第一个时期的结论。

再之后的考察将探索从1850年到1883年，或曰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第二个时期的问题。

## 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借用分为两个时期

与马克思类似，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借用也分为两个时期：恩格斯借用黑格尔的第一个时期是1837年至1850年，第二个时期涵盖1850年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

同样，由于资料复杂，有必要将恩格斯对黑格尔借用的第一个阶段分为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从1837年至1842年。这比相应的马克思的第一个片段长一年，因为恩格斯在1842年离开欧洲大陆，前往英国曼彻斯特，这次离境是一个方便的分界线。恩格斯对黑格尔借用第一个阶段的第二个片段因此是从1842年到1850年。

目前这本专著《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包括“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这一章，分析的是恩格斯在第一个片段中对黑格尔的借用。

以后两卷将处理恩格斯在第二个片段中的问题，并将问题推进



到 1850 年。其余的考察则涉及 1850 年至 1895 年，或曰恩格斯对黑格尔借用的第二个时期的问题。

### 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别

我在第二章中提供了我认可的年代学，从恩格斯思想中分离出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差异。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流派，第一个称为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称为恩格斯主义 (Engelsism)。

我在解读马克思 1837~1841 年借用黑格尔的这个过程中，也看到恩格斯在同一时期关于黑格尔的著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黑格尔的文本显然并不相似。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理解的不一致可用来验证我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论断。由于恩格斯 1837~1841 年对黑格尔的研究作为我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走上岔路的证据，我决定在目前这本著作中包括论述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这一章。这一章不仅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个片段中的差别，而且在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比较中证明恩格斯趋向黑格尔的独特性。

### 四、各种派别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

即使本书的确提出了恩格斯—黑格尔关系问题，它的主要关注点还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因此，最大量的分析和论述都致力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结合。

在第一章“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历史编纂学”中，我提出了一种 20 世纪理解黑格尔—马克思关联的一般阐述。这个概述不打算成为深入的研究，而旨在致力于划定一些重要的学派。通过对思想学派以及代表那些学派的卓越的人物的研究，希望为读者解释这一主题之复杂性的准确写照。

通过将资料划分为两部分，这个错综复杂的主题会被更好地集中起来：20 世纪马克思的重新黑格尔化以及 20 世纪马克思的去黑格尔化。

## A (1) 20 世纪马克思的重新黑格尔化：第一个时代

在重新黑格尔化时期，我提到那些承认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连续性的哲学家。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些知识分子提出了显示马克思汲取黑格尔思想的确切分类的文献。这些 20 世纪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打破了以恩格斯为代表的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 19 世纪的解释，认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个完全损坏的黑格尔版本，割裂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并发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引发了斯大林主义哲学，因为斯大林主义理论的前提是达美特 (Diamat)<sup>①</sup> 以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分离。

在这个时刻，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历史唯物主义涉及他的历史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提出解释社会制度进化模式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对自然和宇宙的形而上学观点。它声称已经发现了宇宙的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矛盾对立统一以及否定之否定，并在这三个规律的基础上，宣称它能说明自然界和社会制度的运动原因。辩证唯物主义是必须被太阳系内部的精神和物质实体所遵守的普遍逻辑：它是形而上学。

虽然乔治·卢卡奇、赫伯特·马尔库塞、让·伊波利特、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有各自的版本，但他们都属于 20 世纪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的第一个时代。他们都反对恩格斯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卢卡奇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版本集中论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主体活动原则。坚持布尔什维主义并作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愿望的辩护者，卢卡奇强调黑格尔的劳动和实践主题，并表明马克思如何延续了上述主题。作为社会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马尔库塞促进了批判理论的发展。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是社会制度批判的发明者，马克思遵循了黑格尔的这个计划。伊波利特看到，异化和外化的主题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中心。以《精神现象学》

<sup>①</sup> 西方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的简称。——译者注

为黑格尔著作的核心，伊波利特认为，异化和外化的主题也形成了马克思重要著作的中心。施密特看到，马克思是逻辑和历史解释的结合者。当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派生出逻辑时，马克思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维度就出现了。据施密特所见，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派的逻辑分层理论，以之为工具说明社会的演变。

#### A (2) 20 世纪马克思的重新黑格尔化：第二个时代

克里斯托弗·阿瑟和托尼·史密斯的著作是第二个时代的象征。这两个人致力于 20 世纪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他们在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改变了这项遗产。阿瑟意识到这个激进的倾向，并给他和史密斯的著作起了一个新的名称。阿瑟称他和史密斯的贡献为“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从而肯定他和史密斯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一个新版本，有些内容超出了卢卡奇—马尔库塞—伊波利特—施密特的理论原则。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特色：采用完全来自体系逻辑的马克思的解释方法，放弃几乎所有线性解释的要求。据阿瑟和史密斯所见，融合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这个方法论原则是生物的发展。在黑格尔的解释中，无论对逻辑还是对历史而言，哲学始终在生物进化的基础上展开。

生物进化形成了黑格尔解释逻辑的内部结构。每个全面的体系都包含一个重要本质，形成有机体核心的范畴。体系辩证法提出了一种解释方法，体系的发展被定义为由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范畴来控制，或由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范畴来确定局部范畴运作的过程。解释意味着对范畴展开的阐述。

阿瑟和史密斯勾勒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密切的相似性。因为体系辩证法形成了《逻辑学》的解释性结构，所以体系辩证法是《资本论》的解释性方法论。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失误是线性解释或历史叙事。阿瑟和史密斯主要关注逻辑的一致性，而不是生物进化。他们强调逻辑的连贯性，而不是社会的发展，因此，关注社会的发展方向对他们而

言是次重要的陈述。

阿瑟和史密斯的著作指向当代马克思主义内部辩论的实质。这场辩论不是社会学的，而是哲学的。他们的主要兴趣不是与时俱进的社会结构运动，而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声明的合乎逻辑的可信性。

#### B (1)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第一个时代

在这一节中，我没有尝试作出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去黑格尔化的解释。与尼古拉·列宁的意愿相反，正如他在《哲学笔记》中所解释的，克格勃的哲学使马克思与黑格尔相脱节，采用源于恩格斯第一次清晰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断裂，我不会花时间描述其逻辑内容。

在第一个时代第一次认真尝试去黑格尔化的是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阿尔都塞的文集是对 20 世纪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据阿尔都塞所见，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它越来越多地参与作为反对政治的哲学问题，第二，它打破了列宁主义传统。阿尔都塞打破了斯大林主义，但他仍然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可行的革命策略，而且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延续。

为了防止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政治缺陷，阿尔都塞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如果马克思主义再次被断言为政治第一或者革命优先于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就是必要的。

由这一理论策略武装起来的阿尔都塞提出了以下的解释纲要：马克思和黑格尔被“认识论断裂”拆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1844~1845 年）是对这种断裂的最初陈述；在《神圣家族》之后没有任何黑格尔派影响过马克思；摆脱黑格尔之后，马克思游移到贝内迪特·斯宾诺莎的轨道上。

认识论断裂的主要指向是马克思脱离了黑格尔的有机体解释方法。黑格尔提出了一个用于解释不同时期的历史的、哲学的和宗教的发展的有机模式。黑格尔看到了作为拥有内在发展趋势的有机整体的历史时期或哲学时期。

受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阿尔都塞拒绝了黑格尔的这种有机体

主义，而返回到斯宾诺莎，其解释方法建构在无主体结构思想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延续了社会总体的传统，而对总体思想去黑格尔化。总体性不是有机体主义，而是无主体的结构或无内在终极目的的结构。阿尔都塞推动的是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的全部著作都是一种行为干预。在法国结构主义阐述知识的哲学之后，阿尔都塞使政治干预介入 20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阐述。希望维持列宁主义的革命战术，作为一个保守的共产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违背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通过违背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设法找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即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紧密结合。这个方法必须支持政治，或曰政治必须创建一种维持政治的方法。

另一位在 20 世纪第一个时代去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西奥多·阿多诺。阿多诺宣称，两个链接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连在一起：一种末世论的历史观念以及对构成历史决定力量之原因的假设。

阿多诺在去黑格尔化的第一个阶段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产儿。去黑格尔化的第一个阶段是确立他们的一致，他们之所以结合，缘于都确信上述原因是历史的推动力量以及历史证明了一种末世论的目的。运用理性改善社会生活中的人类状况的努力是无限的。

阿多诺在去黑格尔化的第二个阶段想要证明马克思与黑格尔共识的两个主要信念都已经在 20 世纪消失了。马克思被去黑格尔化的原因是将黑格尔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信念证伪，这两个人被分开了，共识的结合消失了。希特勒主义、纳粹大屠杀、斯大林主义这三个事件使历史目的论观念和人类理性的救世主义观念失效了。希特勒主义证明《历史哲学》是错误的，对自由的统治不能存在于 20 世纪，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而不是一种共产主义乌托邦。

对马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是 20 世纪的产物，因为极权主义时

代反对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基础。20世纪使与历史乌托邦主义恰相反的理论走到前台。阿多诺解释了作为一种矛盾范式的黑格尔辩证法。阿多诺关注的是从未有人介入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非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停留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原则。去黑格尔化涌现出主体与客体总是质疑的命题。通过改变对黑格尔的解释，阿多诺将马克思去黑格尔化。针对黑格尔的矛盾，阿多诺表明，一个无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是不可能的。

#### B (2)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第二个时代

约翰·罗默和乔恩·埃尔斯特是代表20世纪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第二个时代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独特之处是，它从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哲学传统中处理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罗默和埃尔斯特的辩论并非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传统内部对话中展开，而关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外部的对抗。他们并不企图复兴马克思或黑格尔，而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埋葬他们。

罗默和埃尔斯特从英美分析哲学学派的角度来处理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他们寻求从社会科学的解释视域提出分析哲学，并从这个角度来分离社会分析的两个逻辑：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他们也拒斥功能解释的理念，宣称那是黑格尔派有机体主义的一种残留。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否认任何社会的集体主义存在的逻辑。它拒斥社会由集团和阶级组成的观点，试图从个人选择的角度解释社会发展。在最高的层面，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有机体主义解释的驳斥。没有社会共同体，只有私人主体。

罗默和埃尔斯特使用的第二个逻辑是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类似，理性选择理论驳斥任何声称个人选择取决于集体智慧的主张。主体的决定不基于任何一种集体意识，而基于带给个人利益的方面。理性选择理论使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失效了。个人的行动不取决于集体意识，而取决于对私人报酬的计算。

罗默和埃尔斯特意识到黑格尔派对马克思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承认新黑格尔派的主要论题，但他们还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是马克思主义产生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罗默和埃尔斯特赞同马克思主义被黑格尔化时，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归咎于包含在马克思理论中歪曲的失误。

通过分离黑格尔和马克思，罗默和埃尔斯特都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他们声称黑格尔和马克思在错误的哲学前提下工作，这使他们有理由分离黑格尔和马克思。消解连接他们的错误的哲学假设是他们得以脱离的基础。去黑格尔化的任务是共同取消不正确的理论原则。

然而，罗默和埃尔斯特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一个关键理念是剥削概念。他们两个人的左派哲学是证明如何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解释剥削的一种尝试。

罗默和埃尔斯特是当代激进主义者的范例。除了剥削理念之外，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分析的整个框架。但他们试图通过展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如何最终证明经济剥削的存在来保持剥削理念的生命力。

葛兰德·科亨和菲利普·范·帕里斯的作品也属于 20 世纪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第二个时代，但他们解决问题的哲学假设与罗默—埃尔斯特学派所采用的有极大的差异。

罗默—埃尔斯特的阵营和科亨—范·帕里斯的圈子之间的根本差异是社会科学中的功能解释问题。科亨—范·帕里斯采用功能解释方法，而罗默—埃尔斯特表示反对。

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差别还拓展到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科亨—范·帕里斯取消了罗默—埃尔斯特的社会解释标准。

然而，这两个学派也存在相似性，因为都拒斥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体主义。两个学派也认同马克思主义所预示的，即资本主义社会将产生阶级两极分化，工业无产阶级会出现为历史发

展所证明是错误的多数集体。

即使科亨—范·帕里斯通过取消黑格尔派的生物进化理念来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他们的去黑格尔化也没有结果，因为在罗默—埃尔斯特看来，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科亨—范·帕里斯的去黑格尔化没有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驳。确实，在他们的著作中，功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线。

科亨在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提出了对马克思关于功能逻辑方面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理论的一个辩护。范·帕里斯后来采用了科亨的这个策略。

在区分软的和硬的功能主义时，科亨—范·帕里斯一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生产资料所有者对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当科亨—范·帕里斯采用他们的立场时，他们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秉持的主要论点提供了合乎逻辑的理由，并因此使马克思思想的相关方面在当今时代永久持续下去。

保留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功能逻辑的认同，提供了关于社会经济整体的内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假设功能主义是正确的，就有可能描述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吸收赞成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因此考虑激励其经济基础而形成上层建筑。同样，功能逻辑支持历史的线性解释。对生产资料之上的生产方式的依赖或产生于这些压力暂时性失衡之下的任何冲突都用于证明历史操纵的过程。历史活动开始澄清对更重要的发展程序之一的假设是不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连续性/间断性。

科亨—范·帕里斯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使马克思从黑格尔派有机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力量。通过使马克思主义远离有机体主义并在功能逻辑方面复兴马克思主义，他们建构了延长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他们的著作并未旨在保留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每个特性，因为他们已经删除了边缘内容，但保留了核心内容。



## 五、作者的结论

我自己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处理必须被细分为两类：重新黑格尔化的学问以及去黑格尔化的认识论。

### 重新黑格尔化的学问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始终深信黑格尔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的研究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的存在作为出发点。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倡导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立论，因为我深信马克思和历史事实需要这样一个论断。我的论点是，必须接受重新黑格尔化，因为它符合事实。我没有达成一致的声明，而是依靠历史根据来表明事实。

### 去黑格尔化的认识论

根据与正确性之间是有差别的。当根据证实黑格尔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时，并不能因此证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是更有效的。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证据表明，鉴于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马克思主义是更有效的认识论这个结论是不能得到认可的。

我自己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是马克思主义者思索的许多错误的一个主要来源。当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是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时，当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历史学时，马克思主义正确的认识论需要马克思和黑格尔相脱离。马克思主义存在于黑格尔之外，改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

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黑格尔不相容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效的洞察，但功能解释确实提出了一种确认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本质具有洞察力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取决于功能解释，提供了理解现今资本主义内部结构和线性运动的分析工具。

在整本书中，我使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这样的表述有两

个原因：作为划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一特定时期思想发展的标志，在这套书随后的两卷中，我将处理成熟的马克思和成熟的恩格斯的问题，我还将提出老年马克思和老年恩格斯，用来区分他们后来的思想发展阶段。

# 第一章 黑格尔—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历史编纂学

这是研究乔治·威·弗·黑格尔施加给卡尔·马克思学术影响的多卷本中的第一卷。整套书名叫《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全部作品的主题是，马克思将大量的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纳入自己的研究中，或者说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建构于黑格尔逻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这套书的第一卷，《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着眼于马克思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段时期。

简要介绍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编纂学问题旨在于此，这将帮助读者把目前这部著作归于相互冲突的解释学派内部。下面提到的这个历史编纂学不打算作为一项详尽而宏大的文献学研究，而是一项定位的尝试。经过对很多关键的且有代表性的解释学派的审视，这部含有历史编纂学辩论的著作的地位将得到准确的界定。

存在两个历史编纂学的广泛阵营：一个希望坚持马克思的黑格尔化，另一个试图对他去黑格尔化。黑格尔在马克思著作中的确切位置是诠释马克思的图式的节点（nodal point）。尽管某些图式化粗暴地对待某些事物的唯一性，但很多真相表明，那些主张对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对社会科学的現象学研究方法建立在主客体统一的基础之上，以及对黑格尔主义逻辑形式的具体应用是社会研究的解释工具，而主张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学者倾向于消除黑格尔现象学的、方法论的以及主体—客体的影响。

如果我将进一步澄清有关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我表明自己在这次辩论中的立场：整个研究都在保护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需要。

通过指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受益于黑格尔，这本书试图阐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必须脱离黑格尔。

这个关于我属于去黑格尔化阵营的声明不应被解释为，这意味着我自己对马克思的介绍是实证主义的。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并不自动意味着对马克思的科学化，也不意味着有必要完全放弃马克思。

我的去黑格尔化并不打算成为废除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始。我希望进行一种手术以挽救病人。我的去黑格尔化由两个步骤组成：（1）确认马克思选择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式并将其转化到自己的著作中；（2）在确认这些范式之后，开始转化的过程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前提将得以延续。我的著作的立场是驳斥路易·阿尔都塞所主张的马克思经历过与黑格尔的“认识论断裂”，断裂点显著地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sup>①</sup>

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是马克思自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持续了他的毕生，这套书随后的两卷将主要研究这种方法论范畴领域的话语。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毕生对话中，存在内容消解时期和范式转换时期，但一种完全的断裂从未发生过。

在内容消解时期，我的意思是这时马克思拒绝黑格尔重要的方法论内容；这个时期存在于马克思 1844 年写作《巴黎手稿》的时候。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述的市民社会观点，他声称与自己的黑格尔解释相反，认为异化是人的不可避免的状况，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范式转换时期，我的意思是，这时马克思修改了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论范式，他在这里借用了这些范畴的形式而替换了它们的内容，他在这里运用了费尔巴哈式的颠倒方法。这种范式转换开始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此后延续在他生命余后创作的绝大多数著作中。整个这套书的观点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是持续的，尽管在内容消

---

<sup>①</sup>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1969.

解时期和范式转换时期之间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对话从未完全断裂。当马克思不诉诸黑格尔就不能解决的学术问题出现时，马克思处于范式转换时期，当马克思不诉诸黑格尔也能解决的学术问题浮出水面时，马克思处于内容消解阶段。黑格尔的在场总是显而易见的，而马克思的游移取决于学术研究的需要。

由于这完全是一种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研究，从这一点上来分析，评论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不必要的。不幸的是，马克思隐瞒了他完全得益于黑格尔，他从来没有写他借用或拒绝黑格尔的详细供词，我全部的调查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解蔽马克思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确实阐明了自己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看法，而19世纪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是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发展和普及的。恩格斯填补了马克思留下的空白，在19世纪得到传播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主义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

恩格斯提出的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共同的解释是歪曲而弱化的。这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于青年恩格斯误解了黑格尔派哲学的研究。然而，以恩格斯歪曲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方式进行的任何讨论都是不可能的。希望弄清楚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这个独特方面的读者不妨去阅读我的著作《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中的两章：“辩证法内部的对话”和“辩证法的毁灭”<sup>①</sup>。

马克思的大多数早期著作，比如他的博士论文、《1844年巴黎手稿》，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1837年写给父亲的信，以及后来的《大纲》，马克思的这些早期著作对黑格尔的认同是最为明确的，直到1930年之后，即在恩格斯逝世30年后，这些著作才得到出版。鉴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沉默，解释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身上。尽管恩格斯提出了对这种关系的错误

<sup>①</sup> Levine, Norman,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London, 1984, pp. 6-79, 81-126.

解释，但他是第一个提醒人们注意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个关键问题的人。

恩格斯提出了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最详细的内容。他是在四部著作中理解这个问题的：《反杜林论》（1877~187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以及《自然辩证法》（恩格斯从1873年开始写作而在他一生中并未完成的著作，这部遗著1927年在苏联被全文出版）。上述著作都是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时期创作的。

在19世纪30年代，恩格斯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他毕生始终致力于思想的普及。<sup>①</sup>当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国际时期发展的时候，当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一种无产阶级运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议的时候，就有必要简化马克思的思想，使其能被大量的工人阶级读者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编纂为无产阶级能够理解的形式，而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时期发挥了这个作用。这是马克思没能完成的任务；他总是保持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甚至当被问及简化《资本论》第一卷以使工业劳动者可以理解，及至他在这部著作的第三版中打算从事这项努力时也是如此。他的努力失败了，而他的鸿篇巨制对未受过教育的产业工人来说仍然过于神秘。

第二国际时期也是唯物主义或曰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恩格斯关注自然科学领域，而马克思使自己成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恩格斯在学术上力图证明，为什么自然法则显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正如马克思证明了经济学是相当易懂的，展示了共产主义的有效性，恩格斯的任务是证明物理世界运作的条

---

<sup>①</sup>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差异的研究，参见我的著作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Santa Barbara, 1975)。在1977年，一位德国学者 Heinz-Dieter Kittsteiner 在恩格斯的问题上得出了与我相同的结论。参见他的长篇论文 “Logisch und Historisch: Über Differenzen des Marxschen und Engelschen Systems der Wissenschaft”, in *International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3, Jahrgang, 1977), pp. 2-47。

件与马克思概述的辩证法的原则相同。自然科学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

此外，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遭到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复兴的威胁。柏林的一个私人讲师欧根·杜林撰写了几本攻击黑格尔的著作，并声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蕴含政治上的保守性。恩格斯呼吁人们抵御唯心的保守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哲学攻击。这个理论策略展示了德国无产阶级是18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和黑格尔的合法继承者，这正是恩格斯在其著作《反杜林论》中所研究的。

恩格斯是第二国际在文化战斗中的首席理论家。他试图通过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运动是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真正继承者来确立其合法性。恩格斯的任务在于证明，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在政治上都不是保守的，他们都是革命运动的学术思想前兆。

恩格斯为第二国际进行的工作是击退所有保守主义的复兴，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或自然科学的形式都信奉保守主义政治。恩格斯的任务是消除以自然科学或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使社会主义无效的马克思主义右翼。他试图通过创造一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手段的左翼科学来保护黑格尔主义的左翼传统。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种结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sup>①</sup>是恩格斯纲领性意图的最精确的表述。恩格斯写作这本著作来捍卫费尔巴哈，抵制卡·尼·施达克——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本书中将费尔巴哈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攻击。这位马克思的合作者驳斥了施达克的指控，并指出费尔巴哈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

在回应施达克时，这位马克思的合作者提出，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它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唯物主义。一种类型源自18世纪的法国启蒙唯物主义，而恩格斯认为这是机械唯物主义，恩格斯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11~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的观点是，自然基本上是静止的。机械唯物主义不能把自然看作是革命的或发展的，而将其看作是固定的。

费尔巴哈最伟大的功绩是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他证明科学和唯物主义超越了哲学。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进一步断言，不仅唯物主义，而且经济学也敲响了哲学的丧钟。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科学，为历史运动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明，对人类社会的猜测也就不再必要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战胜了《历史哲学》中的黑格尔主义精神。

费尔巴哈解决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之谜。<sup>①</sup> 所有以往的哲学都假定思维是存在的前提，思维为存在提供了一个结构。通过展示存在是思维的前提，或感觉和存在是等同的，因为感觉产生了理念，所以存在是思维的出发点<sup>②</sup>，费尔巴哈开启了一个新的科学和唯物主义的时代。

以唯物主义取代哲学也融入恩格斯对黑格尔过程概念的理解中，这种结合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相信黑格尔主义的传统有两部分，一半是保守的唯心主义，一半强调辩证法，因而是革命的。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因素导致了政治保守主义，为普鲁士君主政体提供了专制的理由。黑格尔强调过程和发展的因素导致了辩证法。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解释为赫拉克利特的延伸：辩证法意味着历史性；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于变动的河流中。

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性和唯物主义的结合。正如自然被进化的法则支配，社会也是如此。辩证法的原则，或曰历史进程和易变性支配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据恩格斯所见，马克思是赫拉克利特和唯物主义结合的创始者。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19～7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sup>②</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5页。



正如科学取代了哲学，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也必须得到超越。由于易变性是宇宙世界的基本法则，资本主义制度也只是暂时的，因此旨在推翻私有财产制度的无产阶级运动是有道理的。

这种对恩格斯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问题的思想概述不打算全面分析恩格斯对这个关系的整个谱系的思考。《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自然辩证法》中包含的很多思想在这一点上的讨论是不恰当的。

恩格斯发挥的作用之一是开启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编纂学。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解释学派，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事实上，恩格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学派，而对这个学派如何进行评价的问题仍然是开放的。评价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贡献也不是本书的研究内容；但对这种评价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是必要的。恩格斯完全挪用了黑格尔的思想。他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是业余的，而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论转换到自然哲学中是一种简单的变形。将意识的辩证法重写为自然哲学，导致了黑格尔思想的畸形。

曲解了黑格尔之后，恩格斯接着又误解了马克思。当恩格斯论述自然界的三大规律，即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对立统一，不仅统治自然界的运动，而且也统治人类历史时，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畸形化。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消除了人类社会的因素并将之替换为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sup>①</sup>，而马克思强调人类实践，马克思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劳动意识的论述中获得了自己的灵感。

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来源。即使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拒斥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但它仍然忠

---

<sup>①</sup> 关于恩格斯歪曲马克思的全部文献，参见我的著作，*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实于恩格斯的自然界三大辩证法的定律。恩格斯有助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一种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崩溃的僵化。

自相矛盾的是，无视恩格斯是第二国际首要理论家的事实，西欧马克思主义在 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不再坚持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西方支部走向了康德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在 1883 年的一次演讲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与达尔文加以比较，尽管恩格斯最伟大的创造在于将辩证法和自然结合起来，第二国际的后恩格斯（post-Engels）理论家无视黑格尔，转而趋向于进化论：他们仍忠实于科学的范式，但从物理学转向生态学。第二国际的西方支部以去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为标志。

第二国际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解散了，尽管尼古拉·列宁活到了 1924 年，但他属于卡尔·考茨基、戈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以及罗莎·卢森堡的时代。第二国际消失三年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掌权，但布尔什维主义诞生于 1905 年俄国革命，因此列宁是第二国际的叛逆的孩子。

对列宁来说，哲学主要是一种政治手段，但他确实思考了哲学问题。列宁的哲学沉思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个以 1909 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出版为标志，另一个则以 1914~1915 年撰写的《哲学笔记》（直到 1933 年才全部出版）为标志。

作为列宁对哲学的最初尝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去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哲学唯物主义；它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表述，证明作为机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与包含在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哲学是敌对的。

列宁的第二个哲学时期开始于瑞士伯尔尼的图书馆，在 1914~1915 年之间，列宁在这里第一次阅读黑格尔的如下著作：《逻辑学》、《哲学史演讲录》、《历史哲学》以及《哲学全书》中的“小逻辑”。当读到这些著作的时候，列宁摘录了这些书的很多页，而且也作了

大量的个人评论，而他摘录的页和他自己的评论构成了《1914—1915年哲学笔记》。<sup>①</sup> 这些笔记标志着列宁第一次接触黑格尔。它们是列宁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原产地。这是区分列宁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差别。

列宁更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工具，而恩格斯试图将过程概念本体论化。如同马克思，列宁试图将黑格尔的逻辑学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继而套用这个公式进行历史研究。恩格斯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相信实验知识能够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自在之物”的恰当图示。恩格斯不相信主体和客体的认识论统一，但坚持认为外部现实为主体提供了外部世界的“摹本”。反之，列宁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在《哲学笔记》中认为，主客体之间的统一是概念形成的基础。列宁借用了黑格尔关于积极的主体精神的思想，以告知外部现象的结构的方式，主体精神渗透到客观世界，而恩格斯相信主体精神是一张被动的照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他的《哲学笔记》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的研究还局限于恩格斯的认识论，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康德主义的区分，而五年后他在《哲学笔记》中放弃了康德主义的公式，欣然接受黑格尔主义的立场。

在20世纪，列宁是最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黑格尔化的。<sup>②</sup> 列宁是20世纪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发起者，而恩格斯是19世纪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是列宁的继承者。

列宁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他使之转换新的方向，从辩证法置于自然的恩格斯的形式转换到辩证法成为一种知识论的形式。如同黑格尔那样，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正确的安置，

---

<sup>①</sup> 关于列宁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详细研究，参见我的文章，“Hegelianized Leninism”，in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pp. 257-316.

<sup>②</sup> Anderson, Kevin,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Urbana, 1995.

将辩证法和一种认识论结合起来。辩证法再次成为主体论的一部分。

《哲学笔记》重申主体意识的核心。列宁，如同黑格尔，认识到概念的力量，事实上，概念是一种体现外部世界的基本力量。夸大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是可能的，因为在哲学层面，列宁从未达到乔治·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或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的复杂程度。然而，通过再次强调理论上的实践的重要性，列宁标志着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哲学笔记》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反映了列宁对欧洲战争及其全球分支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围绕着欧洲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国际方面，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轴心的全球战争，是黑格尔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依存或对立统一思想的最佳例证。

列宁在 20 世纪第一次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开启了约瑟夫·斯大林在 20 世纪 20 年代第二次去黑格尔化的阶段。斯大林对哲学基本上目不识丁，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机械唯物主义而使之在苏联衰退。斯大林将哲学理解为政治党派的形式，而且发起了一种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消除任何黑格尔主义踪迹的文化运动。他忽视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转向黑格尔的论述，斯大林是在苏联摧毁列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主要责任人。他使阿布拉姆·德波林这个列宁化黑格尔主义的宣传者离开了哲学研究所，并且支持他精心挑选的马克·米丁将机械唯物主义注入苏联的文化生活。斯大林的另一个代理人安德烈·日丹诺夫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并且攻击卢卡奇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卢卡奇只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卢卡奇屈服于日丹诺夫的极权主义，并因此保留他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成员身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另外两个苏联教授也因为他们在苏联哲学内部宣传一种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压制。这两个哲学家，其中之一是马克·罗森塔尔，另一个是他的学生爱德华·弗·伊里因科夫。我特别得益于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他使我第一次意识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内部，我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解释这个概念。

我在本章的开头指出，本章只是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全部历史编纂学的一个简述。迄今我已经确定了一些术语，设置了一些概念性范式，并且通过提供对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珍贵的评论而确立了黑格尔—马克思话语的基础，未作出一种遵循黑格尔—马克思历史编纂学的深入的年代学的努力。

本章后面的部分将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作为证明黑格尔—马克思话语众多观点的手段，我将讨论参与这个对话的四对哲学家：（1）乔治·卢卡奇—泰欧多尔·阿多诺；（2）路易·阿尔都塞—阿尔弗雷德·施密特；（3）让·依波利特—赫伯特·马尔库塞；（4）乔恩·埃尔斯特/约翰·罗默—葛兰德·科亨/托尼·史密斯。

我提出对这四对哲学家的评论，并不试图作为一种对这些人中每一个的详尽研究，我也不认为这个十人组合可算作关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著作的总和。我对这些学者加以搭配的原因是，他们持有冲突的观点，通过列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反驳，我希望证明围绕这些问题的多样化解释，并且在这些学派过多的论述中更好地定位我自己的著作。

## 一、乔治·卢卡奇/泰欧多尔·阿多诺

乔治·卢卡奇

尽管列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但卢卡奇是其最重要的拥护者，而他 1923 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遭到误解，但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的起点。我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得到了过高的评价，而他后来的著作《青年黑格尔》（完成于 1938 年，1948 年在瑞士第一次出版，第二版在 1954 年发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他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sup>①</sup>《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深刻的差

---

<sup>①</sup> 比我这本著作对《青年黑格尔》更彻底的分析，参见我的文章，“Completion, Death, Heritage”，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19 (1979), pp. 49-59。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仅给出了对《青年黑格尔》更深入的分析，而且展示了《青年黑格尔》和卢卡奇后来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之间的连续性。

异。如果没有书目学的革命，从《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导出强大的电流是不可能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的差异不仅来自创作它们的历史时期的差别，而且更重要的是卢卡奇在撰写这些与众不同的著作时运用的参考书目。

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对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超越体现在四个因素上：（1）1931年，在柏林大学举办的黑格尔会议是黑格尔研究复兴的代表<sup>①</sup>；（2）接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4）接触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尤其是《伦理学体系》，以及《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sup>②</sup>

（1）20世纪的德国对黑格尔的研究经历了一次复兴。这次对黑格尔研究兴趣复兴的高潮是赫尔曼·格洛克纳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为契机组织的第一次黑格尔会议。1930年，卢卡奇在莫斯科，但1931年他被派往柏林，恰逢第一次黑格尔会议，而实际上他试图组织一个反黑格尔的会议，以此提出一个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反对以格洛克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形式。卢卡奇没有成功地实施这次会议，但1932年他确实在法兰克福大学发表了关于黑格尔对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长篇评论的演讲，因此对黑格尔研究的复兴有所贡献。<sup>③</sup> 对黑格尔的重新解释已经取得进展，而卢卡奇参与了运动的早期阶段。

（2）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尽管当时尚未出版（是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但卢卡奇得到该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的同意，读到了这些文件。他可能是第一个读到这些开创性文本的中欧或西欧学者。

（3）直到1933年，斯大林才不再压制《哲学笔记》的全文出版。因此列宁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政治独裁统治需要的受害者。卢卡奇幸运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允许他1930

① Kadarkay, Arpad, *Georg Lukacs: Life, Thought, Politics*, Oxford, 1991, p. 350.

② Levine, "Completion, Death, Heritage", p. 51.

③ Kadarkay, *Georg Lukacs: Life, Thought, Politics*, pp. 349-350.

年在莫斯科期间阅读《哲学笔记》全文。《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于1923年，在卢卡奇熟悉列宁的《哲学笔记》之前，但列宁的这些思辨的草稿对卢卡奇是重要的，被他纳入后来出版于1952年的著作《青年黑格尔》中。

(4) 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伦理学体系》，以及《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直到20世纪才出版。《伦理学体系》出版于1923年，而《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发表于1931年。<sup>①</sup>

《伦理学体系》和《耶拿现实哲学》形成了黑格尔关于经济学、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思想的核心。它们还不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知，因此黑格尔的经济学思想是他们忽略的关键因素。黑格尔的这些早期著述对20世纪黑格尔的解释版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于20世纪对马克思的解释。

当卢卡奇开始准备写作《青年黑格尔》时，《伦理学体系》和《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为他所用，而《青年黑格尔》是对此前不为人知的黑格尔的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融合。这被证明是一个爆炸性的混合物，其中的汞合金充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化合物。

区分《青年黑格尔》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另一个差别是，这两部著作分别从黑格尔的不同文本中获得基本的灵感。黑格尔的三个文本，《逻辑学》、《精神现象学》以及《法哲学原理》在建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那些看到马克思从《逻辑学》中发现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论的学者们，认为该书对其方法论产生了重要作用；那些看到主体实践和社会本体论思想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连接在一起的学者们，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最关键的文本；那些比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政治、市民社会的本质以及国家的基础等的观点的学者们，将《法哲学原理》视

---

<sup>①</sup> Lukacs, Georg, *The Young Hegel*, trans. By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5, p. xix.

为黑格尔最重要的文本。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页面的是《逻辑学》，而作为《青年黑格尔》最直接的思想基础的文本是《精神现象学》。1923年，卢卡奇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述，而他对黑格尔的借鉴来自于《逻辑学》；1938年，卢卡奇最重要的意图是抵制欧洲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根基是非理性主义和浪漫的保守主义，而他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理论—实践和社会本体论思想的启示。

此外，《青年黑格尔》和《历史与阶级意识》都是在对历史语境的回应中形成的。卢卡奇在1923年写作《青年黑格尔》时的历史条件与他1938年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历史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收录的文章写于1919~1923年之间，反映了共产主义“左翼”在这些年的思考。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但中欧的革命浪潮在1923年宣告结束。《历史与阶级意识》是涵盖1919年反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乌托邦希望的文章的过渡著作，而后来的文章试图克服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全部失败期间的无产阶级的绝望。作为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成员，卢卡奇写作了告诫无产阶级在革命活动中永不失去忠诚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同时，《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混为一谈的例子。第二国际将学术精力投入到经济学和政治策略上，但1923年革命浪潮过去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回落到哲学沉思上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功能被限制在哲学内部，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策略失败了。这种失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学术垄断。<sup>①</sup>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黑格尔是马克思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先驱。卢卡奇意识到黑格尔是一个两分的形象，由保守方面和革命方面组成。黑格尔的保守方面是他客观唯心主义的

<sup>①</sup> Anderson, Perry, *Consider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6.



产物，在这个外表下，黑格尔保卫霍亨索伦的专制统治。黑格尔的革命方面以辩证法思想为代表，这个革命方面使黑格尔成为马克思的先行者。<sup>①</sup>

在出自《逻辑学》的大部分研究中，卢卡奇强调主客体统一思想，认为人类实践是客体反映主体的手段。对卢卡奇来说，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典型是主观意识和实践的主题。辩证法涉及人类中介的转换力量。<sup>②</sup>

事实上，客体是用于强调辩证法的历史性方面的人类实践建构的。历史性成为辩证法的同义语。如果人类实践不断地改变世界，如果主体的性质持续地变化，那么人的条件为生成（becoming）所统治。<sup>③</sup>

卢卡奇规定了历史中的辩证法。主体—客体、理论—实践的原则涉及经济社会构成中的人类活动。辩证法和历史的结合是一种反恩格斯的变化，因为卢卡奇将辩证法和社会劳动结合起来，而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自然结合起来。卢卡奇以社会本体论推翻了恩格斯的自然哲学。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开始了，而卢卡奇是最早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差异的人之一。

卢卡奇对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结合的驳斥远远超出了他对恩格斯攻击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否定。表明卢卡奇反资产阶级（*contra-bourgeois*）的路径是，他使用方法这个术语描绘马克思的分析程序。这位匈牙利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逻辑，因为它试图避免与康德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说，决定思想形状的永恒的逻辑形式——的任何联系。遵循黑格尔，卢卡奇反对这种先验逻辑，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用来分析确保经济形式生成的社会的方式。方法不是僵化的，不能冻结形式，方法是一个程序，一种假定

---

① Lukacs, Georg, "What Is Orthodox Marxism?",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1971, p. 17.

② Ibid., pp. 20-21.

③ Ibid., p. 19.

社会学客体的历史性的规则。卢卡奇意识到，黑格尔论述方法的话语包含在《逻辑学》的“绝对理念”这一章中。<sup>①</sup>

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攻击简要地包含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长篇文章“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里。<sup>②</sup>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将理念世界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阵营。两个世界的观点是可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和人道主义的。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第二节的标题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而卢卡奇将这些规定为作为决定论者的资产阶级的自然形式和作为超越市民决定论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

对自然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事物由数学法则统治。自然决定论被物理学或数学的法则控制，而人类生活是独立运作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也否定人类的自我决定，断言自然法则统治社会，因而人类不能建构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比如说，资本主义建构在异化和剥削的基础上，但对社会秩序的修改并非出自人的意图。自我建构不是人类存在的要素。

《青年黑格尔》的历史环境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历史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异。《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文章是对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在中欧和西欧进退的推断，《青年黑格尔》则是抵抗希特勒主义的文化战斗的燃料。《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8年，大约在希特勒掌权五年之后，这本书的任务是确认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德国唯心主义不是不间断地朝向希特勒主义的思路，而是持续融入大众民主的河流。卢卡奇想将无产阶级描绘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sup>③</sup>，凭借这种学术思想策略，卢卡奇遵循了恩

---

① Hegel, G. W. F.,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 By A. V. Miller, Atlantic Highlands, 1989, pp. 824-844.

② Lukacs,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 83-222.

③ Lukacs, *The Young Hegel*, pp. xiv-xxx.

格斯的传统。

《青年黑格尔》证明《历史与阶级意识》过时了。卢卡奇开始运用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连同黑格尔对斯图尔特的评论及其关于亚当·斯密的知识，开始成为取代《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来源。占有这些新资源，需要卢卡奇提出黑格尔的新形象，而他这样做了。他们也需要卢卡奇提出马克思的新形象以及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而他这样做了。

依靠这些新的文献学资源，卢卡奇刻画了同情法国大革命“青年黑格尔”。事实上，卢卡奇描述了一个“青年黑格尔”和一个成熟的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显示了雅各宾式的忠诚，而成熟的黑格尔终结于客观唯心主义，是霍亨索伦王权的卫护者。卢卡奇指出，“青年黑格尔”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预见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

卢卡奇还描述了一个羡慕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青年黑格尔”。这种古希腊施加于德国18世纪和19世纪思想的专制得到了详细的记载<sup>①</sup>，而黑格尔和马克思是这种专制的两个例证。

黑格尔认为希腊城邦提出了对过度的个人主义的适当纠正。对黑格尔来说，激进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文化衰退的标志，因为它使个性与共同体中断。《法哲学原理》的主题是寻求将城邦精神重建为现代形式的机制，重建共同体高于个人重要性，以之为一种加强社会凝聚力或道德的手段。

尽管马克思不知道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即为卢卡奇所受益的唯物主义，但他熟知《法哲学原理》，并且正是从这些层面上，以及《哲学史演讲录》的层面上，他猜测黑格尔接近了雅典政治。《法哲学原理》使马克思了解到黑格尔对19世纪弥漫着资产阶级的资本主

<sup>①</sup> Butler, E. M., *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 Boston, 1958.

义社会的批判。黑格尔将资产阶级的组合称为“市民社会”，或道德领域，并将其描述为个体之间利己的和自私的斗争。

经由黑格尔转化到马克思的雅典精神存在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重现城邦共同体精神的一种手段。尽管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定义采用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形式，马克思希望消除私有财产而黑格尔希望私有财产永存，但城邦共同体是马克思定义共产主义的核心。黑格尔是雅典的政治理念转化到马克思的关节点。

《青年黑格尔》转移了从《逻辑学》、《历史与阶级意识》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研究黑格尔的重心。当卢卡奇运作这种转向时，一种新的概念词汇进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词典中。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层面上孕育的，当卢卡奇迈出这一步时，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语法的词源学。

卢卡奇孕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术语是社会本体论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黑格尔左派中关注《精神现象学》中劳动概念的第一人，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将劳动作为仅仅从客观精神中产生的活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采取了手术的方式：他将黑格尔主义的劳动概念从对客观精神的封闭中分离出来，并将劳动置于经济生产实践的社会语境中。卢卡奇不必遵循与马克思一样的方法论轨迹，因为基于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以及对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连同他对于苏格兰学派的一般知识，卢卡奇证明“青年黑格尔”已经将劳动概念应用于经济领域。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证明黑格尔已经将辩证法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在马克思开始马克思主义事业大约30年前，黑格尔已经开始了同样的旅程。

至于社会本体论观念，卢卡奇也从《精神现象学》中借用了对象化、外化、异化、重新占有（reappropriation）等术语。卢卡奇借用了黑格尔劳动现象学的全部工具，但他再现和模仿了马克思，将

这种工具视为经济实践的一种功能，而黑格尔将这种工具视为客观精神的表述。

卢卡奇提出了一种社会本体论观点。他将共同生活作为社会的基础，认为活动是对象化的第一阶段，或曰新事物的存在是诸如风车、马车或火车之类的社会劳动的结果。对象化，或外化，指的是人类劳动、社会实践、意识融合的过程，其产生的事物有助于维持或改善共同体的社会生存。

基于人类劳动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经济如社会劳动产品与社会人相异化。异化指的是个人或集体的产品与它们的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重新占有意味着异化不会发生，或者生产者能够重新获得对劳动者制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控制。共产主义运动被视为一种重新占有的巨大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对异化的扬弃依靠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即对他们自己的生产力重新占有的社会。

卢卡奇回到了本体论领域，但并未抵达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存在本体论取决于对存在——一种独立于社会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的讨论。卢卡奇论述了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以及人和社会相互依存的初始境遇。卢卡奇的劳动现象学假定人和社会是共生的，或者说存在是一个社会范畴。

由于存在是社会的产物，卢卡奇强调历史性概念。活动内在于人的类生活，因此类生活必须持续地确定并通过确定的事物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人是内在的集体构成，这意味着当新生事物成形的時候，社会必须发展，而这种不断确定的过程预先假定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

威廉·狄尔泰影响了卢卡奇的进路，因为狄尔泰是最早将哲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的人之一。在他论述历史本性的著作中，狄尔泰划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态的、重复的，而历史关注变化的、独特的、个性的存在。卢卡奇受到狄尔泰这种见解的影响。也正是由于狄尔泰和威廉·文德尔班、海因里希·李尔凯特分离了历史和自然科学，卢卡奇才能将哲学和经济学联系

起来。

这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是 20 世纪早期黑格尔复兴的代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于 1923 年出版，1927 年马丁·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1932 年赫伯特·马尔库塞撰写了《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的基础》，1938 年卢卡奇完成了他的《青年黑格尔》第一稿，而从 1933 年到 1939 年，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索邦大学主持关于黑格尔的研讨班（seminars）。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在于远离他所不同意的让-保罗·萨特的存在本体论，以及他将黑格尔的存在思想置于社会范畴，还有他对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归结为社会经济力量的辩证法的重新定位。卢卡奇将狄尔泰和海德格尔视为 19 世纪趋向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因此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非理性主义的驳斥，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实现理性主义启蒙的尝试。

#### 泰欧多尔·阿多诺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泰欧多尔·阿多诺没有参加 20 世纪早期的黑格尔复兴运动，他也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党员。他确实致力于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但作为上述两种人的反对者，其著作希望降低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一般影响。阿多诺的思想将在这里作出简要描述，然而不是作为卢卡奇的反对者，而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加以介绍。阿多诺倡导一种避免介入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批判形式，一旦斯大林主义俄国的极权主义凸显，对他思想的研究就将成为建构西方激进主义的脚手架，如果假定去黑格尔化和去马克思化同时进行，阿多诺的社会批评就是激进主义形式的一个有趣例证。

阿多诺的历史背景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希望从非黑格尔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推论中重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他出生于 1903 年，目睹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衰亡，以及斯大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退。阿多诺审视了历史上乌托邦的政治，无论是以民族优越性的形式，还是以专制的平均主义的形式。

在1917年革命之后的圣彼得堡，卢卡奇撰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而他英雄的余生未能成功地将布尔什维主义拓展到欧洲的中心。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时，他创作了《青年黑格尔》，旨在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指出德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旨在展示雅各宾—列宁主义的民主代表了世界上进步的力量。阿多诺在1966年出版了《否定的辩证法》，认为奥斯威辛的幽灵是莫斯科政治局的极权主义的制高点。卢卡奇从希望的角度撰写他的著作，坚信无产阶级革命是对未来的承诺。阿多诺从历史失败的角度撰写他的著作，坚信所有历史的宏大叙事在大灾难中终结。阿多诺通过美学的悲观主义视窗来观察世界。

阿多诺意识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联系，但他以西方哲学的衰落来解释这种连续性。在西方世界，自从启蒙以来的哲学衰落是地域性的，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因为他们是这种衰落的征兆而具有共同的特性。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未能免受的影响是工具理性的兴起。为了消除神话和迷信的世界，18世纪的启蒙主义孕育了理性本体论。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辩证法》描述了从作为信仰普遍理性的本体论的第一个形态到作为工具理性的破坏形式，或作为统治工具理性的、作为一种统治自然和人的极权主义技术的理性的历史。<sup>①</sup>

《否定的辩证法》<sup>②</sup>是一种反黑格尔的谤文，一种自启蒙以来便尝试寻找理性衰落的原因的理性的历史编纂学。它认为黑格尔是这种衰退的主张的提倡者。黑格尔的主要缺陷在于，他承认理性本体论。启蒙主义和黑格尔将理性判断为存在的精神实质，而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上帝是绝对精神。<sup>③</sup>

---

① Adorno, T. and Hork. M., *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1972.

②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1973.

③ Ibid., pp. 61-65.

黑格尔的理性本体论假定一种同一性哲学。自从本体论作为存在的精神实质，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以及理论—实践随之成为这种首要存在的终极显现。这四对范畴是绝不分离的，绝不加以区分，而体现一种实体的特殊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假定，所有最后分析的斗争都终结于统一。<sup>①</sup>

阿多诺告别黑格尔也是受到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实质的鼓舞。黑格尔的所有著作都提出了对他的普遍体系的具体部分或每一具体部分的功能分析，并使之严格按照精神的普遍原则发展。《哲学科学百科全书》<sup>②</sup> 由三部分组成：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部分中的每一个都以理性的一般程序的重复来进行完美的演化；或曰逻辑、自然和人呈现在包括理性进化的各个具体的章节中。<sup>③</sup>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性本体论也是合理的，因为理性浮现意味着一种统治手段。由于理性是同一性哲学的来源，由于它是统一赖以成立的基础，因而理性统治存在。

《否定的辩证法》的写作成因是黑格尔的二律背反，因为阿多诺看到，黑格尔是 20 世纪困扰理性的恶疾的先导。而《启蒙辩证法》赋予黑格尔以历史意义。在阿多诺看来，无论理性表现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形式，还是斯大林的无产阶级形式<sup>④</sup>，当黑格尔将理性转化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时候，他就为法西斯主义准备了通道。

20 世纪见证了工具理性的出现。阿多诺这个术语意味着工具理性并非要支配自然，而是要支配人。工具理性这个术语认为理性是使人成为奴隶的资本主义的、技术的或政治的工具。工具理性展示了理性不是要解放，而是要奴役；理性是一种服务于政治或技术的

---

①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1973, pp. 21-22.

② Hege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1975, 3 vols.

③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pp. 23-28.

④ Hegel, G. W. F.,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Vol 2 of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设施，它使人成为一种自动机器。20世纪推翻了这个德国唯心主义的公式，并证明理性如何被转化为毒气室的发明者<sup>①</sup>，而黑格尔将理性描绘为自由的前提。

据黑格尔所见，历史是另一个“精神现象学”证明自身的领域。<sup>②</sup>《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绝对知识”，并论述了将其视为精神和自由王国的自我意识的理性征服。<sup>③</sup>黑格尔理性本体论体系的实质意味着，黑格尔认同一种宏大叙事，这个理性统治的观点导致了人的状况的永久改善。

《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取缔了黑格尔的乌托邦历史观。阿多诺的这两本书是对所有企图虚构一部哲学史的谴责，因为这种体制的建构孕育着德国和苏联的独裁统治的开始。总体性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的辩证法》是阿多诺对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否定。<sup>④</sup>同一性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旨在建构矛盾的统一体，或多元化的合成。黑格尔确定了多对矛盾范畴：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整体—局部、理论—实践，并在他以统一取代矛盾的辩证法体系中加以讨论。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以综合取代矛盾而告终。

《否定的辩证法》旨在替代黑格尔的辩证法。阿多诺计划将这本书作为对黑格尔的一种超越。阿多诺讨论“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旨在哲学的和解，或曰辩证法并不终结于统一，而终结于特殊性和差异性。“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对立面的和解，而假定其反义。事实上，特殊性往往脱离系统性和统一性。“否定的辩证法”意味着存在

① Hegel, G. W. F., *The Philosophy of Mind*, Vol 2 of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② Hegel, G. W. 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by J. Sibree, Buffalo, 1991.

③ Hegel, G. W. F.,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1977.

④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s*, pp. 174-176.

的特性是不和谐、疑难以及异构，或曰不和谐和异构的存在是反对历史性宏大叙事和所有种类的法西斯主义的最好的防御。<sup>①</sup>

卢卡奇和阿多诺讨论黑格尔和解的认识论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不同理解。卢卡奇认同黑格尔和解的认识论，并将其转换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论。阿多诺否认和回避任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尝试；阿多诺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否定的辩证法”，但这种方法论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

延续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卢卡奇没有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但试图将其转换为社会本体论的基础。卢卡奇认同黑格尔的对立范畴，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整体—局部、理论—实践，并证明社会劳动能以这种可调和的对立为基础。卢卡奇认为，社会劳动是替代同一和矛盾的中介，而黑格尔将主体意识视为同一克服差异的中介。对黑格尔和卢卡奇来说，世界是理性或劳动的对象化，或者说世界在人的形象中塑造出来。

当卢卡奇将辩证法从意识转换为社会劳动时，他创造的这个新方法论生成了。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因为他展示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如何被转换为一种可用来理解社会经济构成的方法。

停止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阿多诺不认同黑格尔的和解理论；他推翻了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并以一种不可调和的形而上学取而代之。黑格尔和卢卡奇认为，同一是对立的最终结果，而阿多诺持相反的意见：真正辩证的方法导致分离和异质性。

阿多诺的方法，或曰“否定的辩证法”，是分解的过程。《否定的辩证法》这部著作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它基于对主体—客体、普遍—特殊、理论—实践、整体—局部、本质—现象也并不具有连续性，而断裂是感知现实的唯一途径这一假定。

异质性主题是阿多诺的著作《黑格尔：三篇研究》蕴含的中心

<sup>①</sup>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s*, pp. 182-192.

思想。当阿多诺接受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时，他这种做法完全采取了一种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黑格尔：三篇研究》中，阿多诺写道：

但他既没有将形而上学从总体性的抽象原则中分离出来，也没有去美化名为“好格式塔”的整体。他没有使局部成为整体的要素，而是自发地反对它；与此同时，作为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他认识到整体只能通过局部，只能通过间断、异化以及反映，通过……来实现自身，简言之，任何事物都是对格式塔理论的宣告。如果黑格尔的全部存在只是作为关键时刻的范型，那么它们总是指向对自身的超越，并在它们彼此的超越中产生。<sup>①</sup>

阿多诺重写了黑格尔。即使是暂时的，总体性也存在于黑格尔的思想中。即使是瞬间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也确实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产生了，而这不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结合中产生的，而是以总体性方式呈现的。尽管阿多诺使用了世界的同一性，但他采用了完全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阿多诺看来，总体性以不和谐和异质性为特征。一种社会的或哲学的格式塔形成了，但他并非以其同一性而是以其异质性为特征。

同样，阿多诺接受了辩证法概念，但将其完全规定为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黑格尔：三篇研究》中，阿多诺阐述道：

仅仅在矛盾变得绝对的过程中，而不是矛盾在绝对中变得缓和的时候，能够使之瓦解并可能找到必然误导黑格尔的和解的道路，因为其现实的可能性一直是他所不了解的。在所有的特殊性中，黑格尔的哲学拓展出否定性，但是，如果与他的意图相反，它也可能在整体上变成否定，从而认识到事物的否定性。<sup>②</sup>

<sup>①</sup> Adorno, Theodor, *Hegel: Three Studies*, Cambridge, 1993, p. 4.

<sup>②</sup> Adorno, Theodor, *Hegel: Three Studies*, Cambridge, 1993, p. 31.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确实获得了一种瞬间的综合，而个性是和解的关键。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普遍性面对着特殊性，但是这种对立的时刻归于个体的统一。阿多诺放弃了黑格尔的模式，他提出以非同一取代综合。对阿多诺而言，辩证法也是否定的，也是不协调的。

阿多诺对黑格尔思想的介入导致了一种非黑格尔的产物。尽管他认识到黑格尔是天才，但他的目的是消解黑格尔的体系。由于转而运用反对黑格尔的否定性批判的武器，阿多诺的黑格尔主义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反黑格尔主义。

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阿多诺反对黑格尔关于历史逐步发展以及历史是通往自由的过程的观点。作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见证，阿多诺坚持认为这些灾难敲响了历史乌托邦主义的丧钟。阿多诺相信历史乌托邦主义是连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纽带，他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但因为阿多诺否定任何形式的历史末世论，他不仅驳斥了黑格尔，也驳斥了马克思主义。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意味着不赞成马克思主义。

阿多诺对黑格尔主义的攻击表达了对大屠杀和古拉格不可思议的感受。奥斯威辛和肃清审判证明，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和启蒙主义宏大叙事的乌托邦视角是不相容的。阿多诺接受了尼采而没有接受孔多塞。

当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时候，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揭示，由于黑格尔是错误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产儿，因而这个父亲的后代继承了他的谬误。

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和黑格尔主义一样的历史目的论。启蒙引发了宏大叙事，而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目的导致了自由的实现。的确，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将马克思看作是一个“社会达尔文

主义者”，这表明他对马克思是完全误解的。<sup>①</sup>

但是阿多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退出自成一格的体系。这意味着它不仅批判解蔽历史最终目的的全部尝试，而且批判所有诸如集团、政党、工会这样的集体单位。阿多诺是个体、个别和非系统的辩护者，他采取尼采的态度，反对在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阿多诺看到趋从的力量对人类的巨大威胁，并且认为反对“趋从”这一精神缺失的最强有力的抵御在于独特性、断裂性以及对身体体系的拒绝。阿多诺谴责了本质概念。

将趋从视为对当代人类最主要的威胁，使阿多诺贬低政治的价值。对他来说，各种各样的集团都是令人厌恶的，都是系统的表述。阿多诺因此怀疑一切政治的或工人阶级的团结形式。服从一个政党以及遵守一个工人阶级组织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有很多失去个性并趋从自动化的例子。阿多诺将政治视为大众控制的另一种模型，它如同支持极权主义扩张的工具；而马克思将政治同时视为民主意志的声音，以及一种推翻资本主义的手段。政治对马克思而言是解放，对阿多诺而言却是大众被奴役的另一种形式。

当德国政治逐渐证明没有能力制止纳粹主义崛起的时候，阿多诺对政治的态度反映了一名德国知识精英的失败主义态度，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的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在他的一部个人自传《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写道：

工人运动的衰退证实了官方及其追随者们的乐观主义。……但进一步的理性预期减少了真正避免社会末日的希望，他们更虔诚地信奉古老的祈祷：大众、团结、政党、阶级斗争。当单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不再被“左翼”党纲的追随者们信奉；当他们的日报和拙劣的宣传提出超越所有的修正主义但毫无意义，而且明天就将被对立派取代的时候，党的路线的忠诚倾听者就显示出丝毫不尊敬

<sup>①</sup>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s*, p. 355.

已经放弃理论口号的音乐家的敏感了。<sup>①</sup>

阿多诺不仅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而且批判了德国工人阶级自身。德国的劳动者阶级遭受了与所有鼓吹技术统治论资本主义社会（techn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y）的人们同样的命运；他们被趋从的弊病、规范化、被动面对官僚合理化所控制。据阿多诺所见，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证明，作为革命骨干的无产阶级已经消失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包含如下的考察：

为什么尽管历史发展到寡头政治的时候，很多观察者能够猜到，工人们还是越来越意识不到他们的状况。从主观上看，阶级成员都变得更具有波动性了；而从客观上看，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僵化了。

然而，社会学家在思考这个恐怖的漫画：无产阶级在哪里呢？<sup>②</sup>

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并不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他可以被同时描述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可以被极好地理解为他实质上是来自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尽管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被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原理，但他从对韦伯关于社会科层化增长的思想以及尼采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碾碎个性的思想的借鉴中勾勒出了他的反资本主义观点。

阿多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攻击并非源自对政党策略和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他的攻击指向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他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政治学 and 经济学激进主义斗争以及后现代反资本主义革命的象征。

---

<sup>①</sup> Adorno, Theodor, *Minima Moralia*,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1974, pp. 113-114.

<sup>②</sup> *Ibid.*, pp. 193-194.

在“重估文化工业”<sup>①</sup>与“文化和管理”<sup>②</sup>中，阿多诺详述了当代文化生产机构的资产阶级统治与这种流行文化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大众文化假定了资产阶级生活形式的实在性，它没有提供替代资产阶级存在的模式。大众文化产生民众的模仿行为；由于大众对资产阶级生活模式的实质深信不疑，他们认为除了模仿这种生活方式之外，别无选择。大众文化的意图在于引导人们产生屈从、规范化、被动以及模仿的行为。资产阶级的科层化统治重新界定了文化的本质。18世纪的文化意味着变化的生活模式的呈现，而后现代的文化仅仅是赞同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管理的伪装。

然而，在两个时期，阿多诺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物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术语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阿多诺将资产阶级文化生产视为一种宣传形式，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大众模式永恒存在的造谣污蔑。阿多诺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这两个术语——物化和意识形态——没有掩盖阿多诺试图在基本问题上解构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阿多诺不仅期望他的“否定的辩证法”能够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分解，而且他对批判的定义有不同的来源，具有与马克思对批判的使用不同的目的。

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根植于对阶级结构和社会劳动的决定性作用的深层社会学分析。社会存在来自于社会劳动，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旨在揭示这种社会劳动如何从他们的生产者自身中剥夺出来。为了澄清这种异化的机制，马克思采取了对社会阶级本质的极端诊断。

阿多诺的反资本主义是哲学的和文化的。尽管阿多诺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疾病的最终原因不是阶级结构而是理性谱系。

马克思的批判基于本质与现象的矛盾。社会构成的本质是社会

---

① Adorno, Theodor, “The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in *The Culture Industry*, trans. by J. M. Bernstein, New York, 1991, pp. 98-106.

② *Ibid.*, pp. 107-131.

劳动，但社会构成的现象基于对社会劳动进行剥削的不平等。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现象必须与其本质相称的任务，或曰社会结构必然是社会劳动平等的一面镜子。

遵循他对“否定的辩证法”的定义，阿多诺认为，批判不是一种社会的事业，而是一种哲学的事业。阿多诺不相信本质与现象的同一，而相信它们的不同；他认为当体系被推翻时，批判就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工具理性的本体论取代了总体性而留下了特殊和普遍的永恒矛盾。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的理论，它由那认为市民将从压迫走向自由的法国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来填充。阿多诺不相信解放，而相信不和谐。他相信保护遭到大众文化专制主义威胁的个性的最好路径，在于赞同不和谐、不对称、不同步。

阿多诺是后现代激进主义的一个例证。后现代激进主义将消费主义的文化视为个性和自我实现的敌人，而马克思将对社会劳动的剥削视为人类被奴役的源头。后现代激进主义将批判定义为抵制科层化的私人存在，将否定政治的行为看作是改变现实的最有效路径，认为文化的反义（antonymic）是当代社会更新的手段；而马克思则将批判假定为政治革命的形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将批判定义为政治实践。

## 二、路易·阿尔都塞/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路易·阿尔都塞

可以在路易·阿尔都塞——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倡导者的思想中发现断开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学术策略。为了在一般意义上理解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近，有必要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

苏共二十大是转变苏共生命的事件。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斯大林的罪过”承认了很多独立的共产主义者如卢卡奇长时间以来已经认识到的东西，即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



阿尔都塞面临的挑战——右翼的挑战——是创造马克思主义的非斯大林主义形式，推动去斯大林化的过程。

对阿尔都塞来说，政治是主要的。他决定将法国共产党归属为“后 1956 年”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阿尔都塞沿袭了与卢卡奇——这个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选择归属于这个时刻——同样的路径，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退出法国共产党的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阿尔都塞将自己界定为一名党员，而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必须完全重建党的理论工具。阿尔都塞与法国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矛盾，因为他不忠实于其理论的上层建筑，坚持主张必须去斯大林化，但作为一个机构和一个骨干，他同时坚持自己对党的忠诚。

对于从右翼角度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敌人，阿尔都塞确实站在“左翼”角度即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角度与之战斗。具体地说，他反对主观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构成这些学派核心的历史主义。

主体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心。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为阿尔都塞所厌恶，因为在这里“我”表现为一个最高统治者，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意味着毁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思想。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将个性思想作为反对黑格尔总体性概念的武器一样，个体至上的概念毁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团结概念，而对阿尔都塞来说，这需要同时消除全部的革命策略。

阿尔都塞还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了人道主义，一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威胁。马克思主义“左翼”深受《巴黎手稿》的影响，而阿尔都塞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推衍中消除 1844 年这些笔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形成了一种类存在，一种普遍主义人类学的信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延续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传统，因为它运用了人类存在的语言。阿尔都塞是本质这一术语的敌人，因为本质违反人最终由环境、由他生活的社会总体构成的思想。存在和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主要原因，阿尔都塞引发了成熟的马克

思主义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的思想。《巴黎手稿》是费尔巴哈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它们都借用了类存在的语言，而且他们都反驳历史唯物主义和成熟的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策略的意图是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分离出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的马克思。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认识论断裂”的焦点。

马克思主义“左翼”也遭到历史主义或曰历史目的论的黑格尔主义思想的破坏。如同泰欧多尔·阿多诺，阿尔都塞否认历史是由任何宏大叙事操纵的。历史的推动力量不是末世论，而是阶级斗争。

阿尔都塞的理论政治学呼吁同时否定右翼和“左翼”，而在列宁的传统中重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放弃了斯大林和主观主义、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思想，并试图使哲学永远成为列宁主义的继承者，这意味着为无产阶级提供帮助被剥削阶级斗争的理论。哲学变成了列宁主义政治学的工具，而阿尔都塞提到了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证明革命阶级仍然在社会上存在的胡志明在越南的胜利。阿尔都塞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为特征，当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提供起义的理论时，这种联合的实质就形成了。

阿尔都塞关于重建列宁主义原则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案，得到了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崛起的语言和人类学结构主义哲学发展的支持。这种哲学发展跨越了他的一生。这两位社会理论家提供了研究语言和人类学的结构概念，在德·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解释由对作为总体性表述的特殊性的理解来引导。

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转换因对贝内迪特·斯宾诺莎的阅读以及他对功能解释的辩护而变得容易了。斯宾诺莎发明了“结构因果性”（structural causality）这个术语，他对阿尔都塞有重大影响。<sup>①</sup>

---

<sup>①</sup> Benton, Ted,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London, 1984, pp. 64-65.

为了捍卫结构因果性思想，对阿尔都塞来说，为功能主义思想辩护也是必要的。总体性的特定作用归因于特殊性，而只要特殊性发挥其职能，总体性就能够存在。

为了获得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综合，阿尔都塞需要分离黑格尔—马克思的联系。“认识论断裂”这个术语成为相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黑格尔道别的口号，而这一看法是本卷以及本套书其余各卷致力于批驳的。阿尔都塞离开黑格尔，导致他强加于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形式。这是与马克思的方法对立的形式，它使阿尔都塞形成了一种违背马克思所有文本根据和真实性的斯宾诺莎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的文本，通过对《资本论》的一种独特的解读，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方法归结于矛盾。

“认识论断裂”的表述出现于1965年，阿尔都塞在这一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解读〈资本论〉》<sup>①</sup>与《保卫马克思》<sup>②</sup>。《解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都是战斗的著作，用以反击萨特在1960年出版的两部著作——《辩证理性批判》<sup>③</sup>和《方法论若干问题》<sup>④</sup>——中推导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早在1947年，阿尔都塞已经看到因存在主义和黑格尔复兴的双重攻击而产生的危险迫在眉睫，而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短文《男人，那夜》中，他攻击了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sup>⑤</sup>，在1950年的一篇文章《回到黑格尔》<sup>⑥</sup>中，他又简要地概述了黑格尔在法国的复

① 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Etienne,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1970.

②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1977.

③ Sartre, Jean-Paul,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rans. Alan Sheridan-Smith, London, 1976.

④ Sartre, Jean-Paul, *Search for a Method*, trans.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1963.

⑤ Althusser, Louis, "Man, That Night", in *Early Writings: The Spectre Of Hegel*, trans. G. M. Goshgarian, London, 1977, pp. 170-172.

⑥ 该文题目全称是《回到黑格尔，学院派修正主义的最新口号》。——译者注

兴。<sup>①</sup> 20世纪法国的黑格尔主义是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必须被理解的背景。

在《回到黑格尔》中，阿尔都塞以下面这个段落总结了法国黑格尔主义的复活：

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慎言之，与让·瓦尔关于 *Le Malheur De La Conscience* 的论文，与阿兰在《主要概念》（1931年）中对黑格尔的讨论，和《形而上学的讽刺剧》（1931年）这篇独特的文章，连同哈特曼和克罗齐写的论文有关。从科耶夫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课程（1933~1939年）中可以发现这种继续，参加课程的一个半沉默的团体自从萨特、梅洛-庞蒂、雷蒙·阿隆、弗萨德、布里斯·帕兰、凯勒斯等开始口若悬河。科耶夫讲到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精神现象学，主奴辩证法，为声望的斗争，物自体，自为，虚无，计划，在对死亡的斗争与将谬误转化为真理的过程中发现的人的本质。为法西斯围攻世界而制造的这些奇文！接着就到了战争年代，在伊波利特出版的这些译作（《精神现象学》1939年和1941年版，《法哲学原理》1940年版）和伊波利特撰写于战后时期即1946年的论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1947年）中可以看到这些版本……随后的贡献是：伊波利特在索邦大学任职，黑格尔认识到，通过他的评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导师之一；在所有书店的窗口评论；在每篇学术论文中表述的“否定性劳动”，在每次学术讨论中提及的主人和奴隶，反对让·拉克鲁瓦的另一种意识斗争；我们关于“次逻辑”的神学论；以及所有与一种复原残骸的学术和宗教的欢腾相关的喧嚣。<sup>②</sup>

阿尔都塞试图建构将黑格尔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这一思潮

<sup>①</sup> Althusser, Louis, "The Return to Hegel", pp. 173-183.

<sup>②</sup> Ibid., p. 174.

的分水岭。当他借此为自己辩护时，他撰写了一篇论黑格尔的硕士论文。写于1947年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论格·威·弗·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sup>①</sup>，阿尔都塞认识到，如果他想要斩断黑格尔主义的脉络，最好了解自己的敌人，以这种学术战斗来武装自己。

这篇论文是《解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的前奏；这是阿尔都塞中期的成熟的结构主义著述。

这篇论文包括如下阐述：

这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性。我们应该赋予历史概念以基本内容并以总体性来标示黑格尔。同样，我们能够确定这种总体性的理性本质与人类的总体性本质。但这是一个触及《现象学》中超越和消解的事实，黑格尔本人未能成功地描述他主要的论断，以说明历史的人的总体性是所有其他人必然涉及的总体性。在康德看来，在范畴的目录缺失的情况下，所有人类活动的先决条件——抽象的真理将被空缺的统治所超越。在人类总体性的基本结构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支配我们时代的人类范畴的目录。《资本论》是我们的先验分析。这似乎将呈现出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发现和占有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人类范畴。<sup>②</sup>

尽管阿尔都塞最初受黑格尔主义总体性思想的影响，但当他撰写《解读〈资本论〉》以及《保卫马克思》的时候，他却抛弃了这个思想。在他中期的这些著作中，斯宾诺莎取代了黑格尔。阿尔都塞1965年在斯宾诺莎主义的语言中提到了“结构因果性”，而不是本质推动总体性向前发展。斯宾诺莎对“结构因果性”的定义指的是一种主导架构，即特殊性是总体功能的“超决定的”局部网点。阿尔都塞倾向于斯宾诺莎，这可在《解读〈资本论〉》的下述语句中捕捉

<sup>①</sup> Althusser, "On Content in the Thought of G. W. F. Hegel", pp. 36-169.

<sup>②</sup> Ibid., p. 154.

到：“另一个例子是，斯宾诺莎哲学介绍了哲学史上的一种空前的理论革命，可能是全部时代最伟大的哲学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从哲学的立场来看，我们可以将斯宾诺莎视为马克思唯一直接的先驱。”<sup>①</sup>

阿尔都塞还放弃了本质的思想，这对他而言具有双重意蕴。“本质”的一个意思指的是费尔巴哈的“类存在”，或曰全人类的普遍实质，而阿尔都塞拒绝费尔巴哈对存在的这种用法。“本质”的第二个意思指的是必要的发展，而这是黑格尔主义的用法。受亚里士多德将本质定义为有目的的人的影响，黑格尔将本质用于总体性，并认为总体性是通过他们的本质，通过一种内在的力量而向前推进的。阿尔都塞否定了黑格尔将总体性定义为由本质所引起的，而重新将本体性定义为一种结构，一种产品交换领域的混合物。

阿尔都塞也放弃了黑格尔主义的历史性概念，他的意思是，历史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人类历史定义为通往自由的进程，但阿尔都塞拒绝这类末世论的期望。对阿尔都塞来说，宏大的历史叙事并不存在，而历史的线性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本章后面的段落将描述阿尔都塞是如何改写历史概念的。

至于否定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性、本质以及历史性概念，阿尔都塞在他1947年的论文中也否认黑格尔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对黑格尔而言，物质，或精神，成为主体，或曰个人是精神的产物。在这个方面，阿尔都塞是真正的马克思，他发现黑格尔颠倒了预言的概念。马克思相信，在黑格尔看来，预言的来源是精神，而个人仅仅是精神活动的结果。马克思修改了这个方程式，认为个人或集体是预言的基础，以唯物主义代替了唯心主义。阿尔都塞走得更远，他否认个人具有任何预言力量或因果潜力，而将因果潜力仅仅归因于结构，并重申斯宾诺莎所主张的“结构因果性”。

在他成熟的著作中，阿尔都塞深入阐述并完善了他在上述论文

---

<sup>①</sup>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 100.

中发现的思想。由于为结构主义语言学 and 人类学所强化，阿尔都塞将生产方式看作是全面的。“他们将自身表述为由某些特定类型的复杂性综合而成的总体性，这种介绍的表述追随恩格斯，我们能将其概要地缩减为三：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sup>①</sup>

在这些全球结构中，个人仅仅被设想为网点。个人因此履行确保区域下属结构的职能，而这正是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这一术语的意思。通过消除个人的建构力量，阿尔都塞展示了他的反人道主义，因而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利益、本质、异化、外化的规定，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

阿尔都塞捍卫功能解释，他使用的功能解释的同义词是“表达主义”<sup>②</sup>（阿尔都塞对“表达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必须与查尔斯·泰勒在论黑格尔的著作中使用的术语区别开来；关于泰勒的用法参见本书第三章）。阿尔都塞的“表达主义”这一术语意味着，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每一个性都是一种“表达”，一种全局的局部代表。在阿尔都塞看来，功能解释是澄清全局的个性化过程。对阿尔都塞来说，功能主义是“多元决定”的同义词，或由一种“全球结构”所决定的奇特过程。

马克思的全球结构理论相当于一种“认识论断裂”，一个阿尔都塞从加斯頓·巴歇拉尔那里借用的术语，意味着在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中突然断裂。巴歇拉尔的术语最初是在科学史的语境中创造的，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是同义语，指的是从根本上背离一个特定的科学传统，并创立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阿尔都塞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认识论断裂”这个术语：说明黑格尔和马克思相脱节；以及说明马克思是革命的科学范式的开端这个事实，即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学大陆。

阿尔都塞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擅长科学理论

---

① Althusser, *For Marx*, pp. 231-232.

②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 15.

的哲学家。理解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在于，首先把握他的科学理论，而在这个方面，阿尔都塞认识到，他得益于巴歇拉尔、让·卡瓦耶斯、米歇尔·福柯、乔治·康吉莱姆和雅克·拉康。<sup>①</sup>所有这些都沉浸在一种“解读”中，所以这本书的题目是“解读《资本论》”。“解读”这个术语意味着一种理论，一种理性建构，总是适用于客体，或曰客体是“解读”或介入的产物。

有三本书使阿尔都塞成熟时期的著作轮廓分明，而这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这三本书是：《解读〈资本论〉》、《保卫马克思》以及《自我批评论文集》。

阿尔都塞着手从科学理论的视角重建马克思主义。通过重建科学理论，阿尔都塞准备了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因此库恩和巴歇拉尔确认了阿尔都塞的创新阶段。

在《解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将科学或曰知识列于研究的范畴。<sup>②</sup>一位研究者介入一个暂时的知识结构中，并提供了一种数据场域（data field）的独特配置。介入这个词意味着打破以往学派的思想，并将一种新的理论注入数据场域。科学的理论都是介入的；它们都是一种新的数据基础公式的产物。

所有的知识都是暂时的。<sup>③</sup>由于知识是介入的结果，知识因而将总是反映暂时的瞬间。每个介入都由暂时的需要和观点所激励，因此知识将与其自身产生的介入同步。

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是根据生产力模式形成的。知识或曰理论必须是被生产的。一个新理论的最初阶段是质疑者的介入，但质疑从各种科学学科——诸如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物理学，等等——中带来信息。通过这些不同的知识库告知，将“断裂”强加于一种同步的数据场域，质疑者将这些知识库作为原材料，并从中

<sup>①</sup>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p. 16, 44.

<sup>②</sup> Ibid., p. 34.

<sup>③</sup> Ibid., p. 112.



产生一种新的现实假设。一个质疑者将总是占有用于他们研究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是以前的理论，而从这些过去的理论中，质疑者将沉浸在一种“范式转换”的生产过程中。

在《解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将“科学”阐述为“理论实践的历史理论”<sup>①</sup>。他的意思是，由于所有的知识构成都是当代理论的产物，知识自身是理论介入的延续。阿尔都塞相信，历史性是知识的根本，但他以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观点使用历史性概念。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性意味着历史显示出一种目的，一种对自由而言的内在运动。但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性并未显示出一种目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仅仅是理论范式的延续。

《资本论》是当代的认识论，或曰“认识论断裂”的同时代性在于将《资本论》的范式运用为当前介入的解释性假说。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他对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揭示，形成了产生当代理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材料。《资本论》的生产力理论为知识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预设。

基于这种新的科学理论，阿尔都塞有勇气攻击黑格尔主义。而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范畴是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因为它消除了精神理念，或曰全部的自我意识主体。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都假定一个积极的主体，以普遍精神（黑格尔）的形式，或以绝对自我（存在主义）的形式，或以人类学的存在（费尔巴哈）的形式。在他反对这些异端哲学家的学术争论中，阿尔都塞需要消除主体。

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必须消除作为基本介质的主体。他的科学理论证明，新范式的生产无需一个假定的主体即可展开。对理论发展无需主体的探索，使阿尔都塞阐述了一种新的因果性观点。阿尔都塞需要一种工具，用来解释为什么社会发展的过程削减了肯定性的主体。

---

<sup>①</sup>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 61.

在他的《自我批评论文集》中，阿尔都塞阐述了自己的介入意图：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作为起源、本质和原因的“主体”的唯心主义范畴断裂，在其内部为全部外在的“事物”所规定，也就是说为内在的“主体”负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没有任何作为一种绝对中心、一种激进起源、一种独特原因的主体。<sup>①</sup>

如果还原为一种起源、一种本质或一种原因（甚至人），这将使其主体……一种主体，一种“存在”，或一种“本质”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存在于内在统一的形式中（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责任特征，责任是在所有主题的其他事物中被内在建构的），因而是可以解释的，因此能够计算全部的“历史现象”。<sup>②</sup>

阿尔都塞对无主体的因果性理论的诉求使他趋向于斯宾诺莎。阿尔都塞渴望自己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以便找到一种无主体的结构因果性，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找到其极致。

为了列出一个以及同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错误”，甚至是拜物教的错误（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拜物教理论对我而言似乎是意识形态的）……并预示，通过结构因果性（斯宾诺莎）这个术语，有些事情事实上是“马克思巨大的理论发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这也能被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因果性”<sup>③</sup>。

我将“知识”定义为“生产”，并将科学形式的内在性确认为“理论的实践”，我使自己基于斯宾诺莎：不是为了提供这个答案，而是为了反击居于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并且经由斯宾诺莎，去开

---

① Althusser, Louis,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Grahame Lock, Atlantic Highland, 1976, p. 96.

② Ibid., p. 97.

③ Ibid., p. 126.

启一条唯物主义的可能路径，如果运行这种风险，就能在语言之外找到某些东西。<sup>①</sup>

阿尔都塞将“多元决定”这个术语替换为斯宾诺莎主义的词汇“结构因果性”。多元结构是这样的理论，即一种社会结构决定其主体的行为，或具有因果优先性和先在性。据阿尔都塞所见，社会结构由多元化的局部网点组成，每个局部网点都复写了普遍的社会结构，而普遍的和局部结构的汇合是因果性的来源。多元决定以历史理论或发展理论为基础，来自于无数社会总体性的结构网点。为了解释社会总体性的发展，唯一有必要的是指出社会实体的内部组织，或产生原因的结构。

多元决定的理论暗示着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替代了黑格尔。阿尔都塞将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确立为斯宾诺莎主义的原理。斯宾诺莎使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主义的问题。与其说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现在不如准确地将之界定为马克思得益于斯宾诺莎。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替代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接着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但他没有在恩格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阿尔都塞接着使用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他以斯宾诺莎主义的视角调整了这些术语。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经济体系革命的理论，但这个对历史变化的解释发生在斯宾诺莎主义的术语中。经济体系运动的根据是结构因果性逻辑，或者说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性方法。

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层面，或者说对知识如何产生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这个方

---

<sup>①</sup> Althusser, Louis,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Grahame Lock, Atlantic Highland, 1976, p. 138.

面，他与斯大林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彻底断裂。苏联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为基础，遵循真理的“复写论”。在恩格斯以及斯大林看来，外部世界将事物的“副本”铭刻于意识中，因此主观的思想确认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图景。

阿尔都塞的知识论或曰生产理论，是一种对斯大林主义认识论意识形态的全然拒绝。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的介入理论，而非一种“复写论”，并将知识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抵制是他对赫鲁晓夫1956年“斯大林的罪过”这一演讲所作反应的附加方面。正如阿尔都塞所赞同的，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斯大林主义政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因而他将斯大林主义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误用，因而他还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用以避免克里姆林宫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破坏作用。

阿尔都塞与恩格斯的关系是扭曲而令人困惑的。一方面，他抵制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仍然将恩格斯视为马克思忠实的解释者。阿尔都塞从未证明谴责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何以可能，他所断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失真，而与此同时他又断言恩格斯是马克思准确的解释者。

阿尔都塞试图避免在马克思—恩格斯分离的辩证认识中产生误解的全部可能性。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人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脱节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或者说通过恩格斯来审视马克思，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断接成为一个焦点。阿尔都塞担忧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脱节将在政治上危害列宁主义运动。在哲学上，阿尔都塞试图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幽灵，他不同意黑格尔主义的侵入，因此他的反黑格尔主义遮蔽了他掩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需要。对阿尔都塞来说，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就是屈从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但阿尔都塞确实将列宁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摆脱斯大林主义之后，列宁主义是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列宁主义是围绕1956年后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复兴的核心。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正因为这样，它对知识而言是一种生产工具。

列宁主义将知识理解为来自于阶级立场的范式构造。列宁是对这个思想的具体化，即知识演进使介入成为现实，而这种介入是阶级斗争的表述。

阿尔都塞对列宁主义的贡献在于，证实列宁主义坚持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阿尔都塞而言，主要目的是改变现实，而为了改变现实，有必要使政治进入理论的灵魂，或者说政治的终结必然指向研究方法。革命行为是理论的目的，阿尔都塞接受了列宁，因此他也以同样的思路接受了毛泽东。

阿尔都塞体认的理论—实践方式是另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例子：换句话说，阿尔都塞对理论—实践范畴的列宁主义定义是这种范畴的黑格尔主义形式的颠倒。当黑格尔谈及理论—实践的联系时，他假定理论是基础，或者说一种恰当的理论上的理解是进一步理解实践的根基。黑格尔不会打断思考的循环。然而，黑格尔左派这样做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鉴于鲍威尔和马克思开始将理论作为基础，理论的最后结果是改变现实的行为。黑格尔、布鲁诺以及马克思都主张理论是先行的。但鉴于黑格尔相信理论的目的是进一步的思考，对人类的再教育，鲍威尔和马克思改变了理论的目的并使现实的改变成为其终点：不是对人类的持续教育，而是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实际改变。

阿尔都塞颠倒了这种黑格尔—鲍威尔—马克思的编纂学。阿尔都塞试图使政治而不是理论变成主要的。而对阿尔都塞来说，目的变成了主要的。鉴于黑格尔认为终点是理论的结果，阿尔都塞认为，理论是政治的结果。政治变成了根基，而理论成为了手段，这就相当于否定了黑格尔派—鲍威尔—马克思的规则。列宁主义是对黑格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驳。

在他的思想中期，阿尔都塞“通过揭示社会存在的所有层面都是独特的实践结果”，建立了“政治的首要性”<sup>①</sup>。而知识的建构是“一种关于不同的人类实践（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科学实践）的具体层面的理论”<sup>②</sup>。

生产过程是三大普遍性的综合体：普遍性之一，或组成理论实践的原材料的思想，或提供理论生产的砌块（building blocks）的巨大思想链条；普遍性之二，即当前概念的机制，来自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科学的方面，它们对这些存在的基石起作用；普遍性之三，这种理论实践的生产。阿尔都塞的这个模式仿效《资本论》的生产过程，在那里，普遍性之一仿效由自然提供给人的原材料，普遍性之二正如学术研究致力于描绘的劳动过程，而普遍性之三是诞生于这个过程的使用价值。阿尔都塞的模式模仿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剥削、劳动过程、对象化的范式。阿尔都塞理论建构的普遍性模仿了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之间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思想。

一种知识，一种理论建构，决不会完全地复写客体。只是它不构成主体的结果，而通常是结构决定论的表述。阿尔都塞在他的思想后期，改变了他思想中期所持的立场。他在思想中期强调哲学生产中全球结构的决定论，而他在思想后期则强调去中心的结构和政治。在1971年的《列宁和哲学》中，阿尔都塞认为，政治实践是哲学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列宁和哲学》包含这样两个命题：

1. 哲学是以理论形式实现政治介入的实践。
2. 所有哲学都表述了一种阶级立场，一种在全部哲学史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大辩论的“党派”，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辩论。<sup>③</sup>

①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 58.

② Althusser, *For Marx*, p. 229.

③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1971, p. 105.

在通往其学术生涯终点的途中，阿尔都塞那时候相信政治介入将确立阶级活动的目的，而哲学必须提供实现这些目的的策略。由于政治介入反映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意旨，意味着现实必须被改变，因而理论生产的任务是，提供使现实通过阶级斗争而被改变的理论工具。

由于阿尔都塞的“政治介入”呼吁他成为法国共产党忠诚的党员，又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由黑格尔主义保持政治中立，阿尔都塞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黑格尔。阿尔都塞的“阶级立场”要求他推测一种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认识论断裂”，作为拯救法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路径。

阿尔都塞的不幸在于，他将自己的哲学定义为对政治的质疑，因为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中，他被导向对客观文本根据的歪曲，即马克思 1945 年之后的著作是黑格尔在场的无可辩驳的文献证明。

####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著作《历史与结构》<sup>①</sup>最初于 1971 年在德国出版，攻击了阿尔都塞学派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施密特推进了连续性的论题。黑格尔主义方法的主要范畴是为马克思所利用的思想，而不是提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不连续性。施密特写出了一种试图纳入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的“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接纳”(materialist Hegel reception)<sup>②</sup>，作为与历史唯物主义或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共谋的解释性优先权。

施密特不是“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接纳”的唯一代表，因为这个学派起源于西欧和苏联。而这也不是“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接纳”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两位苏联学者——马克·罗森塔尔<sup>③</sup>和爱华

① Schmidt, Alfred, *History and Structure*, trans. Jeffrey Herf, Cambridge, 1984.

② Ibid., p. 21.

③ Rosental, M. M., *Voprosui Dialektiki Kapitale Marksa*, Moscow, 1955.

德·伊里因科夫<sup>①</sup>从这个视角写作的重要著作应该被人们记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是苏联哲学内部的主要问题。列宁自己留给苏联共产主义的学术思想传统是他在《哲学笔记》中所写的，即为了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必要读黑格尔的《逻辑学》。<sup>②</sup> 在20世纪，列宁是“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接纳”学派的创始人，而这个方法论脉络由艾布拉姆·德波林延续。<sup>③</sup> 然而，斯大林和安德烈·日丹诺夫认为，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意识形态的需要构成威胁，德波林学派因而被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驱逐。日丹诺夫不仅孤立德波林学派（Deborinites），而且当日丹诺夫谴责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卢卡奇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无视斯大林—日丹诺夫对莫斯科共产主义中列宁主义—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抑制，罗森塔尔和伊里因科夫的著作成为列宁《哲学笔记》哲学继承者的有力象征。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成为政治局共产主义国家认可的哲学，但列宁主义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却进入苏联帝国周边的西欧。在西欧，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的哲学，一种反对国家意识形态支配的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捷克斯洛伐克，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意见在两个学者——卡列尔·科西克<sup>④</sup>和金里奇·泽勒尼<sup>⑤</sup>——的著作中得到了延续。

施密特熟悉泽勒尼的著作，并且在他自己的著作《历史与结构》中提到这位捷克哲学家的著作《马克思和〈资本论〉的科学逻辑》。<sup>⑥</sup> 列宁—德波林—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科西克—泽勒尼这

① Iljenkow, E. W., *Die Dialektik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m 'Kapital' Von Karl Marx*, Berlin, 1979.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③ 关于苏联内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黑格尔—马克思传统，参见 Anderson,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④ Kosik Karel, *Dialectic of the Concrete*, trans. Karel Kovanda and James Schmid, Dordrecht, 1967.

⑤ Zeleny, Jindrich, *The Logic of Marx*, trans. Terrel Carver, Oxford, 1980.

⑥ Schmidt, *History and Structure*, p. 125.



条发展线索是施密特的“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接纳”学派的哲学先驱。

施密特的另一本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文集》<sup>①</sup>是一部论文集，也是破译马克思方法论逻辑的早期尝试。它描述了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形式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定位。施密特与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不同，而这证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各种立场的综合。后面的段落将描述施密特、阿尔都塞和卢卡奇的区别，旨在对至少三种学术立场加以区分。

在更深的层面上，阿尔都塞和施密特之间的相互谴责，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冲突。阿尔都塞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化和政治的产物，他深受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以及法国共产党的政治紧迫情况的影响，这使他具有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姿态。施密特是日耳曼文化的产物，他深深地沉浸于自我意识的论争，黑格尔的复兴在其中作为强大的力量得到延续。他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尔库塞、卢卡奇和恩斯特·布洛赫的影响。泽勒尼著作的译本出版于东柏林，施密特是列宁—德波林—罗森塔耳—伊里因科夫—科西克—泽勒尼话语的继承者。某种对话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其中了，从创建的术语中也能发现施密特自己的习惯用语。

施密特是马克思的“逻辑—历史的”解释的创立者之一。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基于“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接纳”，这种解读假定马克思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纳入社会解释的解释性终点（coda）。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公式，最初表现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式，并通过用这些形式去解释社会结构的的活动，展示了它们何以被唯物主义化，何以与唯物主义相结合。

逻辑—历史的学派是一代德国学者建立的，而施密特是这个

---

<sup>①</sup> Schmidt, Alfred,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1969.

队伍中的一员。奥斯卡·内格特在他的著作《黑格尔哲学的活动和结果》中这样描述这位先驱者——“那些马克思主义学术左派的反对者都被黑格尔思想中辩证的、革命的方面说服”<sup>①</sup>。而列出这个学派的完整名单还是必要的。除了施密特之外，对这个学派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内格特、曼弗雷德·黎铁尔、赫尔姆·艾香德、汉斯—于尔根·克拉尔以及汉斯—乔治·巴克豪斯。这个学派的任务是发掘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哲学预设，而他们在黑格尔哲学中发现了这些沉思的公理。这是趋向于阿多诺“左翼”的一代德国创新者。

克拉尔的文章《对〈资本论〉和黑格尔本质逻辑关系的思考》<sup>②</sup>对内格特的文集《黑格尔哲学的活动和结果》有贡献。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为背景，克拉尔是最早主张黑格尔的本质论是马克思《资本论》基础的偶像破坏者之一。克拉尔进一步声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就是黑格尔的本质概念，价值是在商品中物化的，而黑格尔的矛盾的逻辑能在《资本论》的表述——商品分化为价值和交换价值——中找到。马克思借用的《逻辑学》另一个范畴是本质和现象的辩证法，因为对马克思而言，本质是能够在商品中找到其现象的价值。在克拉尔的解释中，《资本论》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的逻辑学。

另一个对马克思的逻辑的、历史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是《重建马克思价值理论资料》<sup>③</sup>。巴克豪斯指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经济学和哲学的混合体。巴克豪斯认识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自于李嘉图主义左派，而且他注明将劳动价值论和黑格尔主义的本质与表象范畴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据巴克豪斯所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使逻辑优先于历史，他还批评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释，因为恩格斯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作为现实运动的镜子或副本。巴克

① Negt, Oskar,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 Frankfurt, 1970.

② Krahl, Hans-Jürgen, “Bemerkung zum Verhältnis von Kapital und Hegelscher Wesenslogik”, in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 pp. 137-150.

③ Backhaus, Hans-Georg, “Materiali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3, Frankfurt, 1975, pp. 122-159.

豪斯确认了这个论题：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

逻辑的一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以《逻辑学》取代《精神现象学》，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换言之，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连接链条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逻辑学》，因此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连续性不是人类的预测而是社会科学的解释。

逻辑的一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进行了深入分析，而现象学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将其考据精力投入到《巴黎手稿》中。逻辑的一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试图界定马克思分析社会的方法，而现象学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捍卫主体—客体的统一，而且他们假定主体—客体并不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连续性。

逻辑的一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核心文本是《资本论》和《大纲》<sup>①</sup>。1939年第一次出版于东德的《大纲》<sup>②</sup>在卢卡奇评价马克思的过程中没有起到重要作用，而这证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两翼的分裂：现象学这一翼关注人类的生产能力，而“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接纳”这一翼试图分析1867年《资本论》的结构预设，这要回到《大纲》，研究早期的思路和表述。

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大纲》的差异提供了更多关于不同的文本场域何以导致了对同一作者作不同解释的根据。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强调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这被希望马克思和黑格尔分离的人们抓住，并将其作为马克思对他的辩证方法最准确的阐述。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绝大部分都不受黑格尔方法论机制的制约，而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反对

① 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又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98。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开始对《资本论》起源的调查。通过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勾勒的《资本论》的草稿，可以获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思想演变的新见解，而这澄清了这个文本的新意义。关于《资本论》如何建构的清晰论述，参见Roman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Frankfurt, 1969。

者以为这个文本提出了马克思科学的哲学最清楚的概述。另一方面，1858年的《大纲》丰富了许多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提及的问题，或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诸学派的拥护者将《大纲》作为马克思科学的哲学的决定性阐述。卢卡奇没有试图例举《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反对《大纲》，但其他许多马克思学家是这样做的，而《大纲》是作为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根据出现的。

现象学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和逻辑的一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出版而扩大了<sup>①</sup>，开始于1976年的这项出版最终将印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迹的每个片段。当新的文本进入公共视线的时候，它们通常会扩大当前学者的主张，而本章表明为什么对黑格尔早期经济学著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的1858年《大纲》的复原更新了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评价，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各卷持续的出版也将对马克思研究加以改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第一次揭示的文件绝大部分也提供了对逻辑的一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支持。举例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已经出版了此前不为人知的笔记和手稿，马克思用它们作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最后版本的准备材料，而这些手稿强烈地支持了这个思想，即马克思借用了许多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以此作为《资本论》的解释性工具。特别是，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显然属于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或者说不依赖黑格尔的《逻辑学》，要理解马克思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运转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为了更完整地描述方法论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立场，我将以此解释方法的五个方面展开讨论。我选择的这些方面的特色是，决不穷尽方法论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立场或

<sup>①</sup>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erlin, 1975, (MEGA), vols. 1-32.

<sup>②</sup> Levine, "Hegel and the 1861-1863 Manuscripts of *Das Kapital*",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4, no. 4, 47-58.

各种辩论，而我的选择意图在于阐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还要描述施密特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特征。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我将提到的这五个方面是：（1）马克思和《逻辑学》；（2）从抽象到具体；（3）马克思的叙述方法；（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5）马克思和科学的哲学。

#### （1）马克思和《逻辑学》

当施密特谈及“逻辑的一历史的”<sup>①</sup>，泽勒尼谈及“结构的一发生的”<sup>②</sup>时，尽管他们使用不同的术语，但他们提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共同特征。施密特和泽勒尼都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汲取了独特的逻辑工具，而马克思又用这些逻辑工具分析了社会结构。

用《逻辑学》的具体章节来观察社会结构，包含两种解释形式：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历时性解释指的是线性的或基于暂时的或基于历史的解释，而共时性解释指的是纵向的，即关于社会构成的结构框架。施密特坚持认为，马克思最感兴趣的是共时性解释，他将社会构成视为复杂的体系。

马克思的科学的哲学表现为认识和历史之间的张力。马克思希望实现两个目的，解释社会总体性的内部组织以及展示这些总体性何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线性的过程。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优先重视第一个目的，即社会总体性的结构分析。施密特认为，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认识，用来理解为局部提供内在性的整体。

同施密特一样，泽勒尼也认为，马克思主要关注反对历史性的认识，以共时性超越历时性。泽勒尼写道：“我们不是在这里面对一个纯粹的逻辑进程，而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说……仅仅面对纯粹的历史过程，但面对的是对历史过程的理想的表述。”<sup>③</sup> 马克思在基

① Schmidt, *History and Structure*, p. 33.

② Zeleny, *The Logic of Marx*, p. 9.

③ Ibid., p. 52.

本层面上关注认识，关注这个把握了本质的概念，即社会总体性的内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对社会总体性的深层结构的接近。

从逻辑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由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提出的历史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建立在他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这一篇的解释基础上，由于假定这一篇概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思考，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崩溃论”，预言资本主义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逻辑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使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偏离了历史目的论。泽勒尼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性 (gnoseological) 解释，认为马克思的意图是“占有现实，是在理论上逼近现实”<sup>①</sup>，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建构基于研究的现实的‘理想表述’”<sup>②</sup>，而这种基于研究的现实往往是一种社会总体性。

在概念上把握现实，意味着使局部符合整体，继而确定这些局部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概念层面，马克思的终极目的是一种总体性理论，但他认为，为了实现这种整体论，首要的是处理每个局部的问题，揭示局部如何为整体所调节。

用《逻辑学》的具体章节作为理解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工具，留给马克思科学的哲学两个问题：历时性内容和共时性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于马克思确实从《逻辑学》中汲取了特定的方法，为什么他没有充分地解释他的方法？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公开承认他对黑格尔的借用并充分地描述他拒绝了黑格尔的哪些部分以及他采纳了黑格尔的哪些部分？

在一篇有趣的文章《马克思为什么遮蔽自己的辩证方法》中，艾香德试图破译马克思为什么没能成功地充分描述他自己与黑格尔

---

① Zeleny, *The Logic of Marx*, p. 39.

② Ibid., p. 107.

关系的原因。<sup>①</sup> 为什么他没有描述自己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呢？

在进入艾香德的解释之前，可以指出的是，部分社论的压力使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减少了黑格尔的在场性。在1867年最初的德文版出版之后，马克思接受了他的出版者对这本书过于抽象的批评。这位出版者认为，政治需要要求《资本论》靠近无产阶级，但1867年的版本因其浓重的哲学术语而没能成功地靠近这些受众。鉴于出版压力，法文第二版、德文第三版以及恩格斯编辑的1887年英文版都证明黑格尔的在场性持续地减少。黑格尔在《资本论》中稳步缩减，将黑格尔在其根基处清理掉，部分是政治紧迫性的结果。此外，马克思也作出了在他的著作中减少黑格尔出场的学术决定，因为在《大纲》和1858年的原始文本（Urtext）以及《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之间有差异。1858年这一年是一个分界线，1858年之后，马克思有意识地选择在他的著作中遮蔽黑格尔的在场性。

艾香德试图解释马克思愿意运用一种“被简化的辩证法”（reduced dialectic）<sup>②</sup> 并找到哲学的“公开”和“隐秘”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sup>③</sup> 据黑格尔所见，每个哲学都有一个“公开的”范围：它是其所处时代的表述。“公开的”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哲学的历史环境，它能于其中找到自身并做出反应的学术氛围。此外，黑格尔相信，每个哲学都有一个“隐秘的”本质，或者说每个哲学家的信念都是“隐秘的”。“公开的”和“隐秘的”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之间的对比以及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对比。

艾香德断言，马克思在1858年这个时期决定脱离黑格尔“公开的”方面，或曰他选择不使历史哲学与他的方法的逻辑方面相连接。在决定不将他的逻辑与在征服自由中完善的历史目的论观点连接的

<sup>①</sup> Reichelt, Helmut, “Warum hat Marx seine dialektische Methode versteckt?”,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 Forschung*, Berlin, 1996, pp. 73-110.

<sup>②</sup> Zeleny, *The Logic of Marx*, p. 110.

<sup>③</sup> 关于这些术语的深入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充分探讨。

问题上，马克思选择了非黑格尔主义。确实如此，马克思选择了“被简化的辩证法”，即“公开的”方面，或曰其方法论的内部逻辑。马克思决定他的绝对形式优先，并放弃哲学的历史的沉思。艾香德通过指出马克思论文中的那些章节（在那里，马克思斥责对黑格尔的批判，因为他们的攻击是就黑格尔“公开的”错误而言的）来证实他关于马克思放弃黑格尔“公开的”方面的主张（参见本书第三章）。这些拒斥黑格尔的批判假定他屈从于普鲁士王权，而马克思反过来斥责这些批判基于他们过于看重黑格尔“公开的”方面，而在总体上将黑格尔评价为历史“公开的”认识者。马克思希望维护本质，而非任何哲学家（包括他自己的）的历史编纂学。1858年限制辩证法的决定延续在马克思《资本论》后来的众多版本中，导致他的叙述方法存在矛盾，即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矛盾或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sup>①</sup>

黑格尔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应用辩证哲学去解释社会科学。黑格尔的《逻辑学》成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论导论。本章最初的几节阐述了将哲学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而我们已经看到，卢卡奇赞同现象学的方法，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借用了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的方法，但“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接纳”学派是唯一将《逻辑学》作为其哲学绪论的学派。

## （2）从抽象到具体

在这一点上，我将探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他的“叙述方法”。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正在探讨施密特和他的学派，而这两个概念在研究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解释及其原则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探讨与本书末尾论马克思方法的这一节密切相关。我建议读者当读到本书末尾的时候，与下面的段落联系起来，因为这两节是一致的。

<sup>①</sup> Reichelt, “Warum hat Marx seine dialektische Methode versteckt?”, p. 109.



事实上，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事实上，马克思优先重视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他也借用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逻辑形式，但为其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

马克思从未提出对他的“研究方法”的详细阐述，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也“隐藏”了他的分析程序。然而，在一般意义上重建他的研究程序 (protocols)，特别是重估他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被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

这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的预设是对经验主义的拒斥，而马克思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扬弃清楚地表述在他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经验主义的决定性攻击体现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识到，感性认识是所有知识的第一步，外部对象与其概念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拒斥认为对象与概念不可区分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但他也意识到，感性认识，一个“事物”，不能在其自身中得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反经验主义的。为了使一个“事物”具有意义，必须将其置于一个语境中，必须有其他“事物”作为中介，而尽管它与概念是可以区分的，它仅当被置于概念中的时候才能获得意义。斯密、李嘉图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有缺陷的，是由经验主义导向歧途的。<sup>①</sup>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避免了经验主义的陷阱，它是由这样五个步骤组成的：1) 经验主义材料；2) 抽象；3) 总体；4) 有机体主义；5) 具体。

#### 1) 经验主义材料

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开始于搜集经验主义证据的每个方面。在搜集材料的层面上，马克思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主义者，

<sup>①</sup> Arndt, Andreas, *Karl Marx*, Bochum, 1985, p. 238.

因为他假定概念构成是在事后获得事实材料。概念、意义不是先验的。

## 2) 抽象

基于事实材料，抽象的过程开始了。抽象意味着归纳上升到越来越高的层次。这意味着研究者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初级水平上，而要不断地寻求对逐步包括越来越多的单个事件的归纳。

归纳的最高阶段是概念，而意义仅仅存在于概念层次。意义等于概念，而当马克思作出这个主张时，他抛弃了经验主义而抵达黑格尔的哲学世界。尽管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从不同的起点出发而抵达同一个概念的，但他们都同意仅仅是概念为孤立的感性认识提供了意义。

所有抽象上升的终点都是抽象，或曰抽象是一个事物的本质。抽象是事物的理念，是使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个体的特性是事物的概念。

正是在这个层次上，物质性是包含在概念之下的。这正是理念征服物质性的阶段。

## 3) 总体

概念的获得使人们了解事物的总体性，或渗透到赋予其定义的个体特性中。从材料 1) 层次向总体 3) 层次的上升是抽象的上升运动。从总体 3) 到具体 5) 的下降是降低到具体的过程。总体是概念综合过程的高潮，当降落到具体的时候是概念分析过程的高潮。

## 4) 有机体主义

马克思指出，总体引出功能术语，这意味着整体中的局部产生了，以便保护或有益于整体。在马克思的有机体主义标记中，整体决定每个部分履行的职能，而这种行为的意图在于使整体得以存在和发展。

有机体主义解释是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关键，因为这是导向具体的过程，或者说功能是具体的定义。

### 5) 具体

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终结于个别。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假定具体仍然深不可测，除非个别被置于整体的语境中。个别在自身中是不可理解的，而这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错误的根源。

在整体的语境中审视特殊性，意味着特殊性仅仅表现在其功能方面。特殊性的知识仅当具体的功能被确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 (3) 马克思的叙述方法

下面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分析包括如下六个部分：1) 存在；2) 矛盾；3) 范畴的发展；4) 自我决定；5) 《资本论》；6)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理论。

这六部分分析的结果将成为对社会科学辩证叙述的书写公式。这种分析将导出辩证说明的程序以及对社会构成研究的解释。

#### 1) 存在

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研究方法”被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总体，因此他的“叙述方法”开始于总体。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导致了本质决定论，而他的“叙述方法”描述了说明这种本质行为的标准。“研究方法”构成了一个概念，而“叙述方法”构成了对这个概念如何实现其功能的解释。

本质是内在的，或曰是社会总体性固有的趋势。本质是使整体和部分相符合的综合力量。

《资本论》是马克思“叙述方法”最清晰的图式，它开始于对商品的分析。但商品的本质是劳动，或者说产生全部社会领域的基础是人类的劳动力。“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sup>①</sup> 本质通过产生价值，形成了围绕资本主义轨迹各方面的内在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趋势。

当马克思介绍作为本质表述的商品时，他在其“叙述方法”中引出另一个范畴，因为社会需求将要求商品分离。基于社会需求，商品能履行两个矛盾的功能：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成为对立面的基础：它能履行使用价值的功能，实现人或商品的功利的需要；或者它能履行交换价值的功能，或者成为商品交换的工具。当商品上升到对立的层面时，马克思抵达另一个范畴，即矛盾的范畴。

## 2) 矛盾

在马克思看来，矛盾是两极化的同义语。事物是辩证的，或者说经济力量具有消解彼此的特征。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被转化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对立。价值的本质是劳动，但劳动将被分化：劳动的一部分成为必要劳动而另一部分成为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为了维持劳动者和商品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两极化，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是必要劳动的直接结果。剩余劳动是在商品生产和维持工人所需的必要劳动量之外附加的商品价值。剩余价值是一种物价稳定措施，它是利润的来源。

在《资本论》中，矛盾的连续性为剩余价值的分裂所证实。马克思在他对利润成因的解释中运用了矛盾概念。

利润成因的手段分化了。利润能通过降低必要劳动的时间量而增加剩余劳动的时间量来获得，而这能通过延长全部劳动时间量来实现；这被称为绝对价值。反之，利润能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而获得，因此全部劳动时间仍然是同样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因为技术的突破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而这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贪婪、利润的无限获得，将因为将剩余价值分化为绝对程序或相对剩余价值而引起饥饿。

我所使用的三种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

证明矛盾的逻辑范畴是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中心。《资本论》的发展，或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总体，取决于两极化的概念。在上述段落中描述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证明，它将最终导致彻底的矛盾，即以牟取利润为基本动力的社会将在“利润率趋向下降”<sup>①</sup>中绝对性地产生自己的最终否定。

### 3) 范畴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解释意味着描述范畴何以展开。解释存在于概念中，而非存在于经验中，或者说经验活动仅仅是范畴发展的结果。

范畴抽象覆盖了经验数据。“研究方法”为研究者提供各种范畴，而“叙述方法”需要范畴在他们自身中展开并将经验纳入他们自身的功能。

它不仅是每个总体的两极，而且它也是范畴的构成。在这一点上我的结论是，仅仅有必要考虑两个因素，本质和矛盾，但每个总体都是由多数范畴构成的。<sup>②</sup>

### 4) 自我决定

据马克思所见，范畴的发展是固有的和内在的。这意味着范畴的演化是必要的；范畴的运动取决于其本质；本质的展开是必要的。

范畴和总体都是自我决定的。

范畴和总体的自我发展意味着经验由它们所决定。经验的仍然是经验的，但经验运转的功能完全是由范畴和总体所决定的。

### 5) 《资本论》

马克思的巨作实现了他的“叙述方法”：《资本论》是马克思提出的作为所有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叙述方法”的范例。

在《资本论》中，“叙述方法”可以被理解为由矛盾的力量所推动的范畴的一种上升的标尺。正如我们所见，范畴等级的第一个阶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35~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sup>②</sup> 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矛盾性质的详尽研究，参见 Helmut Brentel, *Widerspruch Und Entwicklung Bei Marx Und Hegel*, Frankfurt, 1986。

段是本质—矛盾的层面，或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本质中被分化。第一个阶段不是最终的，而是自我发展到范畴—矛盾的更高阶段，而这个上升的阶段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对立。第二个阶段也立即上升并导向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范畴—矛盾的第三个阶段。没有必要描述范畴矛盾演化的每个阶段，但将《资本论》理解为范畴—矛盾的一个等级是必要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而他相信这是社会结构如何运作的最真实写照。

《资本论》可以被解读成对《逻辑学》的一种批判：它是揭示《逻辑学》范畴何以被借用为社会科学的解释理论的尝试。

#### 6)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他的“叙述方法”产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革命。马克思是第一个将《逻辑学》借用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人。

马克思开启了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补充”（materialist cooption），或者说马克思借鉴了很多黑格尔主义的逻辑形式并为其填充了唯物主义的内容。黑格尔主义的矛盾形式围绕着唯物主义的内容，被借用为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相互否定。

对马克思方法的这种解释此前从未作为一种哲学确证在他的著作中提出来；在这里提出来是为了确证马克思的确做过这样一种尝试。

马克思的尝试是彻底的革新，他是第一个将辩证逻辑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的人，他也开启了科学哲学的新领域。

然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和他的历史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裂缝，因为历史的推移是历时的，而他的社会科学的辩证哲学是共时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仅仅关注总体的内部、它的内部配置，而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他解释社会科学的辩证理论和事件的年代学的历史趋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历时的/历史的层面上，马克思在他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中指出，历史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推进的。但他没有解释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实际上，这里似乎有两个方案：第一种方案关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事件的历时的/年代学的趋势中具有因果的特权，而这正是历史理论；第二种方案关注“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致力于社会总体的共时研究，而这正是关于整体的解释理论。

#### (4)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

在他的《历史与结构》中，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写了如下评论：

相反，在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然至少体现在《大纲》中，我们要思考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二次借用。这部著作对马克思 19 世纪 50 年代和 19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从《精神现象学》中借鉴的劳动范畴对他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自我理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sup>①</sup>

我挑出这一段是因为我想承认，我得益于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1971 年版中，他是第一个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两个时期作出区分的人：19 世纪 40 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基于《精神现象学》，而 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基于《逻辑学》。我自己的著作接受了施密特的提法。

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需要黑格尔的《现象学》，因为他处于通过作为预言来源的人的理论的劳动理论展开研究的开创阶段。卢卡奇，正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代表了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对立面，并假定《现象学》体现了马克思全部生活跨度的

<sup>①</sup> Schmidt, *History and Structure*, p. 61.

特色。

在第二个阶段，马克思转向了《逻辑学》，因为它需要借鉴一种科学理论以写作《资本论》。《逻辑学》提供了很多方法论的形式，马克思需要勾勒他对资本主义解释的图景。

#### (5) 马克思与科学的哲学

马克思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同成为一种政治革命一样，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将解释理论革命化了。

马克思的经济学视角没能通过经验程序得以表述。他对李嘉图的“左翼”批判没能在经验程序中得以持续，因此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转向了《逻辑学》，以获得能够解释其视角的方法论。

我不愿在这里列举马克思借用黑格尔主义逻辑的全部范畴，因为这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以及本套书的其他两卷中展开。在这一点上，我限定自己仅仅评论马克思解释理论的革命，即马克思为了解释他自己，不得不创造一种辩证的语言，以适应一种辩证的理论。

马克思的新语言将自身分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从整体来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为他的理论革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导论。

### 三、让-伊波利特/赫伯特·马尔库塞

#### 让-伊波利特

让-伊波利特的著作是反对阿尔都塞所背叛的那种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极好说明。作为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学派的成员，伊波利特是阿尔都塞发现存在悖谬的那种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

伊波利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国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黑格尔复兴的影响，就是这个复兴对卢卡奇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除了 20 世纪 30 年代黑格尔复兴之外，爱德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在法国也引人注目，正如在 1927 年出版《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一样。



法国黑格尔主义的现代历史中的一个传奇事件是，科耶夫 1933～1939 年在索邦大学讲授论及黑格尔的课程。<sup>①</sup> 这些课程极大地推动了法国黑格尔主义的上升，尽管伊波利特没有参加，但其他法国哲学未来的杰出人物都参加了，比如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完全来自于《精神现象学》，科耶夫的讲座强调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话语。科耶夫以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接近黑格尔，认为“绝对”并不是与精神连在一起的，而是与人类劳动连在一起的。

科耶夫的著作也是有趣的，因为它证明对黑格尔的学术解释内部并不一致。那些在观点上背离了《逻辑学》（1812）、《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的人们优先看重晚年黑格尔，而晚年黑格尔被看作一个对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普鲁士复辟保守主义的辩护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黑格尔对普鲁士复辟的解释在法国大学中得到公认。

相反，那些在观点上背离了《精神现象学》或由霍夫迈斯特和拉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刚刚开始出版的黑格尔更早的著作的人们，阐明了一个更具有人类学意蕴的黑格尔，伊波利特正是这样做的。《精神现象学》（1807）和新发现的耶拿时期（1802～1806）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耶拿现实哲学》第 1～2 卷，属于早年黑格尔这个时期。在早期的这些著作中，黑格尔是以将主观意识视为历史审察的面貌出现的。相对于意识的这个更积极的观点，黑格尔也在《耶拿现实哲学》第 1～2 卷中显示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兴趣，更为关注人类劳动的力量及其创造性潜力。如同科耶夫那样，伊波利特属于那些优先看重黑格尔早期著述的人们。伊波利特在 1936 年将《现象学》翻译为法文，这是该著作的第一个法文版。

此外，正如我在本章最初几节中所论述的，伊波利特在《现象学》和《逻辑学》之间作出了一个区分。他写道：“黑格尔主义的关

---

<sup>①</sup> Kojève, Alexander,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 James H. Nichols, Ithaca, 1980.

键困难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之间的关系，或者，正如我今天要说的，是人类学和本体论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如果谁将《现象学》作为黑格尔的核心文本，他就会羡慕人的意识的肯定力量，而如果谁将《逻辑学》作为黑格尔思想的外衣，他就会受到黑格尔的本体论体系、理念作用与现实的有机整体的深刻影响。

由伊波利特展开的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他将早期黑格尔和早期马克思联系起来。伊波利特站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关键时刻，他的一个观点是，并举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其依赖的《现象学》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篇文章中。通过比较这两部著作，伊波利特能够确定黑格尔哪些思想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以及黑格尔的哪些思想死去了。伊波利特以他自己的方式追溯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步骤，除了鉴于卢卡奇想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永存之外，伊波利特以一种现象学的存在主义来呈现马克思。

伊波利特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中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的受益者，这部手稿使马克思第一次以人类学的光芒在场。以往没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出现揭示了马克思思想此前看不到的方面。伊波利特也是以往不为人知的黑格尔早期手稿出版的受益者，这也照亮了黑格尔思想被遮蔽的维度。伊波利特及时站在这一点上，如同卢卡奇，当第一次并举以往没有出版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著作是可能的时，他倾向于一种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做法。

伊波利特的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是他的著作《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成因和结构》，在这里，他概述了“以意识为中介上升到精神的灵魂的巡回”<sup>②</sup>。黑格尔的《现象学》是对通过自我意识

---

<sup>①</sup> Hyppolite, Jean,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Evanston, 1947, p. 35.

<sup>②</sup> Ibid., p. 11.

进化为精神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象所确认的自我意识的漫长探索过程。

自我意识的旅程假定自我意识本身的历史性质。自我意识要发展为精神，它必须有能力转化自身。精神是对自我意识自我决定的认识。但自我意识想要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自我决定，它必须生产对象，在他生产对象之后，必须反映这些对象。黑格尔提到作为对象化的对象的生产，自我意识使其自身永存。当对象化产生之后，自我意识反映并了解他自己的力量。当自我意识抵达自觉的程度时，它就是精神。

精神的自我教化是在文化领域中实现的。自我意识的自我观察是通过对文化对象化的研究而形成的。《精神现象学》是自我意识的文本来源。

然而，对象化的过程也是异化的过程。当自我意识产生了一个对象，对象就不再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它处于自我意识之外。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一个暂时的分离，但当主体进入其包含客体的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这种分离瞬间就被克服了。由于外化和扬弃持续地循环，异化就成为自我意识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条件。对象化的历史阶段意味着自我意识决不能避免其自我异化。

《精神现象学》包括“苦恼的意识”这一章，黑格尔在这一章中评论了古希腊罗马的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据黑格尔所见，古代的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哲学夸大了个人的自给自足，而这种自我实现的努力使个体与群体分离；这种分离的一个结果是“苦恼的意识”，一种孤立的不祥的感觉。伊波利特认为“苦恼的意识”这一章是黑格尔这部杰作的核心，因为它是对自我意识的状态——作为从其产生的文化客体中反映它自己的异化状态的极好的描述。

由这种对《现象学》的理解武装起来，伊波利特进而将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的著述（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相比较。伊波利特的著作《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是这种比较

发生的场所。<sup>①</sup>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中，伊波利特致力于将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正如下面引用的这段文字所清晰表明：

黑格尔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而如果没有关于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的知识，理解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是不可能的。完全可以肯定，马克思认真阅读了这些著作并从中发展了他的思想。马克思有时受到唯心主义的鼓舞，而在另一些时候则拒绝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集大成之作《资本论》的基始意义，并不逊色于理论经济学和恩格斯的经验研究。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关于《现象学》的全部知识显然来自于论禁欲主义和“苦恼的意识”这一章的说明。任何对《资本论》的解读都足以证明黑格尔《逻辑学》的某种影响。人们认识到……正如列宁所观察到的……人们必须掌握《逻辑学》以跟随马克思的阐述和论证。<sup>②</sup>

伊波利特不仅强调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连续性，而且意识到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而这正是他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的主题。但伊波利特也意识到黑格尔预先为马克思做了思想准备。

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早期著述，特别是《伦理学体系》和《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对伊波利特非常有用。在1802~1806年的这些笔记中，黑格尔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评论了新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评论了自由经济体制、私有财产、人们劳动的需要以及劳动分工。亚当·斯密的新文明对他极为重要，他还看到个人的资产阶级崇拜以及竞争对共同体的主体间的破坏性。黑格尔严厉批评了资产阶级秩序的矛盾，而伊波利特认为，黑格尔预先为马克思做了思想准备；如果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力量的成熟性还不

<sup>①</sup> Hyppolite, *Studies on Hegel and Marx*, trans. John O'Neill, New York, 1969.

<sup>②</sup> Ibid., pp. 128-129.

匮乏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黑格尔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

马克思在社会理论领域的最大成就是，完善了黑格尔仅仅暗示的东西，即将黑格尔主义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采取黑格尔思想的某些核心方面，并将其用作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武器。因为马克思以德国唯心主义标准来衡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独特性就产生了。

黑格尔主义对资产阶级秩序的攻击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据伊波利特所见，这种攻击还拓展到国家问题。黑格尔认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对立；市民社会是孤立个体的王国，而国家是共同体的领域，类似于古代希腊的城邦。对黑格尔来说，政治问题是如何扬弃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破坏性，使之成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尽管黑格尔捍卫私有财产的权利，但他深信只有在团结的共同体中，自私和对抗才能被合作和互利所取代。由于黑格尔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耶拿战争以及神圣同盟这样的历史时期，黑格尔选择了君主专制制度。

伊波利特断言，黑格尔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有机政治秩序之间两极化的看法，是预先为马克思做的另一个思想准备。马克思写于1842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谴责了黑格尔的君主主义，而在这方面，马克思和黑格尔是不同的。但马克思和黑格尔一致地超越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性质（撇开私有财产问题），正如他们都将其看作霍布斯主义的战争，并且都以一种方式思考对个人主义弊病的克服。马克思和黑格尔对恶性病症作出了类似的诊断，但采取了不同的补救措施。<sup>②</sup>

在解读《资本论》的时候，伊波利特意识到《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在场，而它们对这部著作添加了不同的特质。《逻辑学》传递给《资本论》的是结构主义的维度。《精

<sup>①</sup> Hyppolite, *Studies on Hegel and Marx*, p. 73.

<sup>②</sup> Ibid., p. 109.

神现象学》在另一方面对《资本论》产生了主要影响，异化和外化概念被转化到马克思巨著的层面上。伊波利特解读《资本论》的中心不在于经济学的有效性或社会构成分析的有效性，而在于存在主义的主旨。正如《现象学》的核心主题是异化，《资本论》的主旋律是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外化一样。

尽管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但当思考外化的后果时，他们都移入不同的向度。他们都同意诊断，却有不同的预测。黑格尔认为，异化是人类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他对人类存在具有一种悲观的愿景，认为人类存在注定是“苦恼的意识”。马克思认为，异化能被超越，他相信自己找到了这种超越的手段。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确定为解放的原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是悲剧而是革命。

#### 赫伯特·马尔库塞

伊波利特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不同于马尔库塞。尽管伊波利特和马尔库塞都认为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思想中在场，但这个法国人关注异化和外化问题，而那个德国人分析马克思和黑格尔批判理论的性质。这个法国人直接关注《现象学》，关注黑格尔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而且断定黑格尔对人类存在持有悲观的愿景：人们注定是一种“苦恼的意识”，而对异化的解放是不可能的。那个德国人则更多地直接关注（尽管他确实有论《现象学》的一章）黑格尔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述。马尔库塞致力于解剖《法哲学原理》和《耶拿现实哲学》，特别是1802~1803年的《伦理学体系》以及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学》。据马尔库塞所见，尽管黑格尔体系的主题是合理性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试图证明君主制国家是正当的，而毋宁说黑格尔想要使合理性思想成为批判现存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尔库塞重视黑格尔思想的进步方面和解放方面。历史是对自由的说明，正因如此，人类并非注定是“苦恼的意识”，而是通过其实践逐渐成为解放的主体。

施密特将《理性与革命》<sup>①</sup>从英文翻译为德文，但他趋向黑格尔与马尔库塞有着巨大的差异。施密特主要关注马克思的认识论，并为此探索马克思何以从《逻辑学》中借用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并将其转化为《资本论》的解释性方法论。马尔库塞主要关注的不是认识论，而是批判的方法论，关注这种思想如何作为现实被衡量的标准，又如何作为现实被改变的一种手段。

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在他们趋向于对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政治最终将这种相似性撕成碎片。卢卡奇逃往苏联以逃避希特勒主义的威胁，而马尔库塞来到了美国。卢卡奇总是将自己看作是共产党员，而马尔库塞从来都是学术地将其生活界定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德国唯心主义应用。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创立者之一，而卢卡奇在匈牙利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创建中表现活跃。

马尔库塞了解卢卡奇 1923 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被列在了 1941 年《理性与革命》的参考文献中。马尔库塞同意卢卡奇重新联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早期尝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理性与革命》最密切相关的卢卡奇著作是《青年黑格尔》，但《青年黑格尔》在马尔库塞 1941 出版《理性与革命》美国版的时候还没有出版。卢卡奇在 1938 年完成了《青年黑格尔》，但该书遭到苏联的压制，到 1948 年它才在瑞士出版第一版，而 1954 年在东德出版最后一版。

《青年黑格尔》和《理性与革命》彼此密切对应，因为这两本书进一步讨论了黑格尔的《耶拿现实哲学》第 1~2 卷。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都研究了黑格尔 1802~1803 年在耶拿时期的社会经济学思想，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揭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有同样的洞察力以及对私有财产——产生了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分析批判，以及揭示黑格尔从来都不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致力

<sup>①</sup>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41.

于政治革命的代言者。他们都试图消解对黑格尔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解释。

政治将《青年黑格尔》和《理性与革命》区分开来，因为卢卡奇将黑格尔塑造为德国人道主义传统的成员，并最终进入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卢卡奇追随恩格斯，主张德国人道主义传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使黑格尔成为一个对庶民革命有贡献的代言者。

即使卢卡奇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也在斯大林主义的体系内，因而也在为斯大林主义体制提供信誉。即使卢卡奇是斯大林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居民，在1968年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之后，他将政治局的世界确定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马尔库塞还是一个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他在1958年出版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并将苏联的意识形态谴责为一种马克思的实证形式。后面的段落将展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理性与革命》的一个直接产物，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当卢卡奇逃往莫斯科以逃避德国进攻的时候，马尔库塞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不一致。

《理性与革命》对马克思·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有贡献，而它对马尔库塞实现自己探索的目的也有所帮助。马尔库塞的意图是将黑格尔描绘为20世纪批判理论的先驱。马尔库塞通过分离理念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确信自己关于黑格尔作为批判理论创建者之一的主张是正确的。对黑格尔来说，理念是概念的自我决定，它是自我认识进化的最后阶段。

《理性与革命》是马尔库塞对批判理论发展的贡献。他的形式与阿多诺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不同，但基于如下信念：存在必须受到理性的审查。理性不是存在；它站在存在之外，并以其不完备的无情揭露来攻击事物。<sup>①</sup>

据马尔库塞所见，这个事业首先是在黑格尔的《耶拿现实哲学》

<sup>①</sup>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 164-165.



第1~2卷和《法哲学原理》中进行的。马尔库塞将黑格尔表述为：他不是个民主主义者，他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的惊骇中退却了，然而他是个改革者。<sup>①</sup>黑格尔相信，事物能符合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持有一种历史的发展观念。作为启蒙精神的延续，黑格尔相信，历史是通往自由的持续的进程。<sup>②</sup>

与《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同时，马尔库塞还侧重于《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以及这些文本处理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部分。黑格尔熟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黑格尔看来，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市民社会变成了贪婪和奢侈的竞赛。黑格尔认识到，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统治加重了不平等、阶级分层、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劳动剥削以及贫困增加。他也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市民社会完全沉浸在商业中，以交换关系界定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及私人利益和自我专注凌驾于共同体和主体际性之上。

马克思不知道《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它们作为黑格尔文本的一部分在20世纪才得到利用，因此以马克思对这些文本的解释来反对其他评论者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尔库塞不仅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他还使黑格尔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黑格尔以马克思主义术语解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将其看作利润的斗争，认为它是社会贫困的主要成因。

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1802~1803)是将德国唯心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范例。黑格尔是第一个以唯心主义哲学视角解释经济生活的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将此看作是使现实符合理想的良机。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主人—奴隶关系，通过将共同体概念用于揭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造成异化的批判工具，黑格尔为理性创造了契机，并通过实践来加强，以构建符合理想的

<sup>①</sup>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 161-162.

<sup>②</sup> Ibid., pp. 202, 213.

现实。

马克思不了解《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1802~1803年），而他确实知道《法哲学原理》，在1842年，他撰写了对这个文本的长篇评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他1842年的评论中，马克思主要关注黑格尔对国家的阐述。然而，马克思在他的评论中留下了一个惊人的空场，因为他避免提及这个文本中黑格尔处理市民社会问题的那些段落。黑格尔将这本书写成对个人权利和共同体或社会伦理基础之间相关性的论述，而马克思将《法哲学原理》读作一种国家哲学。

然而，马尔库塞对《法哲学原理》中关注市民社会的那些段落做了大量评论。在《理性与革命》中，他引用了黑格尔描述工人贫困化的第243段和第244段全文。<sup>①</sup> 马尔库塞将焦点聚集在黑格尔对工人贫困的认识以及他们被强迫进行的机械劳动上，这种机械劳动使他们扭曲并成为“一个阶级”，使有价值的个体变成了“民众”<sup>②</sup>。马尔库塞展示了一个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作出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黑格尔，而马克思关注的是黑格尔对君主立宪制的捍卫。

无视马克思和他对黑格尔大量作品解读的部分不同，马尔库塞觉得，中心点是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的哲学方法。以同样的方式，黑格尔将辩证理论用作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批判，因此马克思将哲学用于对经济状况甚至对黑格尔自身的批判。马克思使用了从衡量现实的主体意识中产生的概念——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大部分早期著述都写成了批判，特别是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著述也表现为批判，尤其是他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1867年的《资本论》。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倡导者。

当马克思用哲学分析市民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时候，他开启了一

---

<sup>①</sup>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184.

<sup>②</sup> Ibid. .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黑格尔是社会构成的哲学理论的起点，而马克思是这个方法的执行者。<sup>①</sup> 运用哲学来理解社会，不仅旨在成为一种分析工具，而且旨在成为人类能够控制社会运动的手段。黑格尔相信人的自我决定，当马克思认为这是把握人类创造符合人们真实本性的社会的时候，他也证明了他对黑格尔人类自我决定概念的信奉。

马克思也延续了黑格尔运用有机体解释的策略。例如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言中，黑格尔阐述了他将通过随着时间推移的意识来研究思想产生的形式。他对“苦恼的意识”的分析是对界定为斯多葛主义思想形式的研究。

他对启蒙的分析详阅了以 18 世纪的欧洲为特征的思想形式。黑格尔全部著作的核心是有机体主义的解释方法，即将一个具体的事件置于一种有机体系中的解释逻辑。同样，马克思通过总体来解释，他也以有机体主义的概念来思考。即使马克思使这个领域中的黑格尔遗产永存，但要记住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对有机整体的实质有不同的理解。对黑格尔来说，总体是本体论的，它是对理念的表述；而对马克思来说，总体是由阶级结构组成的。尽管有这些不同的内容，但他们都同意形式优先、总体是赋予特殊性意义的形式。<sup>②</sup>

据马尔库塞所见，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没有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术语来规定辩证法。这种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解释，最初是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阐明的，但被马尔库塞归类为实证主义。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基于一个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定的主体不再孤立地存在，而总是居中地或见之于与其他主体的关联中。主体 A 和主体 B 的关系有助于规定主体 A 和主体 B，而主体 A 或主体 B 的这种状况又否定了彼此。这并不意味着主体 A 或 B 彼此消解，而是说一个主体有助于决定其他主体。黑格尔和马克思

<sup>①</sup>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 223-228.

<sup>②</sup> Ibid., pp. 274-275.

的这种辩证法形式基于相互冲突或相互间抵消的过程。这种辩证法与恩格斯正题—反题—合题的版本具有不同的规律。恩格斯将辩证法转换为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它经由自然和历史的发展而成为自然法则。黑格尔—马克思的形式不能描述自然和历史的运动；它不是一种对关乎自然和历史的内在阐述。当然，黑格尔—马克思的形式试图告诉我们关于结构和总体的东西。当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描述解释逻辑的时候，恩格斯正在描述实证主义，或者说他提供了对存在或社会现实为什么表现为是其所是的解释。<sup>①</sup>

马尔库塞对实证辩证法的攻击使他攻击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实证辩证法基本上是关于自然宇宙的进化论，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这种实证的形式用于证实他们关于进化和共产主义最终在全世界胜利的断言。实证辩证法成为历史必然性理论，或证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在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中，马尔库塞嘲笑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和蜕变。实证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坟墓。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相信发展，但不相信使这种发展成为必要的自然法则。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发展是通过意识的设计，通过意识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实现的。在他们相信通过意识选择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和黑格尔是启蒙时代的孩子。他们对发展理念的共同信念也使他们统一起来，或者说他们发出了关于人类有意识地改善人的条件的能力的同一种声音，而这种关于全世界人类宪法的寓意是全部西方经验的核心。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因而是将自身向理性的发展敞开。

#### 四、乔恩·埃尔斯特/约翰·罗默

在1991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新时期，三个解释学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论中占主导地位。这三个学派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功

<sup>①</sup>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250.

能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施密特、伊波利特以及马尔库塞的时代过去了，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研究来到人们面前。

分析马克思主义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原理，正如乔恩·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表述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拒斥黑格尔主义的集体主义和有机体主义。

葛兰德·科亨和菲利普·范·帕里斯创立了功能解释学派。功能解释是这样一种阐述，即如果假定结果嵌入先行事件的体系具有有益的影响，那么先行事件可以被看作结果的成因。尤其是科亨的著作，试图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依赖基础的主题。科亨提出，通过证明生产资料主要适应生产方式的形成来使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理论生效是可能的，因为生产方式的有益影响作用于生产工具，而生产方式有助于维持生产资料。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克里斯托弗·阿瑟和托尼·史密斯的著作为代表。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论》是《逻辑学》在经济学中的反映。阿瑟和史密斯都将《资本论》的方法解释为“范畴体系的发展”。这两个科学的哲学家同意马克思的解释，即关于社会制度的著述基于黑格尔逻辑范畴的内在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产生于卢卡奇这部著作的语境中，作为反对 1991 年后将要出现的这些形式的背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再次将黑格尔引入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瓦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因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新起点。

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都采取了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不同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彻底拒斥了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而功能解释拒斥了黑格尔的有机体主义。但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考的右翼。这个学派认为，逻辑范畴体系的发展为理解马克思对社会经济构成的解释提供了最好的工具。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重新黑格尔化，必须与 20 世纪早期卢卡奇

等人的尝试区别开来。有必要谈及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第二个时期是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学派；而第二个时期是科亨一范·帕里斯的功能解释学派——我属于这个学派。

乔恩·埃尔斯特<sup>①</sup>和约翰·罗默<sup>②</sup>的著作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典范，代表了对当代马克思以及马克思—黑格尔问题的大陆研究的彻底背离。这个学派试图重建以英美分析哲学和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科亨、史密斯、阿瑟以及范·帕里斯都不是这个英美分析哲学学派的成员。

埃尔斯特和罗默的著作试图维护没有黑格尔的马克思。特别是他们希望坚持剥削理论这一来自马克思的概念，而丝毫不必诉诸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或黑格尔。埃尔斯特和罗默都坚信黑格尔派对马克思的影响，但此外也断定黑格尔是马克思方法很多错误的来源。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孕育了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更大的运动。就像阿尔都塞一样，埃尔斯特和罗默都试图使马克思脱离黑格尔，但他们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所依据的方法论基础并不一致。阿尔都塞认为，这种新基础是结构主义，而埃尔斯特和罗默认为它应该是英美分析哲学和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

埃尔斯特和罗默反对那些希望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他们赞同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及其追随者。施密特及其追随者已经使马克思脱离了他所借用的独特的黑格尔主义逻辑范畴，即《资本论》以《逻辑学》的框架为支撑。但在赞同施密特勾勒的马克思方法的学术来源的同时，埃尔斯特和罗默谴责《资本论》以《逻辑学》的框架为支撑这一点，因为黑格尔主义的来源仅仅适用于败坏马克思主义。

---

① Elster, Jon,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1985.

② Roemer, John,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1986.

在这一点上，引自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中的一段长文是适当的，因为它将有助于支撑后面的讨论。

在很多场合，马克思都把“辩证方法”当作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主要方法。马克思实践过任何这样的方法吗？如果实践过，它对理解而言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当马克思明确地指向辩证法时，通常用的是一般的，甚至是枯燥的术语，这很难看出他对具体的分析有何意蕴。尽管他一再倾向于表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他从未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这样做。因而，任何对这种方法的重构都必然是勉强的。我将讨论在马克思中黑格尔主义推理的三条线索，每条线索都有一种被诉诸的主张，如果不是这种辩证方法，至少也是一种辩证方法。第一条线索使用在《大纲》的核心部分，以及《资本论》前几章，它们都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鼓舞。

“概念的自我决定”看起来似乎不过是一种松散的事后模式，它是由黑格尔根据其发现的重要的不同现象强加的。在撰写《大纲》的时候，马克思重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这不仅对撰写那部手稿，而且对撰写《资本论》也有明显的影响。特别是，他相信来自彼此的政治学范畴可能以一种使人联想起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用过的方式还原是可能的。然而，与黑格尔的范畴不同，政治学范畴在年代学上也是彼此相继的。因此，马克思必须面对观念上的次序和历史的次序如何关联的问题，然而他没有能够提供一种一以贯之的答案。<sup>①</sup>

为了全面理解埃尔斯特对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思想中在场的攻击，有必要将他的攻击分为四个部分：1) 方法论集体主义，2) 辩证法推演，3) 目的论，4) 功能解释。

---

<sup>①</sup>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pp. 37-38.

### 1) 方法论集体主义

埃尔斯特指责马克思试图通过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事件，并断言这种荒谬的阐述方式来自于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在场。经由方法论集体主义，埃尔斯特有试图通过客观的集体来解释社会事件的意思，例如阶级的社会范畴。当马克思试图解释无产阶级的活动时，他确实是以集体的术语，而不是以个人的术语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一个行动着的工人个体，而是历史的社会整体，例如无产阶级。

埃尔斯特将马克思归于方法论集体主义者的范畴是正确的。马克思不仅用集体主义的术语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行为，而且也用它描述了资产阶级的活动。《资本论》的读者很快发现，个人的资本主义动机从未被讨论过，讨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集体行为。

在他的著作《理解马克思》中，埃尔斯特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视角批评马克思。在独立的章节中，他展示了马克思的价值、意识形态、阶级、生产方式、无产阶级革命和历史必然性理论何以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它们都基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原理。

埃尔斯特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学派，提议以方法论个人主义替代方法论集体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采用理性选择的模式。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基础是有能力作出理性选择并努力优化其结果的有目的的个人。

埃尔斯特的著作《酸葡萄》彻底颠覆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马克思的阶级以及阶级动机理论。埃尔斯特以方法论功利主义替代之，而不是将社会动机描述为从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sup>①</sup>

埃尔斯特写道：

社会选择理论是阐述基于特定的个人偏好如何抵达社会上最优结果这个问题的有用工具……这种代理人理应也被赋予特定的偏好，

---

<sup>①</sup> Elster, *Sour Grapes*, Cambridge, 1983.



并被假定为独立于这套选择办法。<sup>①</sup>

社会选择理论假定一个自由选择有益于该人偏好的理性个人。作出选择是因为它实现了主体代理人的需要。在没有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哲学优势和过失争论的情况下，很明显，代理机构被置于个人中。通过将行动的原因置于主体性中，埃尔斯特推翻了全部集体行动理论，或集体因果性理论。

埃尔斯特意识到，他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由功利主义社会思潮或新自由主义唤起的。他写道：

在这一章中，我的目的是彻底揭示一个正在功利主义理论基础中产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个人想将满意作为正义的标准，以及为什么个人想让他们自己通过先获得选择过程而形成社会选择？<sup>②</sup>

埃尔斯特的论点是，社会最终是一种能带给人们满足的个人选择的集合体。集体只不过是使选择代理人满意的个人选择的总和。埃尔斯特社会选择理论的结论是，个人想要获得满足，即其功利主义倾向会被最大化，这就证明了马克思的阶级团结、无产阶级统一或任何社会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的无效。

随着以其思想解释剥削和异化，分析马克思主义几乎抛弃了马克思全部的系统架构，因为他们觉得，剥削和异化这两个概念仍然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清除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在场性，分析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将剥削和异化思想置于理性选择社会理论基础之上来复兴它们；以博弈理论来拯救激进主义。

## 2) 辩证法推演

通过辩证法推演这个术语，埃尔斯特指出，黑格尔主义方法论

<sup>①</sup> Elster, *Sour Grapes*, Cambridge, 1983, p. 30.

<sup>②</sup> Ibid., p. 109.

详细说明了其自身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这个过程是自我包含，意味着来自概念的运动，例如从普遍性到特殊性，是一种仅仅由概念自身的内在运动决定的过程。

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解释社会总体的方法使用了辩证法推演，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这个术语，而黑格尔主义的这个痼疾是马克思歪曲社会进化图景的主要原因。

例如，在《资本论》中，矛盾论是辩证矛盾的极好例子。《资本论》表明三个矛盾的范畴：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和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二重性。这些范畴合乎逻辑地展开，其辩证法推演，被马克思用于说明《资本论》的全部生产过程。例如，绝对剩余价值的内在逻辑进化导致了关于工作日长短的斗争。增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这能通过增加工作日来完成。试图延长工作日以作为增加剩余劳动方式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减少工作日以延长工人生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范例。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罢工和资本主义关闭工厂的全部历史可以用来说明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范畴所依据的辩证法推演。

辩证法推演的另一个特征是持续的发展。辩证法推演是内在的自我进化。

### 3) 目的论

根据埃尔斯特的解释，马克思拘泥于历史目的论。同样在这个方面，埃尔斯特发现黑格尔的影响，因为埃尔斯特觉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终将崩溃的确信包含着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同样的目的论倾向。埃尔斯特指出，正如黑格尔假定自由的历史进程的必要性一样，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瓦解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必然性。

辩证法推演和历史目的论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由于本质依据目的论发展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也就需要将一种具体的、内在的方向移入历史的路径。

#### 4) 功能解释

对功能解释的辩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涉及机构或一些其他客观的集体如何被理解的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中的解释起初依据微观基础，它是原子论的，仅仅专注于个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它属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特征的一种功能解释是，依据关于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不断运作的功能的有利结果来说明这种特征的存在和持续性的一种解释。如果一种解释试图基于倾向于维持系统的结果而将原因作为结果的依据，那么它就能被断定是功能的。一个结果，一个有利的结果是一个体系的支撑，是作为结果具有一个原因的基础。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功能解释的一个例子。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因为它对资产阶级履行了一种重要职能：确保其政治统治。马克思的全部论证都关注基于功能分析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层建筑支撑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权力。<sup>①</sup>

埃尔斯特认为，功能解释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功能解释的结构假定，因为结果对先决条件有益，先决条件必然已经确定了结果。功能解释主张及时地退守并断言，如果一种影响已经产生了，那么它就是先决原因需要它产生的证据。埃尔斯特指出，主张影响能够解释原因在认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后面的事件是决定前面的事件立足的基础。

埃尔斯特和罗默所作的以上抨击是他们自己和科亨与史密斯阵营的重要分界线。主要的差别使科亨与史密斯以及范·帕里斯与阿瑟区分开来。史密斯和阿瑟是黑格尔有机体主义一种形式的辩护者，而科亨和范·帕里斯则捍卫功能解释。然而，埃尔斯特和罗默的抨击将更明确地确定功能解释和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

罗默/埃尔斯特阵营和科亨（撇开主张从不同观点的角度来看的托尼·史密斯）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除了

<sup>①</sup>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pp. 27-28.

复活功能主义之外，科亨也想要复兴历史唯物主义。罗默/埃尔斯特没有使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冲突的词语，而宁愿使用他们关于博弈理论的话语。

将决定的力量归结于一种趋势的另一个尝试是，描述社会客体需要功能解释。说明一个机构或任何社会组织是综合的，或依靠功能主义的逻辑，将决定力量施加于其特定的结果上。由罗默和埃尔斯特提出的抨击功能理论的主张逾越了马克思主义，而它对全部社会科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它提出了关于用社会集体术语进行解释的有效性问题。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埃尔斯特颠覆了马克思解释方法的有效性。

埃尔斯特不仅驳斥了马克思的社会客观主义，而且也驳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个方面，埃尔斯特追随新自由主义，主张价值产生于社会劳动以外的来源。

马克思价值论的失效也使埃尔斯特拒绝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结构。在《理解马克思》中，埃尔斯特确实这样做了：他抛弃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以及任何关于崩溃的理论主张。《理解马克思》拒绝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架构。

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的反驳是有说服力的和决定性的，但这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埃尔斯特试图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外壳，不是从20世纪思想中消除马克思主义，而是复活它的一些仍然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在19世纪，贝内德托·克罗齐撰写了一部名为《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的著作，而埃尔斯特也以这种精神写作。通过除去“死的”东西，埃尔斯特希望揭示出什么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是“活的”。

约翰·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一部论文集，在其中两篇文章——《马克思剥削和阶级理论的新方向》<sup>①</sup>和《理性选择马克

---

<sup>①</sup> Roemer, “New Directions in the Marxian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in *Analytical Marxism*, pp. 81-113.

思主义：关于方法和实质的一些问题》<sup>①</sup>中，罗默描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前景。《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一本与《理解马克思》不同的重要著作。罗默的这两篇文章旨在解释对马克思两个核心关注点——剥削和异化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相关性，而埃尔斯特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的批判。埃尔斯特的观点是总体的：他攻击马克思的全部；罗默的观点是针对性的：他将问题集中在博弈理论何以提出关于剥削和异化概念的新定义上。

在这一点上，引用罗默的一段长文是适当的，因为它是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纲要。在这段引文中，罗默描述了关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应当指向的具体问题。

在试图为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特征的活动提供微观基础时，我认为，出色的标准工具是理性选择模式：普遍均衡理论、博弈理论以及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建模技术库。这个方法是对上个世纪思想史的一大贡献。对这一立场的指控可以针对工具被发展为对上升的资本主义秩序的辩解，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因此他们对工具的使用以苍白的资产阶级来败坏这个结果。这种主张是我所批评的功能主义类型之一。

因此我相信，将新古典主义工具用于研究可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规划已经产生了。当然，在使用这些模式的时候，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我将要指出，例如将代理人的偏好作为资料。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目前主要关注明确的说明，通常（尽管不总是）假设个人的偏好是已知的前提。我认为这种假设不只是方法论上的：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且来自于“我思故我在”这句格言。马克思主义颠倒了笛卡儿的警句，并断言人们的偏好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会决

---

<sup>①</sup> Roemer,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Some Issues of Method and Substance", in *Analytical Marxism*, pp. 191-201.

定的结果。如果打算用理性选择模式来描述福利，并对理性行为的结果作出规范判断，那么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考虑。理性选择模式将被用于发展一种内在偏好形态的理论。唯物主义心理学有必要将偏好从天赋和历史中分离出来。这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一个范例将通过使用标准工具而最终得到解决。<sup>①</sup>

罗默着眼于“理性选择”理论工具的目标是剥削概念。由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罗默拒绝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剥削理论。不是导致剥削的劳动占有，而是生产工具的统治。罗默将剥削的成因从对劳动的支配转换为对生产性财产的支配。<sup>②</sup>

此外，罗默还在取代基于价格的价值概念时发现马克思的价值论无效。对马克思而言，劳动价值存在于价格之前，但对罗默来说，价格出现在劳动价值之前。罗默做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觉得不先了解这些产品的价格而决定哪种生产过程有利是不可能的。正是对决定价值的利润的期望而不是价值论的存在取决于劳动的成本。<sup>③</sup>

罗默对马克思的劳动剥削理论和价格理论的消解仍然没有回答被占有的人何以认识到他是被剥削的问题。他何以能作出决定离开被剥削的境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罗默诉诸博弈理论的分析。

此前，这等于说经济结构的代理人联盟玩这个游戏。联盟可以参加或退出这个经济结构。为了给这个游戏下定义，我详细说明了如果从经济结构中退出，任何具体的联盟都能实现自身。鉴于这些详细的说明，如果一个联盟能通过“退出”而使它的成员做得更好，那么就应当选择。<sup>④</sup>

---

① Roemer,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Some Issues of Method and Substance", in *Analytical Marxism*, pp. 192-193.

② Roemer, "New Directions in the Marxian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in *Analytical Marxism*, p. 93.

③ Ibid., pp. 98-99.

④ Roemer, *Analytical Marxism*, p. 103.

罗默假设一个社会中的团体坚持一种可撤销条款，或选择退出规则。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团体在条件 A 中存在，如果这个团体决定条件 B 为他们改善生活状况，那么他们就能够选择退出条件 A 并进入 B 的位置。选择退出规则允许他们识别剥削的条件并找到一种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将得到提高的位置。

可撤销条款不是一个被剥削的团体，例如无产阶级，能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唯一路径。转换剥削社会劳动或劳动市场、生产性财富的拥有者的基因，在罗默的平等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成比例的捐赠，经由特殊团体的生产性财富捐赠的支配，是不平等的原因。

据罗默所见，克服不平等依赖建立一种使被剥削的阶级得到人均占有一个社会的生产性资产的秩序。<sup>①</sup> 罗默没有采用关于推翻资本主义或生产力国有化的布尔什维克的经典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按照再分配的方案，首先，一种人均占有一个社会的生产性财富的决定必须是由被剥削的阶级作出的；其次，一种生产性财富的利润的再分配必须得到落实，以便被剥削阶级的每个成员都能得到他或她的人均占有。当罗默在生产财富不平等的捐赠中定位剥削的时候，他确立了他的再分配正义理论的标准。然而，罗默没有呼唤推翻生产性资产的私人所有者，而是呼唤财产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罗默保持了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因此他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学派是晦涩难懂的。他将黑格尔与目的论思想和功能思想联系起来，并发现这两种方法一文不值。马克思汲取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的范围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

## 五、葛兰德·科亨/托尼·史密斯

葛兰德·科亨

这里将科亨和史密斯的著作并举，并不是要指出这两个人分享对马克思的一致解释。更确切地说，其目的在于清楚地总结这两个

---

<sup>①</sup> Roemer, *Analytical Marxism*, p. 106.

主要思想者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功能解释和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

1978年<sup>①</sup>，科亨用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阐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实质。马克思在《序言》中说明，历史发展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推动前进的。关于生产资料，马克思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量，而关于生产方式，他的意思是支配这些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结构。对科亨来说，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定义的核心，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进化如何产生的理论。

此外，科亨还赞同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公式。关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指的是生产资料，而关于上层建筑，马克思指的是一个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工具，例如，宗教、哲学、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一种反映，或者说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取决于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这种对马克思的解释被称为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inclus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它是包括一切的，因为经济基础在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中具有因果优先权。

在他1978年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科亨还主张生产资料（经济基础）承担对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的因果优先权。科亨主张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首要原因，而这个命题也是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第六章“生产力的首要性”中，科亨更全面地解释了他的思想：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表明马克思赋予生产力以解释上的首要性，我们还将对他的实际做法提供一些理由。

首要性命题指的是，生产力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然

<sup>①</sup> Cohen, Gerald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1987.



而，生产力的一些变化在范围上太有限了，以至于带不来那种结果。也不可能对生产能力必须增长多少才能使生产关系随之发生变化提供具有普遍性的说明。相反，我们能把生产关系依赖生产力的动态方面表述如下：对任何生产关系而言，都存在它们所容纳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限度，这个限度对于那些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进一步发展趋势的发生，都是足够的。<sup>①</sup>

在他对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中，科亨使用了功能主义。为了捍卫上层建筑来自于基础的命题，有必要采用功能解释；有必要将上层建筑描绘为一个结果并向后推导出原因，因为上层建筑对基础有反作用，基础必须是上层建筑的原因。

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科亨修改了他的立场<sup>②</sup>，他放弃了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拥护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restric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科亨自我改造的这个决定性的观点被归于上层建筑的立场。在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意识形态工具来自于经济基础。它没有独立性，它完全依赖经济基础。在重审他原来的立场时，科亨发现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夸张的，表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的确享有某些独立性和影响力这种看法是失败的。

在尝试假定上层建筑的自我发展具有某些自由时，科亨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解释，他将此称为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科亨仍然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来思考，但他不觉得经济基础是精神领域发展的唯一因果决定因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归纳的体系；它不把全部的精神现象归纳为在经济基础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只要不主张精神统治物质，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承认精神层面的独立性，因为这将减少作为

<sup>①</sup> Cohen, Gerald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pp. 134-135.

<sup>②</sup> Cohen, "Restricted and Inclus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y, Labor and Freedom*, Cambridge, 1988, pp. 155-179.

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物质力量的优先权。<sup>①</sup>

科亨在 1988 年对他 1978 年的著作作重大修改的文章中承认，精神层面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他仍然从这两个层面思考，但决定的力量仅仅流入一个方向；精神影响物质是错误的，而物质对精神的影响是真实的。<sup>②</sup>

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如同包括一切的形式，发现功能解释是不可或缺的。关于这个问题，科亨作出如下两个评论：

第一，我不主张所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都是功能解释，但一种理论要被看作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就得对它必须加以解释的那些非经济现象作功能解释。这个结论是从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最小范围的命题到一个关于它的本质的命题中推演出来的。<sup>③</sup>

第二，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对那些历史唯物主义要加以解释的非经济现象的特征的思考，而解释这些特征的适当方式是诉诸功能解释。<sup>④</sup>

科亨描述了功能主义和功能解释的区别。<sup>⑤</sup> 功能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学派，产生于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和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著作。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派，功能主义作出了如下的断言：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彼此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整体。

科亨驳斥了功能主义学派，但他接受了独特的功能解释，或者说提供一种准确的解释正是功能解释的独特之处。他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定义功能解释。

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论”是错误的，因为它试图解释作为一个

---

① Cohen, “Restricted and Inclus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y, Labor and Freedom*, Cambridge, 1988, p. 159.

② Ibid., p. 160.

③ Ibid., p. 174.

④ Ibid., p. 175.

⑤ Ibid., pp. 283-291.

阶级的大多数资本家的行为。然而科亨指出，功能解释能被用于目的归结于个人这种情况。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接受石油公司大型捐赠活动的政治家反对削减政治活动的私人融资法案，这个政治家的行为能通过功能解释角度来评价。通过采取行动废止融资改革活动，这个政治家证明结果即他的目的，超出了原因即他渴望维持政党的私人融资的旧体制。意识形态的目的，废止政党的融资改革，仅仅是维持石油公司统治旧体制的原因的一个结果。

科亨主张以一种受到限制的功能解释匹配一种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其功能解释限定在意识形态领域。阿尔都塞是包括一切历史唯物主义的范例，他相信，社会经济结构的所有方面都能受到功能主义的启发。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标志来自于人类学的先行者，特别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

关于功能解释的争论是科亨和罗默/埃尔斯特阵营的主要分界线，而我们已经看到，罗默/埃尔斯特阵营如何发现功能主义本身无效并认为必须抛弃黑格尔主义的残余。另外，罗默/埃尔斯特放弃了全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工具，其重点是试图恢复其基于分析哲学的剥削理论。相反，科亨试图挽救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佳解释，并且渴望比较黑格尔的历史编纂学与马克思的历史编纂学。正如本书所指出的，科亨并不认为马克思将大量的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纳入他自己的解释程序，他也未必发现马克思的确认为那种做法在认识论上是有效的。但科亨确实认为，功能解释——黑格尔主义思想的一种核心特征——是有效的，而黑格尔历史理论和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相似性是存在的。

科亨认为，功能解释不仅是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纽带，而且是这两个人关于他们对历史理解之间的一种相似的存在。显然，马克思没有将历史理解为自由精神的发展，而将其理解为存在相似之处的其他事件。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一章“黑格尔的历史图景和

马克思的历史图景”<sup>①</sup>中，科亨比较并对照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发展和进步的，而推动这种发展运动向上的力量是精神。如果精神上升到自由，历史是一种先决条件，因为要想让理念变成自由，就必须了解其自身的潜力，必须观察其过去的创造，以便它能以其自身的能力和本性来教育自己。马克思使革命的历史图景永久化，他和黑格尔都具有历史进步的启蒙观念。

从对比马克思和黑格尔这个方面来看，科亨指出马克思将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历史推动者，而黑格尔将精神看作是历史的推动力量。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才是历史进步主义的因果关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延续了黑格尔主义对发展过程的信念，但将社会经济形态替换为因果关系的决定因素。

在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科亨的主要着眼点是，提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种辩护，但在他的文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科亨表明他意识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他的社会学之间的差别。科亨感谢美国的社会学家埃里克·欧林·赖特使他认识到这种区分。<sup>②</sup>

科亨在1988年开始意识到的历史和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关注的术语“逻辑的一历史的”，金德里希·泽勒尼称作的“结构遗传”以及我所指出的历史性解释和共时性解释之间的冲突具有同样的张力。科亨认识到，至少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一部分，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叙述方法”，与对一个社会的历史解释一致，这种关注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理论。历史在分析历时性、逻辑和总体的结构本性时不起作用，关于历史发展，历史性和总体的结构本性告诉我们的很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

<sup>①</sup> Cohen, “Images of History in Hegel and Marx”, i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pp. 1-27.

<sup>②</sup> Cohen, “Images of History in Hegel and Marx”, i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p. 176. 关于科亨提到的这本书，参见 Eric Olin Wright, *Reconstructing Marxism*, London, 1992.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科亨继续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他的兴趣转变了，因为他不再思考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点，而是关注剥削和平等的思想。在1991年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之后，科亨使自己卷入伦理学领域，他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念，试图纠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和平等的定义。

在他1995年的著作《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中，科亨认识到对消除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乌托邦式期待被致命地戳穿了。他写道：

然而，由于选择使用“工人阶级”这个颇有争议的标签，目前在由四个特征——（1）成为社会依赖的生产者，（2）被剥削，（3）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大多数成员在一起，以及（4）迫切地被需要。当然还存在关键的生产者、被剥削的人们以及贫困的人们，但不是现在，由于存在于过去，甚至连大体上一致的名称也没有，更谈不上绝大多数人的替代名称了。而作为一个结果，没有一个集团具有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令人瞩目的实力（由于其被剥削和贫困）和准备能力（由于其生产效率及其人数）。在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无产阶级成为这样一个集团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未能预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自然过程。<sup>①</sup>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开始的梦想，科亨也放弃了关于剥削的终结和平等的制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念。源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富足看作是平等以及剥削的终结的共同来源。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总量扩大的原因是技术上的效率将产生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而这种丰裕将有助于消除社会的阶级，而随着阶级剥夺的终结，剥削也将终结，平等的王国将会产生。对马克思平等主义原理的阐述被激活了。

---

<sup>①</sup>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Equality*, Cambridge, 1995, p. 8.

科亨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思考改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剥削和平等。在这一点上，他受到罗伯特·诺齐克著作<sup>①</sup>的启发，而诺齐克捍卫自由主义。科亨努力撰写对诺齐克自由主义的一个回应，而这种对诺齐克的驳斥包含在如下语句中：

但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在事实上容忍这样的世界——使自我所有的个人分为劳动力的购买者阶级和出售者阶级，即使达成立场的出发点是外部资源的初始平等。这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批判仅仅反对资本主义肮脏的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拒绝资本主义本身，对他们来说，有必要否定自我所有的原则。<sup>②</sup>

科亨 2000 年的著作《如果你是个平等主义者，你怎么能如此富有》<sup>③</sup>证明了自由主义导致剥削和不平等的原因。诺齐克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是一种错觉，但科亨仍然不得不解答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问题。

罗默是对科亨发展理论的有力刺激。作为功能解释的倡导者，科亨不接受罗默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博弈理论。但科亨从罗默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剥削的解释以及部分地实现平等的策略中受益。

得益于罗默，科亨放弃了剥削产生于劳动被剥夺的原理。科亨选择财产剥削理论，而不接受劳动剥削理论。剥削的起源并非来自于劳动被剥夺，而毋宁说来自于对生产性财产的统治，如同继承巨额的财富和工业财产一样。剥削的产生是因为社会上一个特定的阶级占有特权的地位，使他们在其他人之前获得统治生产性财产的有利起点。

---

① Nozick, Robert, *Anarchy, State, Utopia*, New York, 1974.

②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Equality*, p. 16.

③ 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2000.

在支持通过税收重新分配财富方面，科亨还追随约瑟夫·卡伦斯。<sup>①</sup> 无产阶级推翻国家的梦想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希望源于物质丰富的总体上平等的社会。冷战结束之后，一个胜利者前进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较高的税收成为社会富裕的途径，它使全社会的产品可以更公平地转移到社会上的贫穷者手中。尽管并非消除全部的剥削和不平等，但这种财产转移的形式是正义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

托尼·史密斯

在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托尼·史密斯站在右端。卢卡奇着眼于《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谈到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补充”，一种在黑格尔主义的形式中注入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结合；但史密斯坚决主张《逻辑学》为《资本论》提供了逻辑工具。史密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方法论仅仅是对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运用方法论的转换。

在他的著作《辩证的社会理论及其批判》中，史密斯在如下这段话中描述了他的方法：

实体和物质的可理解性只能通过主张思想过程何以对实体和物质在表象中被赋予优先权来把握，因为实体和物质具有基于表象层面的更深的本质层面。思想的任务首先是使表象穿入深层（在由劳动时间衡量的“价值”层面而不是“价格”层面发现了工资合同中的剥削，在这里劳动仅仅被算作价值的生产，等等），而其次是着手调节表象层面和本质层面的联系。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主张思想的独立性是不充分的；必须主张实际的进程及其产生的表象是首要的。这也说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原则没有差别。<sup>②</sup>

① Carens, Joseph, *Equality, Moral Incentives, and the Market*, Chicago, 1981.

② Smith, Tony,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UNY, 1993, p. 78.

史密斯主要关注社会科学中的逻辑、共时性和解释方面。思想凌驾于物质和历史之上，而对史密斯来说，解释意味着对普遍范畴如何进入特殊范畴、抽象如何成为具体进行证明。

不同的文本在理解史密斯和科亨之间的差别中起到巨大的作用。科亨将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为捕捉马克思信息的重心，而史密斯将《大纲》视为目的实现的途径。立即解读这两个文本可以再现科亨和史密斯为何成为彼此。1859 年《序言》提出了一种历史理论，而《大纲》是马克思方法论的一种早期解释。《大纲》是马克思对他的方法的第一次详细阐述，而 1859 年《序言》表明，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为何推动历史前进。科亨和史密斯之间的论战实则争论哪个文本被认为具有哲学上的优先权。

假设黑格尔和马克思运用同样的逻辑形式，史密斯以如下方式规定了马克思社会解释的辩证法：

一种辩证的理论是一步步地迈向更先进的决定性范畴的系统发展……每个后来的决定都超越了此前的决定。<sup>①</sup>

这句话是对埃尔斯特所提出的“辩证法推演”的极好证明。史密斯断言，社会制度是由理念的范畴构成的，这些范畴是自我展示的，这些范畴在发展的时候超越了此前的规定。在本书第三章中，我将描述范畴的性质。在埃尔斯特看来，当史密斯发展了范畴的这种自我展开的思想时，他犯了“概念的自我决定”的错误。史密斯对范畴进化的说明完全赞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概念——例如范畴——的表述。

另一处引自史密斯的话将表明他所看到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确切的相似之处。

<sup>①</sup> Smith, Tony,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UNY, 1993, p. 55.



另一方面，每个后来的范畴又在某种意义上“扬弃”了那些已经过去的范畴。<sup>①</sup>

史密斯使用“扬弃”这个术语表明他多么接近黑格尔的立场。在黑格尔的全部著作中，“扬弃”这个术语指的是超越和保存。在《逻辑学》中，本质的理念扬弃了“存在”的理念，因为本质超越了存在，但另一方面又保存了——而不是毁坏了——存在。《逻辑学》描绘了一系列连续的扬弃，直至概念抵达抽象理念。史密斯认为，与扬弃的过程同样，持续的更高水平的吸收和保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的步骤。史密斯觉得《逻辑学》和《资本论》的超越模式相同，而黑格尔和马克思运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

在他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中，史密斯描述了他所说的范畴指的是什么：

《资本论》一开始的模式是从广义的所有商品生产然而又是其最简单要素中抽象出来的思想建构。马克思系统地采取更具体和更复杂的步骤，继而重建这种生产模式的内在逻辑。遵循这种系统自身内在发展的程序，从通过“货币”产生的“价值”、“资本的生产”以及“资本的流通”到“资本的分配”，到命名最重要的阶段——从简单到抽象决定再到复杂和具体范畴。<sup>②</sup>

一种范畴，例如，相对剩余价值，是一种抽象，是对具体的经济现象加以归纳的概念。范畴是一般概念，是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每个特殊方面的归纳。它们是内在的范畴，因此，拥有终极目的即它们自我决定的能力。范畴的这种内在发展在一个总体性系统中是决定性因素。

<sup>①</sup> Smith, Tony,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UNY, 1993, p. 55.

<sup>②</sup> Smith, *The Logic of Marx's Capital*, Albany, 1990, p. 22.

描述存在和辩证范畴的作用仍给史密斯留下了解释它们如何诞生的任务。史密斯指出，这些范畴的成因是“分析一回归方法”<sup>①</sup>。这种分析一回归的阶段完全符合我所描述的“研究方法”。

在史密斯看来，分析一回归的阶段是一种抽象的比例递增的过程。研究者一开始就收集经验材料，然后通过连续的抽象达到了普遍化可能的最高水平。抽象的最高水平，将经验材料和特定框架结合起来的普遍化，是概念。在我关于马克思研究方法的表述中，我使用的是概念这个术语，而史密斯在他的书中使用的是范畴这个术语。

概念或范畴的实现仍然留下了开放的问题，即研究者为何使抽象转化为具体，以及科学家为何从相对剩余价值的抽象转而分析将机器引进工厂。史密斯指出辩证分析的第二个阶段，即他称作“分析一回归的”的阶段<sup>②</sup>，而这个术语与我说的“叙述方法”完全接近。

分析一回归的方法描述了抽象何以转化为具体。它表明个人的工厂所有者确实将机器引进他的工厂，因而减少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数量。分析一回归的方面就是辩证法推演的方面，因为具体是由抽象推论出来的。

分析一回归的阶段或者说“叙述方法”，使史密斯界定作为辩证法推论体系的社会总体。对史密斯来说，社会总体是功能上相互依存的范畴自我发展的体系。特殊性是从范畴中推论出来的，特殊性也是范畴的表述。

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相似性还存在于分析一回归层面，在这里相似性存在的基础是，分析一回归完全是思想的产物。在分析一回归或研究方法层面，马克思专注于研究经验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是不同的，因为马克思开始他的考察时是一个经验主义

---

<sup>①</sup> Smith,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p. 73.

<sup>②</sup> *Ibid.*, p. 74.

者。然而，在第二个层面，即分析一回归或陈述方法层面，马克思的范畴体系是基于纯粹思想的推论。在这第二个层面，马克思和黑格尔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来自于纯粹理性重建的基础。

史密斯还意识到历史与综合累进（synthetic-progressive）的断裂，由于分析一回归是纯粹思想的产物，它就脱离了事件的真实过程。在人类历史和马克思范畴体系的理性重建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不同的，因为马克思看到了历史和他的范畴体系的理性重建之间的脱节，而黑格尔使历史与绝对理念相结合。然而，史密斯所言的马克思没有对历史过程作出预言的基础，而这是范畴体系解释的结果之一。

根据前面的讨论，现在可以指出史密斯、科亨和罗默/埃尔斯特的差别。史密斯相信马克思更专注于建构范畴的推论，而科亨在1978年试图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这一点上，史密斯同意艾瑞克·赖特对社会学和历史所作的区分，1988年，这种区分为科亨的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接受。<sup>①</sup> 罗默/埃利斯特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寻找微观基础，以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理论，而史密斯主张，最好的解释来自于范畴推论的宏观解释。

此外，史密斯赞同施密特的“逻辑的一历史的”解释模式和泽勒尼的“结构的一基因的”解释模式。施密特的“逻辑的”和泽勒尼的“结构的”是一致的，因为这两个术语指的都是共时性，即解释的范畴方面。施密特的“历史的”和泽勒尼的“基因的”也是一致的，这两个术语指的都是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施密特和泽勒尼所说的马克思是范畴共时性和发展历时性的综合。另一方面，史密斯致力于研究这种结合，他认为范畴的共时性总是假设因果优先和因果先行。

## 六、菲利浦·范·帕里斯/克里斯托弗·阿瑟

在这最后一节，我将把范·帕里斯和阿瑟的著作结合起来加以

<sup>①</sup> Wright, *Reconstructing Marxism*, London, 1992.

评价。正如上面论述科亨/史密斯著作的章节，范·帕里斯和阿瑟的著作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两个不同学派。范·帕里斯属于功能解释阵营，探究科亨开辟的论域，而阿瑟是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成员，与史密斯有共同的学术亲缘性。审视范·帕里斯和阿瑟的著作，不仅能揭示当前各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哲学差别，而且能把我的讨论带到当前。

恰当地对待范·帕里斯的著作，要将其作为一种解释逻辑。范·帕里斯并不关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预测图，他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有任何哲学上的正当表述吗？解释逻辑在罗默、埃尔斯特、科亨和史密斯的著作中也占主导地位。

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有吸引力的革命理论，不再是关于价值、价格和利润的经济学理论，不再是对少数资本家和绝大多数工人之间将分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预言，也不再是利润率将下降的预告。这些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特质都被历史事件证明是虚假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当代对话从历史预言，或宏观经济学的追溯和列宁主义—毛主义的战略转化为关于道德、剥削、不平等以及社会科学的解释逻辑的讨论。

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一种挽救的工作，即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模式的扭曲中挽救出来的尝试，而这导致了解释的哲学。这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现存的实践上。这种挽救尝试的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或探索在哲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有效的逻辑描述。

这意味着阿尔都塞时期终结了。这位伟大的法国结构主义者试图挽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阿尔都塞所指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矮化。阿尔都塞挽救辩证唯物主义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而这种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如今已全不足信。

范·帕里斯的工作致力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在这一点上，他得益于科亨此前的著作。事实上，他的两本书，《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解释》<sup>①</sup>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sup>②</sup>都是对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开创性见解的捍卫和发挥。

在科亨的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范·帕里斯接受了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而范·帕里斯的著作指出逻辑上的证据，即谈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正当的。

范·帕里斯认为，功能解释对证实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相互转换来说是必要的。仅当功能解释被用于描述这种关系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才能被认为在逻辑上是有效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认为生产资料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具有优先权。生产力在决定社会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的全部其他方面时居于首要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基于断言生产资料的首要性，而范·帕里斯认为，生产力的首要性只能通过功能的逻辑来证明。范·帕里斯相信，生产方式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基础之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难题”<sup>③</sup>。

对任何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而言，维护主要观点都是必要的。

阿瑟的著作与范·帕里斯的立场针锋相对。然而，这两个人都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目前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争论的例证。在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任何合法性之前，其解释方法必须被证明在逻辑上是有效的，或在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作为一种社会分析形式的任何可信度之前，他必须首先被证实其解释逻辑是令人信服的。

阿瑟和范·帕里斯之间以及科亨和史密斯之间的基本区别之一

---

① Van Parijs, Philippe,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Jersey, 1981.

② Van Parijs, *Marxism Recycled*, Cambridge, 1993.

③ Van Parijs, *Marxism Recycled*, p. 32.

是，范·帕里斯试图验证功能解释，而阿瑟试图证实体系辩证法的范畴是《资本论》的基础。阿瑟专注于证明有机体模式是《资本论》的原型，而范·帕里斯试图证明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述的，是历史叙事背后的推动力。如同我这本书的核心主题，阿瑟认为马克思延续了作为有机体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和社会制度的解释公式。这两个人采用的元模型是生物学的。

阿瑟几乎以鲜明的特色来描述马克思的方法，我在这章谈及施密特的一节中曾用这种特色来表述马克思的方法。我将引用来自阿瑟的著作《新辩证法》中的两段话，表明我和阿瑟解读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解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就会清楚地看到通过体系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整体对他们的著作非常重要……因此，内在的关系具有整体的特征。如果彼事物是此事物本性的必要条件，那么此事物与彼事物具有内在的关系。它们彼此的关系被定位为总体的要素，并通过其有效性而再生。<sup>①</sup>

理性的线性逻辑是不恰当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总体被构成的，它以这种方式形成自己的特征，离开这种特征，它们也就改变了本性。如果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充分发展，那么马克思第一章的概念只能具有一个抽象的特征，而观点只有通过充分理解的整体中坚持这些概念，才能使其意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体系的说明，开始于一些简单的却具有决定性的关系（比如商品的形式），因而被迫从其他关系中强烈地抽象出来，在现实中穿透它并有益于构成其有效性。只有对总体重建的终结是其事实的展开：事实是从观点明晰的体系中产生的。<sup>②</sup>

---

① Arthur, Christopher, *The New Dialectic*, Leiden, 2004.

② Ibid., p. 4.

这两种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功能解释和体系辩证法，被结合起来做两种不同的事情。由于指向内在矛盾，或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依赖，功能解释更具线性特征。矛盾，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必须具有一个结果，必须解决矛盾并走向均衡，而这个结果是历史，或趋向于发展和矛盾的不同层面的运动。

阿瑟的体系辩证法不关注历史，而关注有机的整体。它是共时性的并试图表明在一个体系中每个个体是如何反映整体的。

体系辩证法不是预言性的，而是有回溯性的（retrodictive）。它不关心发展而关心后退，或认为一个孤立的概念是有机整体的缩影。它关心共时性的结构，即逻辑范畴以及这些范畴何以标志着一个有机整体的每个独特的形式。

阿瑟描述了《逻辑学》和《体系辩证法》之间的直接相似性。他将《资本论》理解为社会科学中的全部解释模式。

在阿瑟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全部社会科学的解释范式。

## 七、结语

迄今为止所作的讨论，核心在于联系或分离马克思和黑格尔逻辑上的异同，即马克思延续或不延续黑格尔的方法论方面。然而，这里有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他们的历史地位层面，或者说他们与18世纪启蒙思想的关系问题。这个层面关注他们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定位，而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些评论。

在写于1939年的一部非凡著作《从黑格尔到尼采》中，卡尔·洛维特——虽然他是一个在日本的移民——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以他们自己的文风使理性、历史和发展的启蒙传统永久化。<sup>①</sup> 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将宗教和哲学分离开来，并认为只有人类理性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乌托邦未来的能力，而黑格尔改写了基督教末

---

<sup>①</sup> Lowith, Karl,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trans. David E. Green, New York, 1964.

世论，将宗教信仰转化为哲学上的自我决定。

洛维特将《精神现象学》中的“绝对精神”一章作为黑格尔对基督教神义论世俗化的标志。在“绝对精神”这一章，黑格尔描述了完整的知识、艺术、宗教和哲学上升的三个阶段，并证明宗教超越艺术而哲学超越宗教。事实上，哲学取代宗教作为知识的最高形式是对理性的启蒙信仰的一种反映。洛维特将黑格尔表述为哲学神学的一个范例，启蒙哲学之后的理念将获得此前为信仰所保留的“绝对知识”。

在洛维特看来，黑格尔将启蒙的方案传递给了后几个世纪。贯通理性、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启蒙原则，黑格尔将西方思想史对人类理性和历史进步的期望留给未来。洛维特的解释被约翰·爱德华·托乌斯在他的著作《黑格尔主义》中所作的研究证实。托乌斯将黑格尔理解为对理性主体和客观世界的经验主义分歧的反叛者，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和本体论的和解取代了这种分歧。<sup>①</sup> 事实是，本体论自身是逻辑的或自我决定的，这意味着人们的时间由理性设计来指导。

尽管马克思脱离了本体论思想，但他也将人类主体视为理性的存在，视为实现与人类理性相符合的未来的能力，而这种历史目的论将马克思与启蒙—黑格尔主义的方案联系起来。

在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sup>②</sup> 中，他将黑格尔看作是现代性的发明者。黑格尔将 19 世纪表述为一个新的时代，表述为对此前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这个新的时代，现代性与历史中的理性规则是同位语，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思想能导致人的状况的持续发展。哈贝马斯指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启蒙方案和现代性是同时代的。

然而，在现代性中存在着一个不幸的悖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一方面，理性规则承诺一种永无止境的历史进步，但另一方

<sup>①</sup> Toews, John, *Hegelianism*, Cambridge, 1980.

<sup>②</sup> Habermas, Jürge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1996.



面，理性的统治也为工具理性的产生准备了通道。黑格尔和马克思是阿多诺思想的前驱，或者说他们对人类理性的信念没有导致发展的目的论，而导致了专制主义和奥斯威辛的极致。工具理性是启蒙方案的庶出，而不幸的是，其结果产生了希特勒主义、斯大林主义、毒气室以及《否定的辩证法》中所谴责的事情，后现代性是一种抵制的反应，标志着现代性议程的失败。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当哈贝马斯质疑现代性的议程是否还与后现代主义世界有关的时候，他提出了当今时代的基本问题之一。黑格尔和马克思还对后现代主义时代有话说吗？这个问题提出的议题是，理性的思想和历史的进步目前是否仍然具有意义。

本书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而只想保留这种困惑。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中的上升或衰落对人类理性和历史进步问题具有当代意义。如果拒绝人类理性和历史进步的概念，那么黑格尔和马克思就失去了意义；但如果保留在思想和乌托邦主义信念中，黑格尔和马克思仍然是知识和灵感的重要源泉。

## 第二章 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本章旨在驳倒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并打算提出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每个体系来自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个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个以恩格斯主义为标签。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两种不同的个性，有两种不同的精神，他们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理论。维护这个连字符，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唯一的社会理论，只能歪曲他们每个人的理论，混淆和延缓对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双重的且不一致的体系的考察。

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同一性的斗争是左派使徒传统的一个例子。政治思想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对任何政治运动而言都是重要的，成为真正的政治思想继承人的斗争是所有群众运动的特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卡尔·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以及卡尔·考茨基为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模式在欧洲占主导地位而斗争，他们用连字符连接了马克思—恩格斯，因为这种融合加强了成为使徒正统的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需要通过声称是真正的政治思想继承人而建立其合法性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两翼，西欧社会主义和俄国列宁主义的分裂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西欧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分裂的见证。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这两个分支的合法性需要提出真正的政治思想继承人的称号，将这笔遗产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是他们希望作为唯一继承人而被合法化的需要，或者说统治全世界的左翼有必要使他们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旨赋予唯一性，而他们是唯一意旨的唯一接受者。

由古斯塔夫·迈耶尔撰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兩卷本传记<sup>①</sup>提供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迈耶尔的传记至今仍然是一流的，迈耶尔的传记不仅表明，西欧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恩格斯遗嘱的真正执行人，而且建立了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遗产最纯净接受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迈耶尔的著作设定了解释的范围，并建构了解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配权。

这个多数主义者的学派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以及哈尔·德雷珀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延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彼此不能区分的一对克隆人，但他们都采用了基本一致的论点，即连体婴儿的观点。在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中，霍布斯鲍姆指出，恩格斯致力于结合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宪章运动者的阶级斗争学说，而马克思自己将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政治学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法国和英国传统的混合物，而恩格斯对“欧洲三头政治”（European triarchy）的贡献是他在曼彻斯特管理他父亲的工厂时获得的关于宪章运动者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知识。<sup>②</sup>琼斯正确地认识到，“今天正统马克思主义流行的概念仍然可以追溯到恩格斯体系化和普遍化的著作”<sup>③</sup>，但他继而错误地断言：“如果恩格斯批判的立足点是人道主义，那么他的批判方法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sup>④</sup>与琼斯相反，本章的核心观点是，恩格斯从未完全理解黑格尔，因而一直滥用黑格尔主义辩证法。作为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一个严谨的学生，德雷珀赞同霍布斯鲍姆的解释，即恩格斯强化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解，他还觉得

① Mayer, Gustav, *Friedrich Engels*, The Hague, 1934.

② Hobsbawm, Eric, “Marx, Engels and Pre-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m*, ed. Eric Hobsbawm, Bloomington, 1982, Vol. 1, pp. 1-28.

③ Jones, Gareth Stedman, “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m*, p. 293.

④ *Ibid.*, p. 306.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现在更为重要”<sup>①</sup>。我反对德雷珀的观点，这套多卷本丛书后面的著作将表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是黑格尔主义批判的例证，它对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不大。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不久，挑战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连字符的对立论学派产生了。持不同意见者以对立论学派取代关于连体婴儿的争论，该学派断言，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因重要的差异而分离。起初的持不同意见者是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和安东尼奥·葛兰西，这三个人都将焦点集中在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解释的差异，以及马克思何以从未放弃黑格尔个人主义对主体批判和政治实践的强调上，而恩格斯将黑格尔主义辩证法歪曲为一种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个对立论学派最初以乔治·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sup>②</sup>，卡尔·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sup>③</sup>，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sup>④</sup> 为代表。这个对立论学派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别，但没有提到两个不同的体系。

特别是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译本的广泛传播，对立论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振兴了。对立论学派自身分为两个阵营，温和的对立论者和激进的对立论者。我是一个激进的对立论者，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的情况从未存在过，实际上两个不同的社会理论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一个被称为恩格斯主义。我最初提出这个观点是在我的著作《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sup>⑤</sup> 中。在本书中，我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找出这

① Draper, Hal,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77, Vol. 1, p. 159.

② Lukacs, Georg, *The Young Hegel*,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5.

③ Korsch, Karl,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0.

④ Gramsci, Antonio,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uentin Hoare, New York, 1970.

⑤ Levin, Norman,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les*, Santa Barbara, 1975.

两个理论的起源，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恩格斯主义的社会哲学早在 1842 年就很清楚了。

在我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出版之后，对立论学派因特雷尔·卡弗著作的出场而扩大了。作为一个温和的对立论者，卡弗拒绝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观点，谈到“这两个人之间的显著差异”<sup>①</sup>，但他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做短暂的手术式分离之后停止了。卡弗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马克思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读物，他进一步指出，“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讨论的‘矛盾’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更具体的阐述”<sup>②</sup>。卡弗的评价是错误的，后面的一卷将证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基本上派生于莫泽斯·赫斯和罗伯特·欧文的著作，恩格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黑格尔的运用仅仅是语言学上的而且是无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于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温和的对立论学派的另一个例子是斯塔西斯·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sup>③</sup>，尽管杜娜叶夫斯卡娅没有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脱离，但他成功地界定了将恩格斯追溯至赫斯和欧文的发展线索的某些原因，而马克思由海因里希·海涅这条线索和法国雅各宾主义激进的左翼演变而来。

在这一点上，作一个程序性的说明是适当的。总体上来说，我的解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认识大体上表现为两个时期。我认为第一个时期是他们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而这跨越了 1837 年至 1850 年；我认为第二个时期是他们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而这跨越了 1857 年至他们各自辞世。我目前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上。

然而，从 1837 年至 1850 年的经历必然将他们分为第一个片段

① Carver, Terrell, *Marx and Engels*, Bloomington, 1983, p. 157.

② Ibid., p. 37.

③ Kouvelakis, Stathis,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Trans. G. M. Goshgarian, London, 2003.

和第二个片段。就青年马克思而言，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片段涵盖的年代是1837年至1841年，就恩格斯而言，是1837年至1842年。对青年马克思来说，第二个片段是1841年至1850年，而对青年恩格斯来说，是1842年至1850年。这种分期是必要的，因为重要的差别区分了这两个片段。

本书关注的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第一次接受黑格尔的第一个片段。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留下了大量值得揣摩的文字材料，处理这些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深入分析。煞费苦心的是，有必要审慎地透过这些档案，对细节作激光般锐利的洞察。出于这些原因，必须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区别为两个分支。

目前这章将被分为如下时间段：（1）1837——恩格斯夭折的教育；（2）1838~1841——恩格斯在不来梅；（3）1841~1842——恩格斯在柏林。

本章旨在开始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过程，而将黑格尔作为区分的标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如何理解黑格尔将被作为他们不同的哲学路径的晴雨表。他们在自己生涯的早期对黑格尔借鉴的不同方式可以被认为是他们未来学术不一致的根源。

这个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发展，但由于其目的是消除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这三个时期的每个时段都会提到马克思。这样做乃是表明他们学术思想发展不同路径的一种手段。

### 一、1837——恩格斯夭折的教育

生于1820年，青年恩格斯未能在他的高中毕业，因为他父亲在1837年让他离开学校，让这位17岁的年轻人到家族的纺织工厂工作。<sup>①</sup>青年恩格斯未能完成他的高中教育，未能进入大学，而这种高级学术训练的缺失，使他终生的学术事业有所残缺。缺少学术技

<sup>①</sup> Mayer, *Fridrich Engels*, p. 6.

能，缺少准确描述理论体系的必要的哲学能力，是他从未克服过的一种缺陷。

马克思生于1818年，起初进入波恩大学，后于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在他学习期间，马克思给他父亲撰写了一封流露真情的信，这封信包括如下句子：

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聚会，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暴露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sup>①</sup>

这封信还包括这段话，它让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学术兴趣和他眼界所及的范围：

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并顺便写下自己的感想。同时我翻译了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即根据语法学习英文和意大利文，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成绩，我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年鉴》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过后者只是顺便浏览一下而已。<sup>②</sup>

在1837年，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进入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他父亲的鼓励下，17岁的青年恩格斯转入商界。他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没有多少关于黑格尔的知识或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知识。

---

<sup>①</sup> 《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sup>②</sup> 同上书，11~12页。

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19岁的青年马克思已经深入研究了黑格尔以及黑格尔派的思想。尽管他的父亲想让他成为一名律师，但青年马克思已经养成了哲学思维训练的习惯。青年马克思对细节的专注，他对深入洞察的偏爱，已经在他写给父亲的这段精炼的话中被证实：“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也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中他的摘录笔记卷所证明。<sup>①</sup>

## 二、1838~1841——恩格斯在不来梅

青年恩格斯生命中的这个时期将被分为如下分支：作为学术业余爱好者的青年恩格斯；德国历史；路德维希·白尔尼；青年德意志派运动；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片段。

### 作为学术业余爱好者的青年恩格斯

青年恩格斯接近黑格尔的路径是通过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确立的。1838年，青年恩格斯从巴门来到不来梅，他在那里的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出口公司继续他的商业教育。在这段日子里，恩格斯使自己沉浸在资本主义世界，而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他开始了一名自由撰稿人的生涯。由于擅长文学，他开始撰写文学评论，而他的第一篇文章在1839年发表于青年德意志派运动的成员卡尔·谷兹科主编的《德意志电讯》上。黑格尔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是由自由理念决定的进步运动的主题，对青年德意志运动产生了影响，而通过阅读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品，青年恩格斯开始熟悉黑格尔。

在他最初发表的作品《伍珀河谷来信》（1839年3月发表于谷兹科主编的《德意志电讯》）中，恩格斯抨击了他出生的城市——位于巴门的伍珀河谷令人窒息的宗教和政治保守主义。青年恩格斯将伍珀河谷说成是“旧蒙昧主义的断崖”<sup>②</sup>，表达了青年德意志派的理性

<sup>①</sup>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Berlin, 1976.

<sup>②</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和社会批判思想，讽刺他的家乡在文化、学校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反动的。特别是，青年恩格斯抨击了传教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马赫尔，他将这个人视为黑暗的冠军、原教旨主义的加尔文主义者。克鲁马赫尔在选民、先定学说、拘泥《圣经》的字句方面坚定不移地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教义。<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延续了青年德意志派对宗教的抨击，从1839年到1842年，宗教和理性之间的冲突是青年恩格斯生命中的主题之一。

从1839年到1842年12月，青年恩格斯以弗里德里希·奥斯维德为笔名撰写他的通讯。虽然恩格斯在他的通讯中摆出社会反抗者的姿态，但他在私人生活中不能违背他的父亲——虔信派教徒，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直到1842年12月，青年恩格斯22岁的时候，才在著述中署上他的本名，结束了他的秘密生活，并疏远了他的父亲和家庭。

青年恩格斯将自己一分为二，在夜晚雄心勃勃地从事青年德意志派的反抗，在白天则是前途有望的企业家，这在他与他的妹妹玛丽亚·恩格斯的通信以及致其他友人——弗里德里希牧师和威廉·格雷培的信中显然可以捕捉到，这些书信跨越了1838~1842年。在本质上，青年恩格斯写了两种不同的书信，一种是与她妹妹的通信，在这里他应付每天生活的细节，嘲笑资产阶级生活的沉闷，显现出对波希米亚生活的触及，从未放弃成为恩格斯家族纺织企业的继承者，从未流露出他的秘密生活；而第二条交往的线路则向格雷培兄弟开放。在这第二条线路上，像一个忏悔者，恩格斯打开了他真实的灵魂，明确阐述他的内心困扰，反对格雷培拥抱虔信派的恳求，在1838年到他1841年2月22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最后一封信中留下了关于他的精神痛苦和他的决定的最准确描述。到1840年时，恩格斯已是一个无神论者。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49~252页。

他在与玛丽亚·恩格斯通信时流露的那条线路上是一个钟爱家庭的人。青年恩格斯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忠诚的通讯员。显然，从写给玛丽亚的信中可见，他还写信给他的父母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但仅仅给玛丽亚的信在大批信件中幸存下来。青年恩格斯比玛丽亚大四岁，而他写给妹妹的信富有一个长者温暖和关心的特色，有处世才能的哥哥指导并保护妹妹接受教育和成长。青年恩格斯不断告诫玛丽亚将信写得更长些和更频繁些。如父亲一般，这些信也充满着关爱，而当玛丽亚在18岁毕业于寄宿学校，成了一个纯洁、天真、美丽而有魔力的女性时，青年恩格斯写了关于她的诗歌，而这个少女初次了解到男性爱慕者的存在。<sup>①</sup>

不管兄弟姐妹之间有怎样健康的家庭同情，青年恩格斯从未与玛丽亚交流过他的文学追求和成就或他的精神困扰。青年恩格斯对他的妹妹和家庭是不诚实的，而他将自己分开的想法透露给他们的是一个略有波希米亚倾向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一个没什么不寻常或令人担忧的18~22岁之间的青年人的形象。

青年恩格斯隐藏他将自己一分为二的第二个考虑出于心理上的需要，他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在他于1839年4月24日前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得到证实，他在这封信里恳求这位牧师为他是《伍珀河谷来信》的作者一事保密：

哈，哈，哈！你知道《电讯》上的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该文作者就是正在写这封信的人，但是我劝你对此守口如瓶，否则我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要求你们5人发誓不对任何人说我是作者。<sup>②</sup>

---

<sup>①</sup>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2年8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304~308页。

<sup>②</sup>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4月24日前~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43~144页。

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分为两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以及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他的家庭，对于他在不来梅的亨利希·洛伊波尔德公司的同事来说，青年恩格斯表现出上层资产阶级典范的形象。青年恩格斯极力避免谎言遗漏，因为只有这样，他作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半才不能被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商界公众所看到。

他在1842年晚些时候到曼彻斯特，为他父亲管理欧门—恩格斯公司。当恩格斯在这些日子里作为一个商业主管和社团领袖起作用的时候，他表现出上层资产阶级典范的形象，而当他作为一个宪章主义者从事写作，当他作为青年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合作者时，他显露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外貌。他父亲在1860年逝世，而恩格斯在出售他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份并迁居伦敦将自己全部奉献于政治运动之前仍然将自己一分为二。

在与玛丽亚的通信中，恩格斯将他自己描述为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青年恩格斯自豪地向他的妹妹夸耀，谈及他对骑马的热爱以及他的骑马经历<sup>①</sup>，他的击剑经历<sup>②</sup>，他的跳舞经历<sup>③</sup>，以及他对联谊会的喜爱<sup>④</sup>，而在1839年4月23日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解释提早作结论并将信送出去的理由：他必须马上去上声乐课了。<sup>⑤</sup>

然而，有时候，这个资本主义财产的继承者超越了上层资产阶

---

①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39年9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03~204页。

②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12月6~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65页。

③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54页。

④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39年9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04页。

⑤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4月23日~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45页。

级的行为准则，跨入波希米亚的行列。他喜欢红酒、雪茄和咖啡，并经常沉迷于其中且无节制。在他 1840 年 7 月 7 日至 9 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描述了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办公室的一天。

我们的商行里现在成了一个完备的啤酒储藏室：桌下、炉边、橱旁，到处都是啤酒瓶。老头儿（亨利希·洛伊波尔德）酒瘾一来，就向我们要一瓶，然后又让人把酒瓶灌满。此事现在已经完全公开了。杯子整天放在桌上，旁边就是酒瓶。右边的墙角放着空瓶，左边是盛满酒的瓶子，旁边放着我的雪茄烟。这的确是真的，玛丽亚，青年人像汉契克博士所说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坏了。二三十年前有谁想到这么吃惊的恶劣行为——在商行里大喝啤酒呢？<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喜欢概述，而他写给玛丽亚和格雷培兄弟的信大多涉及他的工作。他在 1840 年 8 月 20 日至 25 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包含着关于在办公室多次饮酒之后他自己的概述：青年恩格斯倚在一张吊床上，他左手夹着一支雪茄，看起来他打算打个盹。<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的波希米亚作风伴随着一种前卫。他是一个娇贵的上层资产阶级成员，然而他嘲笑同类阶层的乏味。作为一个巴门—不来梅资产阶级的波希米亚式的背叛者，青年恩格斯讽刺了这个群体的顺从和沉闷。他讽刺地模仿了这些庸人，而这正是他的《伍珀河谷来信》的批判对象。

在寄给玛丽亚的这些概述中，他将这些人视为应当被讽刺的庸人，他们缺乏个性，他们服从阶级的愿望。为了表示蔑视，青年恩格斯蓄了胡子。青年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反抗行为，而他

<sup>①</sup>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7月7~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42~243页。

<sup>②</sup>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8月20~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48页。

骄傲地宣称，这使他看起来像个意大利人。<sup>①</sup> 在迁居柏林之前，青年恩格斯将他的波希米亚作风视为一种反抗庸俗的工具。他的波希米亚作风成为他个人自由的一种表述，胡子是对顺从抗议的一种武器；他在给玛丽亚的一封信中倡导这种策略：

上个星期天我们在小酒馆里举行过一次小胡子宴会。事情是这样的：我发了一个通知给全体能够蓄小胡子的年轻人说，消除这一切庸人偏见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一致蓄胡子。谁有足够的勇气来蔑视偏见并且蓄胡子，谁就签名。<sup>②</sup>

服装和个人修饰成为青年恩格斯这个波希米亚者的反抗工具，而这种姿态是他对服兵役态度的例证。当反思 1841 年服兵役的可能性时，青年恩格斯采取作为特权阶级成员的不屑一顾的、骄傲的态度。“不过，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要到柏林去履行我的公民义务，也就是说，尽可能服完兵役，然后回到巴门。可以预料事情将如何进展。”<sup>③</sup> 甚至在他被征召到炮兵部队以履行自己的军事义务之后，青年恩格斯仍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将军事生活本身视为俗不可耐的事。青年恩格斯在寄给玛丽亚的一封信中简述了他的穿着违反了军事条例：

你在信里可以看到我穿着制服的样子。我披上军大衣，有一副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然而很不符合条例规定。如果我就这样走在街上，那我随时都有被关禁闭的危险，这可不是愉快的事情。<sup>④</sup>

①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0年10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56页。

② 同上书，257~258页。

③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1年9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87页。

④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2年1月5~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93页。

1842年在柏林，当他第一次沉浸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时，这个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继续以军事上的波希米亚作风反对军事上的庸俗习气。“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是反抗的符号。这个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将“派头”视为一种政治手段。青年恩格斯没有超越他对巴门的反抗。

在这同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赋予并发明了“派头”的意义，他确实暗示玛丽亚，除了饮红酒和抽雪茄之外，他在柏林是有责任的。在他第一次与玛丽亚的通信中，他提到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他的任务是保卫黑格尔，反对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的哲学复古。在他1842年4月14日至16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承认他倾听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当时他写道：“多么好啊！看，阳光变得更加灿烂，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饭后我到底可以去散步了，而且今天晚上谢林不讲课，因此我整个晚上都有空，于是我可以非常努力和非常安静地进行工作了。”<sup>①</sup>青年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另一面得到承认，见到阳光。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能永远被隐瞒。

在他通信的第二条线路上，将他与弗里德里希牧师和威廉·格雷培联系起来的纽带是，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展示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将自己一分为二的这另一面被允许出现在他写给男性朋友的信中。

在1838~1842年，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思想困扰的核心是理性和宗教之间的冲突。青年德意志派是理性优越的倡导者，而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倾向于他们的立场。鉴于他双重存在的声音，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839年4月24日前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描述了他在不来梅和柏林这

<sup>①</sup> 《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1842年4月14~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93页。

些年的这一核心难题：

可是在可爱的巴门，没有人跟你讲这种事，那里完全按照另外一套原则进行讲授。那么，旧的正统思想以什么为依据呢？无非是陈规旧套。《圣经》在什么地方要求按字面相信它的教义、它的故事？有哪一个使徒在哪里说过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接受到圣灵的启示？正统派所讲的一切并不是要理性听从基督，不是的，他们是要扼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而代之以僵死的词句。因此，我直到现在仍和从前一样，是一个地道的超自然主义者，不过我抛弃了正统思想。所以，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相信一个诚信尽力做善事的理性主义者会永远堕入地狱。这同《圣经》本身也是矛盾的，因为那上面写着，任何人都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本人的罪恶而被处罚堕入地狱；如果有人全力抵抗原罪并且做了他所能做的事，那么，它的真正的罪恶只不过是原罪的必然后果，因此，这并不能处罚他堕入地狱。<sup>①</sup>

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承认他得益于青年德意志派运动，在1839年4月8日至9日，他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前，望着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

我从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能当多久，但我希望继续当下去，尽

<sup>①</sup>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4月24日前~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43页。

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理性主义。<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在他 1839 年 6 月 15 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证实他转向青年德意志派，他写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青年德意志派。”<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第一次提到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是在 1839 年 3 月写的《伍珀河谷来信》中<sup>③</sup>，但他在 1839 年 6 月 15 日的信中第一次具体地提到施特劳斯的《耶稣传》。<sup>④</sup> 恩格斯这个青年德意志派仍陷于宗教和理性之间的两极分裂，但他仍坚持走向理性的轨迹，他写道：“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sup>⑤</sup>

青年恩格斯学术信仰的易变性在一个月之后明显了。在 1839 年 6 月 12 日至 27 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一封信中，他评论了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对他自己思想的影响：

我尤其尊敬施莱尔马赫。如果你是始终如一的，当然就会谴责他，因为他不是按照你的精神，而是按照青年德意志，泰奥多尔·蒙特和卡尔·谷兹科的精神宣讲基督教。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在目前活着的人当中，具有和他同样的才智、同样的力量和同样的勇气的人，我只知道一个，就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这就是施莱尔马赫的学说，而我仍然赞同这个学说。<sup>⑥</sup>

①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 年 4 月 8~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139 页。

②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 年 5 月 24 日~6 月 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182 页。

③ 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64 页。

④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 年 6 月 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186 页。

⑤ 同上书，187 页。

⑥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 年 6 月 12~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194 页。



1839年6月12日至27日这封信是有趣的，因为青年恩格斯没有试图区分施特劳斯和施莱尔马赫；他没有描述施莱尔马赫的宗教体系的主体和施特劳斯的理性之间的区别。尽管他一时陷入宗教直觉，青年恩格斯在1839~1840年这段批判岁月的思想轨迹是趋向于理性的。

青年恩格斯在10月致信威廉·格雷培说，他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sup>①</sup>，并抛出如下挑战：如果威廉·格雷培证明施特劳斯是错误的，那么恩格斯将成为一个虔诚主义者。

一个月之后，恩格斯宣布自己转变为黑格尔主义者，强调他此刻的学术立场。在他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

我能否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sup>②</sup>

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之间，青年恩格斯完成了他趋向于黑格尔主义的行程。在1840年1月21日，他将这封短函寄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为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

---

<sup>①</sup>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05页。

<sup>②</sup>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11月13~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24页。

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光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没有思想的牧师们的极大反感。……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主义的接受使他关于宗教的内心困扰走向终止。当青年恩格斯成为一个黑格尔派时，他开始对宗教冲突感到释然了，当他1840年1月20日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时，青年恩格斯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说他“对继续进行神学辩论没有太大的兴趣”<sup>②</sup>。

1839年4月至1840年1月对恩格斯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他离开了神学并进入哲学领域。在这九个月中，敏感的青年恩格斯至少经历了三个哲学转变：他通过施特劳斯越过施莱尔马赫而抵达黑格尔。在宗教方面，另一个转变等待着恩格斯：他必须从泛神论者转化为无神论者，而他是在1840年开始这个转变的。

#### 德国历史

恩格斯在不来梅的岁月对德国历史采取了一种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解释。这位巴门之子在其生命的这段时期主要关注拿破仑征服以来的德国历史，而在这一点上，他对法国皇帝持有一种矛盾的评价。拿破仑一世是解放者和帝国主义者的矛盾体。

这位耶拿的胜利者是一个解放者，因为他给法国带来内部的改革。青年恩格斯称赞作为自由改革者的拿破仑一世，因为拿破仑在法国制定的逐步改革的政策正是青年恩格斯主张用于俄国的计划。拿破仑将国家世俗化，他对封建权力下放的破坏，他对犹太人的解放，确立经由陪审团的法庭，他编纂了法典，他受到中产阶级欢迎并使之进入国家政府的最高层，他对启蒙的倾向使青年恩格斯希望看到在俄国启动全面的改革。<sup>③</sup>

<sup>①</sup>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28页。

<sup>②</sup> 同上书，228页。

<sup>③</sup>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70页。

相反，青年恩格斯反对作为征服者的拿破仑。他是使德国从法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 1813 年自由战争的倡导者。生于 1820 年，在滑铁卢战役和这位法国皇帝被击败之后，青年恩格斯没有对这位统治德国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亲身回忆，但反对任何外国霸权统治德国是他热烈的民族主义的根源。即使这位巴门之子反对作为征服者的拿破仑，但他称赞作为启蒙的改革者、作为世界精神化身的拿破仑，他写了两首诗赞美这位战败国的皇帝。一首诗的题目是“圣赫勒拿岛”，将这位皇帝比作古希腊的上帝，其中包括这两行诗：“在这里，他曾对自己铸成的那个时代重新思量，在这里，他忍受普罗米修斯的痛苦，直到死亡。”<sup>①</sup> 第二首诗写于拿破仑的遗体被送回法国时，诗的一节是：

他的宫室已经倒塌，他的王冠已经落地，  
他在梦中憧憬的世界帝国已经化为废墟。  
一切都已消逝。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没有后裔，  
他独自躺在月桂树下长眠不起。<sup>②</sup>

这位“亚历山大”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 1806 年的耶拿战役，而这位巴门之子将普鲁士的这次失败看作是德国的第二次复兴。普鲁士和德国具有 1806 年前和 1806 年后的两种存在方式。其 1806 年前的存在方式是滑入专制主义和在社会政治上顺从的文化见证。普鲁士的第一次复兴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位期间，青年恩格斯将他设想为一个重要的内部改革者。在这一点上，青年恩格斯赞同科本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sup>③</sup>（参见本书第三章）。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在普鲁士君主政体的贵族停滞中凋谢了。

① 恩格斯：《圣赫勒拿岛（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157 页。

② 恩格斯：《皇帝遗骸的迁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285 页。

③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273 页。

普鲁士的第一次复兴被普鲁士的第一次倒退扑灭了。

然而，这位“亚历山大”在1806年复兴了普鲁士内部改革，开启了斯坦和哈登伯格的时代。1806年后的普鲁士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sup>①</sup>。许多中世纪的残余被连根拔起。

被自由战争释放的德国统一的梦想未能在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上幸存。1815年的决议再次使德国支离破碎为两大君主制国家即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更小的君主国。在他的文章《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青年恩格斯以这段话为德国统一的失败感到遗憾：

召开了几次会议，这使德国人有时间睡一大觉以消解他们对自由的陶醉，让他们醒来以后重新恢复皇帝陛下和恭顺臣民之间的旧关系。<sup>②</sup>

民族主义愿望在德国的失败标志着内部的改革也被击败了。施泰茵—哈登贝格时代结束了，而德国的国内政治普遍遭遇保守主义的反动。这得到了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正统的支持。德国领土的统一没有实现，但祭坛和王位的统一胜利了。这相当于德国自由主义的第二次破灭。

然而，不管怎样，来自1830年火山的火花是在德国自由主义中燃烧，还是在普鲁士和南德意志燃烧。在《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说明他偏爱北德意志自由主义。<sup>③</sup>普鲁士在1813年自由战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主张德国领导的旗帜。德意志化是德国最重要的需求，而青年恩格斯将普鲁士看作是德意志化最可能的孵化器。

① 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98页。

②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69页。

③ 恩格斯：《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20~422页。

德意志化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觉醒。德意志化意味着克服了德国的党派意识并认识到要以一种单一的民族精神代替分权制的君主专制王国。它意味着一种单一的国家身份的确立，因为普鲁士夺取了1813年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青年恩格斯将霍亨索伦王权看作是这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身份的潜在创建者。

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北德意志自由主义，享有继承其哲学遗产的更多优势。普鲁士丰富的哲学传统将这个王国定位为德意志化的先锋队。当谈到哲学作为德意志化的资源时，青年恩格斯想起了黑格尔主义。青年恩格斯写道，“近代的德国哲学”是“德国的心脏”<sup>①</sup>。

德意志化的一个消极方面是，试图排斥法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法国是启蒙、唯物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以及革命政治思想的故乡，而德意志化采取一些措施，建立一种阻挡任何法国文化渗透的国家屏障。德意志化的一个危险的方面是，将文化孤立于欧洲的进一步发展。<sup>②</sup>

南德意志自由主义尽管富有思想，但缺少领土中心。它缺少能将德意志德意志化或能界定一个民族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心。南德意志的世界主义不是能够被其他单一的国家伪造的铁匠铺。

在这种处境下，通往德国统一的运动已经陷入了僵局，通往内部改革的动力也已经消失了，而1830年的法国革命爆发了。对恩格斯来说，1830年是德国当代历史的开始，因为它重新点燃了内部改革的呼声。青年恩格斯是1830年这一时代的产儿。维也纳会议埋葬的东西被复活波旁王朝的查尔斯五世所推翻。

青年恩格斯代表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历史的循环观。其基本模式是自由改革时代的三位一体：第一个时期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第二个时期是自由战争时代，而第三个时期接受1830年

<sup>①</sup> 恩格斯：《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22页。

<sup>②</sup>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70页。

法国革命的洗礼。改革的前两个周期以君主专制政体的恢复而告终，而青年恩格斯希望这并不能证明 1830 年后的复兴同样如此。可悲的是，第三次复兴也因保守主义的反动而破灭。

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必然被视为 1830 年法国的成功和革命热情的自然结果。他的传记是法国对德国施加影响的事件的权力象征。这种思想脉络经过两个相互关联的国家。关于政治—文化问题，青年恩格斯没有遵循德意志化的要求，而是遵循了海因里希·海涅和路德维希·白尔尼的路径，并接受了法国政治自由主义。不融合法国思想或法国政治模式，德国的政治改革就不能进行。

#### 路德维希·白尔尼

路德维希·白尔尼是普鲁士自由主义第三次复兴的先知。他是唤醒普鲁士对巴黎七月革命的自由主义需求的公民权利保护者。

青年恩格斯毫无保留地对白尔尼赞不绝口。他赞同卡尔·谷兹科将白尔尼说成是“现代摩西”<sup>①</sup>，在《评亚历山大·莱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这篇文章中，他以如下句子来描述白尔尼：

他不知道，白尔尼作为一个人物，是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他不知道，白尔尼是德国自由的旗手，是德国当代唯一的男子汉；他不了解反抗 4000 万德意志人和宣布理念王国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理解，白尔尼是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他向自满的德意志人忏悔，并向他们说，要将大树连根拔起，一个更强大的人即将出现；这个人要用火来施行洗礼，无情地扫除一切糟粕。<sup>②</sup>

白尔尼既是青年恩格斯的一个榜样，也是呼吁人们使自己的国家得到自由的德国思想界的一只苏格拉底牛虻。

白尔尼是青年恩格斯的一个榜样，这个事实可以在他写于 1840

① 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133 页。

②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莱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451 页。

年7月的一首以白尔尼为荣的诗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这首诗名叫《傍晚》，包含如下诗行，表达了恩格斯对尽力赶上白尔尼的渴望：

我也是自由歌手中的一页，  
白尔尼就像那株橡树一样，  
一旦压迫者给德国紧紧地套上镣铐，  
我就会一跃而登上橡树的枝条。  
勇敢的鸟儿翱翔在自由的云霄，  
是的，我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只小鸟。<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和威廉·格雷培之间的通信是白尔尼最初出现在这个巴门之子思想中的地方。最早提及白尔尼的著作是在从不来梅寄给威廉·格雷培的一封信于1839年5月24日至6月15日的信中。在这封信中，青年恩格斯表明，他读过《白尔尼文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并将白尔尼描述为“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sup>②</sup>。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的另一封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将自己描述为“向普鲁士输入禁书的大转运商”<sup>③</sup>。

在青年恩格斯非法输入普鲁士的这些著作中，有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四册，以及他的《巴黎来信》六卷本。<sup>④</sup>威廉·格雷培对他读过的著作显然不为所动，而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将白尔尼描述为“神来之笔”，并希望这两个朋友再次见面时，他会将威廉·格雷培变成一个白尔尼的发烧友。<sup>⑤</sup>

海涅，这个流亡法国的人，试图将德国哲学和法国激进政治学

① 恩格斯：《傍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61~162页。

②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77页。

③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11月13~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22页。

④ 同上书，222页。

⑤ 同上书，223页。

统一起来，而青年恩格斯将他自己称作“海涅笔下的新汤豪塞”<sup>①</sup>，但认为这个“新汤豪塞”目前的状态是“筋疲力尽”<sup>②</sup>的。白尔尼，也处于流亡法国的状态，已经超越了海涅，现在是将德国哲学和为1830年革命释放的法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施洗者约翰”。

然而，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和宗教的历史》最先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德国政治革命的独特性。《论德国和宗教的历史》出版于1832年，认为德国哲学将最终导致一场政治激变。海涅认为，自从路德以来，德国就成为哲学沉思的中心，但他相信产生于16世纪的传统将在19世纪演变为一场政治激变。德国的独特性在于，革命实践将从理性主义理论中产生。<sup>③</sup>

白尔尼是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化身。他打破了将理论运用于德国生活的观念，并以对实践的强调取而代之。青年恩格斯对白尔尼这个作为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生活火焰所作的人格化，可以从这几句话中捕捉到：

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奋斗出来的并证明是实践的一朵奇葩。他就这样坚定地采取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立场，成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先驱和先知。<sup>④</sup>

白尔尼是政治实践的同义语，他与阿尔诺德·卢格具有相近的立场。白尔尼对理论和哲学的需要并不是盲目的，他将其重点放在作为完成改革的指路明灯上，而这是他对德国全部的政治改革运动的最大贡献。青年恩格斯这样纪念白尔尼：

①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65页。

② 同上书，265页。

③ Heine, Heinric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 trans. John Snodgrass, Boston, 1959.

④ 恩格斯：《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22页。



白尔尼才是主张政治实践的人，而且他完全实现了这个使命，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他剥掉了德意志狂的徒有虚名的华丽外衣，同时，也无情地揭开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遮羞布。他用熙德的话提醒德国人：只有舌头没有手，你怎么敢说呢？谁也没有像白尔尼那样描绘事业的辉煌。他浑身洋溢着生机，他浑身充满着活力。……但是，白尔尼第一个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相互关系。<sup>①</sup>

德意志自由主义的未来在于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结合，在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青年恩格斯写道：“我们时代的人物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sup>②</sup>实际上，这两个人相互补充，白尔尼呼吁的行动是健康的，是冲破这种障碍而进入行动的光明的救赎之路，而黑格尔的思想本身往往成为灰色的和暗淡的理论。白尔尼是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实现者。

在青年恩格斯看来，海涅统一德国哲学与法国政治实践的公式是有活力的。青年恩格斯将海涅的公式表述为，黑格尔代表了德国哲学，而白尔尼体现了法国共和主义。由于青年恩格斯的系统阐述，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综合成为1830年后德国改革运动的推动者。

确实，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综合看成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根源：“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已经有不少白尔尼的思想，所以白尔尼可以在《哈雷年鉴》发表的不少文章上毫不犹豫地签署自己的名字。”<sup>③</sup>

白尔尼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先驱。白尔尼是卢格的模范。

白尔尼也是引导青年恩格斯走向黑格尔的思想路标之一。研究

<sup>①</sup>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71～272页。

<sup>②</sup> 同上书，274页。

<sup>③</sup> 同上书，274页。

巴尔尼作为入门，同时引导他深入研究黑格尔。

### 青年德意志运动

青年恩格斯与弗里德里希和威廉·格雷培的通信表明他思想的易变性以及他对黑格尔的最初接受，但他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论述提供了关于他在1839~1841年间理解黑格尔的更深的洞察。在下面的段落中，我将简要地描述青年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评价，重点放在青年德意志运动如何对青年恩格斯最初接受黑格尔产生影响上。我将写到黑格尔在青年德意志运动中的地位，以便确定黑格尔在青年恩格斯心目中的地位。

青年德意志运动在恩格斯第一篇发表的作品《伍珀河谷来信》和1839年4月的一封信中被提到，他将加尔文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与海因里希·海涅、卡尔·谷兹科和西奥多·蒙特的进步主义相比较。<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将青年德意志派当作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而不是哲学家来看待。此外，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文学评论家，他为报纸撰写文章，评价了诗歌、戏剧以及青年德意志艺术家的小说。

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关系分为四个时期：（1）作为青年德意志派政论家的青年恩格斯；（2）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3）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青年黑格尔派；（4）阿尔诺德·卢格开创性的作用；（5）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 作为青年德意志派政论家的青年恩格斯

从他1838年到不来梅直到1840年末，是青年恩格斯忠诚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日子。最能充分地捕捉到他献身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是他1840年的文本《现代文学生活》。<sup>②</sup> 在那里，青年恩格斯将谷兹科赞美为文学天才。有必要回忆他1839年6月15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青年恩格斯那时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青年德意志派”了。

<sup>①</sup> 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58~59页。

<sup>②</sup> 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43页。

谷兹科对这个巴门之子具有构成性的影响。这位发表了青年恩格斯写于1839年3月至1841年4月的20篇文章的《德意志电讯》报编辑<sup>①</sup>是青年恩格斯文学生涯的催化剂。这位《德意志电讯》编辑采纳了这个巴门之子投来的新闻稿，为他提供了最初的鼓励，因此推动了他的文学生涯。青年恩格斯对谷兹科著作的积极评价一部分是他对这位《德意志电讯》编辑的感言。此外，谷兹科还介绍青年恩格斯了解白尔尼，谷兹科将白尔尼称作“现代摩西”<sup>②</sup>，谷兹科还撰写了白尔尼的传记。<sup>③</sup>

在另一系列为《德意志电讯》撰写的文章中，青年恩格斯也说明了为什么谷兹科是那些请他注意黑格尔的人之一。在这些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引用了谷兹科的著作《论历史哲学》，在那里，谷兹科解释了黑格尔本人的历史哲学。<sup>④</sup> 为了证明青年德意志派在何种程度上吸引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注意，他做出了如下考察：

如果是那样，当然就得改变观点，我们也就可以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渗透，——所谓青年德意志的一部分人早已为我们所期待的相互渗透做了前期工作。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这条路与前面两条相比，确实有些可笑，也就是说，这条道路假定黑格尔对美文学的影响毫无意义。不过，我认为，只有少数人能下决心选择这条道路。<sup>⑤</sup>

然而，谷兹科对青年恩格斯发展的帮助并未妨碍他们的关系也因争论而被损害。在皮特·德梅茨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与诗人》中，

① Jedrestski, Joachim. *Gutzkow Als Pionier Des Literarischen Journalismus*, Frankfurt, 1988, p. 220.

② 恩格斯：《现代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33页。

③ Demetz, Peter, *Marx, Engels and the Poets*, trans. Jeffrey L. Sammons, Chicago, 1967.

④ 恩格斯：《时代的倒退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07页。

⑤ 同上书，110~111页。

他近乎指责青年恩格斯剽窃。德梅茨指出，青年恩格斯的早期文学评论基本上是对谷兹科当时主张的重述。<sup>①</sup> 在他们分道扬镳之后，谷兹科曾以贬义的口气将青年恩格斯说成是“青年德意志的公司办事员”<sup>②</sup>，而在1842年12月6日的一封信中，他感到遗憾的是，“引导奥斯瓦尔德了解文学的可悲的荣誉不幸属于我”<sup>③</sup>。谷兹科的其他评论也贬低了青年恩格斯的贡献。

帮助青年恩格斯关注黑格尔的另一位青年德意志成员是卡尔·蒙特。《时代的倒退征兆》这篇文章，提请人们注意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动政策，将青年德意志运动视为抵制这种蒙昧主义的反对党。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和蒙特置于这支反对党的军队中，并将蒙特赞美为“第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黑格尔范畴引进文学的人”<sup>④</sup>。蒙特超出了黑格尔派对哲学的影响而使之进入文学。

在青年恩格斯1840年5月写的另一组名为“现代的论战”的文学评论中，他描述了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内部斗争。这个描述了谷兹科和蒙特之间敌对的新闻片段预示着青年德意志派的解散。然而，蒙特被描述为一个黑格尔派的倡导者，而对青年恩格斯来说，“蒙特却躲在黑格尔体系这棵大树所投下的安全的阴影里”<sup>⑤</sup>。蒙特也是“受过黑格尔的影响，经历过柏林社会生活”<sup>⑥</sup>的可靠的向导。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12月至1840年1月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段他接受黑格尔的时期，从蒙特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必要在这里提到1842年夏天，青年恩格斯在他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转变了他对蒙特的肯定态度，并将他批评为合理的哲学思想的阻碍者。

① Demetz, *Marx, Engels and the Poets*, p. 14.

② Ibid., p. 15.

③ Ibid., p. 32.

④ 恩格斯：《时代的倒退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10页。

⑤ 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33页。

⑥ 同上书，136页。

还有一位提醒青年恩格斯关注黑格尔思想的青年德意志运动成员是弗里德里希·奎纳。青年恩格斯对奎纳的态度经历了一些改变。1840年2月27日，青年恩格斯指出，奎纳试图将黑格尔和现代文学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他模仿蒙特。在《时代的倒退征兆》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评论奎纳“在第一卷<sup>①</sup>的很多地方试图把黑格爾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语”<sup>②</sup>。四个月之后，1840年5月26日，在《现代文学生活》这篇文章的一段中，青年恩格斯改变了他对奎纳的评价，看到他“正在黑格尔体系的迷宫中寻找出路”<sup>③</sup>。

然而，在1839年至1840年末这段时间，青年恩格斯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黑格尔与艺术有关的思想。青年恩格斯试图在美学领域确认黑格尔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将表明1839~1840年的这个趋向于黑格尔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此外，让青年恩格斯认识到黑格尔重要性的是，青年德意志运动还为这位巴门之子介绍了社会抗议的例子。将文学用于他们的宣传，谷兹科、蒙特和奎纳是抵制1830年后的德国自相矛盾的加尔文主义和虔诚主义的模范。他们是不遵照传统生活的人，而且都受到圣西门和皮尔·安凡丹的信条所宣告的性解放的神旨的影响<sup>④</sup>，这个神旨引起了青年恩格斯波希米亚风格的共鸣。作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不遵照传统生活的人，青年德意志运动起到了鼓励青年恩格斯反抗的作用。

在他对青年德意志派的辩护中，青年恩格斯再次表明自己是一个政论家。在1839年至1840年末这段时间，青年恩格斯扮演了青年德意志派一个辩护士的角色。他是这个运动的主角，为报纸填补了对他们文学作品的解释和赞扬。

① 指古·奎纳《女人和男人的性格》第一卷。——译者注

② 恩格斯：《时代的倒退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10页。

③ 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38页。

④ Butler, E. M. *The Saint Simonian Religion in Germany* (New York, 1968)。此外，以青年恩格斯生活中的性自由为主题的著作参见，Schneider, Manfred, *Die Kranke Schöne Seele der Revolution*, Frankfurt, West Germany, 1980。

### 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

正如我此前所论述的，1840年1月，青年恩格斯宣布自己是一个黑格尔派了。一个月后，1840年2月8日，他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写了如下几句话：

此外，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他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承认黑格尔关于任何上帝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原则。<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迅速转向黑格尔派阵营是他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的动力。青年恩格斯附属青年德意志派的丧钟在他1842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敲响，在这里，他确信“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sup>②</sup>。

与青年德意志派破裂，使青年恩格斯从文学转入社会政治批判。由于认识到艺术不能改变世界，青年恩格斯从美学拓展到政治和历史，对社会的批判取代了对艺术的批判。

### 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青年黑格尔派

青年黑格尔派卢格、费尔巴哈和鲍威尔是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活生生的例子，即参与政治活动具有比文学更大的变革力量。

转向青年黑格尔派，在青年恩格斯写于1841年1月的文章《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这组评论中，他并未将黑格尔解释为普鲁士专制政治的捍卫者，而是将他解释为政治社会变革的公民权利保护者。从青年黑格尔派借鉴来的这种对黑格尔的解释，为青年恩格斯将自己融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提供了合理性说明。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这篇文章中，这位巴门之

<sup>①</sup>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30页。

<sup>②</sup>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46页。

子写道：

同白尔尼并驾齐驱而又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一个思想家，他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体系献给了国家。当局没有下工夫去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以及晦涩的文风。当局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竟敢从理论的风平浪静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sup>①</sup>

当青年恩格斯认同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解释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结合时，他成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这种新的信念，这种对黑格尔的重读，在他写于1842年7月8日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再次得到表述：

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sup>②</sup>

撇开论及“亚历山大·荣克”的文章，在青年恩格斯于1841年末离开柏林之前，他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转变就已经发生了。

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是他思想不一致的另一种表现。当青年恩格斯在1838年到不来梅的时候，他成了一个青年德意志派，但到1841年时他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信奉青年德意志的时间跨度持续了大约一年，而大概12个月之后，他接受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这证明他自己在学术上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sup>①</sup>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72页。

<sup>②</sup>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46页。

## 阿尔诺德·卢格开创性的作用

在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过程中，卢格这个人不能忽略的。除了白尔尼之外，卢格对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卢格最早编辑了《哈雷年鉴》，当这本杂志遭到霍亨索伦王权压制的时候，卢格没有被说服继续编辑这本杂志，而是创办了另一本名为《德国年鉴》的刊物。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中，卢格提出了批判文学以及普鲁士政治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是普鲁士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而卢格将黑格尔列为这个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强硬支持者。

青年恩格斯最早提到卢格的《哈雷年鉴》是在1840年5月的评论《现代的论战》<sup>①</sup>中。此后，《哈雷年鉴》、《德国年鉴》以及卢格本人，经常在青年恩格斯的书信和文章中被提到。这两本杂志和卢格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精神在德国还有活力的证明，而这种反抗的思想之父是黑格尔。

在1840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呼吁停止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之间的争吵：“但愿他们（谷兹科和蒙特）从《哈雷年鉴》那里学习到，论战只能针对往日的遗毒和死者的幽灵。”<sup>②</sup>同样是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宣布自己加入了“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他还写道，仅仅“甘斯，罗生克兰茨，卢格等才配称为”黑格尔真正的学生。<sup>③</sup>四个月之后，青年恩格斯在他发表于《德意志电讯》上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引用《哈雷年鉴》，表明他是卢格这本杂志的一个热心读者。<sup>④</sup>

1841年1月，青年恩格斯为《德意志电讯》撰写了另一篇名为

① 恩格斯：《现代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143页。

② 同上书，143页。

③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31页。

④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71页。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的评论。卢格关于实践的论文一定是影响青年恩格斯的最初理论成果，因为恩格斯写道，《哈雷年鉴》“把一篇有关‘政治实践’的评论同……联系在一起”<sup>①</sup>。青年恩格斯意识到，正如施特劳斯用理性去批判神学一样，爱德华·甘斯和卢格主张用政治实践去批判那个时代的反动状况。青年恩格斯意识到，卢格表明黑格尔派哲学必须被用作反对当时政治的批判工作，并写道，仍然是卢格“描述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的协调一致”<sup>②</sup>，而卢格“公开地表述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sup>③</sup>。

青年恩格斯开始使自己与青年德意志派分离，因为这个运动还是太文学化；它沉浸在主观世界中。青年德意志仍然限于美学和自我的领域，从未充分实现它所寻求的社会政治解放的目标。到1841年，青年恩格斯放弃了美学的优先性和波希米亚的首要性，认识到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改变社会政治环境。

青年恩格斯超越青年德意志派转到青年黑格尔主义，是通过白尔尼和卢格的桥梁。这条发展线索是从白尔尼到卢格再到青年黑格尔派，而青年恩格斯完成了这个漫游。

在呼吁理论和实践在卢格意义上的统一时，青年恩格斯显然优先看待实践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作为行动指针的理论需要，而正是这种理论上的需要使青年恩格斯走向黑格尔。

#### 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青年恩格斯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列促使他在1841年9月迁居柏林。他需要服完有利于自己的为期一年的兵役，因为他服役的这支军队（炮兵部队）需要他驻扎在柏林。柏林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中心，而青年恩格斯收获颇丰，因为在晚上——他在下午履行了他的军事义务之后，他开始亲自去了解青年黑格尔派群体中的主角。

<sup>①</sup>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71页。

<sup>②</sup> 同上书，273页。

<sup>③</sup> 同上书，273页。

他继续将自己一分为二。

在关于我对青年恩格斯哲学成长经历的讨论这一点上，我将解释青年恩格斯趋向于黑格尔仅仅是在他 1841 年 9 月到柏林之后。青年恩格斯关于黑格尔最重要的著作写于 1842~1843 年他论述弗里德里希·谢林的三个小册子中；然而，为了描绘他理解黑格尔的完整图景，标出他在 1841 年和撰写关于谢林的小册子之间理解黑格尔的发展轨迹，重要的是揣摩黑格尔的什么概念被青年恩格斯带到了柏林以及他参加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哪些课程。

他第一次提到黑格尔的著作出现在 1839 年 11 月 13 日至 20 日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在那里他评论了《历史哲学》。<sup>①</sup> 大约三个月后，在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再次提到《历史哲学》。<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在 1841 年 1 月阅读了《哲学全书》，因为他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这篇文章中提请人们注意该书。<sup>③</sup> 我还认为青年恩格斯读过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他生命暮年的私人日记中，老年恩格斯保存了《法哲学原理》的复写本，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第四部分第 32 卷的文本。<sup>④</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标记的这本书是恩格斯在 1841 年时拥有的，因此我认为他在那个时期读过这个文本。

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都是爱德华·甘斯（黑格尔的学生和同事）著作的受益者。黑格尔逝世后，甘斯组建了一个黑格尔爱好者的团体，取名为永恒之友，这个团体在 1831 年和 1835 年出版了他们老师在他们所在时代的全集。青年恩格斯知道甘斯编的《全

---

①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839 年 11 月 13~2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224 页。

②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 年 12 月 9 日~1840 年 2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230 页。

③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272 页。

④ MEGA, Part 4, Vol. 32, p. 316.

集》，因为他在 1842 年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中提到过它。<sup>①</sup> 我据此认为，青年恩格斯在 1842 年已经接触了他能够得到的黑格尔的大多数文本。

对黑格尔的表述可以在青年恩格斯 1841 年 9 月由政治和哲学两个维度组成的著述中找到。从政治方面看，青年恩格斯意识到黑格尔本人不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本人是一个保守派，而青年黑格尔派是政治上的改革者。从政治忠诚的观点看，一个巨大的鸿沟将黑格尔本人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开。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本人激进化，或曰他们将黑格尔理性的自我意识思想解释为一种政治批判的工具。从政治的视角看，青年恩格斯拥护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反对黑格尔本人的政治学。

信奉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学并不意味着摒弃黑格尔本人的哲学。青年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和右翼黑格尔派哲学的混合体。

在哲学方面，青年恩格斯采纳了黑格尔本人思想的右翼的观点。青年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和老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综合者。

在诉诸老年黑格尔派哲学时，青年恩格斯也主张客观实在，即黑格尔本人思想抽象方面的存在。青年恩格斯否认主观意识的重要性。

接受黑格尔本人是一个理性泛神论的表述者这个信念，青年恩格斯强调客观实在的作用，强调抽象的力量。他认为客观实在的、实际的情况是合乎理性的，或者说现实取决于理性。在他 1839 年 12 月 9 日至 1840 年 2 月 5 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同意黑格尔关于上帝和人同一的原则。<sup>②</sup> 理性是神圣的，而神圣的东西使自己在人类世界中成为现实。因此，客观实在性、理性，凌驾于个人之上。

当青年恩格斯将历史书写成可以在其上绘制自己思想的画布时，他提出了历史必然性概念。理性泛神论使他相信，概念的展开是历

<sup>①</sup>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337 页。

<sup>②</sup>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 年 12 月 9 日～1840 年 2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230 页。

史中的支配性主题。这个主张的另一方面是确信，根据概念来发展对历史而言是必要的，或者说必要性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原则。

同样是在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捍卫黑格尔本人的立场，即总体高于个别。在作出这一主张时，这位巴门之子暗示个人是局部性的。个人不能在他自身中完成，而抽象高于主体。青年恩格斯削弱了主体的作用，使它附属于普遍和抽象。<sup>①</sup>

概念是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sup>②</sup>在同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描述了黑格尔的概念和神的关系，他写道：“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恩格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发现，理性主义是理性和宗教统一的基础。理性行使了与宗教相同的功能：它提供了对于历史存在的一般说明。1839年10月29日，青年恩格斯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指出黑格尔派的教义取决于“世界灵魂”是否存在，而他赞同黑格尔派的这个预设。<sup>③</sup>

主观意识的作用没有被青年恩格斯彻底掌握。当青年恩格斯接受黑格尔的泛神论观念时，认为普遍观念是历史决定性的推动力，他完全忽视了黑格尔——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的主观意识的重要性。主观意识是否定性的首要力量，历史意识的激励力量。由于授权个人，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主观意识是改变社会状况的否定性力量。青年恩格斯未能成功地领会主观意识的重要作用，因为他继续相信“世界灵魂”的思辨概念，或者说他继续相信“概念的发展”。

此外，青年恩格斯没有揣摩批判的手段。他赞赏卢格，卢格确

---

①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30～231页。

② 同上书，231页。

③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0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实批判了普鲁士国家，但恩格斯没有掌握运用批判的程序。

在黑格尔看来，批判产生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批判是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分歧。一个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是本质，或者说一个事物的必要发展是本质。现象是一个事物的外部表现，即一个事物如何在现实中展示自身。在黑格尔看来，批判的程序遵循如下步骤：（1）一个事物的本质，终极目的，必须首先被确定；（2）一个事物的现象必须与本质加以比较。批判是对本质和现象之间差别的慎重考虑。这个程序假定现象应尽可能紧密地符合本质。

青年恩格斯没有使用过批判，因为他不理解黑格尔派的本质和现象的概念。青年恩格斯从 1839 年到 1841 年的著述没有提到这些逻辑范畴。由于对黑格尔、鲍威尔和卢格有了更多的掌握，青年恩格斯也使用了本质和现象的范畴，因此都被赋予了黑格尔派的政治实践意义。

青年恩格斯也缺乏对黑格尔派方法论的认识。他认为，黑格尔派方法论将自身归纳为：历史被描述为自由概念的必然发展的信念。这是一种简单化和歪曲的观念。对选择这三个范畴而言，黑格尔派方法论是一个关于运用整体和部分、形式和内容以及有机发展等范畴的解释轮廓。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有机体或文化的延续。这些有机体拥有整体，一个决定性的核心，而这些有机体的部分反映整体。每个历史有机体都拥有内容和本质，而社会有机体的形式或结构都是本质的印记。历史，在黑格尔看来，是这些有机体的展开，是对整体和部分内在关系的分析，是对形式和内容相互作用的考察。当青年恩格斯将历史界定为自由概念的发展时，他对黑格尔作思辨的解释，并防止自己理解和运用黑格尔的方法论。

在 1838~1841 年的著述中，青年恩格斯确实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否定性”，证明他熟知这个黑格尔派的范畴。但是当他采用“否定性”这个概念时，他是非黑格尔派的方式展开的，或者说这个方式违背了黑格尔派意图的核心。在他 1841 年 1 月的一篇题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的评论中，青年恩格斯写道：

德意志狂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性、抽象性。德意志狂摒弃了不是源于64代纯粹德意志祖先、也不是生根于本民族的一切，从而创造了抽象的德国人。甚至在德意志狂身上看来好像是肯定的东西也都是否定的东西，因为只有否定了一千年和这一千年的发展道路，才能把德国引向德意志狂的理想；因此，德意志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在上述段落中用“否定性”这个术语指的是差别，或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对比。“否定性”意味着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区别。

这不是黑格尔派的否定性意义，因为黑格尔派对这个术语的规定由三部分组成：取消、保留、包含。在理念王国，当一个概念取消了另一个概念时，否定性的行为就发生了，这表明它不再是相关的概念，但保留了已经被取消的理念的一部分。否定性并不意味着消灭，而意味着一个事物的某些东西在被否定之后仍然存在并被吸收在新的综合体中。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也包含一种渐进的维度，假定新的事物包含被否定的东西，新的事物也取代被否定的东西。

青年恩格斯运用黑格尔概念的另一个纰漏是，他无法对不同的哲学家或法律学者作出区分：青年恩格斯没有按照真正的定义或哲学特性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归类。例如，当他描述注入了黑格尔主义的新生活时，他写了这句话：“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不能对这三个人作出划分。施特劳斯不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而他的著作《耶稣传》没有将新生活注入青年黑格尔主义，而是造成了老年黑格尔派的瓦解。

<sup>①</sup>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69～270页。

<sup>②</sup> 同上书，273页。

施特劳斯用理性去批判《新约》，但这没有使他成为一个黑格尔派。主要的差异使甘斯和卢格区别开来。

爱德华·甘斯是一个从黑格尔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犹太人，甘斯起初被弗里德里希·卡尔·范·萨维尼以反犹太主义为由拒绝其在柏林大学法学院任教。经过长期斗争，甘斯战胜了萨维尼的反对意见，并在改信基督教之后，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法律。

他成了黑格尔的一个私人朋友，而当黑格尔 1831 年逝世时，甘斯组建了“永恒之友协会”，一个力图将黑格尔的著作永久化的同盟团体，在甘斯的领导下，该团体于 1835 年出版了在那个时代所能搜集到的黑格尔全部著作文集的第一版。甘斯自己在 1839 年逝世。

作为 1830 年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甘斯是创造黑格尔自由主义哲学的强大力量。他是一位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保守主义政治学和萨维尼（德国历史法学派的领导成员和普鲁士专制政治的捍卫者）的法律理论。黑格尔和甘斯都反驳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实证主义。甘斯不仅唤起了自由主义的黑格尔哲学，而且还有助于超越这个直抵青年马克思的传统。青年恩格斯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期间，选修了甘斯的两门课程，受到甘斯的法学理论和财产理论的影响。

尽管甘斯受到 1830 年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但他不是卢格那样的青年黑格尔派。甘斯在 1839 年逝世，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创立的前一年。甘斯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卢格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尽管甘斯确实使用了黑格尔派的批判方法，但他不相信主观意识的绝对独立性。

法律实证主义的反对者萨维尼认为，甘斯将黑格尔的历史性理论与法律体系相结合。由于拒绝法律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的存在条件即法律的复写论思想，甘斯反其意而提出，法律体系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在他的《哲学史演讲录》中，黑格尔认为，哲学体系是所处时代的思想的表达，而甘斯拓展了这个理论的视域，认为法律体系也是其所处时代思想的反映。

忠实于黑格尔，甘斯将社会制度看作是局部反映整体的有机整体。甘斯坚持社会制度的结构观念；社会是历史的实体，而它们用于维持自身的机制之一是，确保局部对维持整体的目的起作用。

甘斯撰写了很多关于财产历史的论文。他发展了财产关系是历史的这种看法。大体上来说，他研究了欧洲的财产关系，专门研究了罗马财产理论的起源及其衰落，并发展了德国的财产观念。通过表明支配财产关系的法律不是永恒的，而要受历史发展过程的支配，他抨击了萨维尼的法律实证主义。

甘斯对马克思的影响非常大，通过他的老师，马克思懂得，私有财产不是人类固定不变的状况，相反财产关系是发展的，它们是它们所帮助建构和维持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新的财产理论产生于19世纪前30年的柏林，遵循从黑格尔到甘斯再到马克思的发展线索。

青年恩格斯理解黑格尔的这些纰漏不完全包括在他直到1841年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中。从积极方面看，青年恩格斯理解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实践程序。追随卢格，青年恩格斯揣摩理性必须揭示实践的缺席，而实践是使现实与理性更紧密地相结合的政治活动。在另一方面，青年恩格斯没有掌握在主观意识中发生的理论—实践活动。揭示现实和思想之间的分界线的中介是自我意识，这正是卢格、鲍威尔和青年马克思的做法。青年恩格斯遵循着一条不同的路径，认为普遍理念在通向自由的过程中将揭示理性和存在之间的脱节。

他对黑格尔主义的最终接受也使宗教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斗争结束了。通过接受黑格尔，青年恩格斯也成为了一位理性主义者，仅仅从他的观点来看，这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

青年马克思在1839年和1841年之间的发展路径与青年恩格斯完全不同。青年马克思不仅对黑格尔哲学而且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也做过专业研究<sup>①</sup>，而青年恩格斯这两年致力于成为青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3~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一个政论家。青年马克思在 1839~1841 年间发掘哲学文献，他的博士论文的参考书目证明他对西方古典哲学的探索是深入的<sup>①</sup>，而青年恩格斯为国外报纸撰写了书评，而且他详尽地阅读了当时的德国文学。

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表明他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由于受到布鲁诺·鲍威尔著作的强烈影响，《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表明对老年黑格尔派的突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宣言。

青年马克思汲取了鲍威尔关于主观意识和批判的思想。鲍威尔与老年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派泛神论决裂，而代之以将历史断定为思想的进程，更确切地说，是将发展视为主观意识运用批判的逐步形成过程。鲍威尔遵循黑格尔将批判规定为现实与本质标准的比较，或曰是与应该之间的比较。鉴于黑格尔怀疑主观意识，鲍威尔将其视为带来雅典和苏格拉底衰落的因素以及鼓励恐怖和罗伯斯庇尔统治的因素。鲍威尔认为，对主观意识的批判武器的使用是历史发展的钥匙。

在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借用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的黑格尔是鲍威尔的黑格尔，或者说青年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核心思想理解为由主观意识展开的批判。

青年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比较适用于这一看法。德谟克利特属于古希腊经验主义的传统，相信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感觉。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比德谟克利特更重要，因为他使用了主观意识。伊壁鸠鲁没有使用批判，而是提出个人的意识允许概念解释自然的作用。伊壁鸠鲁不相信感觉能解释自然的功能，而相信概念对整理这些经验是有必要的，主体是这些概念的基础。

---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 卷，3~105 页。

对 1839~1841 年的青年马克思来说，黑格尔是主观和批判的统一，或者说黑格尔是鲍威尔所理解的黑格尔。青年马克思不仅接受了鲍威尔式的黑格尔，而且还使用这种鲍威尔式的黑格尔去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青年马克思没有接受黑格尔对作为自由发展史的哲学史的看法，也没有接受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是一个古代斯多葛主义的成员，象征着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衰落的观点。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阐明，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使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走向终结。<sup>①</sup>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复兴了古代哲学。伊壁鸠鲁不是衰落的例子，而是哲学复兴的声音，他将哲学重新规定为主体，因此哲学作为发展的力量得以复兴。

青年马克思反对将对抽象概念的使用作为历史的建构力量。1839~1841 年的马克思已经拒绝任何关于人类事件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超主体的力量的观点。在他 1843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继续反对老年黑格尔主义的抽象概念。

到 1841 年，主要的分裂已经区分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接受；这些差异第一个是关于历史的问题，第二个是对批判的运用。在历史领域，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读作一个泛神论者，一个关于抽象理念——抽象因果性的哲学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没有阐述抽象历史的因果性理论，而认为因果性是从主体中产生的。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理念不是目的，主观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自身。青年恩格斯犯了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责黑格尔关于永久化的同样错误，例如，以唯心主义的实质取代人类的社会实践。<sup>②</sup> 1841 年，青年恩格斯犯了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的谬误，转换了从主观到先验的因果性。

---

<sup>①</sup> Hegel, Georg. W. 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Lincoln, 1995, Vol. 1, pp. 384-387.

<sup>②</sup>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 卷，5~160 页。

在批判领域，虽然青年恩格斯理解了理论—实践的范畴，但他未能说明理论—实践的范畴。在1838~1841年这个时期，青年恩格斯从未充分地运用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方式。理性泛神论取代了主观意识。

### 三、1841~1842——恩格斯在柏林

当青年恩格斯1841年9月到达柏林时，他承担了自己在心理上倾向于发挥的作用。正如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一个主角，在倡导青年黑格尔派时所起的作用。

以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政论家的理解力，青年恩格斯发现必须捍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以反对包括谢林、海因里希·利奥赫、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以及他在伍珀河谷时候的复仇者克鲁尔马赫在内的诽谤者的广泛阵线。青年恩格斯拿起武器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因试图再次强加路德教派的正统、君主的权力以及在文化—哲学上与绝对王权政治相一致而带来的普鲁士整个范围的倒退。对恩格斯来说，两极分化是柏林的特点，即宗教—政治权利的力量与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改革为代表的力量之间的对抗。<sup>①</sup>

在1842年3月，青年恩格斯出版了名为《信仰的胜利》的小册子<sup>②</sup>，一首由四章组成的长诗，描述了青年黑格尔派和普鲁士极端右翼的肖像，这首诗很有趣，因为它提供了这两个对立的阵营的成员名单。

宗教正统一政治专制主义—哲学保守主义的阵营由莱奥—亨斯滕贝格—克鲁尔马赫—谢林这些人组成。他们鼓吹普鲁士的君主政体。

改革的阵营由青年黑格尔派填充，而青年恩格斯包含在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卡尔·弗里德里

<sup>①</sup> 恩格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534~542页。

<sup>②</sup> 恩格斯：《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73~529页。

希·科本、麦克斯·施蒂纳、爱德华·梅因、路德维格·布尔、奥托·维干德这个阵营里。由于喜欢绘图，青年恩格斯简要描述了一个会议，包括上面所有这些被他列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人们。<sup>①</sup>

尽管不包括在上面提到的这段简要描述中，但在这首诗中，他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阿道夫·鲁滕贝格、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说成是青年黑格尔派。引用这首他描述尚未见到的青年马克思的诗是有价值的。1842年11月底，青年恩格斯第一次与马克思会面。不管这种事实的差异，青年恩格斯这样描述青年马克思：

是面色黝黑的特里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巨妖。

他不是走，而是在跳，在急急忙忙向前飞奔，

他怒目圆睁，满腔悲愤。

只见他高振双臂，直指穹苍，

仿佛要把广袤的天幕扯落地上。

他紧握双拳，不知疲倦，

宛若凶神附体，只顾向前。<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虚构地描绘为费尔巴哈主义的模式，为了减少人间的神圣性，以人类学取代了宗教。

青年恩格斯以如下方式描述自己：

那个靠在最左边迈开两条长腿的正是**奥斯瓦尔德**。

他着灰色上衣胡椒色长裤，内心充满火药味，俨然一个山岳派，

他从根子里就是这个脾气，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他只玩一种乐器，那是断头机，

<sup>①</sup> 恩格斯：《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98页。

<sup>②</sup> 同上书，505页。

他只奏一个曲调，那是抒情曲。

他总是哼着地狱之歌，反复吟唱：

“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公民们！”<sup>①</sup>

在这个自我写照中，青年恩格斯将自己说成是“山岳派”，跟随其后的是罗伯斯庇尔，通过做出这种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一翼的联系，他表明到1842年3月时，他成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仅仅是当青年恩格斯成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时，他成为了一个革命者。

青年恩格斯继续将他自己的身份隐藏在“奥斯瓦尔德”这个笔名的背后。甚至直到1842年3月，青年恩格斯坚持他思想的两极化；他需要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在言语托词的背后。

在《信仰的胜利》这首诗中，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限定在柏林自由人内部。事实上，《信仰的胜利》这个文本表明，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与自由人综合起来。

在表明黑格尔派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勇气的一段中，声势浩大的魔鬼训诫他们：

这时，魔鬼突然闯进房间，开口高喊：

“你们这些低劣作品实在可叹！”

它嘴里喷出轻蔑之火，向自由人发出诘难：

“莫非你们的英雄气概，你们的勇敢，

就是要在书报检查和禁令的淫威下畏缩不前？”<sup>②</sup>

在另一段中，这首诗描绘了阿尔诺德·卢格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将他的同仁召集起来：

<sup>①</sup> 恩格斯：《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503～504页。

<sup>②</sup> 同上书，473～529页。

就在这时响起一个声音，那是阿尔诺德的呼唤，  
他召唤全体自由人到博肯海姆去参加魔鬼集团。  
“自由人啊，快起来，不要呆坐在那里胡思乱想”，  
浪漫主义已使整个世界暗淡无光。<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包括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因此当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归为自由人时，他一定也将青年马克思并入自由人之中。作为科隆的《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成为自由人是很困难的。显然，自由人的问题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底会面不成功的原因。青年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成员，比如麦克斯·施蒂纳和爱德华·梅因持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事实上，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视为自由人的同伴，如果假定马克思知道《信仰的胜利》这首诗，那么在他这首诗中也有关于这两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的观点。

青年恩格斯在自由人的范畴下归纳了这12个人，因此表明他没有能力区分不同学派思想之间的差别。他构建了一个人们任意结合的集体，而这个决定证明他的分析能力不足。

根据青年恩格斯的系统分析，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是自由人的代表，但青年恩格斯没有试图划分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差别。鲍威尔是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倡导者，而费尔巴哈是人类学人道主义的鼓吹者。巨大的差别将鲍威尔对自我意识的信奉与费尔巴哈对社会存在的信奉区分开来。鲍威尔属于批判的理性主义传统，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传统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是自然主义的鼓吹者，是皮埃尔·伽桑狄思想的后裔与古代唯物主义以及施洗者约翰的性解放思想的复兴者。青年恩格斯没能成功地讨论所有这些区别和条件，他这样做不仅留下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之间思想统一的错误印象，而

---

<sup>①</sup> 恩格斯：《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502页。

且青年恩格斯将所有这些都称作自由人。

巨大的差异也将阿尔诺德·卢格和麦克斯·施蒂纳分开。卢格主要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而施蒂纳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的创建者之一。卢格希望改变政治状况，而施蒂纳不关心政治，他关心的是个人的绝对思想自由。卢格关注作为政治改革工具的大规模集团、政党的组建，而施蒂纳将任何集团都看作是一种对主体自由的违背以及对剥夺个人独立性的任何共同体的忠诚。青年恩格斯没有注意到卢格和施蒂纳之间的这些不连续性，而如此失察表明，青年恩格斯没有意识到它们。

青年恩格斯将自由人表述为一个集团，将这些成员组织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他们反对现存状况；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是一个反抗的阵营。作为一个新闻撰稿人，青年恩格斯将他们宣传为一种进步的力量，变革的先锋队。然而，在青年恩格斯的表述中存在着一种空缺：他虽对这个集团的观点加以解释，但不能分析这个集团中每个成员个人思想的具体特征。

《信仰的胜利》是对反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专制的政治运动的一种诗意解释。《信仰的胜利》将布鲁诺·鲍威尔描绘为魔鬼部队的领袖。黑格尔是鲍威尔的老师，而自由人由鲍威尔领导；自由人是理性主义的军队，而在这首诗中他们也是邪恶的宠儿。鲍威尔的军队与由莱奥、亨斯滕贝格和克鲁尔马赫指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部队，或霍亨索伦—新教徒的联合部队发生了冲突。路德教和君主立宪制的结合，教会和国家的联姻，在《信仰的胜利》中作为保守等级的基础而得到诗意的表述。在这场宗教—政治的联合与理性主义的斗争中，胜利走向信仰；莱奥、亨斯滕贝格和克鲁尔马赫的旗帜在战场上占主导地位。这首诗是一种警告：它表明宗教和政治泛神论的胜利是蒙昧时代可悲的序曲。

《信仰的胜利》不是青年恩格斯以他作为自由人主角的能力创作的唯一文本。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保护者的角色使他另外还撰写了反对《福音教会报》的评论文章。

这份报纸以及它所联合的人们，莱奥和亨斯滕贝格，以泛神论的宗教立场展开反对黑格尔的战斗。《福音教会报》将普鲁士当时的思想斗争理解为两个思想学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哲学理性主义之间不共戴天的冲突。作为一种捍卫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策略，《福音教会报》的主要发言人莱奥试图败坏黑格尔的名声，莱奥认为，黑格尔是宗教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莱奥出版了《黑格尔门徒》，他在这本书中不仅试图诋毁黑格尔而且诋毁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将他们导师的理性主义永久化。

在宗教和理性之间的斗争中，青年恩格斯假定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都是政论家的立场。早在1839年4月23日~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一封信中，就在这段时间，青年恩格斯在柏林陷入了他自己关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个人斗争，包含在一首题为“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诗中。<sup>①</sup> 莱奥的著作《黑格尔门徒》试图玷污一个自由主义黑格尔派卡尔·米什莱的著作，而青年恩格斯在这首诗中将莱奥描述为一个蒙昧主义者，将黑格尔和米什莱描述为德国思想的哲学解放者。

在1842年为青年马克思的《莱茵报》撰写的一篇文章<sup>②</sup>中，青年恩格斯坚持作为反对莱奥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政论家的角色。在《同莱奥论战》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再次将贬低莱奥的思想作为捍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手段，而这样做就使得这位政论家反击莱奥的《黑格尔门徒》和《福音教会报》。

在青年恩格斯第一次借用黑格尔的第一个时期的这个发展阶段，他有幸在柏林真正认识自己。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君王，让弗里德里希·谢林到柏林大学任教。谢林，这个黑格尔年轻时在图宾根神学院的朋友，帮助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的业内推荐者，后

<sup>①</sup>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4月23日~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45~162页。

<sup>②</sup> 恩格斯：《同莱奥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40~443页。



来与年轻时的同伴决裂了，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有力反对者，他指责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性。这场宗教和哲学之间的斗争超越了莱奥而进入柏林大学的讲堂，而由于青年恩格斯在首都，出席谢林的演讲对他来说是可能的。

正如青年恩格斯扮演了反对莱奥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一样，他再次扮演了反对谢林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在1841~1842年间，青年恩格斯扮演了反对谢林反黑格尔主义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

在1841~1842年这段时期，从青年恩格斯的笔端流淌出五篇论述黑格尔和谢林的作品。这些作品是《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一个旁听生的日记》、《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其中包含着关于青年恩格斯如何阅读黑格尔的宝贵见解。

这五篇文章对重构青年恩格斯在他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阅读黑格尔的尝试是重要的。从1841年到1842年，他提出了自己理解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见解，也表明他在1838~1841年思考的连续性。本章此前的段落描述了青年恩格斯在1838~1841年趋向于黑格尔，而目前对1841~1842年这五篇文章的讨论，将揭示他的青年黑格尔派评论的连续性。

青年恩格斯论述黑格尔—谢林争论的长篇作品都作为独立的小册子出版了。《谢林和启示》作为匿名的小册子1842年在莱比锡出版，而《谢林——基督哲学家》作为匿名的小册子1842年在柏林出版。他的文章《谢林论黑格尔》发表在谷兹科的《德意志电讯》上，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他的文章《一个旁听生的日记》1842年5月发表在马克思的《莱茵报》上，也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关于“亚历山大·荣克”的评论1842年7月发表在卢格的《德国年鉴》上，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青年恩格斯在他驻扎于柏林的整个时期继续自我分裂。在午后他是炮兵军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而在晚上他是激进的弗里德里

希·奥斯瓦尔德。直到他 1842 年 11 月底离开欧洲大陆去英国，他坚持将自己一分为二，当他 1842 年 11 月 8 日为青年马克思的《莱茵报》撰写《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这篇文章时，他才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名字。<sup>①</sup>

为了恰当地评价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我要将我的分析分为如下范畴：I) 谢林；II) 妥协者；III) 哲学原理；III A) 黑格尔主义的历史；III B) 理性和必然性；III C) 理念和现实性；III D) 主体和客体；III E) 《精神现象学》；III F) 辩证法；III G) 《谢林——基督哲学家》；III H) 黑格尔的不在场。

### 谢 林

谢林和黑格尔 1790 年在图宾根神学院第一次相见，在他们的学生时代这两个年轻人同住一个房间。这两个人结识了未来的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而这三个朋友分享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羡慕。谢林走得更远，他将《马赛曲》译成德文。<sup>②</sup> 黑格尔在 1793 年离开图宾根神学院，而这两个人直到 1801 年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之前都没再见面。

谢林是这两个人中最先到耶拿的，而且他实际上帮助黑格尔在那里获得教席。谢林和黑格尔是耶拿的同事，而且他们共同编辑了《批判哲学杂志》。由于个人丑闻，谢林在 1803 年被迫离开耶拿，此后这两个朋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他思想形成时期，黑格尔受到谢林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的影响。然而，当黑格尔逐渐脱离谢林时，他变得成熟了，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 年）表明他与谢林的决裂。黑格尔寄给谢林一本《精神现象学》，但由于意识到这种破裂，谢林从未对这本书作出直接的回应。

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在 1833~1837 年间的某些时

<sup>①</sup> 恩格斯：《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 卷，405~406 页。

<sup>②</sup> Pinkard, Terry, *Hegel: A Biography*, Cambridge, 2000, pp. 21-25.

候，当谢林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时，他传授了一系列谴责黑格尔体系的课程。黑格尔在1831年去世，在黑格尔逝世之后不久，谢林——其声誉和威望在哲学界已经暴跌了——对黑格尔体系发起了攻击。此外，到20世纪30年代，谢林一改以往对共和政体的同情，他变成了一个君主专制秩序的捍卫者。出于对他的反黑格尔主义、他对宗教的兴趣以及他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奖赏，谢林被派往柏林大学领导反对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战争。曾经的朋友，现在成了哲学上的反对者，谢林在1841年11月15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反黑格尔派的长篇评论。

恩格斯参加了1841年的这些课程，他不是作为听众参加课程的唯一重要的学术人物，参加者还有索伦·克尔恺郭尔和米舍尔·巴枯宁。

关于理性的作用是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核心分界点。谢林谴责黑格尔支持一种消极的哲学，一种精神的、主体的或否定客体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辩证法表现为一种精神不断否定客体的公式，而这种辩证法使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变得不可能。

谢林还指责，精神从来都不能证明存在。消极的哲学，主张理性的排他主义，必然总是被包含在理性中。辩证法，一种纯粹意识的程序，必然还属于意识之内，从来都不能超越它，因此无法提供存在的根据。消极的哲学不能处理存在的终极问题。黑格尔主义从来都不能成为一种纯粹同一性的哲学。

谢林赞成一种积极的哲学，一种打算建构主体—客体抽象统一的思想体系。谢林支持一种积极的哲学，在那里，理性是自然的产物，因而理性属于自然，而黑格尔被限定在否定性之内，在那里理性通过否定性起作用。

谢林假定存在着三种普遍力量，精神、自然、意识或前两者的统一。第一种力量是精神，第二种力量是自然，而这两种力量会合

为“冷漠的观点”<sup>①</sup>。

这种“冷漠的观点”是精神和自然的同时表现，它是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共时性存在。这里没有反抗，没有矛盾，而只有互补。从这种互补中产生了意识，而意识成为主体和客体统一或精神和客体同一性的产物。

谢林构建了一种浪漫的自然哲学（nature philosophy）。谢林信奉自然哲学，而黑格尔最终接受了关于自然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nature）。关于自然的哲学关注将精神强加于物理学世界的形式，一种关于自然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自然哲学研究由精神或形式的本性释放的力量以及将自然嵌入精神的力量。在关于自然的哲学中，理性决定自然的合理性，而在自然哲学中，理性本身是自然力量的产物，或者说精神的螺旋式发展是自然所赋予的。

此外，由于谢林认为理性不能证明存在，那么存在在理性之外存在且仅面向感觉的力量开放。事实上，存在免除理性，阻止理性，意味着存在仅仅在宗教直觉中容易得到理解。临近他生命的终点时，谢林导致了广泛的宗教沉思，因为他将直觉主义视为存在的唯一途径。

当青年恩格斯旁听谢林的这些课程时，他感到这些课程是另一种充当宗教和理性之间的斗争。鉴于谢林 1841 年的学术立场，他诉诸超自然的力量，青年恩格斯将这些课程理解为信仰和理性之间斗争的另一个方面，同样这个斗争在他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得到了概括。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捍卫是对超越信仰的理性优越性的捍卫。黑格尔是正确的，而谢林是错误的，因为黑格尔是理念的发言人，而谢林是超自然力量的辩护者。

---

<sup>①</sup> White, Alan, *Schell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stem of Freedom*, New Haven, 1983, p. 159. 关于谢林思想的其他研究，应当查阅如下著作：Bowie, Andrew., *Schelling and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New York, 1993; Schelling, F., *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a Philosophy of Nature*, Trans. Keith R. Peterson, Albany, 2004. 了解黑格尔在 1801 年如何理解谢林哲学，参见 Heg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trans. H. S. Harris and Walter Cerf, Albany, 1977.

青年恩格斯将谢林放在莱奥的阵营中。他们都是普鲁士反动势力手中反驳黑格尔的爪牙。青年恩格斯反对莱奥—谢林联盟的作用是扮演一个拥护黑格尔的共和主义者。作为“黑格尔帮”的一员而遭到莱奥的谴责，青年恩格斯将他的作用规定为积极揭露莱奥—谢林同盟——普鲁士路德派正统的简单的喉舌。这个任务召唤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高举为人类理性的冠军。

#### 妥协者

青年恩格斯描述了黑格尔自身和青年黑格尔派或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黑格尔本人是保守的，而正是自由人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范畴并将其激进化。

黑格尔本人的妥协倾向来自于他的哲学规定，“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sup>①</sup>。正如黑格尔本人相信哲学是其文化环境的一种表现，因此黑格尔本人相信，他的国家理论应当反映复苏时期的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态度。

青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本人的国家观念是精神世界的投影。在他1842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青年恩格斯的论述显然参考了《法哲学原理》：“难道黑格尔不也是这样的吗？难道对他来说，国家在向世界历史过渡的时候，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不就是绝对精神的具体现实吗？”<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也被“捧成普鲁士国家哲学”<sup>③</sup>。

黑格尔本人的政治妥协因他不透明的文风而加重了。理解“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和晦涩的文风”是相当困难的。<sup>④</sup> 语言和体系都令人费解的特点是黑格尔本人毕生的影响为什么很少能超

①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338页。

②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51页。

③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73页。

④ 同上书，272页。

出讲堂的一个原因。<sup>①</sup>

青年恩格斯表述了黑格尔本人的一种右翼观点。在青年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本人是作为普鲁士王权的辩护者出现的。在《谢林和启示》这本小册子中，青年恩格斯以如下措辞描述黑格尔本人：“他的政治观点、他的以英国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他同样也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sup>②</sup>

此外，黑格尔的政治保守主义也是他哲学的更为积极方面的结果。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思想意味着，他具有哲学上的理由假定普鲁士君主政治在他的时代是合乎理性的，而包容某种必需的东西是必要的。<sup>③</sup>

#### 哲学原理

然而，在哲学层面上，黑格尔的体系包含了能成为哲学发展根基的理论范畴。黑格尔本人没有看到他自己哲学的激进潜力，虽然他创造了这些范畴，但他从未运用它们去批判政治条件的现状以推进改革的事业。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完成的任务。

黑格尔派思想中诸如否定、矛盾、自我意识、辩证法、理念、自由等概念都能找到他们观点的来源。在黑格尔本人看来，所有这些概念都支持他的右翼倾向。而只有自由人，新的一代人，将它们用作革命哲学的结构。

但自由人不得不等待全集的出版，这是爱德华·甘斯完成的任务。“他的全集，特别是他的讲演录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④</sup>自由思想的发展，人类历史的不断完善，构成《哲学史》、《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目的的概念，作为一种灵感，成为自由人运动的燃火点。构成自由人一翼的卢格，将黑格尔派的自由概念和政治实践的信仰结合起来，或者说这个原理认为，政治宪章的逐渐改变

①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336~337页。

② 同上书，338页。

③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337页。

④ 同上书，337页。

是鼓舞自由的最有效的路径；这是青年恩格斯所归属的自由人的阵营。

### 黑格尔主义的历史

在他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中，青年恩格斯写道，在1810年以前，黑格尔的体系就其基本特征来说已经完成，而到1820年，他的世界观彻底形成。<sup>①</sup>

黑格尔主要著作的出版时期是：《精神现象学》，1807年；完整的《逻辑学》，1816年；《哲学全书》，1817年；《法哲学原理》，1820年。青年恩格斯将这些著作视为构成黑格尔主义体系的核心。黑格尔全集的甘斯版本发表于1831年和1835年，包括《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和《宗教哲学讲演录》。正如我在前面的段落中指出的，青年恩格斯了解这些著作；他认识到这些讲演录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自己并不认为它们对黑格尔主义体系是决定性的。甘斯的版本确实包含黑格尔的一些早期著作，特别是早于1807年《精神现象学》的文章，但青年恩格斯没有提到它们。他将《现象学》作为这个体系的开篇阐述，而将《法哲学原理》作为这个体系的总结陈词。

《法哲学原理》对青年恩格斯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个黑格尔式的句子。在《谢林和启示》这篇文章中，当青年恩格斯写到黑格尔认为任何事物“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sup>②</sup>时，他转述了这个黑格尔式的句子，与此同时他概述了他对黑格尔的全部阅读：理性是宇宙中最高的神，而现实是对理性的反映。《法哲学原理》是青年恩格斯理解黑格尔的关键文本，因为青年恩格斯将其解释为关于理性的内在主张；这种信仰构成了青年恩格斯理解黑格尔的不变的核心。

<sup>①</sup>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338页。

<sup>②</sup> 同上书，344页。

另一个有助于他赞赏黑格尔的文本是《哲学全书》。在他的文章《谢林论黑格尔》中，青年恩格斯提及“黑格尔《哲学全书》所得出的观念、自然与精神的三位一体”<sup>①</sup>。在描述黑格尔派思想运动开始于理念而归结于精神时，青年恩格斯再次将黑格尔主义和理念的神学联系起来。《哲学全书》由三本书组成，《逻辑学》（1812年）、《自然哲学》（1813年）和《精神哲学》（1816年），而青年恩格斯将这三本书读作理念的历史。他用《逻辑学》来证实他的观点，因为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以绝对理念结尾。对于青年恩格斯来说，存在仅仅是理念的轨迹，因为它在自然中显露而在个人意识中结束。

在简要描述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过程中，青年恩格斯作出了对黑格尔右翼的阐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绝对理念，而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马克思认为主体的作用具有优先权，但青年恩格斯效仿老年黑格尔派，并以普遍理念为核心。如同老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赞同理性对宗教的替代。

#### 理性和必然性

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解释为一个逻辑泛神论者，即黑格尔相信理性是宇宙的终极目的。

在《谢林和启示》的最后几页，青年恩格斯再次重申必然性的主体。“只有本身包含着必然性的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确，只有作为必然性的合乎理性性质的自由，才是真理。”<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仍然回到逻辑泛神论，认为理性是宇宙的基础，即理性根据必然法则起作用。

青年恩格斯将理性规定为对必然法则的呈现。如果必然是理性的基础，由于理性支配世界，那么理性成为现实就是必要的了。

#### 理念和现实性

由于熟知《哲学全书》，特别是《自然哲学》，青年恩格斯认同

<sup>①</sup> 恩格斯：《谢林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330页。

<sup>②</sup>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389页。



理念是现实的先导。

对谢林的思想做出回应的需要，有助于青年恩格斯接受自然哲学。在其他概念中，谢林提出了两个哲学原理，存在独立于思想和思想自身是自然的表达。谢林的积极哲学基于精神是自然的产物以及自然先于精神这个理念。

青年恩格斯驳斥了谢林这两个理念，相反他断言思想自身是自给自足的，因此自然是精神的一种反映。如果思想本身是自我决定的，那么自然只能通过思想来构造，而这个从精神到自然的运动是必要的。<sup>①</sup>

我已经指出，青年恩格斯受到黑格尔《哲学全书》的巨大影响。在这个三卷本著作中，黑格尔开始于《逻辑学》，第二卷是《自然哲学》。青年恩格斯按照同样的顺序，将精神作为前提，尽管它不是自然的创造者。<sup>②</sup>

在 1842 年，青年恩格斯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相信感觉是思想的起点。理性不是物质外化的产物。作为老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认为，既然思想先于自然，那么现实是对思想的复写。

相比之下，青年马克思到 1841 年就已经使自己远离理性本体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已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他赞美伊壁鸠鲁是因为希腊原子论者支持经验主义。相对于德谟克利特而言，伊壁鸠鲁不相信理念是感觉的直接反映，相反，伊壁鸠鲁意识到，概念是身体感觉不可或缺的有机框架。然而，伊壁鸠鲁相信物质世界的首要性；在他 1841 年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而到 1841 年，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站在了哲学谱系对立的两极上（关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请参见本书第三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幽灵已经嵌入

<sup>①</sup>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351 页。

<sup>②</sup> 同上书，355 页。

青年恩格斯 1842 年的理性本体论中。辩证唯物主义的种子已经隐含在他的理性形而上学中。对于这个理念，恩格斯后来只需要以三个辩证的法则取而代之：质量互变、对立面相互渗透以及否定之否定。1842 年的本体论作为基础，后来被恩格斯填充在支配自然的三个辩证法则中。

#### 主体和客体

在对逻辑泛神论的信奉中，青年恩格斯成了客观主义谬误的牺牲品。他赋予抽象实体以一种来自于人类之外的具有本体论因果关系的力量。

这种逻辑泛神论转化为自我意识。这大概是 1842 年青年恩格斯一个曲解的声明，他完全否定了主观自我意识的力量。

下面这两处引用，尽管有些夸张，却是青年恩格斯意识到主观力量的文本：

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一只新的圣杯，在它的宝座周围集合着欢欣鼓舞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使所有忠诚于它的人称为国王，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富源和威力，全部美丽和丰富都呈现在他们面前，使之成为他们的光荣效劳。<sup>①</sup>

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垒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时代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青春，重新冉冉升起。<sup>②</sup>

即使青年恩格斯认识到了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其理解为完全主观的能力。自我意识最终没有来自于主体。自我意识的起源在于逻辑泛神论。

在他 1842 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

<sup>①</sup>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393 页。

<sup>②</sup> 同上书，393 页。

义》中，青年恩格斯写了如下两段话：

仿佛地球通过人类达到的自我意识在认识到自己是世界意识的因素的一瞬间，就不成为世界意识了。<sup>①</sup>

但是无须特别了解黑格尔也可以知道，黑格尔的见解要高超得多，他主张主体和客观力量相和解，他非常尊重客观性，认为现实即存在比个人的主观理性要高得多，并且正是要求个人承认客观现实是合理的。黑格尔并不是荣克先生所说的那种主体自律的预言家，这种主体自律在青年黑格尔派身上表现为任性妄为。黑格尔的原则同样是他律，也是使主体服从普遍的理性。<sup>②</sup>

他以右翼的方式将黑格尔的阐述读作“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凡属必然的，便应当是现实的”。青年恩格斯用这个术语指的是，现实是对理性本体论的反映。

青年恩格斯赞成的自我意识理论否认鲍威尔的公式。对鲍威尔来说，主观的自我意识是自发的，它不是派生的而是个性化的。

此外，青年恩格斯提出的自我意识理论与青年马克思的说法相反。1841年，青年马克思追随鲍威尔，捍卫作为个性化能力的自我意识。在他论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称赞这位希腊哲学家，因为他倡导自发的自我意识。

相对于青年恩格斯来说，青年马克思从未主张存在是绝对理念的反映。追随鲍威尔，青年马克思指出存在是个人自我意识的投影。

简言之，青年恩格斯提出了关于黑格尔的基本上属于右翼的观点。然而，青年恩格斯与黑格尔右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他的无神论以及他对政治实践的专注。青年恩格斯以逻辑泛神论取代了正统的加尔文派确乎事实，但他也确实否定人格神的存在。他

<sup>①</sup>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59页。

<sup>②</sup> 同上书，448页。

在1842年不是刻板的有神论者。青年恩格斯不是普鲁士王权和普鲁士现状的捍卫者，而是受卢格影响，倡导大规模的政治改革。

然而，青年恩格斯是逻辑泛神论的拥护者，否定主观自我意识的自主性。在这两个关键点上，青年恩格斯与自由人存在分歧，而他自己赞同黑格尔右派。他与自由人联系的纽带是他的政治改革主义（reformism）。同样，使他脱离黑格尔右派阵营的也是他的政治改革主义。

### 《精神现象学》

青年恩格斯将《精神现象学》读作一个右翼黑格尔派的文本：

但是现象学——这恰好明显地反驳了谢林的理解——并不是一门纯理性科学，而只是通往理性科学的道路，即把经验的东西、感性意识提高到纯理性科学的立足点上来。不是逻辑意识，而是现象学意识会找到这三种最终的“确保绝对的超存在物的实存的可能性”。逻辑的、自由意识看见的则完全是另一些事物，不过对这些事物我们暂时还不必去过问，——这种意识在自身中已经有绝对了。<sup>①</sup>

黑格尔的深邃不安定的辩证法只是在这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发展；他于1806年写《精神现象学》时大大超出了自然哲学的观点，而且声明自己不受这种观点的影响。<sup>②</sup>

在上述引文中，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表述为使自己远离“自然哲学”的人，克服了“经验主义”和“感觉”的人。《精神现象学》表达了黑格尔对唯物主义的超级转让，表达了黑格尔对17世纪和18世纪休谟、洛克、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科学革命的拒斥。

《精神现象学》被解读成是对黑格尔逻辑本体论的重新强调。逻

① 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365页。

② 同上书，341页。

辑是绝对的：《精神现象学》是《逻辑学》的早期版本。

青年恩格斯的确正确地将《精神现象学》评价为黑格尔与谢林自然哲学决裂的实例。由于对《精神现象学》的准确解读，青年恩格斯意识到黑格尔在这本书中摆脱了谢林；黑格尔表明思想之于自然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青年恩格斯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也证明，他对黑格尔的解读多半是歪曲的。在对《精神现象学》的评论中，青年恩格斯没有提到异化或外化思想。他也没有评论自我意识的否定力量，或曰他没有说明自我意识何以是主—奴关系的结果。青年恩格斯完全无视劳动的主题，无视自我意识在社会思想世界生产中的生产能力。他离开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劳动何以最终导致人类与其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的黑格尔派主题。

对青年恩格斯来说，理念支配自然的全部存在，逻辑构成了宇宙的基础。青年恩格斯需要做的全部工作是，指出这个普遍的逻辑依照辩证的原则发挥作用。当青年恩格斯声明这个普遍的逻辑按照正—反—合的方式运作时，他必然遵照自然所遵循的这些自然法则。在1842年，青年恩格斯已经形成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的一套哲学信念，已经植入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种子。

除了他的博士论文之外，马克思论述黑格尔的著作开始于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写这本书时正与他的妻子住在克罗茨纳赫。目前这一章停留在1842年11月底，因此将1842年的青年恩格斯与1843~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加以比较与本章的结构不符。然而，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广为人知的，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看法与青年恩格斯的逻辑泛神论显然完全不同。青年马克思接受作为宇宙原动力的人的社会劳动，而青年恩格斯陷入了客观主义和抽象之中。对青年恩格斯来说，宇宙的动力是逻辑，而对青年马克思来说，社会创造的动力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主体。

到1842年底，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显露出萌芽。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产生了，而对黑格尔相反的解释是这两个年轻人走上不同路径的原因之一。

#### 辩证法

在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这个发展阶段的著述中，这个在哲学上不成熟的政论家使用了黑格尔派的范畴，否定就是其中之一。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派思想规定的具体运用，显示了他把握黑格尔的洞察力。

实际上，发展着的思想是唯一永恒的和实证的，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事实方面、外在方面才是否定的、正在消失着的和应当受到批判的。<sup>①</sup>

即使青年恩格斯使用了黑格尔派的词汇，他也没有能力运用黑格尔派的公式。他使用了这些词语却不能完全把握它的程序。

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上以三个阶段展开：主观的意识否定客观的意识，否定没有消除客体，以及一部分被否定的客体归入意识的高级阶段。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主观意识的活动中产生，以保留原则为基础。在否定之后产生着新的综合中，不是消灭而是被取消的客体的一部分得到了保留。

在青年恩格斯1838~1842年的著述中，他确实没有使用这些辩证的方案。对于他来说，运用这些辩证的公式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缺乏关于主观意识重要性的思想。通过否认主观意识的核心，青年恩格斯使自己无法正确地理解取消、保留和包含的作用。他不能将这个世界视为由个人意识的辩证法所构建的。

对青年恩格斯来说，否定是抽象的功能。不是人们否定，而是

---

<sup>①</sup>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56页。

理念否定。由于理念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否定是理念的一种特性。

#### 《谢林——基督哲学家》

这是青年恩格斯论谢林的最后一本小册子，它是对谢林的运动更深入地走进宗教的描述。这个小册子抨击了谢林思想的宗教预设，通过揭示这种宗教偏见，青年恩格斯希望清除这些柏林讲座的所有哲学价值。

#### 黑格尔的不在场

事实上，青年恩格斯知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把这部著作纳入他对谢林的批判中。作为甘斯印制的《黑格尔全集》的一部分，《历史哲学讲演录》在1833年出版，青年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中提到这部著作，并以其作为这位大师的重要研究成果。《历史哲学讲演录》第三卷包含黑格尔提出对谢林哲学概述的一节。<sup>①</sup> 即使这部著作是青年恩格斯可以参阅的，但他没能在他自己批判谢林的出版物中成功地运用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青年恩格斯没能成功地将这个人，黑格尔，他所捍卫的人包括进去，他自己对黑格尔对手的攻击证明，与其说青年恩格斯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善辩论者。此外，黑格尔的论文《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在1801年发表，收入甘斯编选的《黑格尔全集》第二卷，但青年恩格斯完全忽略了这篇著述。

黑格尔本人对谢林著作的概述尽管写在谢林到柏林去反驳他之前，但比青年恩格斯自己的评论更为客观，更具分析性。黑格尔赞赏谢林是因为他明白，现代哲学的任务是将斯宾诺莎和费希特统一起来。现代思想的使命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斯宾诺莎将客观凝结为实体，而费希特提出的思想是，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唯一的因果中介。即使黑格尔认为谢林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但他发现，他未来敌

---

<sup>①</sup>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Lincoln, 1995, Vol. 3, pp. 512-554.

人的努力因其洞察力和眼界而具有某种价值。<sup>①</sup>

谢林统一客体和主体的努力是他的理论——思想本身是自然的表达——的产物。谢林假定三种力量的存在，自然、精神、思想，而精神是自然的力量，在自然中作为一种能力存在。精神和自然在“主体和客体的定量冷漠”<sup>②</sup>中结合起来，或者说自然和精神之间没有“冷漠”，思想是这种“冷漠”的表现，而由于“冷漠”并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毫无疑问的。

据黑格尔所见，谢林的哲学努力是一个错误，因为它终结于自然哲学。谢林通过将主体纳入自然而得出结论，而不是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sup>③</sup>

谢林的失败在于他将理念纳入自然之中。从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来看，理念必须是完全独立的，它必须是自我存在的。黑格尔派的方案是采用斯宾诺莎的物质概念，并使物质进入思想。谢林恰恰移入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使思想成为一种自然力量的表现。谢林将理性归纳为自然力量的一种机能，而不是表明意识的独立性。在谢林看来，主体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自然的附加现象的限制。<sup>④</sup>

黑格尔对谢林的评价是黑格尔体系的一种表述。黑格尔的原理被用于哲学体系的替代。这里没有任何私人恩怨。

不幸的是，青年恩格斯拒绝利用黑格尔的这类论证。青年恩格斯从未提到黑格尔论及谢林的著述。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停留在对这个黑格尔的敌人试图重新回到宗教哲学或复兴神学的指责上。

青年恩格斯对论战的兴趣比哲学更大。确认他在1838年与1842年之间表现出来的基本行为方式，可见青年恩格斯是一个社论家，

①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516页。

②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Lincoln, 1995, Vol. 3, p. 531.

③ Ibid., p. 535.

④ Ibid., p. 537.



熟练的、消息灵通的分析家，而不是哲学的专业人士。

他在 1838~1842 年间的著述是党派的社论文章。

在这一章中，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派思想的不准确把握。他对黑格尔不完整的理解不仅产生了对黑格尔思想的严重歪曲，而且也使他不可能区分这些希望延续他们老师传统的学生和追随者之间的差别。

1842 年 5 月，青年恩格斯为青年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马尔海内克”，另一篇名为“亨宁”，它们都被并入“一个旁听生的日记”这个标题之下。<sup>①</sup>当青年恩格斯在柏林将自己卷入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时，他不仅旁听了谢林的课程，而且也旁听了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课程，这两个人也加入了关于黑格尔的讨论，并与他们以往同事的代表争讼。

青年恩格斯赞同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课程，并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共和主义的。马尔海内克和亨宁被表述为属于赞成黑格尔派的联盟，这个阵营击退了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攻击，并试图援救黑格尔主义的遗产。

由于缺乏分析能力，青年恩格斯没有指出马尔海内克和亨宁都是老年黑格尔派。到 1842 年 5 月，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归为自由人的一员，但他没能指出自由人与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著作之间的差别。

在对黑格尔主义传统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中，约翰·托乌斯写到了这两个人：

关于黑格尔派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存的宗教、政治秩序的保守的妥协的解释，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观点是最好的例证。<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他对马尔海内克和

<sup>①</sup> 恩格斯：《一个旁听生的日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 卷，424~430 页。

<sup>②</sup> Toews, John, *Hegelianism*, Cambridge, 1980, p. 87.

亨宁的赞美可以被定位为“保守的妥协的”老年黑格尔派。即使在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青年恩格斯与马尔海内克和亨宁同属一个联盟，但青年恩格斯没有告知他的读者的是，他自己的黑格尔主义、政治改革与这两个捍卫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正统右翼代表之间的重要分裂。

青年恩格斯甚至没有指出马尔海内克和亨宁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两个人都是黑格尔的拥护者，他们在两个不同的思想立场上捍卫黑格尔。马尔海内克将黑格尔视为宗教和理性之间和解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点上，托乌斯写道：

在他的神学课程和著述中，马尔海内克一直认为，在《圣经》和福音教会编纂的教义中揭示的宗教“代表”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于哲学真理的形式，又不损害人的自由的合法要求，或曰不牺牲宗教信仰内容的任何部分。<sup>①</sup>

相反，亨宁探求理性和现实之间的和解。亨宁探求理性和政治的结合，而马尔海内克诉求理性和宗教的统一。

对亨宁和福斯特来说，政治是黑格尔主义的理性和现实和解的焦点。人能够把握绝对，因为绝对在理性自由的君主政治世界中揭示自身。<sup>②</sup>

共和主义的需要，建立统一联盟以反对普鲁士反动政权的需要，是青年恩格斯没有充分界定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立场的原因之一。无视这些统一的要求，青年恩格斯留下了关于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老年黑格尔派以及这两个人对黑格尔的理性观念的不同态度的重要

<sup>①</sup> Toews, John, *Hegelianism*, Cambridge, 1980, p. 222.

<sup>②</sup> *Ibid.*, p. 117.

空缺。

青年恩格斯最尊重的老年黑格尔派成员是爱德华·甘斯，他在1839年逝世。在1839年5月24日至6月15日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责问他是否参加了甘斯的葬礼。<sup>①</sup>大约两个月后，恩格斯再次敦促格雷培不要忘记为甘斯送殡。<sup>②</sup>大约一年后，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与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通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只有甘斯、罗生克兰茨和卢格配称为黑格尔的学生。<sup>③</sup>

青年恩格斯向甘斯致以最高的敬意可能来自两个原因：青年恩格斯自己是犹太解放运动的阐述者，他对甘斯在柏林大学最后成功地赢得教职表示赞赏；青年恩格斯将甘斯视为反对历史法学派斗争中的一个同盟者，而历史法学派的立场是为普鲁士专制制度作意识形态的辩护。

青年恩格斯想做辩护者的需要成为他最初引起马克思注意的基础。正如青年恩格斯在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拥护黑格尔派联盟，因此他也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在共产主义早期历史中有影响的人的拥护者。我已经指出这个事实，青年恩格斯在他写于1842年5月至6月的诗歌《信仰的胜利》中赞扬青年马克思的才智，大约四个月后，1842年11月，他与马克思在实际生活中结识了。

青年恩格斯希望填补的角色是支持激进政治运动的重要的共和主义者，而这个愿望有时候使他歪曲了一些事实。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有必要再次逾越我为自己设定的1842年这个分界线，而对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和1844年1月在英国的某些著述加以审视。

---

<sup>①</sup>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82页。

<sup>②</sup>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6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01页。

<sup>③</sup>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31页。

对我将要引证论据的充分认识，依赖于回想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在科隆《莱茵报》办公室的第一次会面，而青年马克思怀疑青年恩格斯与柏林的自由人有联系。青年马克思驳斥了自由人发表的文章，因而他冷淡地结束了与青年恩格斯的会面。直到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没有再次会面。

不顾他自己和青年马克思在1842年12月至1844年8月之间缺乏联系，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18日的文章《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撰写了如下段落，它发表在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

还在1842年秋天，这一派的某些人就争辩政治变革的不足之处，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唯一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人类状态。可是，就连这一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当时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该派的政治性刊物《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倡共产主义，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反对行为都不能把它扼杀；就在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曾满意地看到，共和主义者正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他们的行列。除了现在已被查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派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经又有另外一大批人，如卢格博士，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期刊《德国年鉴》的编辑；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一位诗人，他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于去年冬天曾被大部分英国报纸译成英文；还有其他一些人。我们希望其余的共和党人也逐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sup>①</sup>

在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摆出了新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姿

<sup>①</sup>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91~492页。

态。他为欧文和宪章运动的拥趸们写作，并试图说服读者相信，他们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大陆上发展着。青年恩格斯希望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提倡者。

仅仅在 1842 年 11 月，当他在科隆的《莱茵报》遇到赫斯时，青年恩格斯自己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赫斯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了，在匆忙的会见之后，他使青年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因此在 1842 年 11 月底，青年恩格斯在去往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的路上途经科隆，而当他到曼彻斯特时，已经是德国共产主义的辩护者和推动者了。

青年恩格斯渴望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一个号角，实现英国和大陆激进主义的联合，这使他不仅歪曲了陈述，而且对事实作出误述。青年恩格斯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畸形形象出场，而且错误地断言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学。

在上面引用的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说成是一“派”，而这是对现实的歪曲。青年恩格斯在 1843 年 11 月作出这个断言，但到 1844 年青年黑格尔派运动解散了。<sup>①</sup> 这证明青年恩格斯提到的这一“派”至少是短暂的。更为重要的是，使用“派”这个词来描绘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是夸张的。鲍威尔、费尔巴哈和卢格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以至于不能被归为一“派”，这个理性的运动一年后破裂了。

指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这一“派”同情共产主义也是严重的误导。赫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而鲍威尔和卢格从未成为共产主义者。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意见纷争被青年恩格斯看到了，他写道：“就连这一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当时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他们从未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

“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这种表述是荒谬的。

<sup>①</sup> Toews, John, *Hegelianism*, p. 128.

鲍威尔，抑或费尔巴哈和卢格都从未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因此，青年黑格尔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仅当青年马克思脱离青年黑格尔派时，他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青年恩格斯经历了略微不同的过程，因为他在1843年追随赫斯并采取了这种“决定性的步骤”。但是在1844年和1845年，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成为了合作者，一起撰写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与鲍威尔、费尔巴哈、卢格和赫斯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相分离。青年恩格斯证明，共产主义并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必然产物”，因为他割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联系，以便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础。

最后，上面引自青年恩格斯的这段话包含着谬误。“除了现在已被查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派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经又有另外一大批人，如卢格博士，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期刊《德国年鉴》的编辑；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

这段话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莫泽斯·赫斯是共产主义的早期信仰者，而我此前提到的这个人，使青年恩格斯受到共产主义的洗礼。

为了揭示这段话中其他表述的错误，有必要忆及如下年表：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写出这段话；青年马克思自己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在他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宣告的，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底，第一次发表在《德法年鉴》上。当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与他第一次会面时，青年马克思的脑海中一定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萌芽。事实上，青年马克思在发表于《莱茵报》上的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阐述了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sup>①</sup>因此，在与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会面之前一个月，青年马克思公开声称他不是个共产主义者。此外，青年马克

<sup>①</sup> 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1~296页。

思和青年恩格斯在 1842 年 11 月和 1844 年 1 月之间没有通信，这是青年马克思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的时期。

因此，青年恩格斯 1843 年 11 月的阐述是违背事实的。青年马克思从未告诉青年恩格斯他转向了共产主义，而青年马克思认识到他接受共产主义的这篇文章发表于青年恩格斯在 1843 年 11 月作出断言之后。直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之前，青年恩格斯都没有看到青年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因此，青年恩格斯在 1843 年 11 月所作的关于青年马克思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断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它是一个过于热切的共和主义者的夸张之辞。

同样，认为《德国年鉴》的编辑卢格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也是违背事实的。卢格从来就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当他青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这个期刊共事之后，他和马克思分裂了，卢格仍然是一名共和主义者，而青年马克思追求他的共产主义信念。青年恩格斯在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对他的英国读者提及卢格，是这个充满渴望的共和主义者的夸张表述的另一个实例。

本章的重心在于关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不同解释。其前提是相信这两个人接受黑格尔的不同方式充当了他们之间差异的晴雨表，或者说他们关于黑格尔的不同观点来自于割裂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更深的鸿沟。本章并不直接关注他们与生俱来的智慧和他们的正规教育，而关注他们提出的对黑格尔的不同看法何以构成他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的基础。然而，在这个语境中审视第三方——赫斯如何把握他的个性和才华是有启发意义的。这个第三方的评论，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能增加这个观点的另一个维度，它提供了对这两方面的独立评价。

赫斯这样描述青年恩格斯：“在我们相见之前，恩格斯是个彻底的革命者，但当他离开我时，他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sup>①</sup>

<sup>①</sup> Henderson, W. O.,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1976, p. 18.

甚至可以说这一句话描述了一个冲动的、给人深刻印象的青年人的形象。在与赫斯简短的会见之后，青年恩格斯成了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青年恩格斯不是严谨的人，不是刻苦的人，而是一个热衷于寻求理想的人。

你会很高兴去结识一个人，他属于我们的朋友，尽管他住在波恩，即将在那里开始教书。

他是一个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天才。请准备去结识最伟大的，也许是目前世上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当他在公众场合（在他的著述中与在大学校园中）出现时，他将吸引所有德国人的目光。他远远超过了施特劳斯甚至费尔巴哈。如果我能在波恩，无论他在哪儿讲授逻辑学，我都心甘情愿成为他的热心听众。我一直想拥有一个像这个人一样的哲学教师。只是现在我感到自己在哲学上是一个白痴。但是请有耐心。我还会学到一些东西。

“马克思博士，这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的名字，他还是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24岁左右；但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你能这样设想吗？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而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马克思博士。”<sup>①</sup>

赫斯对青年马克思的赞美是热情洋溢的，但可以明确的是，马克思既是一个教授也是一个学者。青年马克思具有一个学者的全部特质，具有穿透力，周密，关注细节，具有分析能力，谨慎。这种思辨能力与热情的、易变的青年恩格斯不同。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都评论了莱奥、德国历史法学派和

---

<sup>①</sup> Avineri, Schlomo, *Moses Hess: Prophet of Communism and Zionism*, New York, 1985, pp. 14-15.



1841年的普鲁士检查法。构成他们对黑格尔不同洞见的个人思辨能力再次出现在这些著述中。感觉的形式表明自身是意识的个别形式，因为构成他们对黑格尔不同意见与维持他们对这些法学派和思想学派人物的不同观点的是同一个原则。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嘲笑了1841年的普鲁士检查法。青年马克思的攻击是写于1842年却在一年后发表在卢格的《轶文集》上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sup>①</sup>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青年马克思使用黑格尔批判范畴的早期尝试。在这篇文章中，青年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内容与实质的形式证明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专制性质。青年马克思利用内容与实质的概念捍卫新闻出版自由。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将出版自由的实质规定为思想自由，或将理性的实质规定为自由。青年马克思认为理性的行为与其实质相符合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完全是自由的，因为若没有绝对自由，理性就不能使自己的见解符合其逻辑结论。因此，当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限制理性的自由时，当它被设置在理性不能抵达的边界之外时，普鲁士政府认为理性的实质无关紧要。<sup>②</sup>

青年恩格斯在他文章中的策略，是将黑格尔的逻辑用于自由主义的事业。他希望表明黑格尔的范畴何以能被调整，何以能被转换为政治改革事业的武器。

在1842年的这篇文章中，青年马克思证实了两件事情，他将黑格尔解释为批判的黑格尔主义者，而他自己延续了这种批判的黑格尔主义传统。1842年，青年马克思探索并尝试使用本质和表象这些作为推动政治进步主义事业手段的黑格尔范畴，而这是甘斯这一代批判的黑格尔主义者的意义所在。

青年恩格斯对1841年官方法令的回应包含在他的文章《普鲁士

<sup>①</sup>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07～135页。

<sup>②</sup> 同上书，111～113页。

新闻出版法批判》中，这篇文章于1842年7月14日发表在《莱茵报》上。<sup>①</sup> 尽管青年恩格斯在标题中使用了“批判”这个词，但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却没有黑格尔的范畴。青年恩格斯没有将黑格尔主义的逻辑形式用作批判的工具，因而他与甘斯的批判的黑格尔主义学派并不一致。

青年恩格斯对1841年官方法令的攻击是有价值的，或者说青年恩格斯在道德层面上对其加以指责。他认为这个法律是“蛮横的”、“无礼的”和“嘲弄的”<sup>②</sup>。这个法律侮辱了新闻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准则。

青年恩格斯的谴责是有力的，但它是新闻评论方面的。这篇文章不包括任何证据表明青年恩格斯希望或有能力借鉴和尝试作为批判手段的黑格尔概念。

类似的模式在这两个人对历史法学派的评价中得到了证明。青年马克思的这个反应蕴含在他发表于1842年8月9日《莱茵报》上的文章《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sup>③</sup>

从本质上看，青年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抨击重现了甘斯反对萨维尼的斗争。通过将甘斯的传统永久化，青年马克思表明他信奉批判的黑格尔派思想，试图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用作政治进步主义的手段。

青年马克思驳斥了历史法学派的实证性。他拒绝将经验作为合法性的基础；存在的未必是正确的，或者说莱奥的法学未必是正确的。历史法学派是对胡果·格劳秀斯的自然法传统的表述；它也来自于启蒙的经验主义。青年马克思拒绝从约翰·洛克的法律实证主义到大卫·休谟的感觉实证主义的所有实证形式。<sup>④</sup>

---

① 恩格斯：《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462~472页。

② 同上书，466页。

③ 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29页。

④ 同上书，232~233页。

由于捍卫批判的黑格尔主义，青年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性塑造了现实。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复述了甘斯的思想，即法律的演变是历史的，法律体系的变化不反映实在而是历史的结果。不同的法律体系是历史发展被带进存在的形式。历史性是法律的本质。

尽管青年恩格斯没有直接面对历史法学派自身，但他确实面对了这个理论的领导成员之一莱奥。青年恩格斯与莱奥的交战在写于1842年10月却发表在1843年乔治·海尔维格主编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文章《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中得到了简要的描述。<sup>①</sup>

这篇文章是从一个政治评论家的角度撰写的。它悲叹通过宗教授权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王权合法化的尝试。青年恩格斯认为，这种君主专制的宗教神圣化是中世纪原则的回归。

这篇文章提到了莱奥，却没有提到历史法学派。通过暗示，青年恩格斯表明，法学理论也能成为君主政治的法律工具：“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证明意识形态工具、宗教、法律何以作为将独裁理性化的观点而被王权剥夺了。<sup>②</sup>

与青年马克思相反，青年恩格斯没有尝试运用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来抨击普鲁士独裁者、历史法学派或莱奥。更确切地说，他撰写的是一种直接的长篇政论，一种新闻曝光。

青年恩格斯显示了对甘斯抨击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层面的全然无知。与青年马克思不同，青年恩格斯没有任何关于甘斯驳斥历史法学派、萨维尼和莱奥的理论原则的知识。它表明自己不了解甘斯的法律历史性概念，不了解社会是随着时代发展的结构整体这种思想，不了解甘斯对财产本身具有历史的认识。青年恩格斯在他自己对莱奥的攻击中没有运用甘斯或黑格尔的任何哲学方法论。青年恩格斯全然避开了甘斯所有关于解放的方法论，这表明他在哲学上是

<sup>①</sup> 恩格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534页。

<sup>②</sup> 同上书，534~539页。

不成熟的。

最后，本章的主题——确认青年恩格斯在哲学领域的缺陷——来自青年恩格斯自己。青年恩格斯的自我评价是诚恳的自我谴责。1842年7月26日，他给卢格写了一封真诚的自我流露的信，他在那里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的学生存在不足之处。

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很清楚，我还年轻，是个哲学自学者。我所学到的知识足以使自己形成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但是要想有效地、有的放矢地为这种信念去工作，这些知识还不够。我当了“兜售”哲学的人，人们就会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我没获得博士文凭，也就无权探讨哲学问题。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此外，现在我不能过分分散我的时间，因为不久以后，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商。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尝试的结果就说明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富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积极参加本世纪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感到满意了；现在我认为我的义务是学习，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学习，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sup>①</sup>

在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关注他过的双重生活。他认识到当他再次写作时，他必须“署上自己的名字”，同时预料到“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商”。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参与德国进步政治活动是秘密的，隐藏在他父亲公司的名义下。到1842年7月，他一直使用笔名，从未公开声明他自己的信仰，而他暗示他将很快去往英国曼彻斯特，作为合伙人管理欧门—恩格斯的家族公司。在1842年

<sup>①</sup>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7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301~302页。

底，青年恩格斯确实到曼彻斯特管理这家公司直到1870年，或者说直到他50岁。一个从17岁直到50岁的成熟的人，恩格斯花费了大量时间倾注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商，而他在晚上则致力于新闻和研究的业余生涯。直到50岁时，青年恩格斯还是一个秘密的革命者。他不能要求他的家庭接受他的所作所为，以此确立他自己的身份，因而迫使他在午夜的黑暗中隐藏了真实的自己。

青年恩格斯从未接受他自己的建议。这段话的开头一句说：“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而青年恩格斯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认识到他的哲学知识是肤浅的。但青年恩格斯没有“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因为到1842年10月他再次写作，当时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11月，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在科隆第一次会见，这次会见并不成功，而他最先会见的是赫斯，这次会见很顺利；在《莱茵报》的这些联络之后，青年恩格斯动身去曼彻斯特。他从未使自己以必要的时间从事认真的哲学研究，从未获得对主体的精深理解，而毕生在哲学思想上都是幼稚的。

这段话是青年恩格斯对自己在哲学领域或普遍的思想方面缺乏能力的个人认识。他从未在高中毕业，从未进入大学，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而青年恩格斯承认，这些差距使他对哲学或普遍文化研究的把握仅仅是肤浅的。他对黑格尔的洞察是业余的，而他在这个领域的无能，使他在尝试运用黑格尔的哲学以及黑格尔其他领域思想的过程中作出令人惊讶的错误阐述。

本章致力于深入探究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阶段，即1839年到1842年。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个是恩格斯主义——的来源。这两种对黑格尔借用的正相反的不同路径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发展的根源。他们对黑格尔所作的成问题的解读是他们分歧产生的基础。

由于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成因开始于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体的转换。黑格尔的主体是区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的思辨哲学或者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关键。当青年马克思采用了通达哲学的主观路径时，他自觉地打破了思辨哲学的传统。

1839~1842年也表明青年马克思尝试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或者说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与主体相融合。青年马克思对批判的规定可以被归结为如下要素：(a) 运用诸如本质和现象等黑格尔的范畴；(b) 主观意识是运用这些范畴的中介；(c) 主观意识将黑格尔的概念用作研究社会的工具。采用这三个要素的批判，认同政治进步主义，青年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并将其转换为批判当时世界的手段。

恩格斯主义的成因在于青年恩格斯没能接受黑格尔的主观性思想。恩格斯仍然是黑格尔右派的囚徒，他从未离开17世纪这种形而上学传统。晚年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规定是他没能离开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学派的直接结果。

青年恩格斯没有尝试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或者说他没能成功地使主观意识哲学化，妨碍了他尝试黑格尔主义方法论。青年恩格斯没能使主观意识和黑格尔主义的逻辑形式——诸如本质和现象结合起来，而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他就从未创造一种主观的社会批判。

## 第三章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青年马克思熟知黑格尔的最早迹象源自 1837 年。在这年春天，青年马克思寄给他父亲一本诗作，其中一首诗题为“黑格尔。讽刺短诗”<sup>①</sup>。这首诗包括下面这两节：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  
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  
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  
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  
请原谅我们这些短小诗篇，  
如果我们唱得调子惹人讨厌；  
我们已把黑格尔的学说潜心钻研，  
却还无法领略他的美学观点。<sup>②</sup>

在青年马克思 19 岁时写于柏林大学的这首讽刺短诗中，表明他无法忍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他抨击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遨游的乐趣，而他只关注“街头巷尾”的现实。黑格尔也被表述为唯心主义者，一个纠缠在话语迷宫中的人，即使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的声望，但他对黑格尔的批判表明自己“无法领略”他的《美学》。马克思无疑没有接受黑格尔，但他的做法是谨慎的，充满着犹豫。

同一本诗作中还提到马克思写的名为《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sup>①</sup> 马克思：《黑格尔。讽刺短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 卷，735～736 页。

<sup>②</sup> 同上书，736 页。

的幽默小说。<sup>①</sup> 在他 1837 年 11 月 10 日给他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说他写了一篇题为“克莱尔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的将近 24 张纸的对话。<sup>②</sup> 这两本书遗失了，因此了解其中包含的对黑格尔的评述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 1837 年 11 月 10 日这封信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黑格尔思想的研究以及他对黑格尔思想的态度，他在这里写道，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sup>③</sup>。然而，他对黑格尔的深度分析始于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完成于 1841 年 3 月，他以此于 1841 年 4 月 15 日在耶拿大学获得了学位。<sup>④</sup> 当马克思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时，他已经是一个左翼黑格尔派，而他的著述不仅特别批判了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抨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为了恰当地理解马克思在 1841 年对黑格尔体系的态度，有必要概述一下《哲学史讲演录》，并评论一下黑格尔对伊壁鸠鲁、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或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评价的一些细节。

在我评论《哲学史讲演录》的开始，有必要区分在《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中提出的问题与黑格尔思想密切相关的领域以及不密切相关的领域。

## 一、不密切相关的领域

我不打算分析黑格尔思想的全部。《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不是对黑格尔自身的研究，而是对马克思借用或扬弃的黑格尔体系的那些部分的研究。

---

① 马克思：《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 卷，807 页。

② 《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 年 11 月 10～1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13 页。

③ 同上书，15 页。

④ Hillman, Gunther, *Marx Und Hegel*, Frankfurt am Main, 1966, p. 105.



在我对黑格尔的考察中，我将不会提及包含在他的《法哲学原理》和《哲学全书》中的附释（Zusatz）。我的分界点是1841年，马克思在这一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仅仅是马克思在1841年前读到的那些黑格尔的著作被算作材料的来源，而由于附释是1841年后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附加的，它们被排除在本章的考虑之外。

马克思对黑格尔全部著作的理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他对黑格尔的解读体现在他所能得到的文本上，马克思不了解黑格尔的很多手稿；直到20世纪，才能读到这些关键的文本，而这些文本的缺失使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知识产生了严重的缺陷，并影响了他对这位柏林令人崇敬的哲人的看法。

## 二、密切相关的领域

在这本书中，黑格尔仅仅在他与马克思的联系或涉及马克思对他借用或扬弃的时候才会出现。

我们知道黑格尔著作的第一部全集由爱德华·甘斯出版于1833年和1836年。认为马克思熟知1833~1836年汇编中包括的文本是合理的，因为他在1837年写给父亲的信中声称他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我已经指出，在他的《黑格尔。讽刺短诗》中，马克思证明他读过黑格尔的《美学》。然而，因为我想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把握在1841年已经存在了，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将黑格尔的著作限定在本章提到的马克思在1841年具体借用的黑格尔参考文献中。

有一个例外，我将对黑格尔的参考文献限定在马克思在他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提到的那些著作。《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参考文献列出了黑格尔的如下著作：

《哲学全书》，海德堡，1830。

《法哲学原理》，柏林，1833。收入《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全集》第8卷。

《精神现象学》，收入《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全集》

第2卷第2版，柏林，1841。

《哲学史讲演录》，收入《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全集》第14卷，柏林，1833。<sup>①</sup>

我还将提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尽管《逻辑学》或《大逻辑》不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注释中，但他是马克思的一部藏书。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四部分第32卷中是能够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藏书的目录的，而《逻辑学》1841年第二版是马克思的一部藏书。<sup>②</sup>我提出这一个例外，因为《逻辑学》包括对黑格尔的否定性、主观性、方法和发展等概念的章节，若没有关于黑格尔如何使用这些术语的准确概念，充分把握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本章将描述马克思——假定他是现代辩证法的发明者——的两个态度，即反黑格尔主义和亲黑格尔主义。当马克思采取反黑格尔主义立场时，他废止了黑格尔思想的某些方面，而当他采取亲黑格尔主义的立场时，他借用了他赞同的黑格尔思想的某些方面。从赞成黑格尔思想的观点来看，柏林这位令人崇敬的哲人思想的两个路径对青年马克思具有巨大的影响——黑格尔论述创作过程和论述方法的思想。

在下面即将展开的段落中，我将讨论安排在（a）创作的过程和（b）方法方面。

### 三、创作的过程

接下来讨论的黑格尔对生产过程的理解将表明，他将劳动创造仅仅设想为思想的活动。然而，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黑格尔从未质疑思想自身的旅程开始于感觉资料或感性知觉是意识的最初内

<sup>①</sup> 参见《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sup>②</sup> MEGA, Vierte Abteilung, Band 32, p. 321.

容。《精神现象学》的前两章致力于研究“感觉确定性”和“知觉”<sup>①</sup>。此外，《大逻辑》（《逻辑学》）和包含在《哲学全书》中的《小逻辑》的话语逻辑开始于“存在”或感觉<sup>②</sup>，而在《哲学全书》的第三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表明精神的自我实现本身何以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之外。<sup>③</sup>思想和外部世界是共时的，而在精神和内容接踵而至的斗争中，内容立即被精神所吸收，因此它立即失去了自身确定的性质，变得与思想不可分割。这就是黑格尔所指的和存在的统一。

将外部内容作为先决条件，在黑格尔看来，生产过程经历了五个阶段：（1）消费；（2）对象化；（3）异化；（4）再占有；（5）再生产。

在劳动过程的最初阶段，思想沉迷于感觉确定性。个性、外部内容的特殊性，被抹杀了，而感觉被意识所吸收。

意识不满足于仅仅是消费的内容，因为意识是内在的、积极的。对象化是意识将它自己的感觉形式具体化的过程。

新的对象化是立即从意识中异化的。新的对象的产生意味着这个对象与意识是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别就是异化。

由于具有积极的力量，意识试图克服这种异化，因此它再次沉迷于这种新的对象化。再占有涉及的意识活动是，通过接受以往的外化回归自身而否定异化。

在意识的生产过程的最后阶段，它再生产出另一种对象化。再生产的步骤为意识提供了新的内容，而由于意识有一种关于自我展现的内在驱动，它将掌握这种新的内容并产生另一个对象。

思想劳动过程是持续不断的。上面描述的这些阶段有一个周期，

① Hegel, G. W.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1977, pp. 58-79.

②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 V. Miller, Atlantic Highlands, 1975;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 1, trans. William Wallace, Oxford, 1975.

③ Hege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 3.

但这个周期处在永不停歇的螺旋式上升中。意识的本质是一种预言的力量。

劳动过程见证了内容被归于概念。这种归类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内容被消除了，而意味着它在被修改的形式中得以保留。

上面描述的思想劳动过程发生在个人即自我内部。这一系列思想形式被黑格尔描述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自我起源（self-origination）。思想的发展，其诉求绝对知识的长途，在主体的内部发现其开端。

主体是否定性的。据黑格尔所见，主体总是与既定的客体相抵触。主体不仅自我外化，而且它也是永久反对的能量。生产过程也是辩证法的燃火点，因为当主体否定存在着的客体，并因此取代它的时候，辩证法就开始了。查尔斯·泰勒在他论黑格尔的书中将这种生产理论归为“表现主义”。通过这个术语，泰勒指出，黑格尔将主体的世界视为表现，或者说视为意识的体现。<sup>①</sup>

黑格尔将这种思想发展层面称作主观精神。思想的发展最终推进到被称为客观精神的更高层面，他关注自身与诸如社会伦理、法律、政治权利、美学、宗教和哲学等外部化的关联。客观精神是群体意识—集体意识—展现自我的阶段。

黑格尔概述的生产过程的图景将思想表述为自我表现的力量。思想自然是动态的和富有动力的。它表现为“推理”、“驱动”和“欲望”。

在他著作的其他章节中<sup>②</sup>，黑格尔提到思想是观念或概念（*begriff*）的实现。有些黑格尔的译者将“观念”（*notion*）这个词作为“概念”（*begriff*）的英文同义词，而我更愿意用“概念”（*concept*）这个术语。

概念是普遍的。在解释概念的意义时，黑格尔经常诉诸有机的

<sup>①</sup> Taylor, Charles, *Hegel*, Cambridge, 1975.

<sup>②</sup> Hege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 3.

术语，比如种子、萌芽或种属。概念是属于类的或普遍的，它自身在类概念或特殊性中具体化。运动从普遍和抽象到特殊和具体。

然而，运动是内在的，这个过程在概念自身之中。有机体类比的运用是理解概念的关键。黑格尔想将概念描绘为内在趋势，即根据其内在本性展现并因此活跃的一种有机体主义。

思想是目的论的，而当黑格尔使用“终极目的”这个表述时，他再次回到有机体的图景。目的论的过程彰显了目的。正如生命的目的是孕育儿童，因此概念的目的是提出与一定的客体相关的问题。

目的论的过程也证明展现的终结。“终结”这种表述对黑格尔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经常暗示，事实上终结处于开始之中。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黑格尔相信动态的客体，比如概念，按照最初的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或者说其最初的设计包含着终结。黑格尔使用这个术语本身要表达的事实是终结存在于开始，或者说处于胚胎中的有生命的东西将是它最终的结果。

黑格尔主义的这个词汇也包含着另外两种用法，这与他们在自身中是同义语，这两种用法是内在和实质。终结的结果内在于其开端，而终结的实质是其结果的必然发展。

黑格尔提出的目的论解释的重要性在他的《逻辑学》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逻辑学》的第二编致力于主观逻辑的讨论，或概念的理论，或个人的思想强加于外部的形式。主观逻辑的第二节详细研究了概念感知外部的形式：机制、机理和目的性。机制是解释彼此分离的外部客体时所持的适当形式，而机理是解释内在于外部客体自身规律的相关形式。

然而，目的性是解释假定在思想中存在的客体相一致的形式。因为思想自身是目的性的，那就是说，因为思想内在地通向终结，那么任何被思想所吸收的客体都必然被视为通往理念的终结。<sup>①</sup>

黑格尔研究目的论的批判部分产生于题为“目的性”的这一章，

---

<sup>①</sup>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pp. 7-10.

即《逻辑学》第二部第三编第二部分。在这一章中，黑格尔认为，目的性的运动符合三段论的模式，或曰它在普遍、特殊、个别方面起作用。三段论将在本章后面的部分作更为详细的思考，而在这一点上只需要指出，黑格尔将目的论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主体的终结，即普遍；手段，即特殊；以及终结的实现，即个别，或曰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在这里，有必要关注目的性的三段论的第二个阶段，手段，或个别。黑格尔关注包容的行为，关注局部被纳入到整体的行为。<sup>①</sup>

紧接着“目的性”的这一章被称作“生命”，而第二部的第二部分第三章是“理念”<sup>②</sup>。黑格尔完全变革了西方传统的逻辑学定义，而且他不认为这是一套思想的规则，不认为这是认识论。更确切地说，黑格尔将逻辑学重新定义为概念的自我表现，被假定为包含特殊性的概念形式。从这个观点看，不将思想视为感觉材料的被动接受者，而将其视为模式、方法的积极创造者，“生命”这一章在论述逻辑学的著作中是恰当的。

“生命”这一章是恰当地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核心。生命不仅具有一个概念，而且由于它具有概念，这个概念在生命的活动中得到了证实。黑格尔界定了生命的概念，并以如下话语表明生命影响思想的劳动过程：

既然概念是内在的，那么有生命的东西的目的性就应该作为内在的来把握；概念在它之中是作为被规定的、与其外在性相区别的并在这种区别中渗透了外在性的与自身同一的概念。有生命的东西的这种客观性是有机体；它是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完全合于目的，因为概念构成它的实体；但正因此这个手段和工具本身就是被实施的目的，所以主观的目的在它之中便直接与自身融合了。……概念

---

①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pp. 735-754.

② Ibid., pp. 761-774.

是每一个别的、特别的环节的冲动，它产生自身，并把其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扬弃其他外在的环节，以那些被扬弃的环节为代价使自身生成，但又同样扬弃自身，使自身成为其他环节的手段。<sup>①</sup>

生命有机体的劳动过程重述了概念的劳动过程。正如概念包含环绕于它的客体，生命有机体通过将客体纳入其中而重申和增强了这种生产过程。那么，生命是黑格尔逻辑学概念的重要部分，而这种生命有机体是理念得以实现的一个手段。

我对黑格尔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讨论要强调的是概念的作用。概念不仅是一个事物的内部存在，比如生命，而且也是认识的方法。要了解一个事物，就得了解它的概念，因此认识活动取决于一个事物的概念的知识。

但这种生产过程没有停止，因为它继而蔓延到再生产过程中。主观性必然否定新客体，然后是新内容，而这样做是通过扬弃新客体—内容完成的。这种新的外部性为概念所吸收，而概念重新产生了另一个客体。黑格尔描述了一个建立在消费、保留、生产、异化、再占有和再生产等概念基础之上的创造过程。

我对黑格尔的表述强调生产的主观方面，而在这一点上我采用了埃德蒙德·胡塞尔、亚历山大·科耶夫和让·伊波利特的现象学解释。但马克思生活在现象学学派声名鹊起之前，而他对黑格尔的接近是分裂的。一方面，正如在这里所描述的，他将黑格尔的生产理论永久化，而另一方面，他通常将黑格尔的哲学解释为泛逻辑主义的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处理劳动过程的这一章中，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的生产理论，但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一章“对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的批判”中，他将黑格尔表述为泛逻辑主义者。当马克思相信理念是黑格尔主义体系的主体时，他强调柏林这位令人尊敬的哲人的泛

<sup>①</sup>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pp. 766-767.

逻辑主义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决定性的因素是对主观性的安置，要么将其安置在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中，要么将其安置在绝对理念中。

对黑格尔的生产理论而言，时间维度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客体来说，要成为内容，必须使之发展。生成是黑格尔哲学总体性的核心概念，因为概念的自我实现只能在时间中产生。消费和对象化的过程，继而包容新的外部性，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因而是时间性的。

历史性概念处于黑格尔生产理论的核心。如果包含的过程和重新包含的过程将要发生，那么必然假定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图式都是从感觉到绝对知识的螺旋式上升，而历史性是这种革命性上升的先决条件。<sup>①</sup>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不是瞬时的，而必然是连续的。

当描述思想的活动时，黑格尔使用了酒神的宴席这个比喻。提及这个纪念希腊神祇狄俄尼索斯的节日表明，这个肆无忌惮的思想倾向于创造。

#### 知 识

黑格尔的知识论是他的生产理论的反面。使思想自身客观化的方式为知识的产生提供了框架。知识是思想的劳动过程的反映。知识是意识的自我观察。

认知是自我认识的活动，或者说是主观思想在其对象化中认识自身的活动。黑格尔将知识界定为“我”认识“我”，或者说主观思想仅仅能认识一个客体，因为思想已经在这个客体中存在。

黑格尔是现代诠释学之父，相信知识仅能通过自我认识进入存在。当对象化的形式是思想时，它将自身反映到主观思想中，当同样的内容存在于两个客体中时，知识就产生了。所有的知识都是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因为知识是主观思想在其对象化中认识自身的结果，那么知识是自我认识的产物。当这个“我”等于我时，

---

<sup>①</sup> Marcuse, Herbert, *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 trans. Seyla Benhabib, Cambridge, 1987.



知识就是自我认识的产物。<sup>①</sup>

这正是历史性进入这个黑格尔等式的关键。思想的劳动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将《哲学史讲演录》当作将要在本章后面的部分讨论的例子，可知黑格尔试图揭示希腊哲学概念的实质。他的努力是试图在古代思想中寻找当代思想自身的诠释。由于知识是自我知识，黑格尔只能将希腊思想理解为回忆的行为，他必须回忆塑造希腊沉思的思想。任何关于历史过程的知识总是一种回顾的行为。

在他《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这位现代诠释学之父作出了这样的阐述：“米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sup>②</sup> 他的意思是说这只猫头鹰只能看到过去的这天，或者说知识只能在观察过去创作的思想中产生，然后在黑暗中使自身在场。

认知是人类的自我教育。通过获得客体的知识而产生的思想获得了思想在其自身中的知识。通过观察其自我的生产，思想和自我成为对他们的自我能力的认识。

《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是“绝对知识”，它描述了自由何以与人类的自我教育是同义语。<sup>③</sup> 然而，在这一章中，黑格尔没有将哲学史与绝对知识的产生联系起来，而是关注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即使黑格尔改变关系这个术语时，他的主体不再是思想，而是自我意识；同样的方法论支配了思想的发展，而且也调整了自我意识的发展。

意识是感觉的标准，然而，意识具有审视自身的能力，而这种自我审视的力量是自我意识。意识能划分自身：一部分获得了感觉材料，并努力认识其他主体的意识，而自我意识指的是详细检查其自身功能的意识的能力。

对意识的考察通过自我意识进行，将意识转化为自我意识的客

<sup>①</sup> Gadamer, H. G., *Hegel's Dialectic: Five Hermeneutical Studies*, trans. Christopher Smith, New Haven, 1976.

<sup>②</sup>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 Oxford, 1952, p. 13.

<sup>③</sup>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p. 479-493.

体。自我意识并未产生意识，而是获得它的知识，认识到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反映。一种主体关系使意识作为客体，而使自我意识作为主体。

正如思想和存在是统一的，因此主客体之间是统一的。自我意识和意识的统一是“绝对知识”的基础。主观性能够支配客体，事实上它给出一个形式，但自我意识的能力是自我决定的基础。绝对知识意味着自我意识，主体和客体的基本统一，意识到它自身的自我决定的潜能，而这是自由，或者说自由相当于绝对知识。

#### 方 法

黑格尔变革了逻辑学的经典概念，而不是将逻辑学理解为认识论，他将其重新定义为在概念向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些形式。黑格尔将历史性概念引入对逻辑学的重新定义中，而不是将逻辑学描述为理解客体的静态的、机械的程序，他将逻辑学表述为发展着的绝对理念——当概念力求与客体完全统一时产生的形式序列。

在《哲学全书》的逻辑学中，黑格尔抛弃了认识客观世界的四个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的、批判的（意味着康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费希特的哲学）和直觉的（意味着关于上帝的直接知识）。为了达成他自己对逻辑的重新定义，黑格尔需要推翻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和费希特的整个西方逻辑学传统。

例如，在《哲学全书》第一卷《小逻辑》中，黑格尔讨论了理解客观性的不同方法。“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一种态度”是形而上学，而在第 27 段黑格尔写道：“这种思想方法从未意识到主观和客观的对立。”<sup>①</sup> 黑格尔拒绝形而上学的逻辑，因为它将主观性归于普遍性，或认为主观概念全然被吸收到“物质、力量、一、多、普遍性以及无限性”<sup>②</sup> 的范畴中。

经验主义构成了“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二种态度”，而黑格尔批判

<sup>①</sup> Hege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 1, p. 47.

<sup>②</sup> Ibid., p. 62.

了经验主义方法，因为它仍然限于孤立的知觉中。经验主义将自己限于对经验是唯一决定因素的狭隘理解中。<sup>①</sup>

批判哲学以康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费希特的认识论为代表。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没能成功地认识到，在原初层面上，主体和客体彼此对立，但是通过思想的劳动，主体和客体融为一体，概念就形成了。批判哲学产生于上面提到的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中。康德试图批判休谟的经验主义，但并不能缩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距，最终承认“自在之物”始终是外在的，不能为理性所理解。费希特对休谟经验主义的回应是，假设最高的“我”存在，自我意识则出现在“自在之物”之外。费希特对主体—客体分离的回应是，使客观性为自我意识所吸收，通过否认客体的独立性来否定主体—客体的分裂。对黑格尔来说，直觉主义只是相当于取消理性的力量：直觉主义取消了对直接理解虚构赞同的思想。

黑格尔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思辨哲学家，认为思辨哲学优越于上面提到的四个过时的哲学学派。思辨思想自身的显著特色是，有能力创造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结合。思辨思想预言主体和客体具有同一性，相信这种一致的产生是在本质上发展的，它是历史的。

如同黑格尔的全部著作一样，《逻辑学》为单一的、普遍的概念所规定。《逻辑学》的核心主题是绝对理念的发展，或者说主体和客体的完美统一。他关于方法的最完整讨论产生于《逻辑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理念”，这符合黑格尔对《逻辑学》的总体设计。

《逻辑学》是对绝对理念漫长探索过程的说明。它是绝对理念的发展史。但绝对理念的谱系经历了很多形式，或者说绝对理念在达到其自身的实现之前，必然要经过很多阶段。

方法与逻辑是等同的。方法是绝对理念为了实现自身而产生的概念形式。

在绝对理念中概念实现了很多形式的跨越，或曰绝对理念留下

<sup>①</sup> Hege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 1, pp. 60-61.

了一份履历。方法是思想的考古学，是对上升到理念实现的思想的早期阶段的探寻。

方法是概念的自我知识。<sup>①</sup>它是概念对自己功能的自我认识。

绝对理念在趋向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表述了很多规定。存在、本质、内容—形式都是这种表述的例证。绝对理念表述了从其分离到规定的建构，而方法论是对这种理念的功能的认识。

在“绝对理念”这章之前，黑格尔设置了题为“生命”的一章。插入这些章节代表了黑格尔对逻辑的重新定义。

黑格尔认为，“生命”的特征是“推理”<sup>②</sup>。他特意选择推理这个术语，因为他想强调逻辑学的发展特点，或曰逻辑不能与生命相分离，因此它在本质上必然是连续的。

“生命”这一章被分为三节：（1）“有生命的个体”；（2）“生命过程”；（3）“类”。黑格尔运用有机的图景描述这种理念的上升过程。这种有机的图景突出在逻辑的历史或一般思想史中无休止持续发展的主题。<sup>③</sup>

“生命”这一章，使用了推理这个术语，旨在表明逻辑是内在之有，理念是由目的性支配的。

由于历史性是存在的预设，那么方法论必然也反映永久的变化。方法论是概念内在发展到理念的映射和写照。

方法是关于现实何以被理解的理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内部，方法等同于科学的哲学。黑格尔拒绝形而上学的方法或科学，因为它没有给出对主观性的承认，他否定经验主义的方法或科学，因为它没有发展到概念的水平。方法是一种科学，因为它是思想将设计强加于现实之上的特殊策略。后面的篇幅将表明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方法的依赖，但马克思没有提出一种揣摩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提出了作为社会科学的解释逻辑的方法。

<sup>①</sup>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p. 826.

<sup>②</sup> Ibid., p. 763.

<sup>③</sup> Ibid., p. 772.

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论具有一系列的特征，它们是：1) 有机体；2) 总体性；3) 整体和部分；4) 归纳；5) 发展理论；6) 功能解释。

### 1) 有机体

黑格尔用来描述辩证法实质的模式是一种有机体。生命是有机体的内在特质，而这意味着有机的方法以活动、欲望和驱动为特征。有机体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展，并使世界环绕在其左右。它们有吸收能力和借鉴能力，因为它们扬弃和否定了环绕它们的外部世界。

有机体由自身、本质和目的填充。它们表明内在压力和推动它们走向终结的目的在其萌芽时就存在了。

这种有机的方法是全部黑格尔主义体系的预设，或者说有机的解释是黑格尔创作的全部著作的基础。这种倾向总是从经验到绝对理念。由于绝对理念被理解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他的全部科学研究的倾向都是从知觉上升到自我决定。这种有机体发展的终结总是自由，或自我决定。

### 2) 总体性

有机的方法论将自身实现为总体性。黑格尔使用了体系解释。他没有将现象解释为孤立的或特殊的存在，而是将其解释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一个知识的客体成为一个系统，例如，哲学史的每一部分都是相互衔接的，即历史是一个完整的共同的整体。

体系化方案是黑格尔对科学定义的核心。正如他变革了逻辑的意义，他也变革了科学的意义。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科学指的不是与真理相符合的理论，科学并不意味着在外部客体及该客体的心理表征之间逼真的建构，或对自然法则的揭示。更确切地说，科学的辩证理论认为，在特定的知识领域内部，每个研究方面都能在总体的体系内部得到统一。

《逻辑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是对思想原则的系统表述。它开始于存在，或者说开始于由知觉环绕的本质，而终结于绝对理念。有助于逻辑发展上升的每一步，都作为逻辑发展的表象和

推动者，继而上升到绝对理念。这种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在这里，总体对部分施加影响，而部分对总体加以支撑。

### 3) 整体和部分

黑格尔的全部解释都是综合的，而它们都来自于整体和部分的模式。正如人体的单个器官都附属于人体并服务于人体的目的，因此总体的特殊性为整体的目的所吸收。相互影响是整体和局部之间关系的特点，因为部分与整体协调一致，而整体是部分的总和。

综合的方法论假定集体性的存在。个体自身具有综合的实质；它们被认为是具有独特行为模式的集体。集体成为客观的力量或发展为必要的运作模式。对自我保护和自我再生产而言，客观总体性的原则之一是必要性。对客观总体性的行为的解释基于功能推理，或曰总体的部分往往采取行动，保护系统或提升系统的功能。

### 4) 归纳

归纳的理念是综合的方法论所不可或缺的。归纳和扬弃这两个词同义，它们都涉及有机体合并和吸收的倾向，而它们最初是在有机体之外的。归纳等于摄取，事物的消耗不是有机体的原初部分，但一旦被摄取，它就立即成为整个机体的一部分。事物被整体所摄取并不是被整体所消灭，即使它的功能在总体中可能发生变化，但它仍然被保留下来。

### 5) 发展理论

在《逻辑学》的第二部分，“概念”和“推论”这两章涵盖了黑格尔对他的发展理论的清晰阐述。

辩证法是首要的发展力量，而我将选择辩证法作为逐步发展的独特推动者的那些特点。

主观性提供了个性或自我。尽管马克思将黑格尔解释为一个泛逻辑主义者，但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思想需要自我以便被激活。个性是辩证法表达自身的模式。由于主观性总是站在历史总体性的反面，由于它是作为区别于“他者”的“我”而存在的，主观性通常是一种批判的起因，一种使他者改变的力量。

否定也是独特的发展动力，因为否定废除了存在着的历史事物，因而引起了改变。否定是一种建立确定性的方式，因为通过否定的过程，两个事物或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边界建立起来了，否定产生了一种确定性，划定了个性的边界。

否定是排除异化的工具。通过其个性化的创造，否定排除了他者，或者说对他者的排除成为一个事物自己独特性或在场性的基础。他者是规定性的预设。

由于上面指出的原因，否定是对抗的来源，或者说否定对于规定性来说是必要的。对抗是一种矛盾的力量，而对抗总是试图推翻其对立面，因而它是修正和发展的手段。

确定性往往是否定的结果，但确定性是暂时的。矛盾辩证法的动力确保规定性为他者所扬弃，或者说否定是历史的源泉。<sup>①</sup>

发展的动力被加诸在个别性中得到和解的普遍和特殊的矛盾之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是思想的特性，是判断产生的基础，而判断是推理的一种机能。<sup>②</sup>

对黑格尔来说，概念是普遍的，但概念不能被纳入全部的现实中。一个事物自身的特殊性往往处于普遍之外，而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是思想的无可辩驳的条件。判断的机能致力于普遍和特殊之间的和解，而个别性是这种调解努力的结果。个别性是普遍和特殊的综合。

要想产生绝对理念，思想必须超越推理的阶段。要想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有必要以这种产生的理念克服普遍和特殊之间的矛盾。普遍和特殊之间的对立或相反，是推动事物发展前进的另一个动力。

黑格尔运用普遍和特殊的对立来分析总体性的功能。由于普遍和特殊的对立是逻辑的特性，如果不将其理解为普遍和特殊的辩证

<sup>①</sup>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pp. 599-605.

<sup>②</sup> Ibid., pp. 622-641.

综合，认识社会总体性乃是不可能的。黑格尔的功能主义理论建构在内在的有机体和目的的预设以及上面提到的所有形式的否定性理论的基础之上。

#### 6) 功能解释

功能解释是对保护和维持总体性的说明。例如，对这两个主题存在而斗争的功能是国家的基础。对于认识而言，致命的打击是被静止，因而必须确立道德命令，国家是这种道德命令的主要表述者。对于认识而言，战争履行了一种功能运作，因为它是国家发展的中介，或者说主观精神的产生是迈向哲学的第一步。

可以在《哲学全书》的“导论”中找到黑格尔对功能主义的阐述，在这里，黑格尔写道：

哲学的每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整体，一个自身封闭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这个圆圈里是以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要素而存在的。单个的圆圈在自身中就是总体，所以也打破他的要素的界限，而建立起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整体因此表现为一个由许多圆圈组成的圆圈，在这许多圆圈之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必然的环节，以至于它们独特的要素组成的体系构成了完整的理念，而这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个别的环节之中。

构成一门特殊的科学，需要多少特殊的部分，这是不确定的，因为一个部分不仅必须是一个孤立的环节，而且要成为真理，本身必须是一个总体。因此，哲学这个整体就真正构成了一门科学，不过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由许多特殊的科学组成的整体。<sup>①</sup>

关于黑格尔方法的这种概述对理解他关于哲学体系的科学定义而言是重要的。在这个“导论”中，黑格尔通过规定哲学体系的科学，开始了对哲学体系的科学研究。他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哲学体系的研究对象？

<sup>①</sup>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pp. 20-21.



科学的首要特性是获得一个结果，一种理念，而哲学体系的理念是绝对知识。每一种科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演讲录》，都具有一种理念。哲学体系的科学想要描述思想何以上升到绝对知识，而哲学体系的每个部分都使自身实现这个目的。为了使之成为一种科学，必须采取体系的方法。

对哲学体系的科学作出规定之后，黑格尔列举了他的研究被划分的三段论阶段。《哲学全书》分为三篇，《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每一篇都代表了三段论的一个独特阶段。在《逻辑学》或曰《小逻辑》中，黑格尔表明思想是先行的。尽管思想和感觉当然是同时产生的，但作为能量的思想要提升为理念，因而概念是普遍的。《自然哲学》代表了三段论的特殊阶段，即概念的普遍性的矛盾。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指出，自然是区别于思想的独立的存在。源自思想的自然的独立性为思想提供了一个“他者”，而正是这个“他者”使思想必然将精神上升为绝对理念。知觉具有其自身的存在，但它瞬间就被吸收到思想中，成为与思想不可区分的存在，正如思想开始于其诉求理念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哲学》是三段论的第三阶段即和解的时刻：《精神哲学》是普遍和特殊之间融合的时刻，它产生了精神，或曰它诉求绝对知识的思想发展。《精神哲学》表明哲学体系获得了其结果，因为“导论”明确指出，科学的结果是绝对理念，而这个哲学体系的三段论阐明，这些阶段导致了这个结果的实现。

《哲学全书》这个普遍的三段论——逻辑、自然、精神，在三段论的每个独特篇章中都得到了复写。《逻辑学》独特的三段论是存在、本质和概念，《自然哲学》独特的三段论是机制、机理和有机体，而《精神哲学》独特的三段论是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此外，这些独特的三段论中每一个自身又再分为微观三段论。例如，在《精神哲学》中，主观精神的独特的三段论被分为由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构成的微观三段论。三段论是黑格尔方法论变革的动力，而这种三段论在从一般形式到微观形式的过程中重

述自身。

现在我将尝试表明这种方法论是如何在《哲学史演讲录》中得到复制的。《哲学全书》是黑格尔主义方法的范本，而《哲学史演讲录》只是对这种方法论的复写。然而，在继续描述这种复写之前，首先有必要界定的是，黑格尔以什么来辨别哲学和哲学史。

哲学是对思想的追忆，对思想产生的体系化追忆在时光中穿梭。由于将时间作为风帆，思想得到逐步体现，而哲学是对这些思想连续外化的理解。<sup>①</sup>

这种逐步体现的在场意味着哲学必然是历史的，而哲学的思考就意味着历史的思考。<sup>②</sup> 由于思想散发出无休止的公式化序列，而这种思想是历史的，除非人们相信历史，否则不可能洞察到思想的实质。

黑格尔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揣摩所有此前的思想建构，而他只能通过对历史的书写来完成此举。

从这个观点来看，自然哲学并非对永恒真理的研究。哲学并不希望获得永不改变的普遍意义。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部分的“导论”中，黑格尔以这段话阐明他的主题：

但人们在某个时代内部并不只是作一般的哲学思考，而某一特定的哲学是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民族内部的。而这种哲学思想或观点具有的特性，也是那种贯穿在民族精神的一切其他历史方面的同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与其他方面紧密联系并构成它们的基础。

这就是哲学在各种不同的形态中的地位。由此可以推知，哲学与它的时代密不可分。因而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精神实质的知识，并将这个精神实质作为它的对象。<sup>③</sup>

---

① Lauer, Quentin, *Hegel's Ide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1971, pp. 33-34.

② Ibid., pp. 31-32.

③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Nebraska, 1995, Vol. 1, pp. 53-54.

哲学获得了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形式。这些思想形式是对某个历史时代的表达，它们反映其所处时代的某种政治的、科学的、宗教的、艺术的条件。然而，每个受条件制约的总体都具有某种目的，因为它被纳入另一种历史形式中。每个有机的整体都被更高的结构所扬弃，因此，每个总体都有助于思想或精神的螺旋式发展。

历史描述具有两个方面，即通俗易懂的方面和深奥难懂的方面，或曰外在的方面和内在的方面。通俗易懂的、外在的历史解释可以说明在其年代学环境中的思想总体性。对哲学史通俗易懂的研究则说明有机体形式的现实状况，说明它们与政治或学术环境方面的关系。

深奥难懂的、内在的解释，旨在阐明哲学有机体的内在发展方面。对哲学总体性内在特质的分析，引发了对其内部一致性的讨论，一个思想体系的内部网络具有不同的部分，比如科学、宗教或内部连贯性问题。

有了这些术语，现在我们就可以描述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全部设计。在这一点上，本章基本上关注黑格尔关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怀疑主义的观点，因为本章后面的段落将讨论青年马克思自己对这些哲学家和这些学派的分析，从而比较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对这些主题的论述。正如我着手对黑格尔的全部重建——它们在三段论中展开——所作的概述，这里我将暂停，并指出三段论的三位一体分支即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斯多亚和怀疑主义是相关的，或曰这些个人和学派思想的逐步体现与精神的发展过程是相关的。

哲学的历史开始于古希腊，因为自由是哲学诞生的先决条件。东方世界不了解哲学，因为不了解自由的主体性。由于喜好专制统治，在东方世界，只有君主是自由的，而他的所有臣民都是顺从的。在东方世界，个人在国王的专制统治中淹没了自己的身份，主观性

消失了，因此，自由思想和哲学不能得到发展。<sup>①</sup>

根据黑格尔的体系，包含在全部哲学史中的一般三段论假定如下三个分支：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sup>②</sup> 古希腊时期发现了理念的意义，经院哲学家关注神圣的世界，而现代哲学家对概念全神贯注。

这个一般三段论的每一部分又将自身分为特殊的三段论，或曰总体的圆圈内部有小圆圈。古希腊的世界采取了这种三元的设计：（1）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2）罗马世界的希腊哲学；（3）非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以如下方式描绘这些圆圈：1）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以具体理念的胜利为特征；2）罗马世界的希腊哲学以科学和教条主义为标志，而教条主义是以单一原则主导思想形式的整个体系的方法；3）非柏拉图主义使思想回归于纯粹的普遍性。<sup>③</sup>

但即使这些特殊的三段论也被分为微观的三段论。罗马世界的希腊哲学特殊的三段论将自身细分为微观的三段论，这个微观的三段论分为三部分：（1）斯多亚主义；（2）伊壁鸠鲁主义；（3）怀疑主义。三段论的这一翼是青年马克思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攻击黑格尔的靶子，这三个思想学派，特别是伊壁鸠鲁主义，被青年马克思作为博士论文的内容。由于我想要完成对黑格尔三段论方法论的概述，特别是他对现代思想的理解，因为他关于启蒙和德国批判哲学的观点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将暂时绕过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三段论。我将首先讨论黑格尔对现代思想的理解，接着再回过头来分析黑格尔何以相信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微观三段论。我不会讨论中世纪的思想有机体，因为它与我思考的主题无关。

---

①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Nebraska, 1995, Vol. 1, pp. 117-119.

② Ibid., p. 109.

③ Ibid., pp. 161-164.

现代哲学也由特殊的三段论构成。三段论中的第一个是：“现代哲学最初的阐述”，这是弗兰西斯·培根和雅各布·波默的经验主义研究；三段论中的第二个是“有思想的理解”，但这部分自身又由一个三段论组成：（1）首先是勒奈·笛卡儿和巴鲁克·斯宾诺莎；（2）其次是约翰·洛克和托马斯·霍布斯；（3）第三个是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他分析了“有思想的理解”之后，黑格尔插入了名为“过渡时期”的一节，基本上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概述。接着他结束了现代哲学特殊三段论的第三部分，即他称作“近代德国哲学”的这部分，而这是对弗里德里希·雅各宾、伊曼纽尔·康德、约翰·费希特以及弗里德里希·谢林或一般批判理论的解释。就本章的意图而言，论述现代哲学的三段论是重要的，因为黑格尔在其中表述了他关于唯物主义、经验主义以及一般启蒙的思想。

基本上开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对现代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评价黑格尔启蒙思想的最佳方法是将其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黑格尔思想的积极方面，另一个是其消极方面。

在积极方面，黑格尔将笛卡儿视为现代哲学之父，因为当笛卡儿写“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将主观性理念嵌入现代西方思想中。这个提问的方法论标准为笛卡儿提供了将主观性确立为存在之无可争议的预设手段。

启蒙的另一个积极特征是为培根、洛克和大卫·休谟所再现的经验主义。黑格尔认为，经验主义在中世纪经院哲学思想之后的16世纪复兴。16世纪的皮埃尔·伽桑狄的著作使伊壁鸠鲁的原子主义再生，但洛克和休谟是现代经验主义的巨匠。黑格尔向洛克和休谟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坚持了笛卡儿的主观性思想。此外，黑格尔发现他们是杰出的思想家，因为他们发展了知觉这个概念。黑格尔认为，尽管外部事物为自我意识的活动所需要，但对“自在之物”的沉思是一项没有结果的事业，因为外部事物与思想的不可分割开始于自我意识与“自在之物”相联系的时候。然而，洛克和休谟对知觉和经验的审视开启了现代思想的新视域，是探索物理世

界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启蒙时期的自然科学发展是洛克和休谟思想发展的直接结果。

在消极方面，黑格尔觉得，笛卡儿、洛克或休谟都没有与主观性思想相结合。尽管方式不同，但笛卡儿、洛克和休谟都使概念依赖于外部世界。笛卡儿将数学视为完美的科学，而洛克和休谟从未离开对知觉的把握。这三个人都相信主观性的优先性，但其中有些人将主观性拘泥于概念中。

启蒙运动是一种泛欧洲现象，而黑格尔认为，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种理性精神是对这场大陆文化运动的主要贡献。德国仍然是精神满足的来源，而英国和法国是启蒙的经验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创造者。启蒙运动是对英法经验主义和自然科学以及德国新教或德国精神的综合。

费希特和康德体现了德国启蒙的实质。作为马丁·路德的继承者，尽管程度不同，但他们都将理念的来源定位于思想而不是知觉。他们改变了理念的出发点，因为他们使之从认知的结果转向精神源源不断的自我产生。

费希特和康德开启了批判哲学，因为他们都批判了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也都开启了对思想范畴的批判审视。康德对思想范畴作出了最严谨的探索，但他坚持理念和“自在之物”之间的区分。由于认同“自在之物”从未被认识的观点，他从未思考过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而往往接受它们的二元论。

批判哲学在费希特手中遭到另一种默认。在费希特看来，孤立的自我是精神的力量，或者说他否认外部事物。费希特消除了矛盾的力量，即意识何以通过摄取“自在之物”而克服矛盾的力量。为费希特所实践的批判哲学声称主观性具有潜力，但这样做就降低了对立的辩证力量。

黑格尔的批判哲学版本与康德和费希特的版本都不同。黑格尔批判了康德和费希特，并非有兴趣提供对牛顿学说的科学验证，而要确立思想的自我决定。尽管方式不同，但康德和费希特都主张主

体和客体分离，而他们对思想的批判方法都取决于这种区分。相反，黑格尔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黑格尔的批判理论版本是非康德式和非费希特式的，因为黑格尔批判任何分离思想和存在的尝试，或者说他否认同一性哲学。

由于对黑格尔方法作出这种简略的概述，由于对他关于 16 世纪、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观点加以粗略的理解，现在有必要回到他对希腊哲学特别是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评价上去。引自《哲学史演讲录》的一段长文对此有益，因为它概述了黑格尔对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特殊三段论及其三个运动——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罗马世界的希腊哲学以及非柏拉图主义——的把握。

我们从思想开始，不过是从完全抽象的、在自然形式或感性形式下的思想开始，一直推进到规定的理念为止。这个时期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始，直到哲学的发展，以及哲学的完成为一个自足的科学整体。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就是以往一切哲学的统一。柏拉图已经开始了这种统一古代哲学的工作，但他并未完成；他的理念是一般性的。新柏拉图主义曾被称为折衷派，而柏拉图则被认为完成了统一的工作；但他们并非折衷派，而是有意识地看到了统筹各种哲学的必然性与真理。

具体的理念既然已经实现了；这个理念于是在对立中自行发展、自行完成。所以，第二个时期就是哲学体现为不同体系的时期。一个片面的原则被发挥成一种整体的世界观。每个方面对另一方面而言都是一个极端，都自成一个总体，这便是斯多亚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的哲学传统；怀疑主义则形成了对以上两种学说的独断论的否定。而其他的哲学都消失了。

第三个时期是肯定的，它取消了对立而融入一个理想的思想世界、神圣的世界。在这里，理念发展为全体，但缺乏主观性或无限

的自为性。<sup>①</sup>

在黑格尔描述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发展的上述段落中体现出了三段论的形式。第一个时期覆盖了从爱奥尼亚学派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发展过程，包括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及至亚里士多德达到高潮。在这个时期，发现了理念的普遍性，但没发现主观性的个体。对理念普遍性的发现可以对照三段论的第一阶段，即一般性阶段。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试图表明古希腊和罗马思想何以发展到辩证的水平。

由于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现了思想的普遍性，必然要以主观性原则否定这种普遍性，而这种否定是由罗马世界的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实现的。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的力量在于他们发现了主观性，但他们的缺点是信奉经验主义。

非柏拉图主义构成了这个辩证法循环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和谐一致的时期，这时普遍和特殊融入新的综合中。这种综合并非结束，因为它很快就分化了，并开始了另一个循环。设想黑格尔辩证法的最佳路径是将其想象为自我扩张的螺旋式循环。非柏拉图主义的缺点是缺乏主观性原则，而这是在现代哲学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 17 世纪实现的。

在古希腊哲学的辩证运动内部，黑格尔认为，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些学派是衰落的例证。尽管它们都是对罗马文明的表达，但这些学派代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达到顶峰之后古代哲学的衰退。这些学派没有宣称新的解放理论，没有对自由作出新定义，而只是有助于古典世界的崩溃。

黑格尔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判断揭示了

---

<sup>①</sup>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Nebraska, 1995, Vol. 1, pp. 163-164.



他处理主观性问题的方法。在他看来，主观性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否定的。

主观性自身是辩证法的必要组成部分。个性是否定的力量，而这种矛盾引起了辩证法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主观性因素完全证实了主观性原则，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学派是积极的。

然而，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想证实的是抽象的主观性，是倒退的步骤。抽象的主观性将个人视为作为原子的“我”，而“我”完全离开了国家、政治和道德共同体。

黑格尔对抽象主观性的拒斥是他从未发展为鲍威尔和马克思的批判哲学类型的原因之一。为了浮现鲍威尔—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形式，有必要使主体站在世界之外，然后再对其加以判断。

鲍威尔—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版本基于思想和存在的断裂。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哲学公式认为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黑格尔的批判指向康德和费希特那种哲学，而鲍威尔和马克思大概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是有差别的，他们否认同一性哲学。

在黑格尔看来，积极的主观性是一种与国家、政治和道德共同体具有共生关系的个性化理解力。这种相互关联是思想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同一的基础之一。如果哲学与世界交织在一起，那么理念和现实之间就没有差别，这样理念就不能判断现实，因为现实是理念本身。因此，尽管黑格尔发现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对主观性的捍卫是古希腊—罗马思想发展的关键步骤，但他还是抨击了这些学派，因为他们严重地歪曲了主观性理念。

除了拒斥抽象主观性之外，黑格尔还发现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论者关于幸福的理念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尽管它们对幸福的定义不同，但这些学派都认为幸福是一种个人舒适安宁的状态。斯多亚学派认为，生命应当以符合自然的方式度过，因为遵循自然的支配可以消除痛苦和创伤。伊壁鸠鲁将幸福称作安宁，因为完全没有焦虑使一个人的生活远离不适。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

义和怀疑论者关于幸福的处方也致力于削弱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任何结合。由于人们确信这些学派的道德教化避免了个人和城邦之间的统一，这种道德标准因而导致了隐遁。

这种经典的幸福论模式是黑格尔所反感的。它们是抽象主观性的另一个结果，因为它们不鼓励个人参与社会道德世界，而支持其退出公共参与。在实践活动方面，黑格尔以道德责任取代了伦理的幸福。

根据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某个人成为道德共同体的一部分时，他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由于拥护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将人规定为政治动物，因为他意识到，仅当主体与他者相结合的时候，主体才能获得普遍性。政治在本质上是道德的。

正如黑格尔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理解揭示了他对主观性的态度，因此他对这些学派的评价反映了他对待唯物主义的立场。《哲学史讲演录》将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写入独断主义的标题下，而怀疑主义被认为具有不同的原则，它们与智者学派有很多共同之处。

黑格尔以如下方式规定独断主义：

第二个方面，与思维对立的一方是特定的事物本身，是个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的感觉、知觉和直观。这就是斯多亚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是片面的，如果将它们绝对化了，就成了理智的知识。抽象思维在它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特殊性处于思维之外，必须就其本身去把握，并把它当作一个原则；因为特殊性有绝对的权利对抗抽象思维。<sup>①</sup>

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是独断主义者，因为它们专注于现实、唯物

---

<sup>①</sup>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Nebraska, 1995, Vol. 2, p. 236.

主义这个方面，并使之变成普遍的原则。他们相信，思想是知觉的反映，而这违反了思想自我决定的辩证原则。依赖于观察将精神归约为理解的层面，斯多亚主义从未将辩证法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正如我此前所指出的，《哲学史讲演录》讲述了理念自我决定的思想提升，而从这种内在进程的观点来看，斯多亚主义遏制了这种思想的进程。

斯多亚派相信物理学，或者说他相信适用于世界全体人民的自然法则，而自然权利理论是对这种信仰的发展。黑格尔反对斯多亚派的自然权利理论。首先，自然权利理论将政治权利问题置于自然领域，而黑格尔觉得政治权利属于道德领域。这是斯多亚为物理学所奴役的又一个例证。其次，自然权利理论在18世纪导致了卢梭的错误思考。自然权利理论为平等和民主概念提供了理由。黑格尔不仅反对卢梭，而且反对所有的平等主义和民主的意识形态。

第二种独断主义者，伊壁鸠鲁派，是早期希腊原子主义、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拥护者。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的原子主义风格具有某些不同的特征，而黑格尔以如下方式描述这种独特性：

至于原子的形状和大小，或曰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他的说法只是一种任意的虚构。由于重量，原子也具有一种运动；但这种运动的方向稍微偏离直线。伊壁鸠鲁认为原子有偏斜运动，因为它们可能会相撞，等等。这样便产生了特殊的集合和组成，而这就是事物。<sup>①</sup>

黑格尔的评论已经过去了。他没有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完全垂直降落作出比较。马克思比较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但黑格尔没有。黑格尔没有质疑伊壁鸠鲁的原子

---

<sup>①</sup>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Nebraska, 1995, Vol. 2, pp. 290-291.

是否存在于思想之外，或它们是否为思想所决定，而马克思这样做了。换言之，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成为马克思离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决定性观点，或者说它是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能够产生的实质所在。我在这里简要地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差别，我将在讨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时候对此作更广泛的分析。

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基础是，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已经确立了。唯物主义处理外部世界的构成问题，而他断言外部世界最终将还原为物质。经验主义更富有认识论意义；它质疑关于理念的起源问题。经验主义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研究方法，如果研究者想从其实验中获得充分的根据，他就必须采用这种程序。

在认识论层面，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是“自然哲学”的拥护者。<sup>①</sup>而这意味着哲学来自于知觉，或根本没有哲学。“自然哲学”是黑格尔用来说明哲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效的术语。要想成为哲学，理念必须离开思想，或曰理念必须由自我意识产生。因为只有这样，自我意识才是自发的。虽然黑格尔认为哲学在他的定义中是辩证的，但他断定伊壁鸠鲁的理念出于理解的极低水平。此外，自然哲学与关于自然的哲学不同。在关于自然的哲学中，精神也提供自然能被理解的方法。“自然哲学”是一种认识论的方案，它试图解释理念何以产生，但关于自然的哲学是理解自然如何运作的模式，或曰关于自然的哲学指的是如何认识自然的理论。

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低估在引自《哲学史讲演录》的这段话中得到了概括：

上面所说的外部事物的图景与我们的感官会合的中断，是错误的根源，这种中断的根据就在于灵魂是由独特的原子构成的，而原子与原子之间又为虚空所隔开。我们不想再纠缠于这些无谓的事物

---

<sup>①</sup>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Nebraska, 1995, Vol. 2, p. 299.

了；这都是些空话。我们对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不能有什么敬意，毋宁说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思想。<sup>①</sup>

尽管对伊壁鸠鲁作出这些抨击，黑格尔还是意识到他对西方思想具有持续的影响。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成为西方传统的恒久特征。尽管它们在整个中世纪被忽略，但它们在18世纪英法启蒙运动中重新起到了塑造的作用。

洛克和休谟是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后裔，而伊壁鸠鲁思想的缺点也能在英法启蒙运动中找到。启蒙运动的这个分支从未发展到超越理智的水平。

伊壁鸠鲁对安宁的寻求，以及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使他拒斥所有迷信现象以及扰乱人类宁静的宗教的任何方面。保护人类安宁的渴望使他否定任何可能毁坏人类幸福的宗教信仰。从幸福论的基础来看，反宗教的偏见被注入伊壁鸠鲁的哲学中。<sup>②</sup>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伊壁鸠鲁否认神的存在。

鉴于黑格尔关注独断主义特别是伊壁鸠鲁版本的缺陷，他强调怀疑主义的积极性。怀疑主义和独断主义的最大差别来自于这个事实，即怀疑主义在思想中找到其依据，而独断主义从知觉中推断其依据。独断主义仍然沉浸在物理世界或物理学中，而怀疑主义则表达了自我意识的原则。<sup>③</sup>

怀疑主义发现每个决定都要触及矛盾，因而否定是理论的来源之一。怀疑主义将对立的理念引入哲学，并使历史作用引发辩证法的一个方面。<sup>④</sup>

怀疑主义将否定性理念引入哲学，却未将综合的理念引入哲学。

---

①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Nebraska, 1995, Vol. 2, p. 300.

② Ibid., p. 297.

③ Ibid., pp. 329-332.

④ Ibid., p. 330.

为了使辩证法存在，否定必须取消一个事物，但在这种矛盾发生之后，综合必将产生，或曰被取消的事物必将被纳入更高的决定中。怀疑论者指出矛盾是辩证法的一端，但从未指出综合是辩证法的另一端。<sup>①</sup>

怀疑主义与主观性一致，却与独断主义不一致。在黑格尔看来，怀疑主义反对任何决定性和绝对确定性，而斯多亚、伊壁鸠鲁与物理学的独断主义有关。

黑格尔写出对怀疑主义的好评，因为怀疑主义对他的思想有影响，或者说黑格尔完成了怀疑论者的事业。在怀疑主义假定否定性存在的地方，黑格尔通过增加综合的存在而实现了辩证法。怀疑论者创立了 U-P 公式，而黑格尔通过增加“我”而实现了这个公式。

怀疑论者和斯多亚派都没有发现辩证法，他们只是发现了正相反的力量，怀疑论者是在思想领域找到的，而斯多亚派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的。他们都通过使矛盾抵达最后的阶段而完成了他们的努力，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他们都没有实现同一性哲学。

智者学派也是自我否定性方面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智者学派是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先驱，因为他们都使“我”进入主要原理中。自我的否定性方面表现出“我”从道德共同体中隐退。黑格尔将雅典的衰落归咎为智者学派的贡献。黑格尔对智者学派如何导致古希腊世界的崩溃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说到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古希腊世界之所以腐化的深层意义，并且不妨指出那种腐败是使自己获得解放的主观性，我们看到主观性在各种方面发生。思想这种内在的普遍的东西威胁了希腊的美的宗教，个人的热情和放纵威胁了国家的宪法。在一切事情中理

---

<sup>①</sup>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Nebraska, 1995, Vol. 2, p. 231.

解自己和表现自己的主观性，威胁了整个直接的局面。因而思想在这里表现为腐败的原则，即实体的道德腐败；这是因为它促成了一种对峙，并在本质上使各种理性原则抬头。<sup>①</sup>

黑格尔在1807年《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的自由”这一章阐述了相似的主题。这一章的副标题是“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sup>②</sup>。

伊壁鸠鲁不包括在这一章中，尽管在这些页面上，黑格尔指出，抽象的个性是“苦恼的意识”的温床。这个独立存在的“我”导致个人的孤立，导致个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而这种隐遁是“苦恼的意识”或离开城邦的主体形成的原因。

正如黑格尔强调了智者学派抽象主观性的破坏性倾向，他也强调“智者”或“智慧的人”缺乏社会榜样的行为。“智者”的行为范式是有缺陷的，因为智者学派将私人看作自身获得了自我满足的美德的典范。黑格尔认识到，智者学派对雅典文化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具有重要贡献，但黑格尔反对将“智者”描绘为英雄。将自己从历史的潮流中孤立起来的单一个人不是英雄。亚历山大大帝、恺撒、马库斯·奥里利厄斯是历史的伟人，因为他们是“理性的狡计”的使用者，而不是精神世界的否定者。

黑格尔对“智者”的估量影响了他对苏格拉底的评价。这位雅典的天才牛虻不是一个问题，而黑格尔提出了对苏格拉底审判即雅典城邦的伦理实体与苏格拉底个性之间冲突的冗长讨论。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以我引用的如下段落概述了柏拉图的老师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根据雅典法律，或者说根据绝对国家的精神，苏格拉底所做的

<sup>①</sup>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 Sibree, Buffalo, 1991, p. 267.

<sup>②</sup>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p. 119-138.

这两件事情都是破坏这种精神的。在我们的宪法中，各个国家的共同原则是一个较强的共同原则，但它听任个人自由地活动，个人对普遍原则不能是那样危险的。因此，当这个作为一切事物的根据的公共宗教趋于瓦解时，对雅典国家来说是一种颠覆，因为在我们这里，国家是一种独立的绝对力量。灵机也是一种有别于公认的神灵的神；它与公共宗教相矛盾，它使公共宗教具有一种主观任意的成分。确立的宗教与公共生活有如此内在的联系，因为若没有它，国家便不能存在，宗教造成了公共立法的一个方面。因此，在人民看来，提倡一种将自我意识作为原则并使人不服从的新神，当然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与雅典人争辩，但是必须承认这对雅典乃是一贯的、必然的。第二，妨碍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不假的。在雅典人那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比具备主观自由的我们更为坚固，更能作为生活的伦理基础。孝道是雅典国家的基调和实质。苏格拉底从两个基本点上对雅典生活进行了损害和攻击，雅典人感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既然如此，苏格拉底被判决有罪，难道值得奇怪吗？<sup>①</sup>

雅典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冲突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城邦的伦理实体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性——之间的斗争。黑格尔从雅典共同体的观点来审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颠覆了国家宗教并干扰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家庭关系。但由于苏格拉底是主观性的自我满足的实体，他不能接受与他自己的自我定义不一致的共同体原则，而这是这种势不两立冲突的基础。

《安提戈涅》是黑格尔所喜爱的悲剧，因为它描述了两种道德原则——在科瑞翁身上体现的国家法律和为安提戈涅人格化的家庭法律——之间不可逾越的冲突。尽管对立面由两种不同的内容组成，但雅典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冲突正是这样的悲剧。悲剧是文化的一部

<sup>①</sup>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2, pp. 439-440.



分，因为世界史是由两种顽固的道德原则之间的碰撞的实例来填写的，而雅典—苏格拉底之间的对抗正如同这种情况。

黑格尔证实苏格拉底是一个天才，但不认同他反对雅典国家的道德主张，不认同他的“智者”身份。黑格尔讲述的是来自雅典法庭的沉思的悲剧。国家没有选择，而只能审判苏格拉底，因为柏拉图的这位老师挑战了雅典社会的宗教和家庭的基础。当黑格尔赞成对雅典法庭的指责时，他结识了自己国家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由于反对任何形式的抽象个人主义，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一种共同体，但在这一点上只需强调他对社会集体的认同。正如他谴责抽象主观性的主张，他也驳斥了自然法的理论原则。

将每个人一同限定在共同体中的力量是道德实体。黑格尔将实体规定为外在的、客观的实质。这种将人们融入共同体的客观实质是道德价值。实体是一种社会黏合剂，而对古希腊来说，这种社会黏合剂是宗教和家庭。

通过对选择来自《哲学史讲演录》的这些特殊主题的讨论，这里构建了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语境。只要理解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所依据的这个框架，黑格尔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表述，以及黑格尔关于哲学发展的世界观，就有可能确切地把握马克思在哪里偏离了黑格尔以及偏离的原因。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最重要的断裂是1841年对黑格尔同一性理论的理解。在黑格尔看来，理性和现实是同一的。当马克思为他的博士论文作结论时，他使理性和现实的统一破灭，并意识到思想和存在之间是脱节的。正是由于超越了思想和存在之间的断裂，马克思的批判哲学产生了。

马克思1837年11月10日给他父亲的信，写于他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之后，在这里，马克思描述了他自己的兴趣从法律转移到哲学，他写道，他“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sup>①</sup>。这种说法表

<sup>①</sup> 《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3页。

明在 1837 年底马克思被黑格尔的理性和现实统一的主题所吸引，因为它继续阐述，“如果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sup>①</sup>。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他最初遇到的黑格尔。“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他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sup>②</sup>

但此后不久，马克思再次接触到黑格尔的哲学，而这次的结果是不同的。“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聚会，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暴露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但在万籁俱寂时，我却产生了讽刺的狂热，而在如此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以后，这是很容易发生的。”<sup>③</sup>

1837 年，马克思成为柏林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之一，那里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中心。但马克思加入左翼黑格尔派运动之后，仍然使该问题保持开放，即为什么他选择撰写论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博士论文，以及为什么证明黑格尔对哲学史的解释是错误的。问题的答案要在马克思与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和鲍威尔的关系中寻找。

1840 年，科本出版了一本书，《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他将该书题献给“来自特里尔的我的朋友卡尔·亨利希·马克思”<sup>④</sup>。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回应了这种赞美，他写道：“这些体系（斯多亚、伊壁鸠鲁、怀疑论）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关于它们同希腊生活的联系，在我的朋友科本的著作《弗里

---

① 《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 年 11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13 页。

② 同上书，13 页。

③ 同上书，15 页。

④ Köppen, Karl Friedrich,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Leipzig, 1840.

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中有较深刻的提示。”<sup>①</sup> 尽管鲍威尔打开了马克思通往批判哲学的大门，但正是科本使马克思注意到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注意到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注意到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任务。在表明他得益于科本之后，马克思通过增加一段引文来强调他对这位朋友的感激，这就是来自科本专著第 39 页的那句话。<sup>②</sup> 这段引文只是一句话，但我愿意充分地复述该句所属的这段话，以便对科本研究的这三种古代哲学体系提供更准确的了解。

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研究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由于弗里德里希是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共同体现，他也是古代哲学的学生。（下面这句话为马克思所引用）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内脏系统，它们的直接的自然的统一决定了古代的美和道德，它们也随着古代的衰亡而瓦解。弗里德里希的技艺精湛得不可思议，他在自身中借鉴和培养了所有这三个传统。它们成为他的世界观的基本结构，他的性格和他的生命，与 18 世纪的基督教教育相融合，因此认为弗里德里希是一个异教徒是不真实的、夸张的。<sup>③</sup>

科本作出的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评价，与黑格尔的解释不同。科本将古代哲学的这三个学派判断为“古代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内脏系统”，而黑格尔将它们视为古希腊—罗马世界衰退的标志。他没有将这些体系视为衰落的例证，而指出这些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学派是哲学史的新开始。

科本也间接地驳斥了黑格尔的主观性概念。本章的前几节讨论

<sup>①</sup>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 卷，11 页。

<sup>②</sup> 同上书，1003 页。

<sup>③</sup> Köppen, Karl Friedrich,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pp. 39-40.

了黑格尔的主观性方法，表明他反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将自发的主观性高估为“苦恼的意识”的诱因。另一方面，科本表明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主观性是弗里德里希个人力量的来源。科本将弗里德里希描绘成一个英雄，一个18世纪世界的“哲学王”，而勇敢的主观性是一个希望将政治改革和学术改革带到普鲁士的人所需要的。

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弗里德里希就广泛地阅读了古代文学。18世纪启蒙运动的特征之一是对古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深感兴趣。弗里德里希自己熟知伊壁鸠鲁，而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将伊壁鸠鲁描绘为“人类的哲学家，芝诺是一个神而我只是一个人”<sup>①</sup>。

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道德思考和认识论思考都加强了弗里德里希的主观性思想。在道德方面，弗里德里希从斯多亚派那里学到友谊很重要，而人们也需要自我满足。政治权力使国王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异化，但斯多亚派的内在和谐处方是弗里德里希所需要的道德意旨。“最重要的是，他评价了斯多亚派的道德观，这些英雄是他的典范”，特别是马库斯·奥里利厄斯。<sup>②</sup>

在认识论层面上，伊壁鸠鲁使弗里德里希看到知觉的优势。在古希腊—罗马的市民社会，“伊壁鸠鲁的感觉论直接导致了怀疑主义，而弗里德里希遵循了相似的路径”<sup>③</sup>。然而，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怀疑主义不是解构的方法，而是建构的方法。弗里德里希将伊壁鸠鲁视为在接受任何事物是真实的之前必须获得经验证据这种怀疑主义形式的拥护者。<sup>④</sup> 弗里德里希对经验主义的信奉，他对中世纪迷信的超越，能在他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研究中找到来源。

科本通过他的描述，将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

① Köppen, *Karl Friedrich,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p. 43.

② Ibid., pp. 42-43.

③ Ibid., p. 43.

④ Ibid., pp. 43-44.

解释为启蒙运动的道德和经验主义先驱。淹没于中世纪，这三个学派被天主教的托马斯主义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并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诞生。作为路德教派的信徒，科本是天主教的独断主义、教皇制度和崇拜仪式的敌人。他在路德和启蒙运动之间画了一条连线，在某种程度上将18世纪的现代主义与反天主教联系起来。科本认为，16世纪的伽桑狄使原子主义再生，而且延续了对伊壁鸠鲁著述的兴趣。

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具有两翼——温和的和激进的。科本认为霍尔巴赫男爵和克劳德·爱尔维修代表了激进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启蒙运动的左翼。但科本自己和他眼中的英雄弗里德里希并未坚持激进的启蒙。科本赞同的唯物主义是导致人们接受开明君主的温和的18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然而，《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这本书清楚地将唯物主义确定为将要诞生的新历史时期的核心主题。

弗里德里希对古代唯物主义、新教和启蒙思想作出完美的综合。科本描述了弗里德里希的理想化肖像，并将他表述为柏拉图“哲学王”的一个实例。<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被美化为理性王位的体现者、新世界的思想先驱。科本写道：“被这个人照亮的时间和条件是正确的，而其余的世界都是错误的。这是真正的苏格拉底、耶稣和约瑟。”<sup>②</sup>

弗里德里希将理性原则运用于政治。弗里德里希以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方式认为，理性和现实是不一致的。无视黑格尔主义的同一性哲学，这位普鲁士国王认为，理念和存在是不同的。然而，君主的责任在于试图克服这种二元性，尽可能地使理性和现实得以贯通。弗里德里希的统治以思想改革和政治改革为特点。

这位普鲁士国王的学术改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指向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消除，而弗里德里希致力于以路德派的传统反对天主教的传统。弗里德里希希望带来理性和宗教的结合。从这个角度看，

<sup>①</sup> Köppen, *Karl Friedrich,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p. 11.

<sup>②</sup> *Ibid.*, p. 6.

这位普鲁士国王反对宗教独断主义的迷信。作为主观理性的捍卫者，弗里德里希将任何违背自由意识和强加正统教皇制度的尝试都视为思想专制的形式。此外，这位七年战争的胜利者反对宗教褊狭，即简单地剥夺其他宗教教派的理性主观性的存在自由。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下，普鲁士实践了宗教宽容。

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对本质和现象脱节的认识，揭示了理论和实践是如何在弗里德里希的思想中协调的。对他而言，理论和理性是同义词。基于本质和现象的分离，理论对这种不连续性的成因加以洞察。理论为这种不连续性的存在提供了理性解释，不是将本质和现象统一起来，而是使它们趋于更接近的状态。

当科本写到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他没有将实践规定为理论的实践或采用本质标准的现象批判。对科本来说，实践不是一种理性解析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在政治层面上，弗里德里希改革了君主专制政体的理念。他在年轻时撰写的著作《反马基雅维利主义》中提出了对君权理念的重新定义。<sup>①</sup> 他的君权理念试图使君主的合法性和普遍赞同的自由理念相融合。

英国的议会制对这位普鲁士国王没有吸引力。在他统治期间，弗里德里希没有做出任何为普鲁士制定宪法的尝试。科本并没有因为这个疏忽而批判这位德国的“哲学王”，实际上他原谅了他的偶像，理由是普鲁士还不具备这种改革的条件。更为清晰的理路是，弗里德里希认为君主制的统治比自由宪政更有效。如果一个人置于执政者之位，那么决策过程可能更符合国家利益，因为决策更少地为特殊利益所妨碍。此外，弗里德里希主张权力集中有利于招募管理人才，因为君主无须迎合选民集团的私人利益。

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不相信王权神授。君权并非来自于上帝，

---

<sup>①</sup> Köppen, *Karl Friedrich,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p. 110.

而是来自于市民社会。国家权力来自于“社会契约”<sup>①</sup>。权力是市民社会“委托”<sup>②</sup>给国家的。

对“社会契约”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弗里德里希属于启蒙的激进派，即卢梭主义的民主。弗里德里希是温和的、自由的启蒙运动的象征，他相信权力的委托，或者说他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不能保留统治权力，而只是这种权力的来源，他们将其转让给国家继而形成了统治权。

弗里德里希描述了国王和国家之间的区别。他因此变革了君主和国家的意义。法国的路易十四通过宣称“朕即国家”表明君主和国家联为一体。这位普鲁士国王摧毁了君主的这种神权理论，摧毁了国家为王朝和继承法所霸占这一事实，因为他勾勒了国家和君主之间的界限。

在弗里德里希所理解的“社会契约”中，人民将他们的统治权转让给国家，而国家是与王冠相分离的自治机构。国王是国家的“第一仆人”<sup>③</sup>。君主政治如同家务管理，因为国王必须服务于国家。弗里德里希将他自己想象为普鲁士的看门人。

弗里德里希对国家与君权相分离以及国家与贵族阶层相分离的表达有意描述国家的目的。“公共福利”是政治权力的目的。<sup>④</sup>置身于“公共福利”保护伞下的具体领域是贫穷问题、法律编纂和宗教宽容。弗里德里希在所有这些领域都进行了改革。他意识到由于统治权来自于人民，他们有理由期望法律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弗里德里希的政治改良使普鲁士变成了一种启蒙的政体。将理性运用于政治，将理智运用于管理，是弗里德里希留给普鲁士的启蒙的遗产。

《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分析了普鲁士国王和政治国家。科本美化了这位普鲁士的前任君主，他在这本书的结尾指出，弗里

① Köppen, *Karl Friedrich,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p. 111.

② Ibid.

③ Ibid., p. 113.

④ Ibid., p. 116.

德里希是“我们的摩西”<sup>①</sup>。

作为无忧宫 (Sans Souci)<sup>②</sup> 的理想化居民，科本抗议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反动统治。科本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倒退趋势分为宗教和政治两个范畴，科本同时抗议霍亨索伦王权的宗教正统和政治压制。迷信和新教暴政毁坏了普鲁士的启蒙理性，而政治倒退毁灭了自由的不同政见和自由意识。

科本主张取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统治。这本书回忆了普鲁士过去实践过的进步统治，而改革对普鲁士来说仍然是必要的。科本的著作诉求普鲁士在这位普鲁士“摩西”的精神中再生。

现在有必要回答《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何以影响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这个问题。是什么使科本对马克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政治层面上，科本使马克思关注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想对启蒙运动以及在伽桑狄之后欧洲兴起的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科本的著作向马克思指出这三个古希腊—罗马学派的道德哲学何以被证实是 18 世纪个人主义（作为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个人象征）产生的动力。

但除了作为西方思想发展历史参照的这三个具体学派之外，科本主要关注的不是哲学。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黑格尔，也没有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时的任何哲学争论。

然而，在政治层面上，科本的著作影响了马克思，使他相信普鲁士需要政治更新。科本的著作是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威廉四世的反动统治的战斗号角。他的专著给青年黑格尔派传来自由思潮的讯息。他引发了黑格尔左派按照普鲁士自身的历史取代弗里德里希之后这两个君主的反动统治。

但只有当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时候，才能实现政治复兴。弗里德

<sup>①</sup> Köppen, *Karl Friedrich,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p. 171.

<sup>②</sup>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于 18 世纪仿照法国凡尔赛宫建造的德意志王宫和园林。——译者注



里希大帝是现实能够改进的例证。当人们意识到理念和现实分离时，当人们具有减弱而不是克服这种分离的策略时，当人们基于这种策略行动时，现实就能够得到改变。科本为马克思提供了实现政治改革的公式，这种改革是从理念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离中演变出的推动力量。

然而，为了撰写他的博士论文，马克思需要了解更多。他需要专门研究黑格尔哲学。由于坚信老年黑格尔派使黑格尔主义传统成为普鲁士反动统治的合法性力量，马克思需要说明黑格尔主义何以分化出保守主义，黑格尔主义又何以成为政治复兴的手段。这是鲍威尔完成的任务。

鲍威尔是马克思早期发展的主要影响者之一，但在这个阶段我只关注他们在1841年的思想交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本章的核心，因此我只关心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中与博士论文相关的部分，即鲍威尔的书信，或他出版的某些著作。

马克思最早提到他认识鲍威尔是在马克思1837年给他父亲的信中，在那里，马克思说到鲍威尔鼓励他发表文章，而鲍威尔被他确认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之一。<sup>①</sup>这种友情在持续地增长，马克思成为鲍威尔家的常客，而在1839年的夏季，马克思听了鲍威尔在柏林大学开设的论以赛亚的课程。这两个朋友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多，但马克思给鲍威尔的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而鲍威尔给马克思的十三封信至今尚存，其中三封写于1841年之前这个时期。<sup>②</sup>

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的友情可以通过鲍威尔计划出版一本批判宗教神学的杂志而希望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成为投稿人这一点得到证实。鲍威尔的计划从未实现。此外，鲍威尔向马克思约一篇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评论，由鲍威尔编辑，但这个希望从未成为现

<sup>①</sup> 《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5页。

<sup>②</sup> Rosen, Zwi, *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The Hague, 1977, p. 127.

实。然而，这两件事情都是马克思相信和尊敬鲍威尔的实例。<sup>①</sup>

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的亲密关系进一步被这个事情所证实，即很多人认为在1841年马克思是《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一书的合著者。这不是真的，因为现代学者已经证明，鲍威尔是唯一的作者。<sup>②</sup>然而，马克思和鲍威尔确实约定，将马克思独立写作的一篇名为“论基督教的艺术”的文章收进来。<sup>③</sup>这部共同出版的著作将由两部分组成，鲍威尔的《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但这个目的没有实现。鲍威尔的《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出版了，而鲍威尔是唯一的作者。

马克思确实完成了他的文章《论基督教的艺术》，但却遗失了。在他1842年3月5日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提到这篇文章，说它“原定作为《末日审判的号声》的第二部分发表”，接着他问卢格是否能将其发表在卢格编的《箴文集》中。<sup>④</sup>两周后，在1842年3月20日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告诉他，这篇文章必须“彻底改写”，并被重新命名为“论基督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马克思写道，这种改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末日审判的号声》式的笔调和烦冗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透彻的叙述方式”<sup>⑤</sup>。大约一个月后，在1842年4月25日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写道，他将给卢格寄去四篇文章，包括一篇题为“论宗教的艺术”的文章，这大概是最初的《论基督教的艺术》的修订版，但这是最后一次提到这篇文章，尔后它就在历史中消失了。

① Rosen, Zwi, *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The Hague, 1977, pp. 128-129.

② Ibid., p. 159.

③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3页。

④ 同上书，23页。

⑤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3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6页。

鲍威尔在 1841 年前写给马克思的信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揭示了这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马克思大九岁，鲍威尔承担了学术上良师益友的角色；他是一位精神导师。

在一封写于 1839 年 11 月 11 日的信中，鲍威尔赞成马克思的“逻辑学力作”<sup>①</sup>，尤其是关于“矛盾”方面的问题。鲍威尔试图帮助马克思明确黑格尔“矛盾”的意义只有在将其置于本质和现象之间冲突的语境中才能理解。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三封信都是鲍威尔对普鲁士王权和普鲁士大学反动现象的抨击。对抗普鲁士反动统治的手段是批判，或曰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的腐朽必须得到揭露。在他 1840 年 4 月 5 日写的一封信中，鲍威尔提到普鲁士统治的危机，提到“国家和科学”之间势不两立的冲突。<sup>②</sup> 1841 年 3 月 28 日，鲍威尔写信告诉马克思：“真正的恐怖主义理论必然使这个领域纯洁。”<sup>③</sup> 三天后，他写给马克思这句话：“理论现在是最有效的实践，而我们还不能预测这种伟大的方式能够成为现实。”<sup>④</sup>

对鲍威尔来说，普鲁士的哲学已经成为君主镇压的手段。批判不仅能拆解哲学、黑格尔和国家之间的联合，而且也能拆解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联合。此外，批判涉及理论和实践的运用。由于受到科本和鲍威尔的影响，马克思撰写的博士论文采取了批判的形式，揭示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别。那么马克思将用于他的批判的靶子是什么呢？

鲍威尔的这本书《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出版于 1841 年，起到了为马克思提供批判得以瞄准的

---

① Pepperle, Heinz, and Pepperle, Ingrid, *Die Hegelische Linke* (Leipzig, 1985), p. 794.

② Ibid., p. 796.

③ Ibid., p. 810.

④ Ibid., p. 815.

靶子的重要作用。<sup>①</sup> 鲍威尔这部专著三个主要靶子是：（1）否定黑格尔哲学只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不同形式的复述这个理念；（2）废除黑格尔哲学为普鲁士的反动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种主张；（3）声称左翼黑格尔主义者是黑格尔的继承者。

《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是学术争论式的讽刺。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首席发言人，鲍威尔描述了左翼黑格尔主义的基本特征，也声明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中，鲍威尔为了证实他对黑格尔的解释，指出了几部黑格尔的著作，比如《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从我自己著作的观点来看，鲍威尔对《哲学史讲演录》的运用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背景。鲍威尔帮助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这个关于一般哲学的三卷本的重要性，而马克思接着就撰写了博士论文，证明黑格尔对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解释是错误的，或曰他说明左翼黑格尔派的观点何以揭示了这三个体系的重要性。

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题为“精神世界的幽灵”的第二部分，鲍威尔运用了几处引自《哲学史讲演录》的长文，接着以如下这句话对他的论证作出总结：“自我意识是世界和历史的唯一力量，而历史没有别的意思，而只是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sup>②</sup>

鲍威尔对老年黑格尔派最致命的攻击是，他们将黑格尔误读为实体哲学家。老年黑格尔派的断言赋予这种信念，即上帝或世界精神在历史中活动。他们移植了主观性概念并使抽象的上帝或理性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观推动力。

---

<sup>①</sup> Bauer, Bruno, “Die Posaune des Ju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in *Die Hegelische Linke*, pp. 235-371.

<sup>②</sup> Ibid., p. 29.

这种错位的主观性理念是鲍威尔对左翼黑格尔主义重新定义的核心。在鲍威尔看来，主观性属于“我”，取代了存在的实体，主观性与个人的自我意识相关。

鲍威尔将主观的自我意识转化为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发展的终点不是实体，而是自我意识，它假定自身是无限的，沉浸在实体的普遍性中，但自我意识假定自身是无限的，沉浸在实体的普遍性中的是它自己的本质。”<sup>①</sup>

鲍威尔借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通俗易懂的方面。正如黑格尔在这几卷本中描述的依次更替和哲学形式的超级转让，因此鲍威尔将辩证法解释为依次包含。<sup>②</sup>

《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的第四部分是鲍威尔对老年黑格尔派攻击的缩影。这部分被称作“对存在的憎恶”，鲍威尔指出，黑格尔处于反对现实的斗争中。鲍威尔将黑格尔表述为一个无神论者，而老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是一种宗教表述。鲍威尔认为，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的追随者，而老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看作是使哲学和普鲁士王冠协调一致的人。鲍威尔将黑格尔描述为相信理性和存在之间存在裂痕，看到存在和思想之间分离的人，而老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理解为证实思想和存在统一的思想家。鲍威尔认同划分思想和存在世界的理念，世界往往是二元的。

鲍威尔认为，黑格尔信奉理论和实践的原则。“他的（黑格尔的）理论与本身是相同的，而正因为这样，最危险的是广泛的、破坏性的实践。”<sup>③</sup> 老年黑格尔主义使黑格尔处于沉思的态势，作为一个寂静主义者，作为精神世界活动的旁观者。黑格尔左派则表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黑格尔，认为这个哲学家相信理念必然成为实践的基础，认为思想的意图是实践的出发点。

---

① Bauer, Bruno, “Die Posaune des Ju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in *Die Hegelische Linke*, p. 287.

② Ibid., p. 300.

③ Ibid. .

理论和实践的原则与使思想切入现实的方法有关，但批判的原则关注理念和现实的差别。鲍威尔指出，黑格尔也实践了批判。他写道：

然而，知识是自由的，它使精神解放，决心在新形式中转换以往的形态，因而使之成为一种新形态，即使之基于自由法和自我意识的规定。哲学因而是对存在的批判。因此，是与应该不同。然而，应该完全是真理，它必须克服这些矛盾。<sup>①</sup>

批判是揭示思想和存在之间差别的过程。理念成为现实的标准，而现实被发现是有缺陷的。“必须发展为一种行动，成为实际的反对者，不仅是事后的反思或注意力的转移，而且作为理论的原则必须直接成为实践的原则。”<sup>②</sup> 左翼黑格尔主义将黑格尔视为“实际的反对者”的思想来源，或曰主观的自我意识成为“实际的对立面”的所在。

鲍威尔阐述了人类发展的进步观点。通过对不必要的历史形式的否定，新的、更高级的形态产生了。尽管绝对自由从未得到实现，但人类历史过程螺旋式上升为自我决定的更高水平。左翼黑格尔主义将黑格尔的历史过程主题永久化，并提出人类将发展到诉求自由的更高阶段。

通过自我意识能力自身的对象化，历史浪潮汹涌往复就成为可能。受费希特影响，鲍威尔将自我意识视为世界的创造者。自我意识产生了理念，理念继而拓展为理论，而理论批判了现存的事物。<sup>③</sup>

鲍威尔的历史发展理论是辩证的。但受自我意识约束正是一种辩证法。现存的历史形式在既定的时代占支配地位，处于自我意识

---

<sup>①</sup> Bauer, Bruno, "Die Posaune des Ju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in *Die Hegelische Linke*, p. 301.

<sup>②</sup> Ibid. .

<sup>③</sup> Rosen, Zwi, *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pp. 82-83.

的过去的水平。但批判否定了这种实际的形式。通过否定这种历史模式，批判产生了允许新的过渡形式在新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条件。

左翼黑格尔主义的发展理论借用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描述。尽管黑格尔没有将批判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他将发展规定为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的超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将精神而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视为发展的推动力量，他将自我意识的诸多发展阶段理解为形式、形态、总体或有机的体系。尽管黑格尔和左翼黑格尔派对主观性具有不同的定位，但他们以共同的方式理解主观性的对象化：主观性将自身对象化为形式、形态和自我意识的总体等方面。<sup>①</sup>

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呼声》的第四部分“宗教的毁灭”中，鲍威尔证实，黑格尔相信“宗教基本上是人类精神的结果，是限制天才和解放天才的产物”<sup>②</sup>。为了证明他的主张，鲍威尔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中的一句话：“艺术证明神性来自于人自身。”<sup>③</sup>

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呼声》的第二部分“作为自我意识产物的宗教”中，鲍威尔再次回到宗教只是自我意识的投射这个主题上来。“自我意识是全部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质，它是一种活动，而仅仅是在这种自我意识的思考活动中，普遍性产生于这个本质。”<sup>④</sup>

宗教批判是所有左翼黑格尔派批判的出发点。宗教批判是解放哲学的实践，它使哲学自由。它是主观自我意识的出发点。

宗教批判揭示了异化问题。神性仅仅是从人性中窃取的力量。宗教批判使人性的力量重新回归于人类，对鲍威尔来说，这意味着

① Rosen, Zwi, *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pp. 192-193.

② Bauer, “Die Posaune des Ju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p. 319.

③ Ibid. .

④ Ibid. , p. 344.

哲学现在能够将主观的自我意识视为创造世界的推动力量。

鲍威尔还将异化概念应用于批判领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表明黑格尔主义不是像老年黑格尔派所认为的那样，是普鲁士反动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鲍威尔认为，黑格尔是普鲁士政治改造的骨干，他将黑格尔看作普鲁士君主政治的起诉者。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中，黑格尔被表述为赞成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改革者。在提倡普鲁士政治改革的过程中，鲍威尔与科本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达成了共识<sup>①</sup>，尽管科本赞成对普鲁士的自由重建采取温和的态度。

在鲍威尔的表述中，黑格尔被描绘为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捍卫者。<sup>②</sup> 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中，黑格尔是作为政治革命者而不是作为君主政治的辩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在《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的第五部分“赞美法国与憎恨德国”中，鲍威尔断言，黑格尔实现了他的目的，使他所有的学生都成为推翻路易十六的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sup>③</sup> 他不知道这些学生是否想要仿效这位法国起义的英雄，他写道：“谁知道另一个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是不是已经出现在他的学生之中呢？”<sup>④</sup>

通过使黑格尔成为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成为摧毁普鲁士国家的倡导者，鲍威尔使黑格尔左派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记得马克思 1843 年开始对法国大革命进行透彻的研究，这正是鲍威尔的《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出版三年之后。马克思自己的政治激进表述是在鲍威尔的基础上产生的。

---

① Bauer, “Die Posaune des Ju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p. 302.

② Ibid., p. 310.

③ Ibid..

④ Ibid., p. 311.



在亨利希·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之后，鲍威尔认为，德国的反思沉浸在抽象的思考中，而18世纪的法国思想已经清除了宗教和迷信的存在。法国思想也是对国家的批判，它以改革和激进的方式存在。

鲍威尔再次使用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话语，指出黑格尔接受了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鲍威尔将黑格尔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法国反对普鲁士的王位和祭坛紧密结合，是反对中世纪再生的最佳防卫。

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我上面提到的其他议题中，他使马克思注意到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本质和现象的区分。鲍威尔拆解了哲学的同一性，反对现实和思想统一的原理。但鲍威尔传递给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理解在于更新批判的理念。为了把握鲍威尔—马克思的概念的独特性，有必要表明他们的公式与康德和黑格尔有怎样的差别。

在休谟攻击了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可能性之后，康德的批判着眼于挽救理解自然世界的前景。通过对理性范畴的批判审视，康德旨在表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是对物理学世界的正确反映。

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康德的批判对认识论加以审视。他提出思想的先验部分，或思想范畴的综合超越——知觉的组织框架。康德相信他挽救了“自在之物”，理性的先验范畴提供了一种与实际的外部事物相符合的“自在之物”的意象。他不相信这个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的“意象”是对外部事物的完美复写，因为精神意象与外部实际事物之间的差别是存在的，但他的确相信，在头脑中产生的东西与看得见的东西确实是相当接近的。

康德认为，两极的世界构成了精神意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鸿沟。尽管能够获得与“自在之物”近似的东西，但这种相似性不能消除理性和经验的差别。黑格尔沉浸于“自在之物”中。他不相信理念和可感知的存在之间存在鸿沟。相反，他认为只要思想合乎可感知的存在，两者就是不可区分的。

康德关注理念的构成，而黑格尔关心的是概念的对象化，这使黑格尔研究了现象学思想。关于思想的知识不能通过研究获得，即理念是由理性范畴构成的，而不是由对思想产物的观察构成的。在黑格尔看来，认识来自于对思想结晶的研究，因为真正的知识是对思想的领悟，而对思想最好的领悟是从对思想产物的检视中获得的。对黑格尔来说，知识是历史的，或者说只有通过审视思想产生的现象，才能获得知识。

鲍威尔所实践的批判形式既不是康德的，也不是黑格尔的。鲍威尔拒斥康德的认识论立场，他也不赞成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鲍威尔主张本质和现象是脱节的，而黑格尔坚持认为，理念和现实、本质和现象都是统一的。

鲍威尔对批判的重新定义将主观的自我意识视为本质的代称。独立的自我意识运用自己的洞察力，将本质从外部存在的事物中提取出来，继而对现存的个性与这种本质标准加以比较。批判是揭示存在和本质之间分歧的一种考察，但既然揭示了这个鸿沟，也就开启了超越这个鸿沟的可能性。

对鲍威尔来说，超越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自我意识中。只有改变精神的取向，才能带来社会的改变，或曰意识优先于社会环境。社会经济的改进不是生活变化的必要成因，因为自我意识还是保持原样，因此鲍威尔主要关注的是将自我意识改造为历史过程的原动力。

马克思借用了鲍威尔的批判公式，而这是马克思毕生方法论的保留部分。作为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要分析方式。

1839年夏天，马克思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研究。除了博士论文本身之外，马克思主要从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摘录而成的七个笔记本也产生于1839年这个时期。这些笔记本被称作“关于伊壁鸠鲁、斯多亚和怀

疑主义哲学史的准备材料”<sup>①</sup>。

此外，1839年的这些准备材料也包括马克思题为黑格尔“自然哲学提纲”的简要评注。马克思在1839年的博士论文研究开始于他所作的第六个笔记本中的这五页摘录的材料。黑格尔“自然哲学提纲”是对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二部分《自然哲学》的非常简要的概述。换言之，马克思在着手研究伊壁鸠鲁、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同时，阅读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

马克思希望将他的博士论文作为一本书出版，但这个计划从未得到实现。<sup>②</sup> 这些摘录的原始手稿还保留着，但博士论文手稿没能保留下来。马克思的原始手稿遗失了，而至今流传下来的是不知名的人抄写的不完整的版本，其中插入了马克思补充和校正的手迹。尽管目录表明第一部分有第四章和第五章，但这两章没能保存下来。目录还显示其中有一个附录，但除了一个片断之外，这部分也遗失了。

尽管博士论文是不完整的，而且出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作者之手，但它仍然能提供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关系的不可或缺的理解。节选或引用的七个摘要笔记本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马克思亲手抄写的他读过的书；其中偶尔插入马克思自己的评论和思考。在对这部博士论文的分析中，我将这部论文和这些笔记本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我将它们视为一个文本，但我会指出，我所提到的材料是来自于博士论文本身，还是来自于这些准备材料。

我还会涉及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纲要》的概述。

为了使我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解释尽可能清楚，我将接下来的讨论分为如下几部分：（1）马克思的总体构思；（2）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3）马克思和宗教；（4）马克思和唯物主义；（5）马克思和国家；（6）从思辨

<sup>①</sup> Hillman, *Marx Und Hegel*, p. 105.

<sup>②</sup> Ibid..

哲学到批判；（7）马克思的科学哲学；（8）发展理论；（9）马克思的方法。

#### 四、马克思的总体构思

乔治·麦卡锡的著作是澄清古代哲学对青年马克思影响的必读书。在他的三本书中，《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sup>①</sup> 是一本论文集，《马克思对科学和实证主义的批判》<sup>②</sup> 与《马克思和古代思想家》<sup>③</sup> 是专著，麦卡锡使自己对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对青年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影响进行卓越的评论。尽管我独立于麦卡锡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我必须承认当我读过他的全部著述之后，我接受了他的论述思路。我特别要提醒读者们注意《马克思和伊壁鸠鲁》这篇文章，他被收入《马克思和古代思想家》中。<sup>④</sup> 除了有一点不同之外，我在下面九个部分中提出的观点基本上都符合麦卡锡论文中的观点。

麦卡锡相信，马克思的自然哲学借用了谢林的思想，而我察觉到谢林的任何思想都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著述中。

当马克思在 1841 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时，他还是一个 23 岁的青年。《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他的第一次学术努力，如同青年学者的大多数著作一样，尽管这部早期著作充满了热忱，但还不够清晰和明确，普鲁士政府从未授予马克思在大学教书的任命。很多主题和思想在这本书中纵横交错，而我在分析中试图梳理这些不易控制的材料。

在这部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确实清楚地表述了该论文的核心意图：“不妨把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在那部著作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这篇论文在形式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缺点在

① McCarthy, George E., *Marx and Aristotle*, Maryland, 1992.

② McCarthy, *Marx's Critique of Science and Positivism*, The Netherlands, 1988.

③ McCarthy, *Marx and the Ancients*, Maryland, 1990.

④ McCarthy, "Marx and Epicurus", in *Marx and Aristotle*, pp. 23-43.

那里将被消除。”<sup>①</sup>

正如我以前提到的，在这同一篇序言中，马克思承认，他得益于他的朋友科本<sup>②</sup>，并且知道这三个古代思想学派对启蒙运动有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写道：“难道它们不具有性格十分刚毅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连现代世界也不得不承认它们享有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吗？”<sup>③</sup>

后来，马克思解释说，他不会沿袭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想进入罗马帝国的思路，而将追踪这三个思想学派在早期希腊哲学中的起源。<sup>④</sup>特别是，他要对比伊壁鸠鲁的原子主义和科学哲学与他的先驱德谟克利特加以比较。在这个层面上看，马克思凝视过去的存在，比较了伊壁鸠鲁的原子主义与他的先驱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主义。然而，在更深远的层面上看，马克思实际上涉及对唯物主义历史的研究。他自己指出，17世纪的伽桑狄使伊壁鸠鲁的原子主义再生。<sup>⑤</sup>在这个广阔的图景中，马克思对欧洲唯物主义加以审视。他使黑格尔左派取代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自然哲学》。由于授予黑格尔哲学史之父的美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对哲学史的解释没有错误，但是不全面，他将黑格尔左派带入黑格尔所忽略的唯物主义传统中。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提供了来自唯物主义视角的新的科学哲学，描述了西方思想新的历史编纂学。

尽管《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大部分内容都在比较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主义和伊壁鸠鲁的原子主义，但马克思认识到，伊壁鸠鲁撰写了自然哲学，“在物理学方面转

①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0~11页。

② 同上书，11页。

③ 同上书，16页。

④ 同上书，16~17页。

⑤ 同上书，11页。

向自然哲学家”<sup>①</sup>。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写道：“我选择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关系作为这样一个例子。……尽管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之间有着联系，但是证实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贯穿到极其细微之处的本质差别就显得特别重要了。”<sup>②</sup>换言之，马克思的外部研究关注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但他的内部研究关注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对物理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的综合研究。

德谟克利特指出，只有原子和虚空是存在的。原子沿直线下降，从不碰撞或会合，而物质客体是这种会合的产物。显然，德谟克利特不可能看到这些原子，因此它们出自他内心的凭空猜想。德谟克利特物理学的关键方面在于他相信必然性。据德谟克利特所见，原子的碰撞或会合是绝对必要的，而我将回到德谟克利特必然性概念的重要性上去，因为这是他和伊壁鸠鲁物理学的决定性分界线。

德谟克利特相信“感性现象不是原子所固有的”，据马克思所见，德谟克利特相信“主观的假象”<sup>③</sup>，即原子的假象是主观精神的印记。换言之，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sup>④</sup>，他相信“感性知觉的世界是实在的和富有内容的世界”<sup>⑤</sup>。

在认识论意义上，德谟克利特是经验主义者的典范。黑格尔是停留在感性知觉水平上的研究者，而他将这个水平诋毁为“理解”，而且认为这种理解假定感性世界存在假象。德谟克利特对科学哲学的表述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没能将概念的普遍性应用于感性实践

---

①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6~17页。

② 同上书，17~18页。

③ 同上书，21~22页。

④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2页。

⑤ 同上书，23页。

之中。

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是“怀疑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sup>①</sup>。德谟克利特是怀疑主义者，因为他意识到，感性的现实是从来不能得到理解的；由于他不能将概念或形式应用到感性的现实中去，他也就从来不能理解其确定性。马克思称伊壁鸠鲁为“哲学家”，因为他确实能将概念或形式应用到感性的现实中去。<sup>②</sup> 马克思看重伊壁鸠鲁的科学哲学方法。对马克思和伊壁鸠鲁来说，感性知觉只有通过运用形式和概念，才能得到理解。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关于感性知觉差别的说法夸大了关于必然性的争论。伊壁鸠鲁相信偶然性，而德谟克利特坚持必然性原理。然而，马克思阐述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争论的方式是黑格尔式的。在分析偶然性和必然性差别的过程中，马克思转向黑格尔的《大逻辑》和《小逻辑》。本章后面的部分将更为详细地讨论黑格尔的《大逻辑》和《小逻辑》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影响。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更深远的构思在于修订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简要描述了《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和第二卷，或者说简要描述了黑格尔对古代哲学历程的一般解释。<sup>③</sup> 黑格尔的解释将亚里士多德视为古希腊思想的缩影。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被认为是古代哲学衰落的标志。尽管是对不同思想态势的折衷，但亚历山大里亚的思辨被视为柏拉图哲学的复兴。至少亚历山大里亚再次看重思想的自我决定，尽管对他们而言，思想完全退回到神学中了。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致力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古代哲学发展过程和特殊意义上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发展过程作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页。

<sup>②</sup> 同上书，29页。

<sup>③</sup> 同上书，15~16页。

出不同的解释。他写道：“希腊哲学是以两类不同的折衷主义体系为终结的，其中一类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另一类统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思辨，难道这种看法不应促使人们至少联系这种关系去加以探讨吗？”<sup>①</sup> 黑格尔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描绘为后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衰落的标志，但马克思将他们视为后亚里士多德时代主观自我意识完整力量的探索者。

尽管他自己在这个领域没有著述，但马克思将自然哲学研究作为西方思想的核心主题之一。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是精神的发展历程，或曰哲学史是对思想的自我决定的认识。黑格尔的观点一部分是老年黑格尔主义的。对马克思来说，自然哲学是西方思想发展的关键思路之一。此外，对自然哲学史的论述同时也是自我意识力量的一个例子。鲍威尔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不同，而这是后来这两个曾经的朋友分裂的主要原因，这在《神圣家族》中得到最初的表述。费尔巴哈确实看重自然主义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性，而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明以费尔巴哈取代鲍威尔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总策略是为左翼黑格尔主义提供对哲学史的左翼解释。马克思指出，哲学史中有反黑格尔主义倾向的观点，它们是黑格尔主义命题的对立面。马克思不赞成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主张，指出左翼黑格尔主义是未来的方案，而唯物主义是这项议程的中心。

鲍威尔预示着以批判为特征的时代来临了。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这是由理论和实践支配的新时代，是批判成为现实的哲学新时代，即理论被归结于重构现存的实践的时代。

博士论文不仅表明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方案，而且表明马克思倾

---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6页。



向于自然哲学。马克思是一个反实证主义者，也是一个反康德主义者。马克思否认真理的“复写论”，否定“自在之物”能被人们所认识。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研究表现为对自然科学作伊壁鸠鲁式的解释。知觉往往是由概念、社会条件或道德所决定的。

此外，马克思指出唯物主义是批判思想的核心。延续科本的著述，马克思承认唯物主义对于启蒙思想的重要性，承认古代物理学对18世纪的重要性。马克思将唯物主义与政治革新结合起来。

马克思关注科学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这个1839年的事实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摘录<sup>①</sup>中得到强调。此外，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表明他还阅读了费尔巴哈出版于1833年的《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sup>②</sup>由于阅读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阅读了费尔巴哈的《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研究了古希腊—罗马的物理学，因而马克思对自然哲学的兴趣早在1839年就被强化了。

本章不讨论马克思对自然哲学以及他在这一点上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系的研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区别对待。我只能提请大家注意马克思在1839~1841年这个时期涉及了唯物主义和科学哲学问题。

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马克思的兴趣转向了政治。由于他不能获得在大学教书的职位，马克思放弃了纯粹哲学领域而转向作为《莱茵报》编辑的政治新闻写作生涯。从1841年到1844年，马克思对唯物主义问题保持沉默，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新回到这个兴趣上来，费尔巴哈的影响在这里再次得到重申。但1845年的《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思考唯物主义的主要文本。马克思在题为“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这一节描述了现代唯物主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76~182页。

<sup>②</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88页。

义的历史，这个历史的模式基于费尔巴哈的《近代哲学史》。<sup>①</sup>我认为，唯物主义理念在1839~1841年这个时期产生于马克思的思想中，它们在《神圣家族》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

## 五、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

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西方哲学史构思的修订并非全然拒斥这位现代辩证法的发明者。马克思在指出黑格尔对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构思没有意义的同时，提出以关于西方思想发展的左翼观点取而代之，但马克思仍然捍卫黑格尔并使他的方法论永久化。

马克思综合了反黑格尔主义和亲黑格尔主义两种态度。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必须使马克思扬弃的黑格尔哲学的那些方面与他保留的这位“大师”思想的那些方面保持一致。这个问题是一个思想的激光手术：有必要切开黑格尔思想的迷宫，以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思路理解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思路。

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这样赞美黑格尔：

虽然黑格尔大体上正确地规定了上述各个体系的一般特点，但是一方面，由于他的哲学史——一般说来哲学史只能从它开始——的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使他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另一方面，黑格尔对于他主要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位巨人般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sup>②</sup>

马克思将黑格尔赞许为“哲学史”的创立者，一个“巨人般的思想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sup>②</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1页。

家”，因而是“我们的大师”<sup>①</sup>。黑格尔没能恰当地指出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重要性，因为古希腊哲学源于他致力表达的“思辨的东西的观点”。“思辨的东西”意味着黑格尔倾向于将特殊性纳入普遍性，关注总体和体系，而这妨碍黑格尔衡量主观性在古希腊思想中或在一般哲学中的重要性。

此外，马克思捍卫黑格尔，反对黑格尔的“学生们”的某些攻击。<sup>②</sup> 这些无知的“学生们”攻击“大师”<sup>③</sup>，因为他们“从适应或类似的东西出发”<sup>④</sup>，这意味着晚年的黑格尔成了普鲁士王冠的恳求者。总之，这些“学生们”指责，晚年黑格尔的过错是在道德上软弱，因为他将自己出卖给君主政治。

马克思通过表明黑格尔的哲学仍然十分重要来攻击这些“学生们”。即使这位“大师”的过错是默认君主专制，但哲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深入理解“哲学家”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sup>⑤</sup>，而不是被诸如适应等不相干的问题引入歧途。哲学研究者必须分析“哲学家”内在的深奥难懂的思想。

除了反驳这些“学生们”之外，马克思拿起武器反对“没有了解这位大师的某些黑格尔分子”<sup>⑥</sup>。正如我在本章前几部分所表明的，黑格尔相信，苏格拉底被城邦谴责是必要的，因此“没有了解这位大师的某些黑格尔分子”认为“例如，黑格尔哲学本身宣判自己有罪”<sup>⑦</sup>。换句话说，“没有了解这位大师的某些黑格尔分子”将苏格拉底之死与黑格尔哲学相提并论，意味着黑格尔哲学也必须被谴责，因为它成了普鲁士专制统治的帮凶。

①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36页。

② 同上书，74页。

③ 同上书，74页。

④ 同上书，74页。

⑤ 同上书，75页。

⑥ 同上书，136页。

⑦ 同上书，138页。

在对反黑格尔主义的谴责中，马克思作为亲黑格尔主义者出现，尽管对黑格尔的捍卫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无视黑格尔的软弱。在这种亲黑格尔主义的模式中，马克思提醒人们注意黑格尔哲学深奥难懂的方面，并表明内在本质的内容很丰富。在保留黑格尔思想的深奥难懂方面与否定黑格尔思想受历史局限的某些通俗易懂方面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马克思是亲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将黑格尔思想的特性看作是哲学开启新的视域。黑格尔不是最后的阐述，而是新的开始。

马克思认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将自身转化为主观形式。哲学发展的原则之一诉求客观体系转化为个人的主观形式。这个从思辨到主观性的转化过程产生于左翼黑格尔派，他们引出哲学发展的新时代。<sup>①</sup> 马克思写道：“然而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sup>②</sup>

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关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论述，他没能成功地使主观性哲学优先化。当黑格尔没能成功地赋予主观性思想以特权时，他也就忽视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重要性。马克思为他自己安排的任务是，保留黑格尔的方法论，但同时改写这位“大师”思想的某些方面。

## 六、马克思和宗教

第三个笔记本包括很多关于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评价的摘录。它的题目是“普卢塔克。1. 《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sup>③</sup>。在马克思写于这第三个笔记本的简要评论中，他嘲笑了普卢塔克。马克思捍卫伊壁鸠鲁的无神论，并解释说伊壁鸠鲁否认神的存在，因为相信神破坏了平静或安宁。对伊壁鸠鲁来说，最高的

---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37页。

<sup>②</sup> 同上书，138页。

<sup>③</sup> 同上书，72~101页。

神是不抑郁的生活，伊壁鸠鲁觉得，对神的信仰使人容易为焦虑和苦恼所伤。神使人类受制于超自然的神灵，因此剥夺了人类的自我满足。幸福是生活的目的这个伊壁鸠鲁的道德观，是他的无神论的基础。

普卢塔克批判了伊壁鸠鲁的这个观点，但马克思捍卫伊壁鸠鲁，反对普卢塔克。他写道：“普卢塔克全然不理解伊壁鸠鲁关于惧怕神的论断的含义；他不理解，哲学意识多么希望摆脱这种恐惧。普通人是不理解这一点的。因此，普卢塔克举出庸俗的经验主义的例子，来证明这一信仰对群众来说并不很可怕。”<sup>①</sup>

在第三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再次表明他与鲍威尔的密切关系。《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是对宗教的攻击，将宗教描绘为人类异化产生的原因，诉求哲学与宗教的分离。第三个笔记本写于1839年，可以证明这个时期的马克思赞同宗教与哲学分离。四年之后的1843年，马克思撰写了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这篇文章包括如下这句被频繁引用的话：“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sup>②</sup>但马克思关于宗教和哲学分离的观点在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四年之前就提出来了。

对伊壁鸠鲁来说，宗教或普遍知识是由概念预设或道德预设决定的。自我意识的需要渴望享受情感的和谐——伊壁鸠鲁的知识标准。概念先于知识，或者说幸福的概念决定了我们要知道什么。

## 七、马克思和唯物主义

为了充分理解马克思对待自然的方式，最好对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加以区分，虽然这两者并非内在地矛盾。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涉及自然的构成。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要素，也是认识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0页。

<sup>②</sup>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1页。

论的工具和分析的工具。自然主义不是分析的而是实践的；它是关于人类如何使自己的生活会过得快乐的阐述。自然主义是一种道德认识，认为生活应当符合自然法则。

伊壁鸠鲁的先验知识论认为，人类的宇宙论最终取决于概念边界和道德边界，但在这些先决条件中，马克思将伊壁鸠鲁表述为唯物主义者 and 感性知觉的信徒。伊壁鸠鲁是一个原子主义者，认为原子是自然的基石，因此它是自然哲学方面的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认为，概念甚至道德处方是感觉材料的组织框架。此外，伊壁鸠鲁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因为他坚持认为生活的目的是快乐，实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使生活符合自然的要求。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将伊壁鸠鲁置于昔勒尼派的传统中。在题为“《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摘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根据比埃尔·伽桑狄主编的《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的版本”的第一个笔记本中，马克思抄录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段话：“在关于快乐的问题上他〔伊壁鸠鲁〕和昔勒尼派也有分歧。昔勒尼派不承认静止状态的快乐，只承认运动中的快乐，至于他则对两种〔快乐〕——无论是精神的或是肉体的——都承认。无论静止状态的快乐或者运动中的快乐都是可想象的。伊壁鸠鲁……是这么说的：‘内心的宁静和没有痛苦是静止的快乐，而欢乐和愉快是通过自己在运动中的能动性才显示出来。’”<sup>①</sup>

伊壁鸠鲁和昔勒尼派都研究快乐—痛苦的公式。然而，昔勒尼派看重快乐的获得。对于他们来说，幸福是尽可能积累快乐的感觉。伊壁鸠鲁则关注如何回避和消除苦恼。在伊壁鸠鲁看来，幸福在于缺少痛苦，或在于避免任何能带来痛苦的情感纠葛的感觉或状况。

自然主义是伊壁鸠鲁拒绝承认天象存在的基础。由于关于天象的理念可能引起人类的恐惧和焦虑，伊壁鸠鲁否认天象存在，因为

---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32页。

它们干扰了心灵的宁静。<sup>①</sup> 自我意识是解释外部世界的天象的形状或神的形象的支配性力量。

马克思在 1839~1841 年讨论古代自然主义的博士论文开启了他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受费尔巴哈这个阶段。我已经说过，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近代哲学史》列入他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此外，马克思在第二个笔记本中提到费尔巴哈的著作并注明出处：“参看：费尔巴哈《近代哲学史》中《比埃尔·伽桑狄》一章（第 127~150 页）——完全不理解伊壁鸠鲁，更不能向我们阐明他。”<sup>②</sup> 马克思对自然主义的兴趣来自于 1839~1841 年这段时期，而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为他后来接受费尔巴哈做了准备。换句话说，不是费尔巴哈引导马克思研究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在 1839~1841 年对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研究成为他接受费尔巴哈的基础。

在实践哲学方面，1839~1841 年已经表明，马克思摆脱了康德的伦理学和黑格尔的普遍定律。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对他没有意义。更确切地说，他转向了法国激进启蒙运动和古代伊壁鸠鲁主义的伦理学。

马克思为他的博士论文撰写的附录名为“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在这篇附录中，马克思记下了摘自保罗·霍尔巴赫《自然体系》中的这段话：

关于这些无比强大的力量的观念永远是同恐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力量的名字总是使人们回想起他们自己的灾难或者他们祖先的灾难。我们现在还害怕，因为数千年来我们的先辈就感到害怕。神的观念在我们心中总是引起令人压抑的念头……就是现在，

---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 卷，62 页。

<sup>②</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0 卷，52 页。

每当我们听到有人提到神的名字时，恐惧和忧郁的想法就涌上心头。<sup>①</sup>

霍尔巴赫只是重述了伊壁鸠鲁的早期结论，并给马克思更多的理由断定，伊壁鸠鲁拒斥基于道德并与人类的宁静相妥协的神是正确的。

对激进启蒙运动伦理学的接受进一步体现在《神圣家族》中题为“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这一节<sup>②</sup>，在这里，马克思再次评论了霍尔巴赫。霍尔巴赫是法国启蒙运动左翼的代表，此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他对傅立叶的著名评论中再次诉求古代的幸福论，“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sup>③</sup>。在1839~1841年，早年的马克思为法国启蒙运动左翼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以及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所鼓舞。马克思用法国批判德国，是他在1839~1841年就已经使用的学术策略。

最后，第二个笔记本表明，作为回避德国唯心主义的手段，马克思转向了古代的自然哲学。马克思在第二个笔记本中写道：

古代世界起源于自然，起源于实体的东西。贬低和褻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生活决裂；新世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古代人那里是褻渎自然的東西，在近代的人看来是从盲目信仰束缚之下的一种解脱；新的唯理论的自然观还应上升到承认神性的东西即理念体现于自然中，——古代的伊奥尼亚哲学至少在原则上正

---

①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69~170页。

③ 同上书，111页。



是从这一点开始的。<sup>①</sup>

这段话包括三个重要的洞见。第一，它是对《哲学全书》第二部分《自然哲学》——认为自然与理念对立——的拒斥。在黑格尔看来，自然是理念的“他者”，或者说主观性正是理念所否定的，对物理的有机世界的理解来自于理念。<sup>②</sup>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当马克思写到“新世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的时候，他指的是黑格尔以及黑格尔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

第二，这段话证明，马克思在1837年《给父亲的信》之后走了多么远。正如在本章前几节中提到的，在那封信中，马克思写道，他“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这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阐述，因为它表明，观念是外部世界的基础。在1839年的笔记中，他转而认为“神性的东西即理念体现于自然中”，或曰自然是现实的内容。马克思在1837年坚持观念是现实基础的立场，而在1839年转向断言物质优先的立场。1839年的立场是反黑格尔主义的。

第三，这段话包括马克思自己的经历。他的目的是要复兴古代的唯物主义。他的任务是远离现实特别是德国的现实，引发最初由科本所清晰阐述的古代唯物主义的复兴。

## 八、马克思和国家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几乎完全致力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然而，博士论文还涉及国家理论，需要对其加以评论，因为它们与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理论的发展有关。马克思的第一个笔记本确实包括不少抄录自伽桑狄主编的《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的页面，在这里，拉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52页，北京。

<sup>②</sup> Hege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Vol. 2, "Introduction".

尔修概述了伊壁鸠鲁的思想。比如，马克思抄录了如下两处来自拉尔修引述伊壁鸠鲁国家理论的话。

自然法是一种求得互不伤害和都不受害的 [对双方] 有利的契约。<sup>①</sup>

正义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在互相交往中，在任何地方为了互不伤害和不受害而订立的契约。<sup>②</sup>

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看来，伊壁鸠鲁认为，国家建立在“在人们交往的相互关系上被证明是有益的东西”的基础之上。基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的这些概述可见，伊壁鸠鲁不赞成斯多亚的普遍自然法思想或普遍自然权利思想。更确切地说，伊壁鸠鲁接受国家的契约论观点，认为“互相交往是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这个事实，在国家中签订契约的人们尽可能享受同等的利益。

伊壁鸠鲁还相信使国家成为现实的“契约”。马克思抄录的另一处来自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引文是：“对于那些不能互相约定互不伤害和都不受害的人，是不存在正义和正义的东西的。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订立互不伤害和不受害的契约的民族情况也是如此。”<sup>③</sup>

正如马克思所摘录的，据伊壁鸠鲁所见，国家的目的是互相帮助，或者说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将受益于利益平等。契约是分配彼此价值的手段。

事实上，马克思以伊壁鸠鲁来赞成国家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自己这样评论道：“下述段落反映伊壁鸠鲁对精神的本质、对国家的看法。他把契约看作基础；从而只把有益的原则看作目的。”<sup>④</sup>

---

①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34页。

② 同上书，34页。

③ 同上书，34页。

④ 同上书，34页。

马克思这种对伊壁鸠鲁解释的另一处证据是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赞同国家的契约论。在“莱比锡宗教会议”这一节，马克思攻击了麦克斯·施蒂纳关于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写了下面这句话：

为了让我们的圣者看看伊壁鸠鲁哲学所根据的现实基础，我们只需提出以下一点就够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sup>①</sup>

然而，马克思很快就放弃了伊壁鸠鲁的国家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基于利益互惠，而且对他来说是不充分的。马克思需要一种更具“精神的本质”的国家。

在反黑格尔主义的模式中，马克思不同意国家的“自然法”理论以及黑格尔关于国家起源于人类意志或主观精神的命题。马克思在1842年3月5日写给卢格的信中说：“我为《德法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sup>②</sup>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述，他在这些页面上反对自然权利学说。特别是，黑格尔攻击了卢梭的人类原始平等的思想，而黑格尔本人是强烈反民主的。

黑格尔将国家的起源置于个人意志中，而不是将其置于自然权利中。每个想要实现个人抱负的人，其意志都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意味着在原始社会，人的社会生活是霍布斯主义的，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主奴”关系这一章就包括原始社会生活中的斗争。黑格尔认为，这个早期的社会存在是“为承认而斗争”，这是“主人”高高在上的权力统治中没有道德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sup>②</sup>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3页。

状况。<sup>①</sup>

然而，辩证的发展过程不允许人类停留在“主奴”关系的水平。不可避免的是，辩证法要上升到客观精神的水平，在这个阶段的国家使自身在历史中在场。

在客观精神这个阶段，国家是一种道德共同体。思想的发展过程达到了道德的水平，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认识，而这种意识见证了国家的产生，或者说国家是在道德上相互依存的表述。

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同时扬弃了黑格尔所反对的国家的自然法理论以及黑格尔关于国家起源于意志的主张。对马克思来说，自然权利理论仅仅是对无限的个人索取或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的掩饰。它提供了在经济上贪婪的理由。国家在个人意志中找到其最终的起源这个思想也是马克思所厌恶的，因为他将这个主张看作是为无限的自我扩张的权利辩解。以另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在1842年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卢梭主义者了。马克思拒绝了卢梭的自然权利理论，但接受了他的民主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事实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卢梭称为黑格尔的矫正者。

亲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这个原理的影响，即国家最终建立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之上。在《法哲学原理》中，“主人”的个人主义是在市民社会和主观精神领域展开的，但在最后的分析中，个人的工具性必然被国家的普遍性所取代，而这种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运动只能通过道德手段或客观精神产生。本章的前几节也评论了黑格尔对古希腊城邦的态度。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最终来自于雅典的风俗和道德的普遍性。

麦卡锡的著作《马克思和古代思想家》包括两章，“古希腊城邦中的认识论、政治和社会正义”和“古代思想家、民主和马克思对

---

<sup>①</sup>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p. 111-119.

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该书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sup>①</sup> 麦卡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黑格尔政治理论和马克思政治理论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它表明黑格尔想捍卫国家，而马克思想要消除国家。对黑格尔来说，没有国家类似于无政府状态，“主奴”的环境或国家是文明的秩序所在。对马克思来说，没有国家意味着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终结。不管这些差别，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他们都渴望政治秩序建立在城邦共同体观念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没有将政治生活从道德中分离出来，而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尽管采用不同的方式，但都使亚里士多德将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的传统永久化。

在关于博士论文的第二个笔记本中，马克思撰写了关于古代雅典哲学发展的宏论。特别是他将在古希腊产生的主观性视为“智慧的人”或作为“智者”的人的产生。在这些关于雅典学术生活的思考中，马克思写了这段话：

因为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灵魂是实体，这实体最初作为一种自由的实体在它们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对这种实体的认识就表现在独立的存在物中，即表现在个人中。他们一方面作为优秀人物外在地和别的个人相对立，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是实体的内部生活，所以这一认识对于他们周围的现实的条件来说是内在的。<sup>②</sup>

在第二个笔记本中，马克思继而增加了这段话：

如果早期希腊哲人是实体的真正精神，是对实体的具体化的认

<sup>①</sup> McCarthy, “Epistemology, Politics,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Greek Polis: Marx and Aristotle”, and “The Ancients, Democracy, and Marx’s Critique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Marx and the Ancients*, pp. 5-39, 107-141.

<sup>②</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63页。

识；如果他们的格言也具有和实体本身一样独特的强度；如果随着实体越来越观念化，这一运动的承担者在观念生活的个人现实性中维护观念生活，而不受显现着的实体即现实的人民生活的现实性的影响，——那么观念性仍然还只出现于实体形式中。活生生的力量尚未涉及。这个时期最理想的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派和爱利亚派颂扬国家生活是现实的理性。<sup>①</sup>

亲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表达的关于国家的观点。

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研究对国家的重新定义。这表明他不同意功利主义和关于国家的自然权利理论。这也表明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君主政治是不能接受的。

马克思研究对国家的重新定义表明他受古希腊的影响有多深。在随后的著作中，我将详细地描述古希腊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他自己的政治思考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仅仅有必要注意的是，雅典是对马克思政治理论有力的影响之一。

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放弃了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理论。同黑格尔和古希腊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寻找一种支持集体主义和共同体的政治理论。黑格尔在道德和实体中找到了这个基础，而马克思发现这个基础在经济生活中。马克思使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成为实体。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是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综合。

## 九、从思辨哲学到批判

马克思在反黑格尔主义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主体问题，或者说推动发展的能动的中介。作为一个思辨哲学家，黑格尔将精神看作是主体。对马克思来说，中介或因果关系被置于个人或构成群体的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65页。

人类活动中。马克思完全重置了主体的场所。在黑格尔看来，最终的主体是精神，或者说泛逻辑的辩证的展开。

在 1839~1841 年间，尽管还在鲍威尔的影响之下，但马克思将主体转化为个人。与鲍威尔决裂后，在 1846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主观性的中心定位于生产的社会力量之中。换言之，在生产的社会力量中产生的人类活动成为变革社会的中介。

此外，鲍威尔毕生都主张自我意识的首要性。鲍威尔将个性与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并将主观的自我意识看作是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马克思再次在自己的自我意识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中模仿了鲍威尔。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这位博士候选人写道：“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sup>①</sup>

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将自身拓展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观点。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一节“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基于历史的推动力是精神而不是人类劳动的主观性思想。<sup>②</sup>此后，马克思从未放弃关于人类活动的思想，他认为人类的劳动力或精神创造力是历史发展的唯一中介。

然而，为了实现批判，有必要借鉴两种黑格尔主义的形式。由鲍威尔和马克思实践的批判成为自我意识思想与本质—现象模式的综合，而对这种综合的共识表明，马克思和鲍威尔在亲黑格尔主义方面是相似的。

本质和现象的形式在黑格尔出版于 1812 年——在《哲学史讲演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 卷，12 页。

<sup>②</sup>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 卷，312~339 页。

录》出版五年后——的《逻辑学》中得到了充分的研究。黑格尔认为，本质是事物本身。在黑格尔看来，每个事物都具有一个目的，一个由内部存在推动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其本质。本质的历史运动需要实现自身，或以极其明了的形式将自身描述为一个观察者。本质和现象处于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这种内部趋势在可感知的形式中实现。<sup>①</sup>

可以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找到马克思对批判概念最清晰的重新定义。为了提供马克思思考这个题目的最充分的观点，我引用这段很长的文本：

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但是从哲学方面来说，重要的是着重说明这些方面的特点，因为从这种转变的一定方式可以反过来推论出一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这里我们仿佛看到这种哲学的生活道路的集中表现，它的主观要点）。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自己的烙印。<sup>②</sup>

在鲍威尔和马克思看来，批判意味着反对其本质的现实衡量。由于从政治领域加以阐述，他们认为最好批判专制制度。第一步是形成关于政治的本质的理论，或者说在对政治的本质作出完整的实证考察之后，必须使之普遍化。在实现这种重新定义之后，在政治自身得以实现之后，这个本质可以与现存的普鲁士专制制度相比较。这

<sup>①</sup> Hegel, "The Doctrine of Essence", in *The Science of Logic*, pp. 314-337.

<sup>②</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



种比较是在政治的本质与普鲁士王权的现实之间作出的，这种比较证明，普鲁士王权相对于这个本质而言是有缺陷的。

马克思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借鉴的鲍威尔对批判的重新定义是鲍威尔的普罗米修斯式自我意识思想与黑格尔的本质和现象模式的结合。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也具有赞成和反对两个维度，马克思和鲍威尔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从1839年直至1883年马克思逝世，鲍威尔对批判的态度持续地保留在马克思的政治研究脉络中。

如果不承认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思想的某些特征，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毕生都使用本质和现象这个黑格尔主义的公式，事实上，这是《资本论》的核心解释工具。在马克思借用黑格尔主义的形式中，亲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是最显而易见的。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与黑格尔的体系及其泛逻辑主义有关，而马克思的亲黑格尔主义与适用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方法论有关。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中区分本质和现象这两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在黑格尔看来，本质指的是内在的必然。另一方面，在偶然中闪现的实体能成为一个事物的特征。在《哲学全书》的第三部分《精神哲学》中，黑格尔认为，主观逻辑与人类的心理学水平和人类学水平是同一的。主观精神与人类存在的这些领域有关，在这里，市民社会产生了外部环境。实体是由联合起来的外部活动建构的。例如，国家的实体是道德，或者说道德是一种社会结构，它继而成为政治生活的框架。

马克思对本质和现象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与黑格尔的用法完全一致。对马克思来说，本质指的也是内在的必然。资本主义具有一个本质；它的发展符合内在的公式。此外，政治还具有一个本质，或者说具有决定其存在的内在的质。马克思也重复了黑格尔的实体概念，因为马克思也用这个概念来界定事物。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实体；它具有一个特征即创造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本身的存在是有活力的，而实体、客体或经济价值是其存在的必然结果。

## 十、马克思的科学哲学

本章的这部分主要关注 1839~1841 年这个时期马克思的科学哲学，但为了清楚地描述他思想的这个部分，首先有必要对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以及马克思的方法加以区分。

在目前的讨论中，科学哲学意味着关于给出外部世界的知识步骤的理论。后面将要界定的马克思的方法与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是同义语。然而，马克思没有用这个方法研究自然科学，而是用它研究社会经济的构成。

同样，在这个领域，马克思是亲黑格尔主义的，因为他关注劳动所产生的现象的形式。黑格尔将这种现象学的方法用于思想的历史生产中，并关注自我意识何以产生艺术、宗教、哲学、国家或实体。马克思和黑格尔不同意主观性的定位，马克思将社会劳动作为主体，而黑格尔将精神作为主体。因此，马克思致力于研究社会劳动的生产过程，制定理解这种社会经济增殖的方法。

“关于自然的哲学”这个术语指的是对物理学或自然法的思考。关于自然的物理学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场所。然而，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此他相信，物质是自然最主要的实体，但他没进一步思考自然法的问题。

在乔治·麦卡锡的著作《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和实证主义批判》中，他认为，谢林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sup>①</sup> 麦卡锡认为，谢林使自然从黑格尔同一性理论的监禁中解放出来。黑格尔的思想依据这个假设，即概念和外部世界是不可区分的，但谢林分离了经验世界和概念世界，这样做就将自然作为思想所依靠的外部世界。麦卡锡认为，谢林脱离了同一性哲学，他使经验从概念中解放出来，为马克思开启了唯物主义视域。马克思了解谢林的著作，而麦卡锡赞成谢林关于自然的哲学著述，赞成他对经验的解放，认为他使马克思研究唯物主义思想。

<sup>①</sup> McCarthy, *Marx's Critique of Science and Positivism*, pp. 70-71.

事实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证明，他了解谢林的著作。在博士论文的题为“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的附录中，马克思提到了谢林的《哲学著作集》。<sup>①</sup>然而，马克思对谢林的评价不是肯定的；他从未归纳谢林思想有何价值。马克思没有说过他在哲学的任何方面得益于谢林。相反，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位曾经的同事的简要评价是关键的，他提请人们注意谢林的著作是深奥难懂的，谢林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在政治上实质上是保守的。

在这个附录中，马克思抄录了谢林一本书中的这句话：“向优秀的人类宣布精神自由并且不能再容忍人类为失去身上的枷锁而悲泣的时候已经到来了。”紧接着这句引文，马克思写了这句话：“如果早在1795年这样的时候就已到来，那么到了1841年又该怎么说呢？”<sup>②</sup>

这里提到的1795年指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指向。这种指向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左翼运动，它熄灭了雅各宾派的政治主张。马克思认为，谢林是对这种指向的保守主义反动。马克思推断说，谢林1841年在柏林大学的演讲相当于确立这种指向。正如我在第二章指出的，谢林被普鲁士王权召唤到柏林大学去消除自由的黑格尔主义的残余，作为反对左翼黑格尔主义的攻击者，以及君主政治和路德派正统的复兴者。作为一个左翼黑格尔派，这种辩护在马克思看来是令人厌恶的，而他将谢林视为热月政变的哲学化身。

马克思1841年对谢林的否定态度持续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sup>③</sup>和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sup>④</sup>中。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谢林的简要评论重复了他对谢林贬义的评价。马克思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99页。

<sup>②</sup> 同上书，100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21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210页。

在《神圣家族》“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sup>①</sup>这一章中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进行概述时，甚至都没有提到谢林，而马克思既然扬弃了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就不太可能接受谢林的泛神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将谢林与鲍威尔对唯物主义的拒斥联系起来。麦卡锡对谢林—马克思关系的评价是错误的，因为不是谢林向马克思指出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而是费尔巴哈这位良师益友在1841年指出唯物主义的重要性。

马克思的科学哲学在他对伊壁鸠鲁的科学哲学的态度中已经很清楚了。在他对伊壁鸠鲁的评价中，马克思也表明了他自己的原则。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第二部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具体差别”。第二部分的第二章题为“原子的质”，在这里，马克思写了这段话：

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化了的、与它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这个矛盾正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因此，在他设定原子有某种特性并由此得出原子的物质本性的结论时，他同时也设定了一些对立的规定，这些规定又在这种特性本身的范围内把它否定了，并且反过来又肯定了原子概念。因此，他把所有特性都规定成相互矛盾的。相反，德谟克利特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特性，也没有把包含在这些特性中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观化。实际上，德谟克利特的整个兴趣在于，从质同应该由质构成的具体本性的关系来说明质。在他看来，质仅仅是用来说明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的假设。因此，原子概念同质没有丝毫关系。<sup>②</sup>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8～170页。

<sup>②</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39～40页。

感性知觉从未给伊壁鸠鲁提供原子的反应。因此，原子只是伊壁鸠鲁思想中的一个概念。例如，安宁这个概念，幸福论的道德希冀，是否定上帝存在的充分理由。概念在伊壁鸠鲁和马克思的科学哲学中是决定性因素。

伊壁鸠鲁也认为，人类的自由与科学决定论是不相容的。个人的自主性与实证主义相对立。为了证实人类是自由的，伊壁鸠鲁否定了实证主义和自然决定论。同样，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毕生都坚持伊壁鸠鲁的思路。

概念优越性的原则是这两对矛盾——概念与存在的矛盾以及概念与本质的矛盾——产生的基础。这些矛盾意味着科学哲学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概念从未与存在一致。在伊壁鸠鲁和马克思看来，矛盾总是存在于概念和现实之间，因此概念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总是辩证的。形式总是为内容所否定，而否定在知识建构中是始终存在的因素。同样，概念和存在之间总是矛盾的。本质指的是事物的内部，而存在指的是现实。正如概念不可能获得存在，因此它也不可能获得本质。因而，概念和本质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或者说本质总是否定概念。

根据马克思的解释，伊壁鸠鲁坚持辩证的科学哲学。它基于概念和存在以及概念和本质的对应关系，而知识的发展是由否定的力量推动前进的。

马克思解释伊壁鸠鲁的方式是他后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范例。马克思在1839~1841年赞同的科学哲学与他后来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科学哲学是同一个范畴，采用的是同一种方法。

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哲学的轻视在我所引用的材料中显得很清楚。尽管博士论文的标题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研究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的科学哲学认为，理念是感性知觉的表象。不同于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没有把握概念的优先性，而认为理所当

然的是，理念是外部世界的表象。德谟克利特是18世纪至19世纪经验主义的古代先驱，而马克思放弃了德谟克利特的传统。

在第二部分第三章“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中，马克思还用这几段话来描述伊壁鸠鲁的科学哲学：

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单个的原子本身内，因为单个的原子具有了质。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他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

在这种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中的矛盾显然达到自己的最尖锐的实现。因为原子按照它的概念是自然界的绝对的、本质的形式。这个绝对的形式现在降低为现象世界的绝对的物质、无定形的基质了。

原子诚然是自然界的实体，一切都由这种实体产生，一切也分解为这种实体，但是，现象世界的经常不断的毁灭并不会有任何结果。新的现象又在形成，但是作为一种固定的东西的原子本身却始终为基础。<sup>①</sup>

在这三段话中，马克思再次回到了矛盾的主题上来。原子的概念往往是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和冲突。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发现劳动是社会存在的DNA之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分析社会的方法而言就是关键的了，而若不将本质和现象作为相互解释的话语，《资本论》就无法理解。

马克思从《哲学全书》的《小逻辑》中借鉴了本质和存在的用

---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49页。

法。<sup>①</sup>在这本书中，黑格尔对本质理论进行了第二次细分。事物本身发展为表象，或者说内部态势在表象中实现自身。黑格尔认为，现象是“光辉的”<sup>②</sup>，现象是“能知觉的”<sup>③</sup>。或者说现象是人类的感性知觉所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再次回到分化的世界这个黑格尔主义的主题上来。本质是纯粹的，而现象是污浊的。即使现象是本质的光辉，而本质一旦为物质所触及，便被污染了。这种污染的过程是社会生活的辩证本性形成的基础。现实世界从来就是堕落。

在他对伊壁鸠鲁的论述中，马克思还回到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上来。当马克思写到“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时，他再次指出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当原子被给予质的时候，当它的尺寸、重量和外形被指定的时候，它就立即同它的概念相异化。将异化概念融入本质和现象的公式，即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本质是劳动，如果现象是资本主义，那么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现象相异化。异化这个工具使得衡量本质和现象、劳动和资本主义何以创造一个颠倒的世界成为可能。

在他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讨论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形式的借鉴得到了明显的强调。在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著述中，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内部作出了这种分析，而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将引用一段长文。它将使我们想起，在伊壁鸠鲁看来，偶然性支配自然，而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必然性是自然的支配力量。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又正相反。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实在的可能性就像知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

---

<sup>①</sup> Hegel, "The Logic",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 2, pp. 162-200.

<sup>②</sup> Ibid., p. 186.

<sup>③</sup> Ibid., p. 188.

幻想那样是有限制的。实在的可能性力求证明他的客体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为说明的主体。只要对象是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就行了。抽象可能的东西，可以想象的东西，不会妨碍思维着的主体，也不会成为这个主体的界限，不会成为障碍物。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成为现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对象本身。

由于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符合抽象可能性性质的可能的东西，于是很显然，存在的偶然就仅仅转化为思维的偶然了。伊壁鸠鲁所提出的唯一的规则，即“解释不应该同感性知觉相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抽象可能的东西正在于摆脱矛盾，因此矛盾是应该防止的。最后，伊壁鸠鲁承认，他的解释方法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sup>①</sup>

在这两段话中，马克思重申主观的自我意识以及这个概念的自主性。由于强调伊壁鸠鲁的“解释方法”的优越性，马克思对这种优越的规定是，伊壁鸠鲁“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伊壁鸠鲁处理科学哲学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是自我意识的需要，“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伊壁鸠鲁主要感兴趣的不是符合真理的理论，不是现实和理念之间的逼真，而是自我意识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何以决定没有“感性知觉”的知识本性。

马克思讨论自我决定和自我意识同等的兴趣表现在他对现实的和抽象的可能性范畴的使用上。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中借用了这些范畴，尽管它们在上述两部著作中的表现形式不同。当我们发现马克思借用这些范畴的确切文本时，马克思吸收黑格尔方法的程度将得到阐明。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的本质学说被分为三部分：本质、现

---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7~28页。



象和现实，而可能性的逻辑在这种现实的划分中得到了简要的讨论。这种描述主要表现在第 143 段。<sup>①</sup>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将可能性界定为现实是没有矛盾的。现实必须发展，而可能性意味着现实的发展符合现实的要求。在《小逻辑》中的这种讨论不涉及抽象或现实的可能性。

黑格尔对抽象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范畴的讨论表现在《大逻辑》中，在这里，黑格尔还在他分析现实的语境中反复思考作为外部性存在的直接体现的这些形式。<sup>②</sup> 现实必须发展，而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它通过现实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形成。现实的可能性意味着选择在现实受到限制之前展开。因此，现实的可能性等同于相对的可能性。受到限制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存在。<sup>③</sup>

抽象的可能性意味着面向现实敞开的选择是无限的。这种可能性的形式具有无限选择的自由，因此，它对可能性或偶然性来说是平等的。<sup>④</sup>

在他对伊壁鸠鲁的偶然性理论的分析过程中，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的抽象和现实的可能性的逻辑范畴。在马克思对古代哲学的考察中，黑格尔是一个积极的存在。黑格尔提供了马克思把握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之间差异的方法。

马克思将德谟克利特归为“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行列。<sup>⑤</sup> 这是一种贬低的评价。相反，他将伊壁鸠鲁赞美为“怀疑论者”和“哲学家”<sup>⑥</sup>。

马克思趋向于黑格尔的双重性在他们对伊壁鸠鲁的不同解释中

① Hegel, "The Logic",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 1, pp. 202-203.

②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pp. 541-542.

③ Ibid., pp. 542-550.

④ Ibid., pp. 551-553.

⑤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 卷，29 页。

⑥ 同上书，29 页。

变得清晰可见了。马克思用黑格尔的抽象与现实的可能性的范畴来理解伊壁鸠鲁的偶然性学说。当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这些感性知觉模式时，他表现出亲黑格尔主义的方面。

相反，马克思采用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观点的深奥难懂的批判和通俗易懂的批判，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表现出反黑格尔主义的方面。

在深奥难懂的层面上，马克思拒斥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是“教条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提倡自我意识的自由，产生于感性知觉的思想的自由。有趣的是，黑格尔赞美思想的自主性，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即伊壁鸠鲁也是自由概念的倡导者。马克思使用“老师的”批判来解读伊壁鸠鲁，而在这一点上，他赞成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批判。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意识到德谟克利特的思想是原子沿直线降落，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以偏斜的方式下降。黑格尔没能成功地考察这个差异的意义，因为他只是简单地考虑到这种差别，而从未试图研究这两位古希腊原子主义者的差别的重要性。马克思确实分析了沿直线降落和偏斜下降之间的对比，而从这种审视来看，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是一个真正的“教条主义者”，但伊壁鸠鲁赞成自由意识的原则。当黑格尔未能成功地审视沿直线降落和偏斜下降这两极时，他失去了理解伊壁鸠鲁概念重要性的机会。马克思把握住这个契机，通过研究他提出了关于伊壁鸠鲁概念的自我决定理论。

马克思还反驳包含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哲学的历史编纂学”，而当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的通俗易懂的批判。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是古希腊思想衰落的体现，因为它滑入了“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泥淖。在马克思对《哲学史讲演录》的重新书写中，他以伊壁鸠鲁这个在“三巨头”之后复兴哲学的人为中心。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通俗易懂批判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的历史编纂学，这个历史编纂学认为，伊壁鸠鲁是批判的古代之父，因而是新的哲学可能性的开创者。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鲍威尔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类似。鲍威尔试图表明这个体系的实质及其在老年黑格尔派中的体现之间的差别。这个体系的本质是思想的自我决定，但不仅黑格尔在他对伊壁鸠鲁的评价中违反了原则，而且老年黑格尔派在“我们的老师”逝世之后也表现出同样的缺陷。黑格尔主义的这种表现与其体系的实质是矛盾的，这种表现无力把握伊壁鸠鲁的自由概念，使批判的宝剑埋没于普鲁士王权的沉沦之中。

这些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的逻辑范畴与黑格尔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同时摒弃了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的人们，是探索哲学新时代的“自由的”左翼黑格尔派。这正是马克思在1841年的立场。

## 十一、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在理念与历史发展的冲突中最为显而易见。“大师”解释了泛逻辑主义方面的历史发展。

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将因果关系的动力重置于主体之中，而这样做就重构了黑格尔的发展概念。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将哲学的发展过程规定为从抽象到具体、从普遍到特殊、从精神—逻辑到物质的运动。

然而，在他对黑格尔发展命题的反驳中，马克思依赖对黑格尔主义公式的具体化。<sup>①</sup> 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关注的是思辨的、泛逻辑主义的黑格尔，而他的亲黑格尔主义在他对黑格尔主义方法论公式的运用中得到了证明。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向声明主体具有因果优先性的转变，使他去研究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理论—实践的关系及批判；第二，主体和完整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否定和矛盾的辩证方法，而这两个辩证工具在主体层面采用了两种形式：理论—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00页。

实践和概念的批判。

理论—实践的模式在现象世界中展开。理论—实践的模式产生了发展，因为实践活动变更了当前的现象。这种辩证的工具关注主体否定当前现实的活动。由理论引导的实践的否定引起了环境的改变。

理论—实践的工具必然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相区别。实践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而理论—实践与政治行为相关。无论事实上理论—实践指的是公民的政治领域，而实践指的是经济—生产的领域，实践也是发展的动力。劳动和社会生产的过程否定了当前的经济条件，而通过改变物质环境，实践开动了发展的马达。

批判在理论—实践的另一个维度展开。批判关注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而理论—实践关注的是存在和活动之间的矛盾。批判在思想领域发挥其作用，主要致力于在理论中揭示现存的谬误。在批判的模式中，否定的力量不是实践的，而是在理论上对失真的现存事物的揭露。<sup>①</sup>

然而，批判将理论应用于理论—实践的模式中。通过阐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差别，批判为理论提供了一个靶子，它为理论提供了一个目的，实践着眼于其目的。目的驳斥了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确立了这两者之间新的统一。

在上述这些模式中，否定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动力。

在关于自我意识和完整的哲学体系这第二个问题上，马克思将个性视为“发展的直接力量”<sup>②</sup>，它是在矛盾中获得的。在哲学的这个发展阶段，个人的自我意识“在理论方面还未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sup>③</sup>，还未意识到当它最后走出这个体系时，它仅仅是在总体的特殊时刻实现的。在对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哲学总体的描述中，马克思

---

①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00页。

② 同上书，76页。

③ 同上书，76页。

采取的是亲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因为他以普遍—特殊的形式展开，研究部分证明整体的程度。

特殊的自我意识与普遍的哲学命令之间的两难困境是马克思在前面那段话中生动地表述过的。我将再次引用这段长文，因为它对当前的分析非常重要。

最后，哲学自我意识的这种二重性表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派别：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可以一般地称为自由派，它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而另一个派别则坚持把哲学的非概念即实在性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这第二个派别就是实证哲学。第一个派别的活动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学转向外部；第二个派别的活动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也就是哲学转向自身，因为第二个派别认为，缺点对哲学来说是内在的，而第一个派别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缺点，必须使世界哲学化。两派中的每一派所做的正是对方要做而它自己不愿做的事。但是，第一个派别在它的内在矛盾中意识到了它的一般原则和目的。在第二个派别里却出现了颠倒，也可以说是真正的错乱。在内容上，只有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而实证哲学只能产生一些这样的要求和倾向，这些要求和倾向的形式是同它们的意义相矛盾的。<sup>①</sup>

马克思清楚地将自己列入“自由的”阵营中。在界定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完整的哲学命令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是“自由的”，因为他接受了这两个理念：（1）批判，即哲学必须是实践的，换言之，必须将世界哲学化；（2）概念的优越性。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发展的恰当结果是主体性批判，或者说鲍威尔式的批判。

马克思拒斥个人的自我意识关于完整的哲学总体或“实证”方

---

<sup>①</sup>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76页。

法的第二个派别。这个实证方法的形成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接受批判的优先性；而是受制于实证的哲学体系。而且，这个实证方法的策略没有转向外部，他不是实践的，而是转向内部，转向思想本身。

在直接的发展方面，马克思还为“自由的”阵营所说服，因为“只有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另一方面，实证哲学只能产生无效的要求，因为它们是指向内部的，是指向哲学命令的，而不是指向现实的。

我刚分析的这一段是对博士论文的核心观点的简要描述。马克思在他的发展理论的结构中指出，哲学必须从抽象的总体性转向个人的主体性。在个人的主体性和有机的哲学整体之间的关系构图中，马克思选择了实践的维度、批判的尝试。

正如本章前面几节所指出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将伊壁鸠鲁描述为一个“自由的”思想家，概念的力量倡导者。伊壁鸠鲁是鲍威尔哲学的古代先贤，他证明在如同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之后，哲学还能呈现出一种特性。

马克思在1839~1841年的反实证主义表明，尽管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但马克思已经具有反对恩格斯的真理“复写论”的立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信奉真理的复写论。感性知觉在我们的精神中留下了外部事物类似复写品的印记。马克思是反对恩格斯的，因为他在这一点上赞成黑格尔。恩格斯以德谟克利特的方式成为“教条主义者”。

马克思用作博士论文准备材料的很多笔记本还包括对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评论。他对苏格拉底，古希腊的“智者”，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独特评论与他对一般哲学发展史的解释相符合。苏格拉底的意义在于这个事实，即他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的象征。

在第二个笔记本中，马克思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的实质性的体现者。马克思在第二个笔记本中写道：

主观性在它的直接承担者〔苏格拉底〕身上表现为他的生活和他的实践活动，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通过此种形式他把单独的个人从实体性的规定性引到自身中的规定；如果撇开这种实践活动，那么他的哲学内容就仅仅是善的抽象规定。他的哲学就是，他促使实体上存在着的表象、差别等转化为自身的规定；但是自身规定的唯一内容就是成为这种分解的反思的容器。<sup>①</sup>

这位古希腊的“智者”是随着事物的发展，主观性必然也采取实践转向的例证。规定的来源不仅必然从抽象变为具体，主体的目的也必然得到改变。主体的目的必然从理论转向批判，转向否定现存事物的活动。<sup>②</sup> 马克思将伊壁鸠鲁描绘为一个“智者”，或实践批判的个人。如果这样的话，伊壁鸠鲁代表了能从古希腊哲学史中得到的两种启示。

首先，古希腊哲学的完善在于伊壁鸠鲁，而不在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思想的三巨头。这三巨头将哲学理论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伊壁鸠鲁将古希腊思想转向实践。其次，伊壁鸠鲁证明，即使在完整的哲学体系形成之后，哲学本身还拥有未来。逐步的发展是持续的，而即使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之后，哲学还在伊壁鸠鲁的描述中开启新的视域。在他对伊壁鸠鲁的解释中，马克思指出，左翼黑格尔派的时代即将到来。黑格尔没有导致哲学的终结，但黑格尔左派必然以黑格尔提出的问题为工具，并使之转向实践，或使之成为否定目前社会存在的手段。

马克思对苏格拉底这位“智者”的象征以及伊壁鸠鲁的解读表明，他具有一种反黑格尔的立场。马克思提出对主观自我意识的彻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69页。

<sup>②</sup> 同上书，69页。

底辩护，而黑格尔没有。黑格尔将古希腊的原子主义和唯物主义视为衰落的表征，而马克思将伊壁鸠鲁视为古希腊思想的实现者。马克思认为，苏格拉底是普罗米修斯，而黑格尔认为，雅典对苏格拉底的起诉是正当的。黑格尔总是停留在抽象、逻辑和实在上，而马克思提倡个人、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自我意识。

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与“老师”决裂。相反，即使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的缺陷，他也确信黑格尔思想的创造性方面。在他的第六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写道：

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激情就 [比黑格尔——作者注] 更富内容，更热烈，对启蒙教育的社会精神更为有益——亚里士多德以这种激情颂扬“理论认识”是最美好的……斯宾诺莎以这种激情论述关于“从永恒的角度”观察世界……黑格尔以这种激情揭示观念的永恒存在，精神世界的庞大机体。因此，柏拉图的激情在达到登峰造极时就使他变得如痴如狂，而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激情则燃烧成纯洁的理想的科学之火；因此前者只是个别人的感情的加温器，而后者则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sup>①</sup>

无视使马克思与黑格尔相分离的重要差别这些事实，马克思仍然将黑格尔视为“科学之火”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由于相信黑格尔对当代德国哲学，甚至黑格尔左派仍有教育意义，马克思捍卫“老师”以反对那些试图在总体性中消解黑格尔的人们。对于那些看到黑格尔捍卫雅典对苏格拉底判决的人们而言，他们有理由与黑格尔彻底决裂，而马克思只是加以指责。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部分传统必须得到利用。与其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没有断裂，毋宁说黑格尔思想的独特方面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了延续。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42页。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提出了鲍威尔的观点。马克思基本上以鲍威尔的主要观点来展开对古希腊思想的解释，或展开从泛逻辑主义到个人自我意识的运动。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不仅基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向，而且基于辩证法。在第六个笔记本中，马克思这样阐述道：“死和爱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神话，因为辩证法是内在的淳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sup>①</sup>

在1839~1841年对辩证法的这种定义中，马克思强调“否定的”方面。当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否定”的时候，由于消解现存的事物，他为其发展理论增加了另一个维度。他证明历史发展来自于对现实的解构。他在这里再次与鲍威尔的观点相同。

在第七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对他在1839~1841年就已经形成的发展理论加以简要的概述。

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像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同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因为哲学家是了解他们自己的。哲学史应该把那种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这种主体意识是那些哲学论述的容器和动力。在把这种意识区别开来时应该彻底研究的正是它的统一性，相互制约性。在阐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体系时，为了把对体系的科学阐述和它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这个关键因素是绝对必需

---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44页。

的。这一联系所以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个存在是历史的。但是与此同时哲学史还应该被确定为哲学的联系，——因而，它应该根据它的本质来展开。最不可取的是仅仅根据威望和真诚的信仰来断定哪一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尽管这种威望的体现者是整个民族并且这种信仰已存在了千百年。要提供证明，只能够通过揭示这一哲学的实质。<sup>①</sup>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认为，每个哲学体系都是一个整体。它们都是由各个独特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效的运动从总体、抽象到规定、部分。

“编纂哲学史”的职责是规定部分，或曰是规定每个主观的自我意识。哲学学者的目的是“区别”每个哲学家，表明每个独特的哲学家何以将自身个性化以反对整体。马克思的视角基于黑格尔的整体和部分的观念。

哲学体系的总体性是由批判所推动的，或者说批判是创造发展条件的否定的力量。否定与取代类似。当总体的一部分通过取消、批判而被取代时，整个体系都向前发展了，或者说都被改变了。

然而，取消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认为，否定和保留不是不相容的。包容的过程指的是一个事物被取消，继而被吸收到一个有机的系统中，因而保留了那个事物的行为。显然，事物的本性将被改变，其个性将被消除，但它将作为整体的部分被保留在不同的地方。<sup>②</sup>

后来，当马克思开始研究社会经济总体性的时候，马克思倾向于将它们解释为包含内在矛盾的系统。由于受到黑格尔哲学的训练，马克思需要从概念的角度将社会总体性解释为对立面的冲突。马克思从威廉·舒尔茨那里知道，社会包含着内在的否定，威廉在 1843

---

① 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0 卷，170 页。

② 同上书，138 页。

年出版了《生产的运动》这本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过该书的内容。在《生产的运动》中，舒尔茨第一次将社会发展描述为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借用了舒尔茨的这个范式，但马克思将社会视为对立力量的冲突这种学术倾向已经得益于黑格尔的矛盾理论。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受到舒尔茨的启发，用它来研究社会经济有机体，而黑格尔将辩证法限制在思想领域。

马克思在1841年就预见到了舒尔茨的观点，而赫斯、奥古斯特·采什科夫斯基或黑格尔左派的共产主义一翼都没有预见到。《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参考文献中没有提到奥古斯特·采什科夫斯基，而赫斯的著述也只是以一篇文章的标题“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问题”被列入。在1841年，马克思还没有信奉赫斯和采什科夫斯基的无产阶级乌托邦主义。从政治的视角来看，科本和鲍威尔是自由的改革者，而马克思追随他们，成为温和的改革派，正如他在《莱茵报》的新闻生涯所见证的。

历史理念是“编纂哲学史”的预设。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思想艺术的画廊，如同客观物质。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而且是当前的，也是精神的未来。

马克思保留了历史的核心，却改变了它的内容。在他思想的成熟时期，马克思主要关注社会经济结构的起源。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取决于历史理念。他攻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锋利的箭指向李嘉图和斯密对历史的忽视。马克思驳斥他们，因为他们认为经济范畴是永恒的，而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结构的历史学。

此外，黑格尔本人也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德国人道主义传统的表述者。这个学派的宗旨是道德自律和自我决定。黑格尔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规定这些术语。正如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做的，他以德国自由主义拒斥黑格尔对专制政治的捍卫，攻击他对个人权利的忽视。然而，黑格尔的全部著作都描述了自由的发展，尽管黑格尔对自由的规定存在着差别。《精神现象学》以

“绝对知识”这一章结束，《小逻辑》和《大逻辑》都使逻辑的发展追随理念，或曰抽象的自我决定。不管内容这个问题，他使用的语言，他对精神的永久化，都包含着德国人道主义的传统。

尽管他拒斥了黑格尔对自由和自我决定的定义，但马克思自己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忠实代言人。同样在这个领域，马克思消解了黑格尔的内容，但他确实将反映德国启蒙运动的黑格尔的精神永恒化。马克思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遗产的继承者。

自我决定的理念是马克思伦理学的核心所在。马克思将自我决定读作从社会经济中产生的人类状况，而黑格尔将自我决定理解为精神的表现。但解放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而通往普遍解放的动力是由黑格尔的人道主义激活的。

黑格尔的人道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通过科本的影响实现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这本书使马克思关注何以将德国人道主义指向政治实践或宪政改革领域。科本还开启了马克思关注古希腊—罗马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视野。

在1841年，马克思的思想由黑格尔的方法论、鲍威尔的批判与科本的政治实践组成。

## 十二、马克思的方法

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思想的形式和构造为他提供了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论。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主要用黑格尔的方法论原则解释伊壁鸠鲁的思想，而他研究伊壁鸠鲁时使用的同样的公式后来被用于对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中。

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形式—内容批判。虽然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内容，但他借用了黑格尔的解释形式。这是马克思亲黑格尔主义的核心要素。马克思所拒绝的黑格尔的内容是精神的泛神论和逻辑的泛神论。

马克思重置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性是

人—社会的活动以及人—社会的劳动。马克思以主—谓的解释公式取代了泛逻辑主义，并将这个公式转化为个人—社会。在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的改写中，精神上 and 逻辑上的普遍主义转变为物质上的特殊性。

在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还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但当他以人类的社会活动取代自我意识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者了。当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力取代自我意识的时候，他就跳出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的束缚。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破裂也使马克思改变了辩证法的实质。它不再是自我意识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在辩证法中，原动力不再是意识，而是物质生产力。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方法论指向与黑格尔不同的事物。马克思用这些形式去分析社会，而黑格尔用这些形式去研究理念。黑格尔的目的是了解理念如何发展，他希望这些逻辑的公式能够解释历史。马克思的目的是了解社会经济的总体如何发展，他希望用这些方法论原则解释历史。

为了确证马克思借鉴和使用黑格尔方法论的程度，我在下面列出了所有他用来分析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结构。所有这些结构都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得到了使用，它们也都是在《资本论》中再次出现的结构。

A) 有机的认识。(1) 总体性；(2) 有机的；(3) 本质；(4) 内在；(5) 自在和自为；(6) 发展，或历史；(7) 本质和现象；(8) 实现，现实化；(9) 整体和部分；(10) 普遍—特殊：结构；(11) 反映，中介。

B) 认识的外化。(12) 对象化，预言；(13) 异化；(14) 辩证法：外化；(15) 实体。

C) 认识的工具。(16) 概念；(17) 抽象；(18) 形式—内容；(19) 规定；(20) 矛盾，否定；(21) 辩证法，认识；(22) 普遍—特殊，认识。

在后面的段落中，我将对每一个认识模式加以简要的分析。在第八个部分“发展理论”中，我解释了马克思关于历史更替或“编纂哲学史”的普遍结构。通过对这种特殊认识模式的考察可知，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所遵循的方法是能被理解的。

我对这些个别认识模式的分析将是简要的。本书后面两卷在论述马克思方法论这方面的拓展将更详细地讨论目前这些认识形式，并增加这些方法论范畴的目录。由于我在此处的意图只是去介绍它们，因而我对它们内容的考察只是为了使读者熟悉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一般目的。

#### A) 有机的认识

##### (1) 总体性

由人一社会的活动在历史中产生的形式必然被视为总体。判断人类活动的原子论的路径只能导致历史客观性的错位，因为这种客观性只能被正确地理解为综合的和整体的系统。

##### (2) 有机的

这些总体与有机体是类似的。它们可以与生物系统相比较，其中每部分都致力于生物体的功能运作和维护。

##### (3) 本质

本质是全部总体的目的。本质既是根源，即任何统一的体系的起点，又表现为这个体系的发展，它的产生完全符合原始胚胎的结构。

##### (4) 内在

总体的内在发展趋势完全符合其最初的起源。总体的必然性的展开符合其预设的种类。

##### (5) 自在和自为

自在是有机体的本质；它是符合自身属性的必然表现。

自为是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不是完全孤立的，而自为就是对所有在与另一个特殊性的关系中存在的特殊性，或者说作为整体的部分的阐述。

(6) 发展，或历史

历史性是所有人和社会存在的条件。存在在本质上是历史的。

(7) 本质和现象

这是在马克思的全部科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它指的是总体的内在实质和该总体的外部表现之间的脱节。如果本质是一个系统的内在趋势，那么本质和现象就关系到这两者的极端。一个系统的现象有别于该系统的自在之物。

(8) 实现，现实化

一个系统的自在的原则必然得到体现。一个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势表现为从本质到现存，到实在。

(9) 整体和部分

总体性必然被视为整体和部分的统一。部分被归纳在整体中，被转化为整体的工具，但它们的共存仍然得到保留，仍然是存在的，尽管表现为变化了的形式。

(10) 普遍—特殊：结构

普遍—特殊是整体和局部的同义词；系统的目的规定各个部分；普遍性包含着各个部分。

(11) 反映，中介

事物从未在孤立中出现。事物总是彼此相关的，它们总是在一个背景中被看到。事实上，它们的定义来自于它们的背景。

所有这些有机的范畴都是解释一个统一的系统如何维持自身的手段，或者说解释一个统一的系统的每个部分如何维持或反映整体的手段。

B) 认识的外化

(12) 对象化，预言

这些范畴关系到思想的生产过程。思想的实质是消费，当消费之后，思想生产出事物。连续性使消费和生产联系起来，而事物的发展过程是永不终止的。

另一条描述对象化的路径是从含蓄到明确的变化。自在之物，

含蓄的存在，在事物的明确性中持续地闪耀。

### (13) 异化

一旦事物由思想所创造，它就与其自身的起源相异化。一旦事物由思想所塑造，它就因来自于思想而表现为独立的存在。

### (14) 辩证法：外化

辩证法的一方面在外化的领域是活跃的。在这个领域，辩证法指的是一种对象化为另一种对象化所取代的过程。正如我在“对象化，预言”这段所指出的，思想的依次实现是持续的，因此，当在外化的语境中使用辩证法的时候，它指的是过去的思想对象对新的思想对象的持续超越。

### (15) 实体

实体是由人类思想所生产的，因而是外在的和客观的。实体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或者说主体外化的结果。实体是维持创造性活动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变成了实体。

## C) 认识的工具

### (16) 概念

概念是事物的属性，它是赋予事物的特殊性以意义的构成原则。概念是为事物特殊性提供意义的解释工具。

### (17) 抽象

抽象是概念的同义语。它是使观察者构成并传达个性的意义的普遍原则。概念和抽象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他的科学理论取决于它们。

### (18) 形式—内容

普遍—特殊的形式存在于认识领域。内容是特殊，感性知觉，而这仅仅需要在形式或概念中获得意义。形式—内容指的是内容的活动，由概念加之于外部世界的具体化。

### (19) 规定

概念不仅消费自身，而且对自身加以详细表述。每个概念都是以属性一种类的模式塑造的，而因为概念是属性，因而属性的具体



化和特殊化就形成了种类。

(20) 矛盾，否定

矛盾和否定意味着排斥，或者说一个事物不能获得其个性，除非它排斥他者。当一个事物被视为具有与他者有所区别的特征的时候，他的个性就产生了，这种有区别的事物只有在它与他者产生矛盾或否定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21) 辩证法，认识

正如在认识中所体现的，辩证法是螺旋式上升的，正如他否定了此前的规定。作为一种认识的工具，辩证法使人们将现实视为一系列的变革，其中一种规定为另一种规定所否定和超越。

(22) 普遍—特殊，认识

作为一种认识模式，普遍—特殊是三段论中的两段。在这个三段论中，作为历史运动的基本动力，普遍是与特殊相抵触的，但这种否定在个体中实现了和解，普遍和特殊在其中是相互调和的。对马克思来说，认识意味着对现实——被视为力量冲突的领域和助长相互否定的领域——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Adorno, Theodor, and Marx Horkheimer, *The 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E. B. Ashton,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2.
- Adorno, Theodor, *Hegel; Three Stud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 Adorno, Theodor, *Minima Moralia*, Translated by E. F. N. Jephcott, London, Verso Books, 1978.
-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 Translated by E. B. Ashton,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ers, 1973.
- Adorno, Theodor, *The Culture Industry*, Translated by J. M. Bernstein,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Althusser, Louis,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lated by Graham Lock, Atlantic Highlands, N. J., New Left Books, 1976.
-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9.
-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 Althusser, Louis, *Louis Althusser: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by G. 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Books, 1997.
-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 Anderson, Kevin,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 Anderson, Perry,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 New Left Books, 1976.
- Arndt, Andreas, *Karl Marx*, Bochum, Germany, Bochum Verlagersanstalt, 1985.
- Arthur, Christopher, *The Dialectics Of Labor*, Oxford, Blackwell, 1986.
- Althusser, Louis, *The New Dialectics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Holland, Brill, 2004.
- Avineri, Schlomo,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Althusser, Louis, *Moses Hess: Prophet of Communism and Zion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 Althusser, Loui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Backhaus, Hans-Georg, "Material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In *Gesellschaft Beitra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 3, Frankfurt, 1975: 122-159.
- Benton, Tom,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4.
- Bowie, Andrew, *Schelling and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Brentel, Helmut, *Widerspruch und Entwicklung bei Marx und Hegel*, Frankfurt, West Germany, Universität Frankfurt, 1986.
- Butler, E. M., *The Saint Simonian Religion in Germany*, New York; H. Fertig, 1968.
- Butler, E. M., *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 Carens, Joseph, *Equality, Moral Incentives, and the Mark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 Carver, Terrell, *Engels After Marx*,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arver, Terrell, *Marx and Engels*,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arver, Terrell, *The Postmodern Marx*, University Park, Pa.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ohen, Gerald A. , *History, Labor and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Cohen, Gerald A. ,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ohen, Gerald A. ,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ohen, Gerald A. ,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Demetz, Peter, *Marx, Engels and the Poets*, Translated by Jeffrey L. Samm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Derrida, Jacques, *Spectres of Marx*, Translated by Peggy Kamuf, London, Routledge, 1994.
- Dickey, Laurence,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Draper, Hal,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I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 Demetz, Peter, *Sour Grap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Demetz, Peter, *Dialectics of Nature*, Translated by Clemens Dut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0.
- Demetz, Peter, Die Entwicklung des Soc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Marx-Engles Werke*, B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181-227.
- Demetz, Peter,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Marx-Engles Werke*, Bd. 21, Berlin, Di-

- etz Verlag, 1982: 263-307.
- Demetz, Peter, *Outline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conomic-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Edited by Dirk J. Strui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4: 197-226.
- Elster, Jon,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Engels, Friedrich, *Anti-Dühring*, Translated by Emile Bur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 Gadamer, H. G., *Hegel's Dialectic: Five Hermeneutical Studies*, Translated by P. Christopher Smith,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Gould, Carol, *Marx's Social Ont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8.
- Gramsci, Antonio, *Prison Notebooks*, Translated by Quentin Hoa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 Habermas, Jürge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 Harris, H. S., *Hegel's Development: Toward the Sunli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 Harris, H. S., *Hegel's Development: Night Thou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 Hegel, G. W. F., *Jenaer Realphilosophie*, Edited by J. Hoffmeister, Hamburg, West Germany, Felix Meistner, 1967.
- Harris, H. 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H. S. Harris and Walter Cerf,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7.
- Harris, H. S.,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3 Vol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all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Harris, H. S. ,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3 Vols, Translated by E. S. Haldane, Lincoln, Nebr. ,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Harris, H. S. ,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Harris, H. S. ,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 Siblee, Buffalo, N. Y. , Prometheus Books, 1991.

Harris, H. S. ,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Atlantic Highlands, N. J. , Humanities Press, 1975.

Harris, H. S. , *System of Ethical Life*, Translated by H. S. Harris, Albany, N. 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9.

Heine, Heinric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 Translated by John Snodgras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

Hillman, Gunther, *Hegel und Marx*, Frankfurt, Europäischer Verlaganstalt, 1966.

Hobsbawm, Eric,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 I ,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Hyppolite, Jean, *Studies in Hegel and Marx*, Translated by John O'Neill,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Hyppolite, Jean,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Evanston, Ill.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Ijlenkow, E. W. , *Die Dialektik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n "Kapital" von Karl Marx*, Berlin, West Germany, Verlag Das Europäische Buch, 1979.

Jedrestski, Joachim, *Gutzkow als Pionier des Literarischen Journalismus*, Frankfurt, West Germany, Suhrkamp, 1988.

Jones, Gareth Stedman, "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In

- The History of Marxism*, Edited by Eric Hobsbawm, Vol. 1,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290-326.
- Jones, Gareth Stedman, "Introducti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Penguin Publishers, 2003.
- Kadarkay, Arpad, *George Lukacs: Life, Thought, Pol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Kittsteiner, Heinz-Dieter, "Logisch und Historisch", In *International Wissenschaft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3 Jahrgang, 1977: 93153.
- Kojève, Alexander,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lated by James H. Nichol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 Kol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Köppen, Karl Friedrich,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Leipzig, Germany, Karl Dietz Verlag, 1840.
- Korsch, Karl, *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Fred Halliday, London, New York Books, 1970.
- Kosik, Karel, *The Dialectic of the Concrete*, Translated by G. 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Books, 2003.
- Kouvelakis, Stathis,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G. 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Books, 2003.
- Krahl, Hans-Jürgen, "Bemerkung zum Verhältnis von Kapital und Hegelscher Wesenslogik", In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 Edited by Oskar Negt, Frankfurt, Europäischer Verlag, 1970: 137-150.
- Lauer, Quentin, *Hegel's Ide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1.
- Lenin, V, *Werke*, Bd. 38, East Berlin, East Germany, Diet Verlag,

1981:78.

Levin, Norman, "Completion, Death, Heritage", 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19, 1979: 49-59.

Levin, Norman,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4.

Levin, Norman, "Hegel and the 1861-1863 Manuscripts of Das Kapital",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4, No. 4, Winter, 2002: 47-58.

Levin, Norman, "Hegelianized Leninism", In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 1984: 257-316.

Levin, Norman, "Marx's First Appropriation of Hegel", In *Critique*, Vols. 36-37, June 2005: 125-154.

Levin, Norma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Translated by Norman Levin,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Levin, Norman,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les*, Santa Barbara, Calif., Clio Press, 1975.

Löwith, Karl,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Translated by David Gree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4.

Lukacs, Geo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1.

Lukacs, Georg,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Darmstadt, Germany,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1972.

Lukacs, Georg, "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83-222.

Lukacs, Georg, *The Young Hegel*,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6.

Lukacs, Georg, "What is Orthodox Marxism?",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20-42.



- Marcuse, Herbert, *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 Translated by Seyla Benhabib,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Marcuse, Herbert,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 Marx, Karl, *Capital*, Vol. 1,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 Marx, Karl, *Capital*,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Vintage Books, 1981.
- Marx, Karl, *Capital*, Vol. 3,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Vintage Books, 1981.
- Marx, Karl,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and Philosophy as a Whole", In *Economic-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Edited by Dirk Strui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3: 171-193.
- Marx, Karl,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Joseph O'Mal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arx, Karl,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State: Introduction", In *Writing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249-264.
- Marx, Karl, *Early Writings*, Edited by Lucio Collett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 Marx, Karl, *Economic-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Edited by Dirk Strui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3.
- Marx, Karl, *Grundrisse*, Translated by Martin Nicola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 Marx, Karl,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Marx, Karl,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ited by Loyd D. Easton and Kurt H. Guddat,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1967.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s, 1-35(MECW),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ert, 1976.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1-32, (MEGA), East Berlin, East Germany, Dietz Verlag, 1976.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mocritus' and Epicurus' Philosophy of Nature", In *MECW*, Vol. 1,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6.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Translated by Roy Pasc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7.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Holy Family*, Translated by R. Dixon, Moscow, USSR, Progress Publishers, 1956.
- Mayer, Gustav, *Friedrich Engels*, Translated by Gilbert and Helen Highe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36.
- McCarthy, George E. , *Marx and the Ancients*, Savage,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1990.
- McCarthy, George E. , *Marx and Aristotle*, Savage,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1992.
- McCarthy, George E. , *Marx's Critique of Science and Positivism*, Dordrecht, Holland, Kluwer Academic, 1988.
- McClellan, David,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London, Macmillan, 1969.
- Meikle, Scott, *Essentialism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Macmillan, 1969.
- Murray, Patrick, *Marx's Theor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tlantic Highlands, N. J. , Humanities Press, 1988.
- Negt, Oskar,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 Frank-

- furt, Suhrkamp, 1970.
- Nielson, Kai, and Robert Ware, *Exploit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97.
- Nozick, Robert, *Anarchy, State,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 Pepperle, Heinz, and Ingrid Pepperle, *Die Hegelische Linke*, Leipzig, East Germany, Verlag Philipp Reclam, 1985.
- Pinkard, Terry,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ippin, Robert B., *Hegel's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Reichelt, Helmut, "Warum hat Marx seine dialektische Methode versteckt?",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 Forschung*, Berlin, 1996; 73-110.
- Roemer, John,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Rosen, Zvi, *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The Hague, Holland, Nijhoff, 1977.
- Rosental, Mark, *Voprosui Dialektiki v Kaptiale Marksa*, Moscow, Sovetskii pisatel, 1955.
- Rosdolsky, Roman,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Frankfurt, West Germany, Europäischer Verlagsanstalt, 1969.
- Rubel, Maximilien, and Margaret Manale, *Marx Without Myth*, New York, Harper Torchbacks, 1976.
- Sartre, Jean-Paul,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Smith, London, Verso Books, 1976.
- Sartre, Jean-Paul, *Search for a Method*, Translated by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 Schelling, Friedrich, *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a Philosophy of Nature*, Translated by Keith R. Peterson,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Schmidt, Alfred,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West Germany, Suhrkamp, 1969.
- Schmidt, Alfred, *History and Structure*, Translated by Jeffrey Herf,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3.
- Schneider, Manfred, *Die Kranke Schöne Seele der Revolution*, Frankfurt, West Germany, Suhrkamp, 1980.
- Shaw, William H.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Sheehan, Helena,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
- Smith, Steven B., *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Smith, Tony,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Smith, Tony, *The Logic of Marx's Capital: Replies to Hegelian Criticism*,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 Taylor, Charles,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aylor, Charles,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Toews, John, *Hegel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van Parijs, Philippe,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otowa, N. J., Rowman & Littlefield, 1981.
- van Parijs, Philippe, *Marxism Recycl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hite, Alan, *Schell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stem of Freedom*,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Wood, Allen,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Wright, Eric Olin, *Reconstructing Marxism*, London, Verso Books, 1992.
- Zeleny, Jindrich, *The Logic Of Marx*, Translated by Terrell Carver, Totowa, N. J. , Rowman & Littlefield, 1980.

## 索 引

- Absolute idea, 165  
 abstract-concrete, 44-45, 226  
 abstraction, 45  
 Adorno, Theodor, 17-35, 83  
     *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18-20  
     *Hegel: Three Studies*, 20-21  
     *Minima Moralia*, 22-23  
     *Negative Dialectic*, 18-20, 83  
 alienation, 225  
 Althusser, Louis, 25-37  
     epistemological break, 2, 26, 27,  
     30, 32, 36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32-33  
     *For Marx*, 27-28, 31-32  
     intervention, 31-32  
     *Lenin and Philosophy*, 36-37  
     *Man, That Night*, 27  
     *On Content in the Thought of*  
     *G.W. F. Hegel*, 28  
     *Reading Capital*, 27-29, 31  
     structural causality, 33  
     *The Return to Hegel*, 27-28  
 绝对理念  
 抽象—具体  
 抽象  
 泰欧多尔·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黑格尔：三篇研究》  
     《最低限度的道德》  
     《否定的辩证法》  
 异化  
 路易·阿尔都塞  
     认识论断裂  
     《自我批评论文集》  
     《保卫马克思》  
     干预  
     《列宁和哲学》  
     《男人，那夜》  
     《论格·威·弗·黑格  
     尔思想中的内容》  
     《解读〈资本论〉》  
 结构因果性  
     《转向黑格尔》

- theory of science, 30-32, 35-36
- Analytic Marxism: dialectical deduction, 64-65
- functional explanation, 65
- game theory, 61, 69
- 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 63
-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61, 63
- rational choice theory, 61, 67-68
- redistributive justice, 69
- social choice theory, 63
- teleology, 65
- withdrawal clause, 69
- Arthur, Christopher, 61, 79, 81-82
- The New Dialectic*, 81
- systematic dialectic, 82
- Backhaus, Hans Georg, 38-39
- Material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39
- Bauer, Bruno, 118-119, 120-122, 185-191, 206-208, 215, 222
- Börne, Ludwig, 103-105, 109-111
- Carver, Terrell 91
- Cohen, Gerald A., 61, 70-75, 78-80
- functionalism, 70-73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80
-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75
- 科学理论
- 分析马克思主义: 辩证的演绎法
- 功能解释
- 博弈理论
- 方法论集体主义
- 方法论个人主义
- 理性选择理论
- 再分配的正义
- 社会选择理论
- 目的论
- 撤回规则
- 克里斯托弗·阿瑟
- 《新辩证法》
- 体系辩证法
- 汉斯-乔治·巴克豪斯
- 《重构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材料》
- 布鲁诺·鲍威尔
- 路德维希·白尔尼
- 特雷尔·卡弗
- 葛兰德·科亨
- 功能主义
- 历史唯物主义
- 《如果你是个平等主义者, 你怎么能如此富有》

- Images of History in Hegel and Marx*, 73
-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70
- Restrictive and Inclus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71, 73
- substructure-superstructure, 70, 80
- concept, 155, 160-161, 211, 226
- contradiction, 212, 226
- Critical Theory, 17, 24-25, 57-59
- critique, 191, 206, 216
- Deborin, Abram, 37
- de-Hegelianization, 1-14, 17, 22, 25-35, 61-70
- determination, 226
- development, 162, 163, 215-220, 224
- diachronic, 49
- dialectic, 225, 226
- systematic dialectic, 82
- negative dialectic, 19-29, 24
- Diamat*, 6, 34, 37
- Draper Hal, 90
- Elster Jon, 60-67, 72
- dialectical deduction, 64-66
- Making Sense of Marx*, 62, 67
- 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 63
-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图像》
-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
- 《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
- 基础—上层建筑
- 概念
- 矛盾
- 批判理论
- 批判
- 阿布拉姆·德波林
- 去黑格尔化
- 限定性
- 发展
- 历时的
- 辩证法
- 体系辩证法
- 否定的辩证法
- 达美特
- 哈尔·德雷珀
- 乔恩·埃尔斯特
- 辩证法的演绎
- 《理解马克思》
- 方法论集体主义



-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61, 63
- rational choice theory, 63-64
- Sour Grapes*, 63
- Engels, Friedrich, 1-14, 34, 89-147
- copy theory of truth, 218
- Diary of a Guest Student*, 137-138
- Divided Self, 94-98
- First Appropriation of Hegel, 91-92, 146
- Friedrich William IV, King of Prussia*, 114
- German History, 101-103
- Hess on the Young Engels, 142
- logical pantheism, 131
- Schelling on Hegel*, 129
- Schelling and Revelation*, 128-130
- Schelling, The Philosopher in Christ*, 136
- self-evaluation, 145-146
-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131
- 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Prussian Press Law*, 143
- Triumph of Faith*, 120-122
- young Engles, 92-93
- young Engles and Bauer, 132
- young Engles in Bremen, 119
- young Engles and the dialectic, 134-135
- 方法论个人主义
- 理性选择理论
- 《酸葡萄》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真理复写论
- 《一个旁听生的日记》
- 自我分化
- 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 德国历史
- 赫斯论青年恩格斯
- 合乎逻辑的泛神论
- 《谢林论黑格尔》
- 《谢林和启示》
- 《谢林——基督哲学家》
- 自我评价
- 主体和客体
- 《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
- 《信仰的胜利》
- 青年恩格斯
- 青年恩格斯和鲍威尔
- 青年恩格斯在不来梅
- 青年恩格斯和辩证法

- young Engles and the first meeting with Marx, 139-141 青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第一次会见
- young Engles and the Free, 121, 122 青年恩格斯和自由人
- young Engles and the young Germany, 106, 111 青年恩格斯和青年德意志派
- young Engles and Hegel, 100, 112-116, 127-130, 132-133, 135-136 青年恩格斯和黑格尔
- young Engles and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143-144 青年恩格斯和历史法学派
- young Engles and Leo, 142 青年恩格斯和莱奥
- young Engles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33 青年恩格斯和《精神现象学》
- young Engles and Schelling, 123-127, 130 青年恩格斯和谢林
- young Engles and the Young Hegelians, 110-111, 119 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黑格尔派
- Engels, Marie, 95-97 玛丽·恩格斯
- Engelsism, 1-8, 89, 133-134, 142-144, 146-147 恩格斯主义
- Engelsian Hegeianized Marxism, 6-8 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
- First Appropriation of Hegel, 91-92, 112-116 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 Second Appropriation of Hegel, 91-92 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
- essence, 26, 156, 211-212, 224 本质
- essence-appearance, 18, 20, 206-208, 211-212, 216 本质—现象

- Existential Marxism, 26, 32  
 Exploitation, 67-68, 74-75  
 Feuerbach, Ludwig, 31, 32  
     Feuerbachian Humanism, 32  
 form-content, 223, 226  
 functional explanation, 30, 61, 66-67, 70-73, 80-81, 165  
 Gans, Eduard, 112-113, 115-117, 128, 138, 143-144, 153  
 Graeber, Friedrich, 95-96, 98-100, 109, 112, 114, 138  
 Graeber, Wilhelm, 98, 104, 112, 138  
 grand narrative, 18-19  
 Gutzkow, Karl, 94, 107, 110-111  
 Habermas, Jürgen, 93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83  
 Hegel, G. W. F., 18-22, 25-35, 51-55, 77-79  
     *Collected Works*, 153  
     *Das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10-11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166  
 Epicurus, 171-176  
 Hegel and Schelling, 125-126  
*Jenaer Realphilosophie* I and II, 10-11  
 labor process of thought, 154-159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剥削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  
 形式—内容  
 功能解释  
 爱德华·甘斯  
 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弗里德里希·威廉  
 宏大叙事  
 卡尔·古茨科  
 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格·威·弗·黑格尔  
     《选集》  
     《伦理学体系》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伊壁鸠鲁  
 黑格尔和谢林  
     《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  
 思想的劳动过程

-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67-178 《哲学史讲演录》
- method, 160-166 方法
-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54-56 《精神现象学》
- process of production, 154-159 生产过程
- Science of Logic*, 13-15 《逻辑学》
- Spirit, 166, 206 精神
- theory of knowledge, 159-160 认识论
- Twentieth Century Hegel revival, 10, 28 20 世纪黑格尔的复兴
- Young German Movement, 106-110 青年德意志运动
- Young Hegel, 14-16 青年黑格尔
- Hegelianized Marxism, 41 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
- Heine, Heinrich, 104-105 海因里希·海涅
- Hess, Moses, 139-141 莫泽斯·赫斯
- Hess on Engels, 142 赫斯论恩格斯
- Hess on Marx, 142 赫斯论马克思
- Hobsbawm, Eric, 90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Horkheimer, Max, 18, 57 马克斯·霍克海默
-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rch, 56-57 社会研究所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clus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71 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
- restrict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71 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
- historicity, 29, 31, 158, 222 历史性
- Hyppolite, Jean, 50-55 让·伊波利特
-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5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成因和结构》

- Hegel Revival of the 1950s, 51
-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51
- Iljenkow, E. V., 37
- immanence, 156, 224
- “in-itself” and “for-itself”, 224
- instrumental reason, 18-19, 83
- Jones, Gareth Stedman, 90
- Kojève, Alexander, 51
- Köppen, Friedrich, 179-184
- 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 222
- Kosik, Karel, 37
- Krahl, Hans-Jürgen, 38-39
- Bemerkung zum verhältnis von kapital und Hegelscher wesenslogik*, 38
- Left-Wing Hegelians, 185-191, 196, 198, 221
- Lenin, Nicolai, 7-8
- Materialism and Empirico-Criticism*, 7
-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7, 37
- Leninized Hegelian Marxism, 7-8
- Leninist Revolutionary Marxism, 26, 34-36
- Löwith, Karl, 82-83
-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82
- 20 世纪 50 年代的黑格尔复兴
- 《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
- 爱·弗·伊里因科夫
- 内在
- “自在”和“自为”
- 工具理性
- 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
- 亚历山大·科耶夫
- 弗里德里希·科本
- 《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
- 卡尔·考茨基
- 汉斯-于尔根·克拉尔
- 《对〈资本论〉与黑格尔本质逻辑之关系的说明》
- 左翼黑格尔派
- 尼古拉·列宁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哲学笔记》
- 列宁式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 卡尔·洛维特
- 《从黑格尔到尼采》

- Lukacs, Geo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9-14, 56  
*Jenaer Realphilosophie I and II*, 11-12, 14  
*The Young Hegel*, 9-17, 56-57  
 “The System of Ethical Life”, 11-12, 14
- Marcus, Herbert, 55-60  
*Reason and Revolution*, 56, 58  
*Soviet Marxism*, 57, 60  
*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 56, 57
- Marx, Karl, 1-14, 18, 151-226  
*Collected Works of Hegel*, 153  
*Comments on the Latest Prussian Censorship Law*, 143  
 Critique, 206-211  
*Critique of Hegel's Dialectic and Philosophy in General*, 206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204  
*Das Kapital*, 48-49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mocritus' and Epicurus' Philosophy of Nature*, 192-223  
*Epigram on Hegel*, 151, 153  
 First Appropriation of Hegel, 91-92  
*The German Ideology*, 203, 210
- 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  
 《青年黑格尔》  
 “伦理生活制度”
- 赫伯特·马尔库塞  
 《理性与革命》  
 《苏联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
- 卡尔·马克思  
 《黑格尔著作选》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批判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资本论》  
 《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黑格尔。讽刺短诗》  
 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

- Greek city state, 205
- The Holy Family*, 1990202, 210
- Letter to his Father*, Nov. 10, 1837, 152
- method of inquiry, 45-46, 49
- method, 41-48, 226
- method of presentation, 46-48
- modes of cognition; organic, 224
- modes of cognition; externalization, 225
- modes of cognition; tools of cognition, 226
- philosophy of science, 50, 208, 216
- Second Appropriation of Hegel, 49-50, 91-92
- theory of development, 215-222
- Triumph of Faith*, 120-122
- young Marx, 92-93, 117-119
- young Marx and Bauer, 185-191
- young Marx in Berlin, 179
- young Marx and Democritus, 193-196
- young Marx and Epicurus, 171-176, 193-196, 198-220
- young Marx and Hegel, 196-198
- young Marx and Köppen, 179-184
- young Marx and Naturalism, 199-202
- young Marx and Religion, 198-199
- young Marx and the *Science of*
- 希腊城邦国家
- 《神圣家族》
- 《致父亲的信》（1837年11月10日）
- 研究方法
- 方法
- 叙述方法
- 认识模式：有机的
- 认识模式：外化
- 认识模式：认识工具
- 科学哲学
- 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
- 发展理论
- 《信仰的胜利》
- 青年马克思
- 青年马克思和鲍威尔
- 青年马克思在柏林
- 青年马克思和德谟克里特
- 青年马克思和伊壁鸠鲁
- 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
- 青年马克思和科本
- 青年马克思和自然主义
- 青年马克思和宗教
- 青年马克思和《逻辑学》

- Logic, 41-44
- young Marx and the State, 202-206 青年马克思和国家
- Marxism, 89, 133-134, 142-144, 146-147 马克思主义
- modes of cognition, 223-226 认知模式
- Material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5-34, 60, 134-135, 146-147 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 33-34, 80-81, 223 历史唯物主义
- Greek atomism, 193-194 古希腊原子主义
- naturalism, 199-202 自然主义
- mediation, 225 调解
- negation, 155, 164, 212, 226 否定
- Negt, Oskar, 38 奥斯卡·内哥特
- Actualita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 38 《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性及其结果》
- New Hegelian Marxism, 61, 70, 79, 81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
- Nozick, Robert, 74-75 罗伯特·诺齐克
- Anarchy, State, Utopia*, 74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 organic, 162-163, 224 有机的
- objectification, 225 对象化
- Philosophy of identity, 20 同一性哲学
- praxis, 12-13, 216 实践
- rational choice theory, 63-64, 68-69 理性选择理论
- re-Hegelianization, 1-14, 17, 22, 35, 37, 52-55, 61, 76-79, 81-82, 90-91, 153 重新黑格尔化



- Reichelt, Helmut, 42-43  
*Warum hat Marx seine dialektische method versteckt*, 42-43
- Roemer, John, 60, 67-70, 72, 75  
 Analytical Marxism, 67  
 redistributive justice, 69  
 rational choice, 68
- Rosental, Mark M., 37
- Ruge, Arnold, 105, 110-111
- Sartre, Jean-Paul, 27-28  
*A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27  
*In Search of a Method*, 27
- Schelling, Friedrich, 124-127  
 Engels and Schelling, 128-138  
 Hegel and Schelling, 124-127, 135-137  
 Marx and Schelling, 209-210
- Schmidt, Alfred, 37-42, 49-50, 56, 73, 79  
*Beitra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38  
*History and Structure*, 37, 49-50  
 logico-historical, 38-39, 41-44  
 materialist Hegel reception, 37
- Second International Marxism, 4-6
- Smith, Tony, 61, 70, 75-79  
 analytic regressive method, 77-78  
*Dialectical Social Thought and Its*
- 赫尔穆特·艾香德  
 《马克思为什么遮蔽自己的辩证法》
- 约翰·罗默  
 分析马克思主义  
 再分配正义  
 理性选择
- 马克·罗森塔尔
- 阿诺德·卢格
- 让-保罗·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  
 《对一种方法的寻求》
- 弗里德里希·谢林  
 恩格斯和谢林  
 黑格尔和谢林
- 马克思和谢林
-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文集》  
 《历史与结构》  
 逻辑的历史的  
 黑格尔接受的唯物主义
-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
- 托尼·史密斯  
 回归分析法  
 《辩证的社会思想及其

- Critics*, 75-77 批判》
- The Logic of Marx's Capital*, 77 《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
- logico-historical, 79 逻辑的历史
- structural genetic, 79 遗传结构
- synthetic-progressive, 78 综合累进
- social ontology, 15-17 社会本体论
- Soviet Marxism, 8-9, 26-28, 34-35, 37 苏联马克思主义
- Spinoza, Benedict, 27, 29-30, 32-33 贝内迪特·斯宾诺莎
- Spirit, 166, 206 精神
- Stalin, Josef, 9 约瑟夫·斯大林
- Stalinism, 6, 25-26, 34, 36-37, 60 斯大林主义
- Stoicism, Epicureanism, Skeptics, 171-176 斯多葛主义, 伊壁鸠鲁主义, 怀疑主义
- Epicurus, 193-196, 198-205, 210-215, 218-220 伊壁鸠鲁
- subjectivity, 29, 155, 159, 206, 216, 223 主体性
- subject-object, 12-13, 18, 20 主体—客体
- substance, 29, 208 实体
- substructure-superstructure, 70 基础—上层建筑
- subsumption, 162-163 类别
- synchronic, 49, 76, 82 共识
- Taylor, Charles, 30 查尔斯·泰勒
- teleology, 155-156 目的论
- theory-practice, 18, 20, 216-220 理论—实践
- totality, 29, 162, 220, 223-224 总体
- Toews, John, 83 约翰·托厄斯

- Hegelianism*, 83
- universal-particular, 18, 20, 164, 225
- van Parijs, Philippe, 61, 79-80
-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80
- functional explanation, 80-81
- Marxism Recycled*, 80
- West European Marxism, 6-7
- whole-parts, 19-20, 163, 220, 225
- Wright, Erik Olin, 79
- Young German Movement, 106-111
- Young Hegelians, 110-111, 119
- Zeleny, Jindrich, 37-38, 41-42, 73, 79
- The Logic of Marx*, 37-38
- 《黑格尔主义》
- 普遍—特殊
- 菲利普·范·帕里斯
- 《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解释》
- 功能解释
-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 西欧马克思主义
- 整体—部分
- 埃里克·欧林·赖特
- 青年德意志运动
- 青年黑格尔派
- 英德日赫·泽兰尼
- 《马克思的逻辑》

## 译后记

诺曼·莱文教授是美国学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著名学者，他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辩证法内部的对话》等著作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引起了国际马克思学界的重视，不少学者围绕这些观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作为《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第一卷，《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借用”黑格尔的角度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加以比较研究，同时例举了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施密特、伊波利特、马尔库塞、乔恩·埃尔斯特、罗默、科亨、托尼·史密斯等学者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或“重新黑格尔化”的思路与问题，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主义基础》关注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3卷收录的笔记、手稿、论文和小册子，特别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青年恩格斯的政论、文学评论；此外还有反映马克思主要研究方法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以及恩格斯晚年的名著《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书中还引用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与亲友的一些重要通信。莱文教授是在哲学史背景中阐述他的观点的，他对黑格尔哲学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多相关文献的引用和评述大多是国内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文本，比如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耶拿现实哲学》第1~2卷，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阿尔都塞的《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回到黑格尔》，施密特的《历史与结构》，巴克豪斯的《重建马克思价值理论资料》，内格特的《黑格尔

哲学的活动和结果》，乔恩·埃尔斯特的《酸葡萄》，阿瑟的《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阿多诺的《黑格尔：三篇研究》，范·帕里斯的《社会科学中的革命解释》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施密特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麦卡锡的《马克思的科学批判与实证主义批判》和《马克思与古代思想家》……这些大都是上述西方哲学家不为国内学者熟知的著作，莱文教授对上述哲学家的文本加以比较研究，而且参阅了MEGA（1-32）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了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文本线索，这也是本书重要的学术特色之一。

本书另一个重要的学术特色是以历史的方式把握哲学的发展，在历史视域中比较不同哲学家的思维特质，很多引文往往是人们此前未加注意的。原因大概在于，莱文教授曾以研究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论文获得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德波夫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从事历史学教学与研究，目前担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历史学教授，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有着独特的看法，曾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编纂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从事研究，他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往往从历史角度切入，他总是为自己的结论提出尽可能充分的历史根据。比如本书最后对“马克思的方法”作出简明扼要的规定，但这个规定是在前面洋洋二十余万言的基础上得出的，基于对马克思文本解读史的分析，基于对马克思文本发展脉络的研究，还基于对与马克思哲学相关的哲学家特别是与黑格尔和恩格斯的比较，尽管结论还有待推敲，但这种审慎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莱文教授在书中阐述的很多观点以及使用的某些术语都颇具特色，同时引人深思。但创建并使用“恩格斯主义”来表述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学术传统是否恰当？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修改”是否孤立的理论景观？或曰是否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有关？马克思对“认识”的重视是否超越了对“历史”的重视？将马克思

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自然观加以比较是否合适？马克思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恩格斯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如果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对立”？马克思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审视自然的发展是否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差别是否一定与他们不同的教育背景有关？或曰恩格斯没有受到正规的大学哲学教育是否意味着其著述与思辨一定停留在“业余”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是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失效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独特思辨逻辑是否与历史统一？……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对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相关论点，相信广大读者会有自己的辨别。

本书在行文过程中有几处明显的笔误，比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认为“普列汉诺夫发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其实，“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由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发明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沿用了这个概念，并对狄慈根进行了评价，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 60 周年》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但这个表述是在狄慈根提出这个概念大约四年之后作出的。比如作者在第一章中将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称为“斯大林的罪过”，该报告的名称应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作者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 1842 年，这个表述将该书具体写作时间提前了一年。比如作者在第二章中认为青年恩格斯 1840 年 2 月 8 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写了一封信，其实，那封信写于 1840 年 1 月 21 日。比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表述为“对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的批判”；作者认为马克思 1842 年 4 月 25 日写给卢格的信中包括一篇题为“论宗教的艺术”的文章，其实，这封信写于 1842 年 4 月 27 日；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目录还“有一个附录，但除了一个片断之外，这部分也遗失了”，其实，这个附录是一份手稿，据《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注释，该手稿“批判分析了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其中只有第三张流传下来了，这个片断以前是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的片断’发表的，其实，它在马克思尚未开始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写成，它不属于博士论文，而可能是失传的一部研究古代哲学著作的一部分”。作者认为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个笔记本中“确信黑格尔思想的创造性方面”，其实，早在1972~1973年，德国学者就已考证出该笔记原来认为的第五个笔记本和第六个笔记本次序颠倒，即此处应表述为第五个笔记本。这几处笔误属于全书谨慎论述中的瑕疵，为了不打断作者的行文思路，译者未在正文中标注，而在这里指出，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鲁克俭研究员主编的“国外马克思学译丛”之一，也是莱文教授近年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力作。本书很多重要的学术概念属于莱文教授原创，其中的意蕴耐人寻味，译者在翻译的同时将原文附于其后，以便读者推敲。贯穿本书的众多学术概念的是作者的思辨逻辑和论证习惯，其言说方式可谓颇为独特，莱文教授的表述也不乏文采，这为本书论述增色不少，但翻译颇具美感的思辨文字着实并非易事，此外，莱文教授还使用了不少自然科学的术语或工业生产方面的术语归纳很多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对诸如此类的表述不难“意会”，但用何种话语来“言传”却着实使译者颇费思量，对于上述问题，译者基本上采取以直译为主的原则，但对一些特殊的修辞和隐喻只好以意译的方式处理。

为了便于读者查对原文，译者除翻译每章尾注的解释性文字之外，对“注释”中的英文书目未作翻译，但其中涉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尚未出版的著作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本书参考文献中涉及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仍保留原样，以方便读者查阅外文著作；在翻译“索引”中标识条目的同时，附上了条目的英文和原书页码。此外，对书中概念

缩略语与文本缩略语的全称在脚注中作了相关说明，而“关于作者”部分译自原书。

关于如何准确地翻译本书，以及如何理解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及作者的思想特质，鲁克俭研究员为译者提供了不少建议。关于书中出现的一些德文著作和德文概念，译者请教了汉译《康德著作全集》主编李秋零教授，李秋零教授为译者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意见。

2008年10月，时值莱文教授来华访问，鲁克俭研究员介绍译者与莱文教授相识，译者随后与莱文教授就本书所涉重要学术概念的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莱文教授耐心地回答了译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并给予译者不少鼓励，此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关于生僻难懂的词汇如何更好地切入中文语境，莱文教授提供了详细的英文解释与深入阐释，使译者感到受益匪浅。此外，莱文教授还应邀为本书撰写了中文版序言，他在其中进一步阐发了本书蕴含的思想主题，继而发掘这些理解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现实意义，相信他的序言当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意旨。

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副社长饶涛博士和祁传华编辑对本书的精心编排，同时感谢尹莉莉编辑为联系本书版权所付出的努力。

最后感谢我的爱人姚颖博士，她为我解释了本书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俄文概念，愿以这本译著与她共勉，其实，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每项微小的成绩都是与她的支持分不开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翻译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臧峰宇

2009年2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ISBN 978-7-303-10637-0



9 787303 106370 >

定价：36.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

作者=(美)莱文著；臧峰宇译

页数=322

SS号=12563549

DX号=000006839049

出版日期=2009.12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